

毛泽东

离京巡视纪实

1949—1976

侯波 吕厚民 袁小荣◎编著
钱嗣杰等◎摄影

上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毛泽东 离京巡视纪实

1949—1976

侯波 吕厚民 袁小荣◎编著
钱嗣杰等◎摄影

上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 / 袁小荣编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15-2129-3

I. ①毛… II. ①袁…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4072 号

书 名: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
作 者: 袁小荣
摄 影: 侯 波 吕厚民 钱嗣杰等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银 河 程文静
封面设计: 金 刚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5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952 千字
印 张: 92.25
印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版 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129-3
定 价: 168.00 元 (全三卷)

前 言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出巡活动，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探索的一部分。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禁锢在高墙内，他奔走在各地，和各级地方领导、工人、农民、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交谈、讨论、探索，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寻找建设和革命的办法。经统计，从 1949 年到 1976 年 27 年间，毛泽东在外地的时间有 2943 天，按一年 365 天计算，有 8 年多的时间在外地，所以，说毛泽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是有根据的。了解毛泽东的出巡活动，对于把握毛泽东在各个时期思想的变化、发展，了解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时期的政策变化及历史发展是有益的。

毛泽东的行踪，在当时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知道的人极少。加上已过去几十年的时间，要想搞清楚，难度相当大。近几十年来，虽然出版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文献，但大多局限于在一地或部分活动，没有完整、准确的记述。许多材料仅凭当事人的回忆，缺少文字记载。有的材料难免有误，有些材料甚至相互冲突。

作者经过 30 多年的艰苦工作，收集整理了几百万字有关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出巡活动的资料。按年、按月、按日查证、整理，不断修改、补充，数易其稿。经与铁道部、空军有关专列、专机资料核实，整理出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共 58 次出巡，以及详细的时间、途经路线，形成了在目前来说最接近实际、最完整的毛泽东出巡资料。这 58 次出巡，记述毛泽东乘火车、飞机、轮船在国内的巡视活动，包括毛泽东到外地休息、休假、养病、开会，因为毛泽东到外地休息、休假、养病从来没有中断过调查和工作。而不包括毛泽东在北京及郊区乘汽车的活动，以及两次在苏联的活动。毛泽东在外地的巡视活动，包括大量的讲话、谈话和批示。这些讲话、谈话、

批示是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及回忆文章整理的。本书收集、参考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和材料，作者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压缩、综合和文字修改。有些材料由于各种原因时间记载不准确，作者把这些材料放在了经过考证的可能时间。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一书，其宗旨是尽量保持史实的真实性、准确性、严肃性。时间的误差大体在 24 小时内，因为毛泽东常年坚持夜晚工作，记录时间往往有误。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常常听到一些人的非议，更有人热衷于泼脏水。这没什么奇怪。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他从不奢望所有人的赞许。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有过失和错误。有人对他有些埋怨，可以理解。延安时期，有人诅咒毛泽东没有遭雷劈，毛泽东制止追究，从中体察到老百姓的情绪。他接受了民主人士的建议，精兵简政，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东方红》曾被广为传唱，那就是人民对他为人民谋幸福的肯定。做人民公仆，这是毛泽东一身自觉的追求和政治信条。他不谋私权，把自己与百姓融为一体。他痛恨欺压百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除了公开场合，他衣服和鞋袜上的补丁不比普通人少，他吃的不比一般人好。甚至他不让孩子在食堂吃中灶，只能和一般工作人员一起吃大灶。“文革”中，李讷曾一度担任北京市的领导职务，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让她到江西农村锻炼。毛泽东对自己对孩子的这种要求，是自觉的，没有任何规定、约束、监督，完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条：不脱离群众，不脱离人民。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的金字牌匾就竖立在中南海的门前，但所有共产党人还能像毛泽东那样真心实践它吗？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还在怀念毛泽东。可以肯定，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怀念不会减少，而会发展延续。因为毛泽东作为忠实实践为人民服务的一代伟人，成为人民的一种追求与期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袁小荣

2013 年 9 月

目 录

(上卷)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离京 / 1 /

○ 一 赴苏联及回国途中在国内的巡视活动 2

专列在广袤的东北大地风驰电掣。

跨出国门前和回国返京途中，毛泽东一路调查研究。回程途经哈尔滨、沈阳，当地领导设宴盛情接待，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他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缸中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 二 毛岸英牺牲后，到石家庄短暂休息 13

朝鲜战场，风烟滚滚。

志愿军入朝 40 多天后，毛岸英在美军空袭中壮烈牺牲。为了不在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分毛泽东的心，周总理把毛岸英牺牲的电报暂时搁下。直到 1951 年元旦后，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全线撤退，电报才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强压丧子的悲痛，说：“战争嘛，总要有伤亡。”长叹一声后，又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

○ 三 为处理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到天津 19

刘青山与张子善，一个是前任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在任天津地委书记，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但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忠告，贪污腐败，危害一方。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的干部。

第二章 集中精力谋划国家建设 / 23 /

○ 四 视察黄河中下游，探询治理黄河 24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而治水是毛泽东最为关心的大事之一。1950年下半年他就指出：一定要把水害一条条地治下去，把水害变成水利。1952年10月25日，他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离开北京，到了济南、徐州、开封，一路查看黄河险段。

毛泽东站在黄河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说：“要彻底治理黄河水害，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使黄河永远不泛滥不决口，不改道。”他又对吴芝圃、陈再道、毕占云、王化云等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 五 春节外出，探询长江治理 52

1953年大年初二，毛泽东登上南下专列。此次出巡，他有两个目的，一是探寻农业合作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一是探询治理长江。

毛泽东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稍稍悬空着在地图上移动，一面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他首先指着西北高原问道：从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都不行。毛泽东问：为什么？林一山做了解释。毛泽东手中的红铅笔指向汉中盆地，问：引汉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上的汉江，问：为什么？林一山回答：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与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说：“要驯服这条长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第三章 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十四次离京 / 97 /

○ 六 去杭州起草宪法 98

1953年底，全党的工作开始转向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考虑着手起草新《宪法》。12月24日，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赴杭州。一到杭州，他深入新登县农村，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在杭州，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工作，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 七 视察官厅水库 121

1954年4月11日，毛泽东视察官厅水库。当他来到坝顶时，人们立即欢腾起来，聚集在各个工作中心点上，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欢呼声

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再经过峡谷的回荡，形成了巨大的震撼力量。

毛泽东深深地被这种热烈壮观的场面所感动，不断地向工人们招手示意。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热情地赞扬官厅水库，对水库建成后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风趣地勉励大家：“人怕出名猪怕壮。没有出名想出名，一旦出了名就得要注意。官厅水库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大，你们要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 八 到天津、唐山、秦皇岛探讨工商业改造 127

制定了宪法草案，过渡时期总路线被中央和各省领导接受。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思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考虑在农村逐步实现合作化的同时，如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此，他到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深入考察。

○ 九 1954 年夏天在北戴河 137

1954 年 7 月，中央组织机关的同志到北戴河休假。在北戴河期间，游泳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游泳池很快成了对他的束缚，他要走出泳池，到大江、大河、大海游泳，游泳甚至成了他对大自然的一种挑战。这次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他开始挑战大海。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泳。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

○ 十 赴广州研究“一五”计划 144

1954 年 10 月 31 日，根据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去广州审核修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赴广州和返京途中，毛泽东找沿途五省负责同志开会，还亲自找一些农民谈话，对所传农民苦、粮食紧张做实际调查。他始知问题仍有，但一般尚好，比去年好得多。说农民苦的是富农，他们以此来反对统购统销，而 70% 的农民是拥护统购统销的。

○ 十一 对农村情况初次调查 155

1954 年底，一些部门和人士不断反映，统购统销、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商业改造，引起各地不满和关系紧张，有些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5 年 1 月 2 日晚上，他登上专列，到郑州、徐州、济南、天津巡视一圈，向河南、安徽、山东、天津的领导调查，发现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 十二 对合作化问题再度调查 159

1954 年 10 月到 1955 年上半年，农村工作部反映农村合作化、统购统销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毛泽东登上专列，再

次巡视南方，实地察看农村情况。他到了武汉、杭州、上海，所见所闻和通过卫士回乡调查的结果，与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完全不同。沿途庄稼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毛泽东说，谁说生产消极，农民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

○ 十三 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第三次调查 177

毛泽东回京后找邓子恢做工作，并召开了 15 省农村合作化会议，希望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但遇到了坚决抵制。浙江是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运动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为搞清楚那里的情况，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直奔杭州，第二天就深入新登县视察了农业合作社。他还派身边警卫战士，分头回乡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情况。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离开杭州，毛泽东经南昌、长沙、武汉、郑州、保定，沿途调查研究。

○ 十四 1955 年夏天在北戴河 186

1955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时，直接掌握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权；并做七届六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 十五 在北戴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93

毛泽东再去北戴河，用 11 天工夫，集中精力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亲笔作序，序中说：“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 十六 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商讨农业发展规划 196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已为中央和各地领导所接受。中央开始考虑加快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 年 11 月 1 日，毛泽东去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沿途在天津、德州、济南、泰安、兖州、徐州、蚌埠、滁州、浦口、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松江一路找干部座谈。文件起草后，在杭州、天津召集华东和北方省份的省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形成了《农业十七条》。

○ 十七 征询《农业十七条》意见，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 209

1955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经保定、邢台、郑州、武汉、

长沙、南昌，一路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在杭州，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业发展纲要》。返程途经上海、南京、天津，视察了农村、工厂。

○ 十八 到广州扩大调查 241

1956年春夏，毛泽东仔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各部门的汇报。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毛泽东乘飞机到广州，组织中南等几个省汇报，调查研究，为工业、农业的进一步大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 十九 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 259

这次毛泽东到北戴河休假，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一个月里，几乎天天下海，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第四章 宣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组织反右派斗争 / 261 /

○ 二十 宣讲“百花齐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62

1956年下半年，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共”高潮，国内也有人遥相呼应。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鸣和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共产党整风，以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但这些思想在党内遇到了很大阻力。为此，毛泽东离开北京，直接到基层做群众工作，到各地宣讲他的思想和主张。

○ 二十一 组织反右派斗争 281

毛泽东原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放”而不是“收”。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党内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与此同时，急剧变化的客观环境也迫使他改变了初衷。一些过去的政治盟友，借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建议搞轮流执政，更有人跳出来，公开辱骂共产党，甚至对跟着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进行威胁。这种政治上的挑战，不可能不受到政治上的回击，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反右派斗争已不可避免。

○ 二十二 1957年夏天在北戴河 291

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持续两个多月，青岛会议又对反右派斗争做了总结和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他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 二十三 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调查研究 293

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到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了解整风、反右派、工农业生产情况与群众情绪。

他视察武汉国棉四厂，观看了职工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毛泽东一进工厂就被大道两旁的大字报专栏吸引住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党能领导一切吗？》，公开叫嚷：“共产党只能领导打仗，只能搞土改，搞农村斗争有一套，搞工业生产不行，还是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这张大字报毛泽东从头到尾看得很细，看完以后说：“好家伙！”毛泽东询问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在场的厂领导做了回答。毛泽东又问厂领导你们怕不怕？厂领导回答说：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怕。毛泽东又问，你们能不能顶得住？回答说，我们顶得住！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面前，不要怕，要顶住！

第五章 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七次离京 / 305 /

○ 二十四 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 306

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回到北京，他感到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12月8日离京，到华东停留将近一个月时间，并在杭州、南宁召开会议。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毛泽东用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

○ 二十五 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间隙到济南调查 336

1958年初，“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会间隙，2月5日到济南做调查研究。

○ 二十六 视察东北工业基地 337

毛泽东说：“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 二十七 召开成都、武汉、广州会议 351

3月4日，毛泽东乘飞机离京，在成都召开会议，传达、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冶金、农业、铁道和化工四部部长参加，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到会。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又在武汉召开了武汉会议，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省参加，实际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也可以说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武汉会议后，毛泽东又在广州召开会议，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同时讨论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 二十八 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 405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要亲眼看一看。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此，“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国。

○ 二十九 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457

毛泽东飞抵北戴河，顾不上休息，立刻召集会议，讨论钢铁生产问题。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和主管计划及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各大协作区主任参加会议。

毛泽东感到1958年完成1100万吨钢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于是，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 三十 巡视大炼钢铁 473

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托付给周恩来等人，自己把关注的目光重新转回国内。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安徽、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视察，查看北戴河会议后，钢铁生产的情况。

巡视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我看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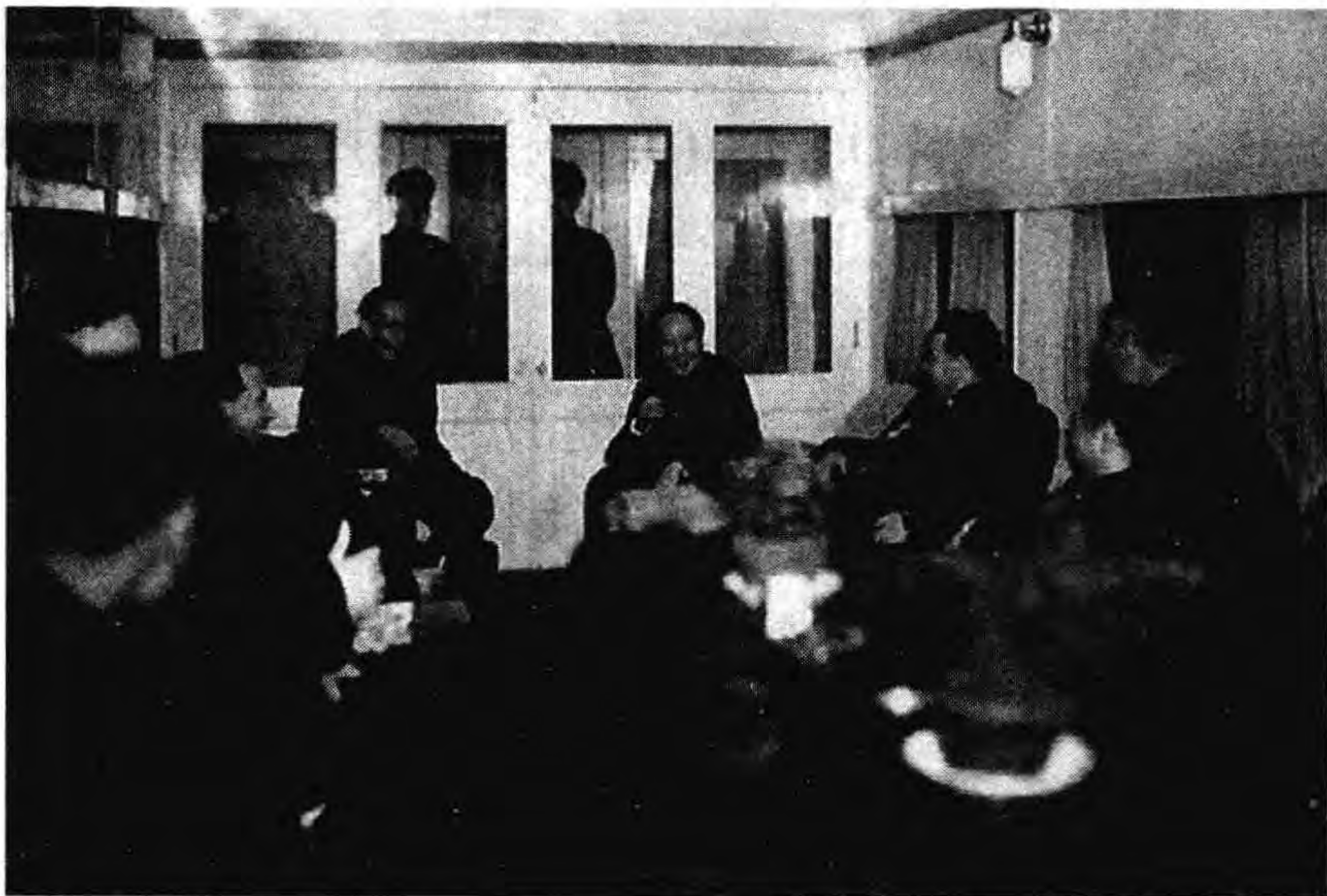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离京



- 赴苏联及回国途中在国内的巡视活动
- 毛岸英牺牲后,到石家庄短暂休息
- 为处理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到天津

一 赴苏联及回国途中在国内的巡视活动

1949年12月毛泽东建国以后第一次外出，是代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到苏联，与苏联政府协商，撤销过去与国民党旧政权签订的条约，订立新的中苏友好条约等事宜，并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毛泽东这次出访，是我们党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毛泽东在苏联境内访问两个多月，但在赴苏及回国返京途中，毛泽东沿途视察，所以算做毛泽东建国以后第一次出巡。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京前政治局的同志到专列上送行。（摄影/徐肖冰）

1949年12月6日晚8时30分，毛泽东由中南海丰泽园出发，从西直门火车站登车。行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到丰泽园送行。随毛泽东访苏的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师哲、陈秉承、沈剑心、田树彬等。随专列护送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①

据可靠记载：临行前，毛泽东对汪东兴宣布了三条纪律：1. 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2. 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政府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3. 沿途不下车，也不要向地方要东西。

盘踞台湾的国民党，为了破坏毛泽东的这次出访，派遣特务、密送武器，纠集国内残匪，企图颠覆列车，暗杀毛泽东。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出访，有关方面组织三个军的兵力在铁路沿线布防。按分工，杨成武护送毛泽东到山海关，后面由东北方面负责。专列乘务人员都是从中央警卫部队里一一挑选的。每到一地，杨奇清等人都要亲自下车检查，并与前方交流情况。

毛泽东的专列经丰台、天津、山海关、沈阳、长春、哈尔滨、博克图到满洲里。

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并不轻松，他关注和思考着国际国内大事。就解放军进军西藏问题给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拍发电报。向杨奇清了解关于对潜伏敌台的侦破情况。在山海关车站，毛泽东曾走下专列。他说：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之理！^②



1949年12月，访苏途中的毛泽东。
(摄影/叶子龙)

^① ^②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08~113页。时锋：《为了领袖的安全》第90~93页。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第176~177页。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途中在东北（左二是罗瑞卿）。（摄影/叶子龙）

过了山海关，毛泽东开始找沿途党政负责同志调查研究，在绥中同县委书记谈话；在锦州同锦州市市长谈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调研的题目太多了，问得太细了，连统计数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过。在沈阳和哈尔滨，毛泽东同当地铁路局负责同志谈话，了解铁路运输生产、管理、职工生活等方面情况。^①

过山海关以后，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暖气管子冻坏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博克图一路修理也没有修好。毛泽东说：“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这火车比老牛车还慢，你们还说胜利品呢，还是美国出的。”“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我历来不相信，有些人迷信洋货，怎么样，结果害了自己。”^②

12月7日，专列到沈阳，高岗一行上了专列。高岗提出，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同意。因为要检修列车暖气管道，毛泽东临时下车

① 《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百年潮》杂志2007年第二、三期。

②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08~113页。时锋：《为了领袖的安全》第90~93页。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第176~177页。《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百年潮》杂志2007年第二、三期。

到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沈阳文化宾馆休息了半天。^①

8日，毛泽东从满洲里跨过国界进入苏联访问。

1950年2月17日，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以后，毛泽东一行离开莫斯科回国。沿途参观考察。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斯大林70寿辰宴会上。

2月23日，毛泽东就回国后行程给王稼祥转刘少奇、高岗一封电报：

王大使转刘少奇高岗二同志：

我们一行因沿途参观今二十三日可到伊尔库次克。计二十六日可到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铁岭各停留一二小时至三四小时，到沈阳拟停留一两天。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尔后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有少数党内党外人士（一百人左右）至车站迎接，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待到北京后方才发表消息。请照此布置为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②

26日下午，毛泽东一行离开苏联国境回到中国满洲里。

这时的毛泽东一行，比去时增加了赶赴苏联，参与中苏友好协议谈判

①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50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268页。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到满洲里车站。（摄影/叶子龙）

的周恩来总理等人和随车返回的寻求中苏支援的越共领导人胡志明。

先期赶到满洲里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以及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东北局书记高岗已在此等候。

26日深夜，专列由满洲里出发。27日上午10点，专列在海拉尔车站停车。列车更换机车，毛泽东、周恩来等到站台上散步。

回到祖国，毛泽东的情绪格外好。在行进的列车上，他一会儿往左看，一会儿往右看，在车厢里来回踱步，思考着祖国的建设。

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东北地域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他还谈到林业、畜牧业、工业等等。^①

27日下午2点15分，专列到达哈尔滨。当时的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哈尔滨市长饶斌等在车站迎接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在省市领导同志的陪同下，经月牙街、红军街、邮政街来到颐园街一号。

^①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74页。

毛泽东听取了省市领导的简要汇报，然后到二楼休息。向陪同上楼的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王化成了解了哈尔滨市的社会情况。

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

这是当时哈尔滨市最大的工厂。沿途，毛泽东对市容看得很仔细，他问身边的省市领导：“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毛泽东对饶斌说：“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啊！”

下午4点左右，毛泽东一行到了车辆厂。毛泽东简单了解了一下厂领导的姓名、隶属关系和大概情况，便提出到车间看看。毛泽东先后看了锻冶分厂、机械分厂。毛泽东勉励工厂领导：“哈尔滨市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这个厂又是全市最大的厂子，所以应给全国做出好样子。”“越是大工厂，越要管理好，发挥好作用。”

在机修分厂，毛泽东主动同一位60岁的老工人握手，老师傅说：“毛主席，您辛苦了！”毛泽东风趣地回答：“咱们都一样。”

毛泽东向工厂的领导询问：工厂还有哪些附属机构？工厂俱乐部都干什么？你们办不办职工夜校？毛泽东说：工人政治是要学的，还应多学点文化技术。毛泽东问工厂领导：你会管工厂吧？厂领导摇头说：不懂，是新调来管业务的。毛泽东说：不懂就学。我们都不懂，我们都要学。要好好学会管理工厂，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必须学好。

离厂前，毛泽东同工厂职工见面，并同工人们握手问好。

下午5点，在返回颐园街一号途中，毛泽东、周恩来又在省市领导陪同下，登上哈尔滨国际旅行社楼顶平台，俯望哈尔滨市的全貌。毛泽东若有所思，对省市领导说：“应该把哈尔滨由消费城市建设成为生产城市。”^①

晚上6点多，毛泽东、周恩来回到颐园街一号，又不辞劳苦地接见了省委书记张策、副省长李延禄、哈尔滨市市长饶斌、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以及郑一平、苏生等。

有的同志关切地说：“主席，这次行程万里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去的时候是坐老牛车，前边拉后边推，才上了兴安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省市领导一定请毛泽东对松江地区的工作指指方向。毛泽东喝一口茶，

^①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78~179页。

吸一口烟，慢慢地说：“我们刚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镇压反革命。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项是重点。”在具体谈到松江省工作时，他说：“一定要发挥你们自己的优势，把粮食抓上去。黑龙江是个好地方，过去只听说过，这次在火车上亲眼看看，果然名不虚传。你们要把这个自然优势利用起来，特别是荒草原、森林等资源，把它们改造成为畜牧基地、森林基地、粮食基地，那就太可观了。当然，这需要很多工作，克服很多困难。”说到这里他看了大家一眼问：“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啊？”省市领导都说有决心。毛泽东说：“对，应该有个雄心壮志。”周总理又补充说：“在恢复经济的同时要有个计划，把新的建设统筹考虑进去。”^①

毛泽东吸着烟说：“现在大家都进城了，住上了楼房、洋房，还坐上了小汽车，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了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任何时候都不要忘掉革命的优良传统！”

周恩来说：“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还要保持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必须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我们共产党人才可以考虑办一办自己个人的事。如果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②

这天晚上，省市领导在颐园街一号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举行了便宴，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专门请来了同车回来的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便宴搞得很丰盛，由于胡志明在场，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只在两三个盘中夹菜，吃了半碗米饭，其他都没有动。饭后，毛泽东对饶斌市长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③

吃过饭，毛泽东回二楼办公室看报。他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和大家闲聊，看着，聊着，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打住了原来的话题，询问当地领导，

① ③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80页。

② 引自1984年9月叶子龙座谈手记。

为什么街道上没有人，“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小巴黎之称，人们都喜欢夜生活。”毛泽东说，“分明是我来了，你们设了些障碍，限制了人家的自由。”毛泽东走到桌边，写了一张条子交给警卫人员，上面写着“撤岗”两字。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住上了高楼大厦，不要忘掉延安的土窑洞哟。咱们进城了，可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当晚，毛泽东应省市领导的请求，为他们题词。毛泽东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为市委题词：“发展生产”。为市第二届团代会题词：“学习马列主义”。还为《松江日报》题写了报头。省市领导还有再让毛泽东题几份的意思，毛泽东笑着说：“能把这些做好就很好了嘛！”^①

晚上，毛泽东让卫士换上硬板床，换上自带的行李——已用了多年的两面白的被子、两条灰毛毯和毛巾被、荞麦皮枕头。毛泽东说：“搞那么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如果到一个地方换一套，我用了别人怎么用？那是一种浪费！”毛泽东晚上依床看书，大约12点休息。

28日早上，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登车离开哈尔滨。

中午12点40分，毛泽东一行到达长春。东北局、吉林省、长春市的领导在车站迎接。

毛泽东坐上小轿车，参观了长春市容和八大处。当车开到市区时，大街小巷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他的追问下，当地领导作了种种解释，毛泽东为此动了气，批评道：“你们在说假话。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②

参观市容后，毛泽东被安排在长春银行大楼休息。稍后，他又参观了伪满洲国皇宫，伪满办事的地方。因为受到批评，解除了戒严，老百姓都出来了，毛泽东这才消了气。

28日，毛泽东离开长春到沈阳。住在当时的铁道宾馆（大和旅社，现在的和平宾馆即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沈阳文化宾馆）。毛泽东、周恩来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见面后马上听取汇报。为了让毛泽东休息，汇报时间不长，周恩来对大家说了主席在沈阳的活动安排，而后宣布今天

^①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第103页。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81页。

^②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83~184页。

会议就到这里。

毛泽东稍事休息，由高岗等陪同到食堂就餐。一进餐厅，毛泽东的脸就沉了下来。毛泽东、周恩来先让胡志明主席就座。餐中，毛泽东只吃了眼前的空心菜等几种菜，吃了点饭，喝了几口葡萄酒，并礼节性地让胡志明多吃多喝。不大一会他便放下筷子，吸起烟来。整个晚饭用了半个多小时。

饭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对这种讲排场的现象提出批评：“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3月1日，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上讲话。

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恢复经济建设问题；肃清反革命、国民党残余势力问题；而重点讲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毛泽东说：“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存在问题，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他稍微顿了一下，开始讲起这几天的亲身经历：“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中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①

这次毛泽东途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对有些干部思想作风是不满意、不高兴的。

晚上，东北局在和平宾馆举行了文艺晚会，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看，表示对毛主席、周总理访苏胜利归来的祝贺。另外，当时在沈阳有不少延安来的干部，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也想借这个机会见见面。所以这个晚会主观愿望是好的，整个气氛也是很好的。

晚会上，表演了不少传统节目，除了京剧片断，还有陕北民歌，特别是延安时期的流行歌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一下子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战斗年代。

文艺节目之后是跳交际舞，毛泽东历来把这种场合当作他调查研究的

^①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85~186页。

好机会。这次也是如此。他听取了一个舞伴向他汇报情况，直到他们认为谈完了才开始跳舞。

2日，毛泽东参观了沈阳故宫博物馆，参观了沈阳卫生学校，并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3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看望了在沈阳的苏联专家，听取了他们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毛泽东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毛泽东的意见是说：我们已经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是要建设好我们的祖国，造福于人民。^①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还同高岗、林枫等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议需要在东北地区贯彻实施的问题交换意见。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到沈阳市橡胶厂视察。这个厂在郊区，路不好走，下午4点才到。毛泽东视察了每个车间，仔细地看了工人的操作。询问了工人的生活、工作情况。临离厂时和工人群众见了面。

3日晚，毛泽东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

^①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187页。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72页。

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①

周总理在会上讲道：这次苏联给我们的贷款，绝大部分中央给了东北，这是“因为东北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于全国影响是很大的，有局部然后才能有全国”^②。

当天晚上，毛泽东登上专列，告别了沈阳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

4日，专列途经山海关。毛泽东、周恩来下车去看了看山海关。因为刚解放不久，“天下第一关”城楼缺门断户，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此停留不久就离开了。

按照警卫分工，北京卫戍司令杨成武在山海关迎接专列，并护送毛泽东返京。

列车开动后，毛泽东把杨成武召到他的车厢。毛泽东谈了傅作义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功劳。毛泽东说，地方上军队上有些同志对我们任用傅作义有意见，有些还很尖锐，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新革命。还有什么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毛泽东问杨成武有没有听到这种说法？杨成武如实回答：听到过这种反映。于是毛泽东向杨成武做了解释，说明了要团结各方面人士，各方面力量，以利于建设新中国，使民族大家庭更加兴旺。^③

晚上，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车站迎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5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 27 页。

③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 243~247 页。

二 毛岸英牺牲后，到石家庄短暂休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组成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入朝参战。身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毅然把自己亲爱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朝鲜。40多天以后，11月25日正在坚持工作的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遭美机燃烧弹轰炸，与战友高瑞欣一起光荣牺牲。当夜，彭德怀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电告毛泽东。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总理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很大，他不愿在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全线撤退。这一天，周恩来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并附信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毛泽东、江青）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电报由叶子龙送交正在新六所的毛泽东。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毛泽东强压着悲痛说：“战争嘛，总要有伤亡。”^①

据《杨尚昆日记》记载：“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德胜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②

1月25日，“联合国军”趁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第四次战役。看到战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99、112页。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56页。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上卷，第196~198页。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69页。

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彭德怀十分焦急，于2月21日飞到北京，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到中南海，又赶往新六所。^①

2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认为国内支持朝鲜前线很不得力，造成志愿军大量不必要的伤亡，因而在会上大发脾气，使会议不欢而散。^②

26日至28日，周恩来两次陪彭德怀去新六所毛泽东处。讨论国内部队轮流出国参战，空军出动计划，炮兵、坦克兵出动时间，以及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等事宜。^③

这件事情处理完后，中央考虑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精神痛苦，和编选《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决定让他到北京“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

26日，毛泽东曾决定27日下午5时动身去石家庄。下午又改为28日出发。^④后又因故推迟。

28日，周恩来再次陪彭德怀去新六所毛泽东处。讨论国内部队轮流出国参战，空军出动计划，炮兵、坦克兵出动时间，以及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等事宜。^⑤

3月1日，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当日，彭德怀飞沈阳，与高岗讨论后方支持问题。3日，周恩来致电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通报彭在北京商谈后，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⑥

2日夜，毛泽东离开新六所出发，冒雪从清华园车站乘车，去石家庄。到保定车站时大雪仍然在下，考虑到三更半夜下雪天到石家庄主人不便，毛泽东决定在保定过夜，专列停在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桃上村附近的岔道过夜。^⑦

3日，毛泽东到石家庄。住在当时石家庄市郊的石家庄保育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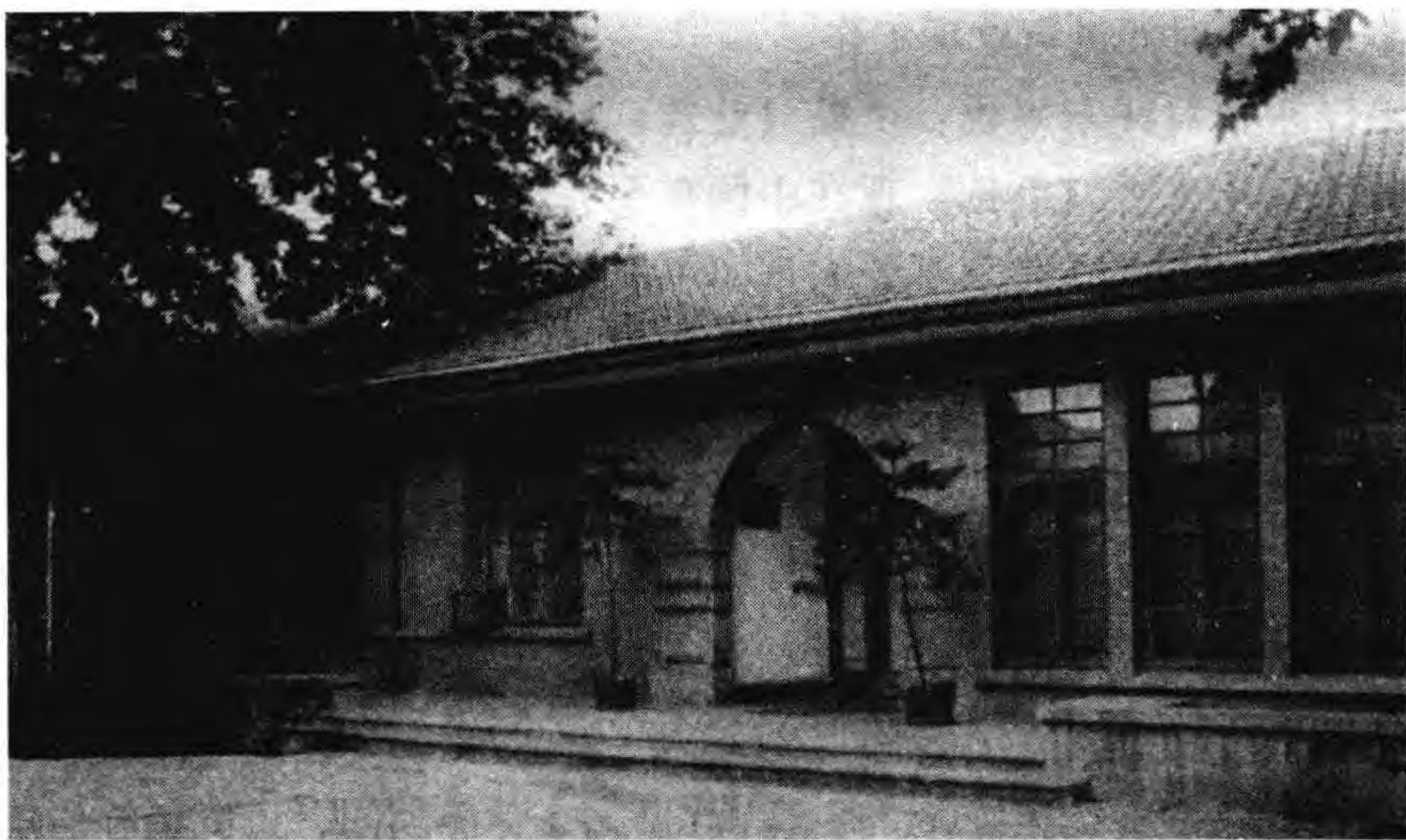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0页。

② ③ ⑤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0页。

④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81~82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51~15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81页。

⑦ 保定停车根据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385~388页。



毛泽东在石家庄修养期间的驻地原石家庄保育院。

陪同毛泽东到石家庄的有，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随他在石家庄居住的有秘书叶子龙。

在石家庄休息的毛泽东，作息时间和过去一样，一般早上8点左右睡下，下午三四点钟起床，然后工作。除了伏案工作，唯一的休息就是在院中散步。有时兴致上来，还对着空旷的院子唱两声京剧、或湖南花鼓戏，以调节一下神经，间或散散步。偶尔和工作人员打打扑克，然后又伏案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所以，名曰休息，实际上他并没有从繁忙的工作中摆脱出来。

他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修改和选编《毛泽东选集》的工作。每天还要处理送来的大量来电来信。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三项中心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和大量的批语，领导和指挥各项运动的开展。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主要做了三件事：

1. 编辑《毛泽东选集》。编辑《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在石家庄休养期间的主要任务。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最早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提出来的。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编选《毛泽东选集》的决议，并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负责整理稿件，最后定稿则由毛泽东亲自完成。编辑工作开始以后，由于工作繁忙，有不少稿件因为毛泽东没有时间审定而不能定稿。因此，这次休养，正好使他

可以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这项工作。

毛泽东曾对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①

毛泽东对每篇文稿都详审细阅，反复斟酌。除对每篇文章和文稿修改外，对题解和注释也逐条进行了审改。“看一遍”、“再看一遍”、“校后再送我看”，毛泽东在选编《毛泽东选集》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心血。

2. 指导全国的镇反运动。在休养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批阅最多的就是关于镇反的文件，几乎天天都有。

3. 继续关注着抗美援朝。毛泽东在石家庄休养期间，正值朝鲜战场第四次战役时期。毛泽东身在保育院住所，仍然注意着朝鲜战局。

4 月份，石家庄市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市里接连召开了几次万人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几批反革命分子。一次，毛泽东听说市里又要在离住地不远的人民体育场（今中山路体育场）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便提出要看看公判会，看看是怎样镇压反革命的。市委领导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进行了说明和劝阻，但毛泽东对镇反工作仍是放心不下。

一天，主席在院中散步，他问身旁的汪东兴，现在全国镇反，我们警卫连的战士恨不恨反革命呀？汪东兴回答：“恨，非常恨。我们经常组织战士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学习报纸和时事，战士们都控诉反革命罪行，坚决拥护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罪行，坚决拥护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决策。”主席听了点头说：“噢，这很好啊！”^②

在石家庄期间，毛泽东曾与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工作、共商国事。毛泽东还审阅并修改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在这里，他还会见了秘密来华的日共领导德田球一。招待他看了反映国民党反动派在红军撤离井冈山后对根据地人民镇压的电影《翠岗红旗》，边看边给德田介绍当时的历史和背景。在此期间，工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39~140 页。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 59~60 页。

人员还为毛泽东放映了《白毛女》、《大地重光》、《胜利重逢》以及《义犬救主》等新影片。

一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招呼卫士开车外出散步，三辆汽车从住地出发，沿石（家庄）获（鹿）公路一直向西驶去。从车窗往外一望，远处群山巍峨，公路两侧返青的麦苗嫩绿可爱。这天，毛泽东心情非常好，不时从车内向路旁麦田眺望。车子开进山脚下的一处地方，他看到路旁麦田里有老乡在干活，便让车停了下来，他下车走到麦田，一边弯腰俯看小麦长势，一边与农民交谈起来。

毛泽东问：“前面那座山叫什么山？”老乡们回答说：“叫抱犊寨。”“为什么叫抱犊寨呢？”毛泽东问。老乡们介绍说：传说过去老百姓上山干活，因为山高坡陡，老牛上去了，跟在后面的小牛犊上不去，急得乱蹦乱跳；老牛见小牛没上来也不肯安生干活，最后只好由人把小牛犊抱上去，老牛才安安生生干活，小牛也不乱蹦乱跳了。

听了老乡的介绍，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接着，他又关切地询问了麦子如何看长势？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现在农民生活怎样？附近的农民见到毛主席，都围拢过来，毛泽东同他们谈了好一会儿才返回了住所。

得知毛泽东外出情况后，石家庄市委领导为毛泽东的安全而深感不安。就在这段时间，石家庄刚破获了一次反革命暴动。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美蒋特务加紧了活动。当晚，他们向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作了反映，叶子龙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笑着说：“好，尊重他们的意见，以后不出去了。”^①

27日，毛泽东准备返京，临行前接见了市委书记毛铎、副市长臧伯平、公安局长封云埔等。

毛泽东说：来石家庄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今天要回北京了，特意把你们找来谈谈。接着又说：石家庄这个地方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石家庄往西是井陉口和娘子关，可通往山西腹地，石家庄就像通往山西的门户，故曰石门。国民党不就是把石家庄叫做石门吗！所以，我们首先解放了石家庄，这是对国民党的沉重打击。这对孤立北平，解放北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询问了石家庄有多少人口、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市

^①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61~62页。

委领导一一做了回答。在谈到建设石家庄时，毛泽东特别指出：石家庄附近土地肥沃，你们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这对于支持城市建设很重要。你们还要下点功夫多打一些井，还可以把滹沱河水引来浇地。毛泽东还询问了石家庄的文化教育情况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情况。^①

4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返回北京。

^① 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62~63页。

三 为处理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到天津

1951年12月27日，毛泽东到天津视察。

在天津干部俱乐部附近一幢楼里，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同志的汇报。当时在场的还有天津的劳动模范潘长有、李兆珍等同志。据潘长有回忆：“毛主席当时讲了许多话，只记得其中有关于张国焘闹分裂的问题。”毛泽东此次去天津，正是中央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最后阶段。刘青山、张子善一个是前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现任天津地委书记，都是当时的父母官。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八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毛泽东这时来到天津，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就是同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有关。毛泽东这次天津之行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即批示将关于刘青山、张子善问题的新闻稿在第二天见报。

毛泽东同天津市的领导谈话以后，由当地领导陪同到准备建设水上公园的地方视察。这里当时还是一片窑地。毛泽东到此视察时，两边路旁站满了群众。视察了水上公园的建筑地址，毛泽东又参观了当时正在举行的华北物资交流会。毛泽东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对农业馆。



1951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天津参观华北区物资交流展览会。(摄影/侯波)

然后，毛泽东在黄敬的陪同下，到天津工商联合会主席李烛尘家拜访。建国后李烛尘参加全国政协主席团，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谈话中毛泽东关心李烛尘的健康，说常跑北京辛苦，建议他把家搬到北京去。

29日，毛泽东返回北京。

当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了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天，毛泽东在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罪行报道的新闻稿上批示：“照发。应予三十日见报”。^①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第156页。

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对华北局和中央的量刑有些想不通，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能否给个改造机会。

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这个道理。^①

1952 年 1 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下达了判决书。

1952 年 2 月 10 日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217~218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第 157~158 页。

第二章

集中精力谋划国家建设



- 视察黄河中下游，探询治理黄河
- 春节外出，探询长江治理

四 视察黄河中下游，探询治理黄河

1952年下半年，“三反”、“五反”胜利结束，国内财政经济状况基本稳定，朝鲜战争边打、边谈、边稳，从9月18日至10月底的全线反击，一个月歼敌三万以上。10月24日，毛泽东发电祝贺。

朝鲜战争后期，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考虑国家建设。而治水是毛泽东当时关心的一件大事。1950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曾指出：从明年起一定要把水害一条条地治下去，把水害变成水利。^①

10月25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离开北京到黄河中下游视察。晚上9点多出发，10点专列离开北京。

毛泽东对罗瑞卿交待：这次出去是休息，不管走到哪个省市，一不扰民，二不谈工作，不召见，不吃请，不住宾馆和机关，食宿在车上。^②这次随行的有罗瑞卿、滕代远、杨尚昆、叶子龙、汪东兴。

晚上，专列途经天津。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市长吴德在车站迎接。毛泽东由吴德陪同，登门到李烛尘家拜访。当时，“三反”、“五反”刚刚结束，资产阶级还心有余悸。毛泽东为了使李烛尘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在和李烛尘见面谈话时，把吴德同志留在外面。谈话后，毛泽东邀李烛尘和他一起南下视察。

26日上午，在黄敬、吴德、万晓塘、黄火青的陪同下，毛泽东带着李烛尘，视察了刚刚修好的天津新港。随后，沿京浦线南下。

^① 《周恩来传》第1051页。

^②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08、142页。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视察天津新港。（摄影/侯波）

晚上6点左右，专列途经济南。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山东省委、济南市的一些领导同志、公安局长李士英等在车站迎接。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正在上海开会。

在专列上，毛泽东向大家说明来意，并且表示不想下车打扰地方同志。接着毛泽东听取了省市领导的简单汇报。中间，毛泽东多有插话和提问。谈话差不多了，许世友邀请主席到济南看看，看看趵突泉、大明湖、北极阁，并提到淮海战役王耀武的指挥所就在北极阁。在许世友的盛情邀请下，毛泽东同意下车，第二天在济南巡视。

毛泽东被安排到山东交际处。他对许世友和省市领导说：“我来不扰民，不害民，随便下来看看，你们分局的同志该干什么干什么。”^①

毛泽东问了山东工农业产值情况和发展地方工业等问题。接着又问了秋征粮食问题。

毛泽东说：“民以食为天，我们作领导的，一定要有群众观点，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征过头粮，否则老百姓是要骂娘的！”^②

① 魏余秀、邹庆忠编：《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第30页。

②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9页。

休息前，毛泽东让李银桥去图书馆帮他借《历城县志》，因为找不到，只借到了《济南府志》。毛泽东借的还有蒲松龄的一些著作。

27日早上，毛泽东由许世友陪同，登上四里山，凭吊了黄祖炎同志。黄祖炎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951年3月被反革命分子枪杀。

上午，毛泽东由许世友陪同，李宇超当导游，游览了趵突泉。

中午，返回住地吃过午饭，下午2点，毛泽东游览大明湖。在北极阁，毛泽东问许世友，攻打济南时是怎么活捉到王耀武的。

游览了大明湖，毛泽东要求去济南泺口黄河大坝。

因为事先没有准备，罗瑞卿和山东陪同人员都劝毛泽东不要去了。但毛泽东坚持一定要去。在许世友和省市领导陪同下，毛泽东来到山东黄河历史上频频决口的泺口黄河段。

毛泽东站在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问道：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要高出多少？陪同的人回答：高出六到七米。毛泽东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①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观看珍珠泉。（摄影/侯波）

^①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28~3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8页。

改造黄河，兴利除害，这是毛泽东利用休假时间，一定要沿黄河走走看看的本意。

毛泽东想了解黄河在山东段的情况，陪同的当地领导没人能答得出来。这时天已黄昏，刮起了风，大家劝主席回去，并说，关于黄河问题，请水利科学家专门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看到在黄昏中围观的群众逐渐多起来，才默默地走下大坝返回驻地。

晚上，省委应毛泽东的要求，指派分管水利的负责同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晚饭也是一边谈一边吃。夜里9点多谈话才结束。

27日晚上，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从上海赶到济南，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已休息。

28日早上，毛泽东和谭震林共进早餐，高克亭在座。毛泽东和谭震林开玩笑说：“你是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饭后，毛泽东听取了谭震林的汇报。

毛泽东对谭震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国，各省都要按照自己的特点，搞好经济建设。”又说：“沪、宁、杭三角洲，经济、文化、科学、教育都比较发达，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基地和农业商品基地。”听说苏北盐城地区的干部群众创造“小江南”的情况，毛泽东称赞说：“苏北人民发动起来了，生气勃勃啊！”并要新华社记者写篇报道。

毛泽东强调，抓生产要深入、细致、踏实，反对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①

当天，谭震林离开济南前往北京。

28日上午，毛泽东在许世友、高克亭的陪同下，登上专列向曲阜前进。沿途，毛泽东和许世友长时间谈论淮海战役的情况。

在路上，毛泽东看到山上光秃秃的，感慨地说：“山上有树就好了。”^②

列车到达泰安车站，毛泽东下车，仰首望泰山，并在站台上散步，同火车司机握手问好。

列车到达兖州，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滕县县委书记王基德。送走滕县

^① 魏余秀、邹庆忠编：《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第38页。

^②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31~34页。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泰安车站。（摄影/侯波）

县委书记，毛泽东下车，从兖州乘汽车，东行30华里来到孔子故里曲阜。

毛泽东参观了孔庙、孔林。下午返回兖州，原准备让主席看看兖州，主席临时改变计划，专列直开徐州。

陪同毛泽东的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吴德从兖州返回天津。高克亭、许世友陪毛泽东去徐州。

从兖州到徐州的专列上，毛泽东继续与许世友谈淮海战役和楚汉之战。

傍晚专列到徐州（当时徐州属山东省）。

列车从北站开到大湖专用线上。这里是郊外，很僻静，毛泽东就住在专列上。这时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由上海赶到徐州，上车向毛泽东问好。为了让主席好好休息，向明、许世友等下车回到徐州市机关招待所。

29日早饭后，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徐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华诚一、张光中。

华诚一表示，事先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愿意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华诚一简单地汇报了徐州“三反”、生产和生活情况，中间主席不时插话，并提出一些问题。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说：这样汇报很好，情况真实。

毛泽东说：这次来徐州主要是休息，随便看看、听听，搞点调查研究，不想多打扰你们的工作。就算旅游吧。

上午，向明、许世友、高克亭、华诚一、张光中陪毛泽东到云龙山。云龙山上有许多古迹，毛泽东重点是看黄河故道。在山顶，毛泽东环视四周，

朝北边指指问：“那是黄河故道吗？”毛泽东说：“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市委、市政府应当及早采取措施，变灾为利。”^①

下山的时候，毛泽东问：“那些山上怎么没有种树？”毛泽东说：“我们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荒山的面貌！”^②

下山后，毛泽东看了范增墓，又乘车看了徐州市容。接着驱车到九里山，看了九里山古战场，到驻九里山的装甲兵部队休息。山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刘涌也在座。部队请主席留下吃午饭，毛泽东笑着说：“不在这里吃，我请你们的客，到我车上吃。”这时主席的专列已从大湖站开到了徐州北站通往九里山机场的一条专用线上。毛泽东请客仍旧是四菜一汤，给每人斟了半杯葡萄酒。

午饭后，向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赶来了。

向明汇报了山东实行义务兵役制试点的情况，毛泽东很重视，要向明写一个报告给中央，并打电话到北京，要重视山东试点的经验。

毛泽东又和曾希圣谈了治淮问题，他指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解决好治淮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还给总理打了电话，要曾希圣去北京汇报治淮情况。^③

这次在徐州，铁道部长滕代远因低血糖晕倒。毛泽东得知后对滕代远说：你的健康情况不好，以后再外出视察工作时，你不要陪同了，派个副手就行啦。

下午5点，毛泽东要去河南看黄河，向明、许世友等要送主席到河南，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徐州云龙山视察黄河。（摄影/侯波）

①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215~216页。

② ③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56、60~61页。

毛泽东笑着说：“不用送了，出了徐州就是河南地盘了。”罗瑞卿说：“李士英可以陪着去。”这样，向明、曾希圣、许世友等都下了车。

晚上9点多，专列到了兰封车站。

河南省委书记张玺、省长吴芝圃、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还有裴孟飞、王化云等已经在车站迎接。张玺请求罗瑞卿：“今天我们请主席到开封去。”罗瑞卿说：“这个不必提了。主席怕打扰，原来不让通知你们，经我们商量，还是临时告诉你们一下。主席今天看了黄河故道和云龙山古迹，很疲劳，已经休息了。今晚不见你们喽，明天早晨，请你们来这里就餐。”

稍候，专列离开兰封站驶进了“兰坝”支线。

30日早上6点50分，张玺等人上了专列，向罗瑞卿、杨尚昆、滕代远、黄敬、李烛尘等谈了视察东坝头的准备工作。

罗瑞卿说：“主席昨天巡视云龙山，累了，还在休息，我们在这儿等一等，不要去打搅他。”

早上，毛泽东起来，他来到铁路附近西北方的一个小村子。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叶子龙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个穷地方。陕北也苦，可是有地种，有窑洞住。这里不行，地里不打粮食，黄河如果决口，就什么都没了。解放几年了，不知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河南兰考农村与农民交谈。（摄影/侯波）

在打谷场上，毛泽东和一位中年农民攀谈。

毛泽东问：“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不咋样呗，哪年不是这样，咱这盐碱地不打粮食哩！”

这位农民抓了一把豆子给毛泽东看。

“负担重不重？”

“负担不重，比‘老蒋’在时轻了好多。”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日子比解放前好多了。”

正谈着，周围聚拢来一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用神奇的眼神望着这位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

毛泽东与这位农民谈了一阵子，又向东边许贡庄的一个农民家中走去。这家老汉赶早集去了，毛泽东一进门，见到老婆婆便说：“老人家，我来看看你，看看你吃的啥子饭，日子过得好不好？”老婆婆赶紧让座，一面让毛泽东喝水，一面说：“今年收成不行。俺们老两口有村上接济着，吃穿不发愁。”老人家顺手取出馍馍篮子，还指着床上的被褥让毛泽东看。毛泽东又掀开床单下的褥子，看看破不破，揭开盆盆罐罐瞧瞧米面还有多少。毛泽东从缸里抓出一把黄豆，豆子既小又干瘪。“像辣椒籽啊！”毛泽东说。这时赶集的老汉回来了，问毛泽东，“俺这里的盐碱地有没有办法治？”毛泽东说：“有办法，利用黄河水嘛？”^①

老人的一句话，记在了毛泽东的心上。

稍后，毛泽东返回专列吃早饭。毛泽东坐到王化云对面问：“化云是哪两个字？”“化是变化的化，云是云雨的云。”“你是啥子时候做治黄工作的？过去做啥子工作？”“过去在冀鲁豫行署工作，1946年3月调到黄委会。”毛泽东说：“化云这个名字很好，化云为雨，化雨为云，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毛泽东简单地询问了张玺、吴芝圃的工作情况后问陈再道：“近来回老家没有？”陈再道答：“长征后一直没顾上回老家。听家乡人说，解放后，经过土改现在有饭吃了，但老区被国民党摧残得太苦了，短期难恢复，现在还很困难。”

毛泽东对李烛尘说：“老根据地的人民，在战争年代付出了很大的牺

^①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第237页。

牲。我们现在集中搞城市，对老区顾及不够，以后要帮助他们。”

谈话中，工作人员将早餐送了上来，毛泽东说：“今天我请客，我天天请客。”^①

饭后，毛泽东、张玺、吴芝圃、陈再道等进入会客室谈话。

毛泽东说：“请你们来，想听听这里的情况。土改后农村有什么变化？战争创伤医治得怎么样？生产生活怎么样？三反运动开展得怎么样？群众负担重不重？”张玺、吴芝圃、陈再道等分别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

毛泽东说：“你们河南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就谈这些吧。我在北京就听邓子恢同志讲，河南这几年工作搞得不错。这次我还想侧重听听治黄工作情况。在山东听了一点，到这里想多听听，黄河的事办不好我睡不好觉。三门峡水电站搞起来有多大作用？对下游有没有影响？黄河到底怎么样？治黄到底怎么搞？”

张玺说：“主席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是不是请黄委会的同志来汇报？”

毛泽东说：“好、好，还是让你们那个‘黄河’来说最好。”^②

张玺把王化云招来，毛泽东的调查开始了。

7点40分，毛泽东开始同王化云谈话。毛泽东问：黄河的灾害主要是水灾，而水灾是怎样形成的呢？王化云说：第一个因素就是暴雨集中的缘故。毛泽东问：洪水暴涨造成了灾害，黄河泛滥、决口、改道是否都是因为暴涨的原因？王化云说：不，还有流沙淤积的特点。毛泽东又问：黄河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泛滥、改道？王化云作了回答。

王化云谈了这几年治黄的工作。毛泽东说：国民党扒堤，共产党复堤、固堤、防汛，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谁是真诚为人民服务的？

这时专列向东坝头开进。毛泽东问：这几年安然无恙，能否说黄河水害已经消除了？

王化云回答：绝对不能。

王化云向毛泽东说了一首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绵滩。

毛泽东说：要彻底治理黄河水害，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使黄河永远不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35~36页。

②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233~234页。

泛滥不决口，不改道。

王化云说：除了严重的水害，还有全流域的严重旱灾。王化云谈了黄河缺水的问题。

毛泽东问：现在我们在黄河问题上任务是什么？

王化云回答：要从根本上治理黄河的水害，制止水土流失、消除黄河流域的旱灾。要利用黄河水来灌溉、发电、通航，促进农业、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毛泽东说：历代的政府花了很多钱为修复河堤，并且设专门的官吏来管理治河，这些官吏虽然许多是腐败和贪污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认真办事的。毛泽东举了嘉靖到万历时的潘季驯，康熙时候的靳圃陈潢。

王化云说：过去治理黄河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问题。

毛泽东问：为什么？

王化云说：黄河上游的水灾，中游的水土流失，中下游的旱灾是互相关联的，根本在于没能控制水和泥沙。

毛泽东问：“泥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么大？”“怎么才能控制？”“《黄河水利规划》有几部分？都有些啥子工程？”“为啥子要搞三门峡工程？”“这个工程建成以后，三门峡以上的黄河河道将会出现啥子情况？”“黄河支、干流的水坝建成后，黄河流域将会发生啥子变化？”“这么多开发计划实施后，水土保持还要不要？”^①

王化云一个一个地作了回答。

11点10分，专列到达东坝头。

王化云对主席说：主席，东坝头到了，今天暂谈到这里吧。

毛泽东看着王化云说：“三门峡这个水库修起来，把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发电、通航，可以研究。”

下车后，王化云向毛泽东介绍了在此迎候的黄河河务局局长袁隆平。

毛泽东一行乘车前往东坝头。

毛泽东问王化云：“这是啥子地方？”“铜瓦厢，清咸丰五年黄河决口的地方。”“黄河为啥子从这里决口？”听了介绍毛泽东说：“这里的坝一定要修好！我们绝不能当咸丰！”毛泽东问：“过去的治河古书，你都看了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39~64页。



1952年10月30日，李烛尘与郑州黄河河务局局长袁隆平陪同毛泽东视察黄河。（摄影/侯波）

吗？”王化云说：“看了一些。”

毛泽东说：“我们治黄，古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你们今后再把大坝修得好一些，黄河就不会决口了吧？王化云和袁隆平说：如果洪水太大，现在的工程顶不住，就是加修大堤，悬河靠两堤束水排洪，实在太危险。还是在上边想办法修水库才行。

毛泽东点了点

头，又问：“黄泛区人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张玺回答：过去逃出去的人，大都回来重建家园了，土改后群众生产劲头很大。国民党搞的那个农场，我们接收了，经过整顿，有了发展，农村的互助合作也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说：反动派制造黄泛区，我们建设黄泛区。他做坏事，我们做好事，谁好谁坏？这么一比较，群众就清楚了。

他又说：你们不但要修好大坝，而且要管好大坝。

袁隆平向毛泽东介绍了东坝头段长任俊华。毛泽东问：“你管多少坝，管多长坝？”

任俊华回答：“这兰封和考城境内的大堤。”

毛泽东问：“现在黄河上有过去国民党的治河人员吗？”

王化云答：“有，都接收了，原工资待遇不变，安排了工作。”

任俊华这天穿了一身新毛呢服，毛泽东问：“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袁隆平答：“他是从解放区调过来的老同志。”

毛泽东说：“将来不论老同志还是新同志，都可以穿呢子么。”

毛泽东离开东坝头修防段，乘汽车顺堤来到了最后一道坝——杨庄。毛泽东向着大片滩地走去，手指一道道一片片淤积的泥沙问袁隆平：“每年来多少泥沙？”

“平均每年淤高一寸左右。”王化云补充说：修堤就是与淤积比赛，不是好办法，关键要在西北黄土高原搞水土保持。

毛泽东从淤滩往回走。王化云对他说：“我们已派人到黄河源头查勘，查勘队已移到了长江上游通天河。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西北、华北的水源不足。”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地方。那虽然是作家笔下说的，但现在你们的查勘队也到了通天河。搞南水北调。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调一些是可以的。能多调一些更好。”

毛泽东走上大堤，想找几个农民谈谈，东张西望了一会，未能如愿，于是大步向堤外的杨庄走去。一连走了几处打谷场，没有碰上一个农民，突然听到有歌声，这是杨庄小学。毛泽东循声走近小学的门口，停住脚。有人要进去，毛泽东摆摆手说：“不要惊动老师上课。”他绕到窗后听了一会，说：“这是讲抗美援朝啊，很好嘛！让娃娃们从小学就受爱国主义教育，待他们长大以后，美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辱我们了。”

毛泽东问张玺：“农村的全面教育办得怎么样了？”

张玺回答：“现在正普及农村教育，80%的儿童上了学，成人扫盲也开展起来了。”

“这样就好，只有将基础教育搞好，使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建设新中国。”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老师讲了约20分钟还不想离开。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依依惜别离开了这所小学。毛泽东夸奖那位老师：“对世界形势、和平大会，抗美援朝都讲得不错。”^①

13点10分，毛泽东一行乘车返回东坝头，登上专列，驶向开封。

午餐时，毛泽东、罗瑞卿、滕代远、张玺、吴芝圃与毛泽东同坐一桌，早餐时，毛泽东移动位置，在王化云对面落座。午餐，毛泽东含着笑，打手势招呼王化云：“黄河，坐这边来。”

桌上放着几个小盘：咸鸭蛋、青菜、鱼、辣子和一碗清汤。饭后，毛泽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64~74页。

东继续和王化云谈话。

毛泽东询问黄河源头的水土保持与入海情况。

毛泽东说：“在东坝头受益匪浅，但没有看出黄河的‘悬河’，悬河，啥地方有？”

王化云解释说：“东坝头改道，河道淤深许多，所以看不出‘悬河’，到开封花园口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问：“悬河，平素高出两岸多少？”

“高出三至五米，封丘曹岗险段，高出八至九米，开封城内地面比黄河低五至六米，如涨大水，悬差更大。”

“哪到开封看‘悬河’吧。”^①毛泽东当即做出决定。

下午3点多专列抵达开封，毛泽东一行换乘汽车去柳园口。

毛泽东在张玺、吴芝圃、王化云的陪同下，爬上了大堤的顶端。举目眺望，大堤北边黄河在地面上奔流，南边农田、村庄、树木落在了坑里，高大的桐树梢比大堤还低了许多。

毛泽东问：“这是什么地方？”

吴芝圃答：“这里叫柳园口。”

“噢！黄河的水面，比这堤外村子里的树头还高，真是悬河！”

吴芝圃向毛泽东介绍了开封多次被黄河淹没的情况。

毛泽东说：“要好好防守，万万不能出事。”

看过“悬河”，毛泽东走下大堤，沿河边折向东边的渡口，他抓了一把泥沙问王化云：“这就是黄土高原冲下来的泥沙么？”

“是的。”

“有多少？”

“据陕县水文站测验，一年平均冲下12.8亿吨。”

渡口处许多人在修一只大船，毛泽东登上船，和工人们聊了起来，他问工人们这船怎么开？能乘多少人？工人们告诉毛泽东，这船曾载着刘邓大军打过黄河，立过功。但他们谁也没认出毛泽东。

毛泽东下船后向前走，渡口边有一家小饭店。毛泽东向罗瑞卿、张玺笑着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吃饭了。”随后问那卖饭的老翁：“有啥子饭？”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74~75页。

“面条。”“我们可以吃一碗么？”老人家赶紧让进里间，他认出了毛泽东，说：别说吃一碗面条，就是掏出心肝来，也报答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啊。老人激动得口吃起来。这时毛泽东的两个卫士上前劝阻，毛泽东才脱了身。

走近大堤，河边也聚着一堆人，过去一看，也是修船工人，毛泽东向他们打了个招呼，与吴芝圃向大堤走去。

走上大堤，吴芝圃向毛泽东介绍说：“往东三十里，就是陈桥渡口，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处，现在还有一座庙，一个石碑一棵系马槐。”

毛泽东说：“没时间去看了。”

张玺问：“是否回开封？”

毛泽东说：“到了开封再看。”

回到开封，毛泽东视察了铁塔和龙亭。

一进龙亭大门，大院中央有一尊孙中山铜像。毛泽东问：“这是谁铸的？”

“冯玉祥。冯玉祥 20 年代，两次主政河南，在开封做了不少好事。”

毛泽东说：“冯玉祥是国民党里的革命派，是个好人。他在开封做好事，这里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毛泽东走近铜像，看到孙中山头部、臂膀和胸前被子弹击了四个弹坑，问吴芝圃：“这四个弹坑是谁打的？”

“日本鬼子打的。”

“孙中山打不倒。”毛泽东列举了孙中山的革命经历，说：“他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谁也打不倒！”

毛泽东登上高大的殿堂，见东门石柱上有康有为的诗文，他默读后，招来秘书说：“把它抄下来，带回去。”

毛泽东又讲了康有为的历史，最后说：“他在同洋务派、顽固派斗争时，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不失为近代改良派的领袖人物。”

这时夜幕降临。毛泽东风趣地说：“还有啥子要看的，今天都看完。”张玺、吴芝圃说：“天黑了，请回休息吧。”

30 日晚，毛泽东下榻开封省军区红洋楼。

在红洋楼，裴孟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牛佩琮、省军区副司令员毕占云在此等候。毛泽东刚一下车，张玺就把他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毕占云是当年井冈山上的特务营长，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他。

“多时不见了，你离开井冈山以后到哪里去了？一别 20 年，你还是像

在井冈山那么精神！”

毛泽东与毕占云在院子里谈了好一阵子。这晚，毛泽东在红洋楼浏览《河南通志》、《汴京志》和龙门十八品帖，翌日一时还未入睡。

晚上，柳园口的几个农民抬着两缸鱼，说是要送给毛主席。原来那个卖饭的老汉看毛泽东没有吃饭，很过意不去，跑到村里，找了几个人下黄河打鱼，挑了50条两斤多重的大鲤鱼，送到省委，一定要转送毛主席，而且执意不肯收钱。

31日凌晨5时，要看“引黄济卫”和“人民胜利渠”工程的毛泽东睡不着，天还未亮，就迫不及待呼唤罗瑞卿促毕占云派车，登上了专列。

张玺、吴芝圃、王化云得到消息，火速赶到火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见到他们，风趣地向王化云说：“化云、化雨化得不错呀。”

张玺对主席说：不知主席会起得这么早。毛泽东说：人没二心，不可早起，为了早点看到“人民胜利渠”么。

张玺对主席说：省委几个同志有意见，要我代表他们与王化云一起把你送到郑州，一则有些事还要向主席请示，二则好让王化云陪你去平原省看“人民胜利渠”。

毛泽东说：“化云不必去了，那边有人。瑞卿同志已做了安排。”



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视察郑州黄河大桥前在黄河边。（摄影/侯波）

吴芝圃、陈再道、毕占云、王化云等下了专列，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①

上午8时，专列离开开封经郑州，折北而行，缓缓地停在了黄河南岸邙山脚下。

毛泽东下车后，张玺、郑州市委书记赵成武、郑州市市长宋致和做向导，沿邙山脚下的阡陌，向邙山顶攀登。

邙山是黄土山，有少许农家窑洞。毛泽东来到一家窑洞，想起当年在延安住过的窑洞，不由地停下脚步。这家农民叫刘宗贤，他认出了毛泽东，急急忙忙用他家的粗瓷碗盛了一碗温开水捧到毛泽东面前，诚挚地说：“毛主席，喝点水解渴吧！”这时卫士匆忙从其随身携带的水壶中倒了一杯茶水，挤上前递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推开卫士递来的茶水，双手从农民手中接过白开水一饮而尽。然后连声对刘宗贤说：“谢谢、谢谢。”

毛泽东告别刘宗贤，继续向上攀登。到了邙山顶，眺望万里黄河。片刻，回到邙山尽头一个名曰“小顶山”的地方在土坎上席地而坐。

他指着黄河和铁桥对张玺、赵武成、宋致和说：“黄河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连年征战、乱砍乱伐，造成的一条害河。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一出三门峡，搞不清会在那里闯乱子。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无论任何情况，绝不能让它出乱子，不然，我是睡不着觉的。”^②

10时许，毛泽东下山登上专列。滕代远将黄河铁桥二段的两位副队长乔廷选、梁世久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幽默地说：“巧了！修桥的，一个姓乔，一个姓



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黄河铁桥上与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摄影/侯波）

^① ^②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88~95、96~99页。

梁，‘乔梁’二字合在一起，恰好是‘桥梁’，真是太好了！”毛泽东听取了两位队长关于大桥加固、维修情况的汇报，表示了肯定。

车到黄河北岸，毛泽东下车，和滕代远、李烛尘一起，向大桥走去。在桥上，毛泽东会见了老工程师刘鸿钧。毛泽东向刘鸿钧询问了建桥的历史、现状、维修加固办法，稳固后还能使用多少年？毛泽东肯定了刘鸿钧的工作，并向他表示感谢。

11时许，专列进了黄河北站。平原省省委书记潘复生、省长晁哲甫、司令员刘致远上了专列。

潘复生、刘致远与毛泽东早就认识，罗瑞卿把晁哲甫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说：“今天，我把你们三个请上车来，因为我这次出来是休息，一不扰民，二不谈工作。”潘复生未等毛泽东说下去，诚恳请示说：“昨晚我们商议，还是请主席到新乡省委机关去休息，与省直党、政、军主要干部见见面。”

因为中央刚刚下了《关于调整省建制决议》，决定指出，从11月30日撤销平原省建制。毛泽东此次到开封又谈到张玺调中央的决定。张玺走后，河南省委书记由潘复生接任。因此，他们希望在平原省委撤销时毛泽东能和大家见面、合影以作纪念。但这些都没有说出来。

“那不就是既扰民又谈工作了么？”毛泽东回头问罗瑞卿，“怎么？我在出北京时，给你谈的那几个不字没有告诉他们？”

罗瑞卿回答：“说过了，说过了。”其实，罗瑞卿前一天已通知他们，“毛泽东这次下来是休息：‘一不扰民，二不谈工作’；不住宾馆和机关，食宿在车上。你们不要准备住处，主席去平原省的主要目的，是要看你们的‘引黄济卫’工程。”

毛泽东摆摆手说：“这次我不到你们省委去住，也不与省直的干部见面。要见面，以后有机会再见吧。”^①

毛泽东岔开话题，直谈治黄问题。“豫北鲁西、直南三地，黄河横贯其间，而且又处于最容易泛滥的地区，在未能治本以前，几乎全系害河。昨天，听王化云同志说，你们的‘引黄济卫’工程搞得很好。”

潘复生汇报了平原省的概况和“引黄济卫”工程的情况。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08~111页。

毛泽东问：“你们为什么要叫‘人民胜利渠’呢？”听了解释，毛泽东赞许地说，“‘人民胜利渠’这个名字好。我今天就是来看你们这个‘胜利’渠的。走，下车！”

毛泽东一行在潘复生、晁哲甫的陪同下，将专列引向“人民胜利渠”的支线站，改乘四面装有栏杆而专供铁路工人使用的平板车，在小火车头牵引下，沿黄河北岸，向“人民胜利渠”首开去。毛泽东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呢服，外套海军呢大衣。登上平板车后，昂首向前，不时与潘复生、晁哲甫说些什么。

“人民胜利渠，是从啥时间测量的？测量了多少地方和面积，费了多少时间？”

12点，毛泽东走下平板车，向“人民胜利渠”走去。黄委会副主任赵明甫、胜利渠段长乔登云在此迎候。他们登上“引黄济卫大坝”。毛泽东一到这里，忘记了疲劳，绕顶峰边沿转了一周，停下脚步，举目四望，走近赵明甫，挥手道：“这大大小小的渠道，建筑有多少？”“正常流量有多少？”“这么多秒立方米水，能给老百姓灌溉多少亩地？”“这么些亩，每年可以增产多少粮食？”“这四十万亩的范围，都是什么县的？”“不晓得这黄河水灌田好不好？”当听说用黄河水灌溉过的土地丰收了，毛泽东满意地笑了。说：“我们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如果每县都能有这样一条渠就好了。”

毛泽东又问：“能不能在黄河下游各县，都搞这样一个闸？”

毛泽东又拉过晁哲甫，手指远方问：“哪南边是邙山么？”

这时潘复生请示毛泽东：“咱们下去到渠畔走走好吗？”

“来了就是要看的，下！”

走下大坝，毛泽东问乔登云：“你原来做什么工作？”

“原来当区长，现在叫我来管闸。”

“管闸责任重大，担子不比当区长轻么！”

走着路，说着话，不多时来到了第一道启闭闸。毛泽东问：“为啥不开闸？”

“现在麦子已种过，不需要水了。”

毛泽东点点头，绕着启闭闸中的启闭机转了一周，停下脚，招来乔登云问：“你们这里有多少工人？工人的生活好吗？”

听说工人生活好，毛泽东说：“你们的工人生活好，人民胜利渠好，

启闭闸好，就是让这‘机器’露着天不好。工人操作、修理机器，是不论风雪和下雨天气的。应该给这部机器盖上一座小房子，让工人在房子里操作，冬天可以防风避寒，夏天可以防雨蔽日，那就更好了。”

下午1点，毛泽东一行人离开第一道启闭闸沿总干渠到第二道启闭闸，他想试试将启闭机启动起来。

“这启闭机需要几个人摇？”

“两人。”

“一个人可以摇动吗？”

“可以。”

毛泽东脱下大衣，放在草地上，卷了卷袖子，将启闭机的摇把攥得紧紧的。挥动两膀，用力摇，但怎么也摇不动。又咬紧牙关，奋力摇，那启闭机动得很慢。大家见状，上来一起摇，启闭机徐徐开起，黄河水由小到大，流进干渠。毛泽东笑着说：“还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

毛泽东问：“这黄河水中有那么多淤泥，淤了庄稼怎么办？”

“下游有清沙地，经沉淀，再放入支渠，这样就解决了淤泥问题。”

下午1点半，潘复生走到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该喂肚子了！”

毛泽东说：“你是东道主，听你的。”

毛泽东一行告别乔登云，在潘复生、晁哲甫等的招呼下，登上“平板车”，沿来时的路线向东北方向开去。

行至黄河北的小铁路支线站，大家换乘毛泽东的专列北上。专列到达新乡后，罗瑞卿、王路宾招呼大家进餐车，准备午餐。

毛泽东借午餐前的机会，把黄敬、李烛尘介绍给大家。中餐是四菜一汤，一瓶葡萄酒，每人一个苹果。毛泽东说：“过去你们请客，今天我请你们吃我的。”

毛泽东就餐速度很快，当潘复生、晁哲甫、赵时甫等还正在进食时，毛泽东已放下筷子，向他的车厢去了。

大约十分钟后，他又返回餐车与潘复生、晁哲甫、赵明甫谈了半个小时问题。

毛泽东问赵明甫：“引黄灌溉分几级？”“都是哪五级？”毛泽东扳着指头，一级一级地数着五级的数。然后问：“这五级都起什么作用？”听完赵明甫的解释，毛泽东说：“这是一级管一级，上级管下级。现在说的都

是渠灌区，你们这里有井灌区没有？效果好不好？”听完解释毛泽东又说：“井水灌田是游击战，渠水灌田是阵地战”。你们的人民胜利渠就是阵地战。你们既要搞阵地战，又要搞游击战。搞阵地战还要用游击战的灌溉办法，搞小畦灌溉。小畦灌溉不但可以省水还可以防止碱化，对增产有利。”毛泽东说：“东北的沟灌是否比较先进，你去过那里吗？”^①

赵明甫说：“东北我没有去过，但听说苏联正在试验沟灌。”

毛泽东对苏联正在试验沟灌的话没有作任何反应，站起来一挥手说：“休息十分钟，直奔饮马口。”

原来，在午餐间毛泽东听赵明甫说，由于“引黄济卫”使古老的卫河增加了10多个甚至40个立方米的流量，因此决定午休后到“引黄济卫”汇口——饮马口看个明白。

十分钟后，毛泽东招呼罗瑞卿：“准备车子，出发饮马口。”

毛泽东一行登上平原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派的小车，在潘复生、晁哲甫的导向下，绕道向新乡繁华闹市区驶去。不料，毛泽东在闹市区乘车瞭望时，被群众发现！顿时车子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欢呼声此起彼伏。王路宾费了很大劲才把毛泽东的车子“解放”出来。吓得罗瑞卿出了一身汗。毛泽东却不顾这些，手指新乡市的建筑，向潘复生、晁哲甫开玩笑说：“天晓得！你们搞的这一大片，可真不少呀！”

车队从新乡市出来，已是下午3点20分。上路后因当时路还未能直达饮马口，毛泽东中途下车，徒步两华里多，向饮马口前进。

路上毛泽东又向晁哲甫发问：“卫河，为什么叫卫河？发源都有些什么地方？你研究过吗？”

“卫河流域面积有多大？支流除了漳河外还有什么河没有？”

“卫河最大流量有多大？比黄河小多少？”

毛泽东看见渠道中有一个机器，便问赵明甫：“那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那是测量水速的计速器。”赵明甫答道。

又走了一段，毛泽东又指着渠中的一只双脚打鱼小舟问：“河里漂浮的那东西是作什么用的？”

赵明甫答：“那是打鱼人用的双脚捕鱼小舟”。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12~126页。

“打鱼小舟？打鱼小舟一只不够了么，为什么要把两只连在一起呢？”

赵明甫向毛泽东述说了这双脚小舟的好处。毛泽东望着资本家出身的李烛尘，语带双关地说：“这是脚踏两只船么。”

到了饮马口，毛泽东把潘复生、晁哲甫等人甩在后面，精神抖擞地抢先站在“江口”以南的河畔上，饶有兴趣地看了又看，然后问潘复生：“农民对‘引黄济卫’有些什么看法？”

潘复生说：“引黄济卫工程落成通水后，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家都说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好。”

毛泽东说：“还是我们的人民好，引黄济卫好。”他原地坐到河畔的草地上看，然后又索性双手合拢，手心向上支撑着脑袋，躺在了草地上。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流水。不多时，毛泽东酣然入睡。短时间休息，毛泽东睁开了眼睛。罗瑞卿等过来问：“主席走累了吧？”

毛泽东说：“到小黄河了，我心里高兴，闪了一个梦，不累不累。”

毛泽东问：“水量增加，水位提高，引起渠道两旁土质碱化怎么办？有什么预防治理办法？”毛泽东想起了兰考那位老农的问话。

有人告诉毛泽东，苏联的经验是在渠道种树。毛泽东表示怀疑。他发现对岸有个牧羊老翁，便匆匆从河南过桥，与那老翁攀谈。毛泽东看到每只羊



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新乡与牧羊人交谈。（摄影/侯波）

的脊背上各涂有红、绿颜色的标记，问：“你的羊怎么都是花的！”

老人说：“这是三家的羊，怕分不开，就染上颜色做个记号。”

毛泽东指着已发白的土地说：“老人家，你有治碱的法子吗？”

老人家摇摇头，他听不懂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失望地返回南岸。

在回程的渠畔上，又碰上四五个带着一两只羊的农民。毛泽东紧走几步，挤在他们中间，与他们攀谈起来：“你们为什么要放羊？”

“搞建设，占了土地，地少了，就来放羊。”

“噢！你们对建设新乡有意见？”

农民们说：“没意见，没意见”。

“政府搞建设，占了你们的土地，影响了生活么？”

农民们说：“政府占了地，给了买地钱。还给家里的年轻人分配了工作，挣工资，养家糊口，不影响生活。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分了地主的房子、地，翻了身，有房住、有地种，还能吃饱肚子。咱农民应该支持国家建设。”

毛泽东说：“唷！你们的思想很进步么！”

毛泽东指着渠道两旁已发白的土地问：“你们对土地碱化有法子治吗？”

一个上年岁的农民回答：“抬田”。

“怎么个抬法？”

“挖沟。挖了沟，土地不是抬高了么？地一高，水就往沟里跑么。”

毛泽东笑了，说：“抬田的法子好，法子好。”

公路到了，毛泽东一行登上汽车，向新乡驶去。^①

晚间，毛泽东在专列上休息。专列停在王路宾安排的原道清线的叉道上。

当晚，毛泽东让罗瑞卿打电话询问能否借到《新乡县志》。书很快送到了毛泽东手里。送书人说：“这书我们还有，请主席留下手边做资料吧！不必再还了。”

第二天离开新乡时，罗瑞卿向送书人转达毛泽东的话：“主席让我转告你们，《新乡县志》看妥以后，再奉还。”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托罗瑞卿给潘复生打电话：“主席要看《中州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27~137页。

志》，问你们那里有没有，如有，可送一部来。”

时隔不久，毛泽东就将《新乡县志》和《中州志》退了回来，并嘱咐说：“《新乡县志》、《中州志》已看完，这两部书上都有平原省图书馆的编号，不能归个人所有，必须完璧归赵奉还原地。”

11月1日，毛泽东开始返京。事前，他做出安排，在安阳作三四个小时的停留，看看举世闻名的小屯和袁世凯的墓地。毛泽东再次交待，这次是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下来看看，不管走到哪里对地方上的工作不过问、不招见、不吃请、不住机关宾馆和招待所，办事食宿全部在车上。

早上，专列向安阳开进。开车不久，有个小站叫潞王坟，毛泽东从掠过车窗里瞥见了车站的牌子，问：“为什么叫潞王坟车站？”省委的同志回答：“潞王坟是明潞简王朱翊镠的墓地。京广线的这个小站设在潞王坟区的东侧，所以小站谓之潞王坟站。”

毛泽东指着路西的山问：“这叫什么山？”

“凤凰山。”

“凤凰山的名字好，无怪潞王要葬在这里。”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潞王坟的情况。然后开始翻看那本《新乡县志》。看过书中关于岳飞的记载，不由得离开座位，双手叉背，踱来踱去。少顷，毛泽东对罗瑞卿说：“瑞卿啊！到了汤阴站，我要下车去看岳庙！”^①

专列在汤阴临时停车。

公安局长苗庆喜奉命在此护路。毛泽东问：“汤阴县人民的生活好吗？”“解放后人民的生活好多了。山区——老解放区比平原新解放区好。”“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搞得怎么样？”

苗庆喜向毛泽东简要地谈了镇反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给汤阴人民除了害，汤阴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毛泽东又问：“汤阴城有电不？”

“没有，现在还没有。”

“现在没有。不要紧，以后慢慢搞就可以。”

在汤阴停车，是毛泽东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要看岳庙，可是这里没有一点准备。苗庆喜赶忙给县政府打电话，让通知县长到车站来。毛泽东等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39~150页。

候多时不见人来，焦急地在站台上转来转去。忽然间毛泽东看见在车站有个小亭子，还有一座碑，毛泽东走到近前，原来是《岳忠武王故里》碑。

毛泽东很认真地读完了碑文，眼睛盯着被锤子敲打的24个小坑问：“这八个立碑人的名字为什么给打掉了？”

苗庆喜回答：“他们都是汉奸，群众恨他们，才给打掉的。”

“汉奸想借岳飞给他自己扬名于世么？这是历史，不必打掉，留下来让做反面教员。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还是遗臭万年。”

当县长王庭文赶到车站，毛泽东和他握手时问：“认识吗？”

“认得，认得。”

毛泽东突然皱起了眉头，王庭文看到毛泽东疑惑不解，说：“去年，我出席华北县长会议，在会上毛主席与我们合影，见过面。”

毛泽东恍然大悟。问：“汤阴县有多少人口？”“你在这里做县长几年了？”“现在搞些啥子？”“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搞得彻底吗？”

毛泽东在询问了汤阴的一般情况后，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岳庙里都有些什么建筑？”“主要建筑有多少？”“那里有岳飞的《满江红》吗？”

“有啊，有。”

“你看过吗？”

“看过，我还会背呢？”

王庭文应毛泽东的要求，背诵了岳飞的《满江红》，又应毛泽东的要求背诵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毛泽东问：“你读过大学吗？”

“没有，我从小参加革命，只读过小学，这都是在工作中学来的。”

毛泽东夸奖说：“你这个县长的脑子不错呀，背得很熟的。现在岳庙怎么样，还好吗？”

“战争年代受到破坏，解放后我们维修了一下。”

“你们给人民办了一件好事，现在群众对岳庙有些什么看法？”

“群众对岳庙很关心，县里不断在那里召开村干部会，又是吃饭睡觉的。群众有意见，不让在那里开会，睡觉。”

“群众有意见，你们以后就不要在那里开会了。群众关心岳庙，就要尊重群众的习惯，不要违背群众的意愿。还应当搞些钱，把坏了的地方修一修，保持古庙的静穆才好。”

毛泽东又问：“岳家有后代没有？现在表现怎样？”

王庭文介绍了岳家后代的情况。毛泽东说：“很好。岳飞是个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气节，好！唔，岳飞是怎么冲到内黄的你能说清楚吗？”

王庭文摇摇头说：“主席，我不懂。”

毛泽东问：“岳庙在哪个方向，离这里有多远路啊？”

“岳庙在城里，在东北方向，离这里约有两华里。”

毛泽东轻声向罗瑞卿、滕代远说：“距这里不算远，你们看怎么样？”

然而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突然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传来。

候车室里，人们从窗口发现了毛泽东，拥挤在窗口喊口号。原本同情毛泽东的罗瑞卿露出踌躇的神情：“请主席去岳庙，顺情入理。即使没有车子送，两华里的路也是可以走去的。但如果要去，还得从城里走，现在你毛泽东已经被发现，很可能传到城里，且不说走到汤阴城的闹市区被人群包围，你毛泽东一出车站之门，就会被发现的人群围拢。”

“主席，天已不早了。很可能安阳站的人已等急了！还是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毛泽东沉着脸，看了看表，已经9点40分了。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不去就不去吧！你罗瑞卿怕我失踪了。”^①

10点钟左右，专列到达安阳。

走下车，毛泽东向迎接的人们扫了一眼，觉得来的人有些多了，不解地说：“怎么？大家都来了”。

潘复生先期赶到安阳，他逐一向毛泽东介绍当地的领导。在介绍安阳行署专员程耀吾时，毛泽东问：“程耀吾，好一个名字啊，耳东陈吗？”

程耀吾逐字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这个名字没有我的名字好。程耀吾，就是你光‘耀’自己，不‘耀’别人；我的名字叫毛泽东，‘泽东’，就是光泽大海，普泽东方。你是安阳人民的专员，为什么只照耀自己，不照耀人民呢？”说完，毛泽东哈哈大笑。程耀吾只好哑然一笑。

毛泽东在车站询问了安阳地区的土改、镇反和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50~163页。

后，登上小汽车向殷都遗址小屯驶去。

在小屯附近，毛泽东下了车，边走边向周围的人说：“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都。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了起来。在历史上，对发展文明的区域曾有过贡献，是有功的。可是他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造重重楼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毛泽东又讲了纣王的暴虐残忍和他失败的原因。他说：“今天来到这里，反见不到什么古了。”

毛泽东问程耀吾：“殷墟面积、范围多大？这里都出土了哪些古物？”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小屯宣布了“戒严令”，但老百姓还是爬上房顶、骑在墙头上，站在竖起的梯子上向这边张望。当地负责导游的干部则向人们喝道：“瞧什么？都下去，待在家里不准出来，不准瞧！”

毛泽东向房上、墙头的人看了一眼，不满地说：“你们专搞些让我脱离群众的名堂，让那些老百姓都下来么，我又没长三头六臂。”

参观了小屯，毛泽东上车，要到安阳市里看看市容，罗瑞卿提议：“不下车，车缓行，乘车瞭望。”从大院街、唐子巷瞭望了文峰塔后，由南穿西大街向东，在十字大街转南口向北，经城隍庙门口，瞭望了旧县衙、城隍庙、高阁寺，冲着鼓楼驶去。在中山中街，毛泽东看见一家新华书店，突然呼唤司机：“停车！”他要像普通人一样到书店里去瞧瞧，去寻觅、猎取他所喜爱的图书和古籍。

“你要干什么？”罗瑞卿急切地问。

“我到书店里看看。”

“不行！”罗瑞卿快步下车，伸出双手，扶住了正要下车的毛泽东，把他缓缓地推进了车里。扒开了刚刚围拢过来的人群，罗瑞卿很快地上车，关上了车门。

毛泽东在车里发了脾气：“在汤阴下了车，你们不让我看岳庙，现在，又不准我进书店，为了啥子呀？”

罗瑞卿没有回答，只是下令：“开车！”车很快开到袁世凯的墓地袁墓。毛泽东下车，在潘复生等人的陪同下沿北神道，越过牌楼，进入墓区。毛泽东进碑亭，入飨堂，穿过后堂门，绕袁墓一周，登上袁墓之颠，环顾远方，然后缓步走下袁墓，在一块条石上休息。

毛泽东在这里讲述了袁世凯的罪恶历史。有人提议，“袁世凯恶贯满

盈，他的坟应当平掉。”

毛泽东说：“不要平吗，要把它保护好，留作反面教材么。”

下午2点，毛泽东上车返回车站。因为毛泽东的车快，当毛泽东一行到达车站后，还有一些当地领导的车没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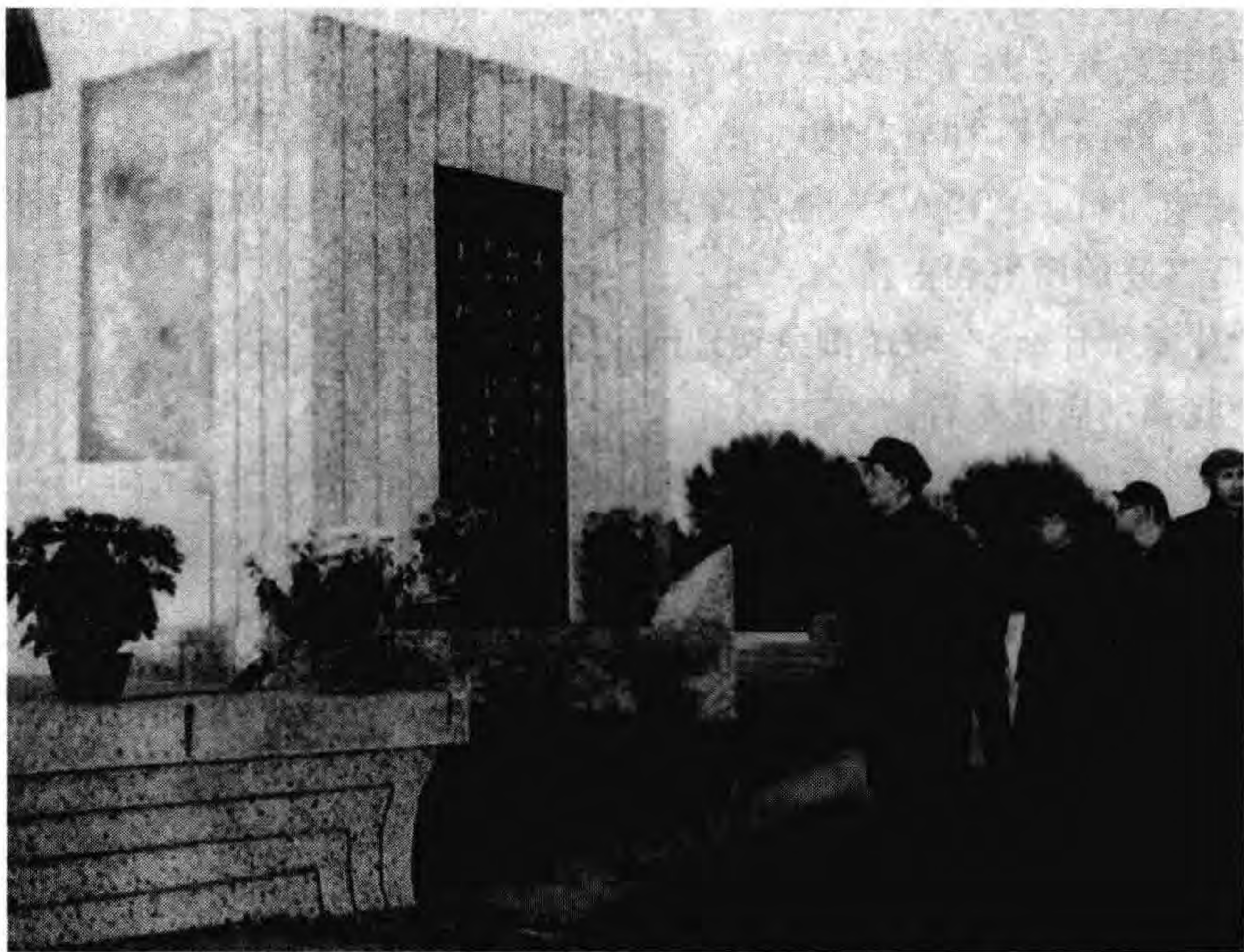
罗瑞卿、滕代远催毛泽东上车北行。毛泽东不同意：“东道主还未来，见不到他们就走，不辞而别是不礼貌的。”

毛泽东在月台上足足等了10分钟，当地领导才赶到。毛泽东对他们说：“安阳是个好地方，是曹操起家的地方，战略地位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你们要好好工作，把安阳建设得更美好。”毛泽东与省、地、市的领导握手告别，曹幼民责成公安局局长路光来一直随车驶过漳河，到邯郸才返回。^①

在列车行进途中，罗瑞卿、滕代远追述了当年左权公葬的情景以及1950年移葬邯郸。于是，毛泽东提出到邯郸临时停车，去看看左权墓。

专列到达邯郸，毛泽东凭吊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毛泽东一行下了专列。此行没有通知地方领导。在邯郸下车后，乘车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邯郸晋冀鲁烈士陵园。（摄影/侯波）

^①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63~197页。

直驶烈士陵园。在陵园门口下车后，毛泽东径直朝迎门而立的烈士纪念塔走去。塔的正面刻着：“晋冀鲁豫烈士纪念塔”。在纪念塔前，毛泽东摘下帽子静默伫立。

然后缓缓戴上帽子，又转到塔的西侧和北侧，最后到塔的东侧。东侧刻着毛泽东在延安的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塔碑的下面环绕着一组碑群，毛泽东仔细品味着每一块碑文，绕塔一周后，穿过公祭先烈的大广场，来到与塔碑相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这是一座象征性的纪念公墓，墓内陈列有300多位烈士英名录。毛泽东拾级而上，来到东侧一座碑石前，上面竖排镌刻着刘伯承的题词。毛泽东从西侧下了台阶，来到陈列馆，馆门紧闭，一时找不到掌管钥匙的人，毛泽东略等了一会，便问身边的罗瑞卿、滕代远说：“左权的墓在哪里？”滕代远指了指说：“在东面。”毛泽东一行向东走去。

在左权墓前，毛泽东摘下帽子，凝神沉思，然后绕碑一周，走下碑楼，戴上帽子。见东面工地上正在搭架施工，随同人员告诉他：“那里正在修建烈士堂。”毛泽东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①

下午3时多，毛泽东返回专列，继续北上。

专列途经定县，毛泽东参观众春园。毛泽东从火车站驱车直奔定县城内东北角的一座古典园林——众春园。详细察看了保存在那里的由苏轼（东坡）在定州任知州时在中山后圃发现的雪浪石，并给随行人员详细讲解了刻于雪浪石盆唇部的东坡铭文。看了雪浪石后，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登临料敌塔，只登到第二层，就因塔身坍塌残破有危险，被陪同人员劝阻而终止。

专列途经保定。

11月2日，在河北省政府副主席薛迅的陪同下，毛泽东视察了保定古莲池。

1918年10月6日，毛泽东、蔡和森为迎接准备赴法留学的湘籍学生，从北京赶到保定，第二天下午，同这些湘籍学生一起游了保定古莲池。这次故地重游，毛泽东回忆了当年的情景，感慨地说：“不是那个样子了！”他嘱咐陪同领导一定要把这个名胜古迹保管好。

3日凌晨1时，毛泽东结束了这次出巡回到北京。

^① 王兴、马金南：《毛泽东与邯郸》第11~17页。

五 春节外出，探询长江治理

1953年2月13日，大年三十，全国人民家家都在吃团圆饭，开始欢度春节。毛泽东吃过晚饭，对叶子龙说：“明天我们出去走走。看过黄河了，这一次再去看长江。你把杨尚昆、罗长子请来，我们商量一下。”

杨尚昆、罗瑞卿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连夜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出行进行部署。^①

毛泽东是夜间工作，出发时已是15日凌晨（大年初二）。毛泽东登上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专列途经保定，毛泽东让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随行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

专列途经石家庄。毛泽东听取了石家庄市委领导齐一丁、康修民的工作汇报。

毛泽东说：城市不能发展太大。发展纺织工业一定要注意原料的来源和市场需要。要多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农机具。^②

毛泽东提出：听一般的汇报不行，这次下来要做些调查研究，要找基层的同志谈谈。他与马国瑞商量，选了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

15日上午9时专列途经邢台，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奉命赶到了车站。罗瑞卿和马国瑞下车。马国瑞问：“吉平，

^①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第241页。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359页。

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李吉平指着张玉美说：“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罗瑞卿说：“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张玉美上了专列，马国瑞对他说：“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说：“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作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张玉美既高兴又担心，向罗瑞卿表示：给主席汇报工作，事先没有准备，文化水平又不高，农村工作千头万绪，能汇报好吗？另外来车站仓促，身上没带钱，咋能白吃白喝白坐车呢。

罗瑞卿笑着说：“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管你饭吃，车票也不用买。至于汇报嘛，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张玉美问：“你知道主席叫我汇报什么内容吗？”罗瑞卿说：“这个问题不大好说。因为这是主席进京后第一次外出搞调查，估计各方面情况都会要了解，涉及面可能宽些。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情况，主席一向非常关心，让你汇报的可能性很大。”

罗瑞卿又说：“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很快就会醒来，咱们到前边会议室等吧。”

在会议室，罗瑞卿首先介绍张玉美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对张玉美说：“你先坐下等候，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张玉美抓住这个空隙，思考全县的工作，不多时，听到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

罗瑞卿马上对在场的同志轻轻说：“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不一会儿，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罗瑞卿说：“主席，这就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毛泽东微笑着向张玉美点点头，并握住张玉美的手，拉着张玉美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张玉美挨他坐在右侧。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和桌子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

张玉美凝视着毛主席。这时罗瑞卿说：“玉美，这就是主席。”

张玉美顺口说：“见过。”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毛泽东惊奇地问。“见过你的相片。”一句话把毛泽东和在座的全逗乐了。

毛泽东见张玉美心情紧张，便与他拉起家常，问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张玉美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说他只上过八个月夜校，现在认识不少字，主要是从工作当中学来的，便递过来一支钢笔说：“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张玉美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把笔和本子一块儿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又默默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说：“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吗，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然后抬起头，面向随行人员说：“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毛泽东转过身问张玉美：“家里几口人？”

“35万。”张玉美脱口而出。

毛泽东高兴地点头说：“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毛泽东又问：“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张玉美说：“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毛泽东又问：“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张玉美做了汇报。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问：“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张玉美说：“原来不知道给主席汇报，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的时间。”

毛泽东说：“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泽东插话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毛泽东问：“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张玉美说：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摩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

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

毛泽东拍着张玉美的肩膀连声说：“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然后，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说：“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侧过脸对着张玉美说：“继续谈吧。”

张玉美又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

毛泽东点点头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张玉美又汇报了到秋后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

毛泽东诙谐地说：“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张玉美继续汇报说：“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入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泽东惊讶地问：“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张玉美说：“一个是我县互助合作有十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党中央《决议》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张玉美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毛泽东点了点头，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问：“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张玉美说：“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泽东夸奖说：“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随后，张玉美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

毛泽东听后明确指出：“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

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张玉美说：“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毛泽东关心地问：“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张玉美说：“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许入社。”

毛泽东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张玉美接着说：“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毛泽东插话说：“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

毛泽东又问：“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张玉美说：“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开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张玉美说：“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部书记和十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毛泽东转过身问张玉美：“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张玉美说：“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毛泽东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他又问：“还有什么问题？”

张玉美说：“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下午1点，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吧。”

毛泽东站起来说：“不讲，吃饭去。”

张玉美跟随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餐桌上摆着色酒和四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张玉美碰杯，接着让张玉美吃饭，还不断往他碗里夹菜，让他每样菜都尝尝。

饭后，张玉美随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泽东一边走动，一边给张玉美介绍车厢内悬挂的古画名称、作者和朝代。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便又入座听他继续汇报。

毛泽东问：“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毛泽东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这是基础。”

毛泽东又问：“《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毛泽东说：“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毛泽东接着又问：“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张玉美向主席作了汇报。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的做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主席吃饭，张玉美和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临走时，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给张玉美。

饭后，列车将到郑州站。毛泽东在会议室拍着张玉美的肩膀说：“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张玉美说：“主席忙了一天，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

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问张玉美：“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张玉美告诉主席：“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级干部会，这次就不去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也好。”

火车进入郑州站，毛泽东再一次问：“玉美，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张玉美回答说：“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毛泽东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张玉美，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张玉美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①

15日夜，专列在郑州停留。

16日早上7点，奉毛泽东之命从开封赶来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到了郑州车站。毛泽东想接着四个月前（1952年10月）那次视察，继续和王化云探讨黄河治理的问题。

毛泽东下车，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问王化云：“邙山水库为什么不修了？”王化云汇报了邙山水库不修的想法。

毛泽东和王化云他们上了车，列车就启动了。毛泽东让他们在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周围坐下。毛泽东问王化云：“有图没有？”

王化云说：“有。”随即把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黄河规划设想的图纸展放在方桌上，汇报了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比较方案。王化云说：“邙山水库的坝址是沙基，技术条件比有很坚硬的岩石基础的三门峡差。三门峡可以修比较高的混凝土坝，能够综合利用，虽然投资多些，但总的看来，比修邙山水库好处多。”

毛泽东问：“三门峡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报告说，除了修三门峡水库，还要在上中游修干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黄土高原的农林牧业生产，制止水土流失，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期。

毛泽东关心地询问，怎样安置库区人民。然后指着图说：“你们计划在干支流修多少水库，都在哪些地方？”

^①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64~75页。

王化云一边汇报，一边把图上拟定的坝库址和名称，一一地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打开面前的中国地图册，对于支流的大水库加以对照，找出坝库的所在县、区。他极仔细地一面听，一面看地图，随后问：“你去过这些地方吗？这些地方现在的情况怎样？”

王化云回答说：“去过。”并把了解到的这些地方的现状向主席汇报了，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毛泽东问：“你们计划修多少中小水库？”

“500座。”

毛泽东看着图说：“这都是泥库，要做几千座吧！”他又问：“黄土高原有多少沟？”

王化云回答不出来，只知道黄河干流每一公里就有一条大沟。”

毛泽东说：“不是几千座，是几万、几十万座吧？”

毛泽东又问：“化云呀，去年你给我说的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的事怎么样了？”王化云汇报了从长江上游引水100亿立方的计划，毛泽东高兴地说：“引一百亿水太少了，能多引一些好。”

饭后毛泽东继续和王化云谈话。^①

两个多小时后，专列到达许昌车站。在站台上等候的许昌地委书记、宣传部长纪登奎，被工作人员引上刚刚停稳的专列。三分钟后，专列继续向南驶去。

纪登奎被领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见他有些紧张，微笑着打量了一下，与他握手，还递给他一支香烟，说道：“像周瑜一样，还是个青年团呢！”毛泽东拍了拍旁边的沙发，对纪登奎说：“坐下来，咱们再谈。”为了放松纪登奎的紧张心情，毛泽东随便问道：“你是哪里人？”

“山西武乡人。”纪登奎回答说。

毛泽东问：“你知道关云长是哪里人？”

纪登奎自豪地说：“我们山西人。”

毛泽东笑道：“关云长是河南人，犯了人命案，逃往山西。他也不姓

^① 《怀念毛泽东同志》编写组：《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56~159页。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199~204页。

关，路过潼关时，人家盘问他姓什么，他不敢回答真姓。情急之中，一抬头，看见潼关二字，就随口说，我姓关。以后就落户山西，在那里造起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你是怎么到河南来的？”

纪登奎向毛泽东简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

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许昌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乡土风俗、经济文化、人口物产等情况，并着重汇报了土改、治理淮河、抗美援朝、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要纪登奎详细汇报一下许昌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

纪登奎向毛泽东报告全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

毛泽东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情况？”

纪登奎刚从鲁山县苏殿选合作社调查回来，就将苏殿选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生产情况怎么样？”

纪登奎说：“生产增长很快。互助组时，小麦亩产平均 158 斤，1952 年增长到 187 斤，今年预计可达到 300 多斤，小麦亩产超过互助组时四五成，超过单干户一倍多。去年该社玉米平均亩产 325 斤，比 1951 年增产 47%。在副业方面，社里办了磨坊、粉坊、豆腐坊，还搞运输，去年赚红利 304 万元（旧币折新人民币一万元等于一元）。分配上实行按劳付酬，男女同工同酬。夏季分红按土地六成劳动力四成的比例。秋季为土地劳动力各半。去年该社每个社员平均分玉米 1305 斤，比全乡收入最多的互助组还多出 45%。通过比较，证明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互助组又比单干好。”

毛泽东对纪登奎汇报的情况很满意，他问：“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合作社存在有什么问题？”

纪登奎说：一是互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有的社用牲口入社时作了价，但社里长期不付款，不计息。有的农具采用无代价入社，一部分社员不满，他们认为被共了产。

毛泽东说：“这样共产不好，社员会不高兴的。”

纪登奎接着说：二是社里会计制度不健全，账目杂乱，公共支出过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

毛泽东突然问：“你们那个文香兰合作社现在怎么样？垮台了没有？”

纪登奎说：“这个合作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压力，但没有垮台。”

当时文香兰事件在社会上搞得沸沸扬扬，成为河南的头等新闻，毛泽东也耳有所闻。

文香兰是鲁山张良区贺堂乡的女青年团员，1952年春，她组织起了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当时县、区政府要求每个合作社划出三亩地，作为高额丰产田。麦收时，张良区委书记在现场验收。三亩地单割、单打、单收，亩产高达676斤，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阚枫和《长江日报》记者吕建中赶赴现场采访，产生了怀疑，并报告给鲁山县政府。可1952年10月28日《河南日报》公布的小麦丰产模范受奖名单中又出现了文香兰合作社。阚枫看了十分生气，随即写了《鲁山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小麦“高产丰产”的实况调查》，刊登在《河南日报》第一版上，编者按，批评鲁山县、区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党和人民。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文香兰一时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闻人物。这对一个18岁的女青年来说，压力很大！

纪登奎说：文香兰从开封回去，大伙要分社散摊子。结果16户退了九户半，文香兰家一半退社一半留社，她的公婆退了社，她和丈夫留了下来。处境艰难，六户半农民兑上鸡蛋卖了，买回一个耙。乡长把三个月的津贴借给他们，又买了一头牛，硬是把合作社办了下去。

毛泽东说：“你们要帮助文香兰解决困难，不能让这个合作社垮了。”

谈话即将结束，毛泽东突然问：“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说：“我挨过两次整。”

毛泽东说：“我挨三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整错了。”纪登奎简略地讲了他在冀鲁豫挨整的情况。

毛泽东笑道：挨点整也有好处。又问：“你整过人么？”

“整过。”纪登奎回答。

“整错过么？”

“也整错过。”

毛泽东紧接着问：“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马上答道：“杀过。剿匪、反霸，杀了很多。”

毛泽东追问：“杀错过么？”

纪登奎如实答道：“也有杀错的，那是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

做好。”

毛泽东注视了一会儿纪登奎，对他敢于说真话表示满意。^①

同纪登奎谈完话，毛泽东接着又同王化云谈话。毛泽东说：“1918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三天。到了郑州，黄河涨水。那时候，男人还有辫子，女人缠小脚。党成立后，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长期斗争，革命成功了。现在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

毛泽东说：“比如治黄，过去也有王化云，但因不归我们管，治黄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谈到解决。”

毛泽东启发王化云在制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时，要力戒骄傲，不要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中国黄土高原和三门峡的地面实际，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问：“你读过斯大林讲的那个安泰的故事吗？”王化云回答说读过。毛泽东要人们从安泰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一定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②

专列途经驻马店。毛泽东把潘复生、王化云、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对罗瑞卿说：“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下午6时左右，专列到达信阳站，毛泽东请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握住王黎之的手，笑着说：我们一起到车站走走。那时，天已黄昏，飞着雪花，毛泽东边走边问：京戏《四进士》那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宋士杰是信阳州人吗？毛泽东说：“宋士杰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一状告倒了三个贪赃枉法的进士，可不简单呀！”

回到车厢，专列向武汉前进。毛泽东取来一张地图摆在办公桌上，问王黎之：信阳地委下辖那些县，多少人口？边问边划，开玩笑地说：“你管着几个国家啊，古时的上蔡、息县、固始、商城都曾经是个国家。”

王黎之汇报了豫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当谈到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前在信阳烧了不少民房，在河南做了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因此，在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信阳的代表对他仍在河南当官反映很强烈。毛泽东说：“河南群众有意见，那就让他到北京做官好

① 《百年潮》1999年第10期，第56~57页贺明洲文章。《当代民声》1998~1999年连载一，第37~38页贺明洲文章。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17页。

② 郭新法：《毛泽东休息的七天》第205~212页。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在赴武汉途中。（摄影/吕厚民）

了”。后来，这位起义将领被调到北京任职了。

毛泽东问：你去过北京吗？王黎之说：1951年去过一次，是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那时我当地委组织部长。当地委书记后就没去过了，因没人召集我们开会了。毛泽东稍加思索后说：“部门的会议多，干线不通噢！”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反映。要上情下达，也要下情上达。

1955年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时，就吸收了全国的地委书记参加。后来，毛泽东在郑州见到王黎之说：“干线不通”那个意见不是你提的吗？问题解决了。

毛泽东问王黎之多大了，任地委书记多久了。当他知道王黎之31岁时，便问：河南省像你这样年龄的地委书记还有几个？王黎之回答：“三人。”毛泽东很高兴地连声说好。

毛泽东问王黎之是哪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在哪里念书？王黎之说：是山东人，因抗日战争，书读不成了，1938年参加了革命队伍，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说：那没关系，你还年轻，在革命队伍里是可以学习提高的。你知道谭震林吧？原来也没有文化，他很注意学习，现在很不错嘛。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像你这样的人不少，问题是要努力学习。

谈话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说：我们去吃饭吧。王黎之随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里，对面坐在一个餐桌旁。服务员端来四个小盘，两荤两素，另加一个汤，两杯葡萄酒。毛泽东怕王黎之拘束，不断地让王黎之吃菜。饭后

又在办公车里随便聊天，专列从信阳开到湖北广水车站。毛泽东说：你去过武汉吗？王黎之回答：去过。毛泽东风趣地说：“那你就回去吧！大概你出来时，家里人还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三风雪之夜王黎之失踪了。那还了得，说不定家里人正到处寻找你呢！”^①

16日晚上11时3刻，专列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李雪峰，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等在车站迎接。毛泽东下榻在惠济路16号，中南局招待所。

毛泽东急于了解广大农村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的情况。他与湖北省委的领导商量，要找几个地县领导座谈。

17日凌晨5点，孝感地委书记王良接到通知，乘车赶到了大智门车站。一下站台，就听到广播喇叭声：“孝感地委王良同志，请到站口来，这里有人接你。”原来，是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来站迎接。

在车里，省委负责同志告诉他，毛泽东到武汉视察，要听他汇报基层情况，叮嘱他：“要沉住气，主席喜欢当场出题，随便谈，不喜欢照稿念。你掌握的情况多，只要不紧张，一定会让主席满意的。”

早餐后，毛泽东在招待所一个简朴的会议室接见了王良。毛泽东握住王良的双手说：“你是王良同志吧！”然后询问了王良的籍贯、年龄及学历等。当王良回答是山东人时，毛泽东说：“啊，还是一位‘山东好汉’。”

毛泽东坐下后，拿出笔记本，要王良谈谈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毛泽东问得十分仔细，比如集市的萝卜、白菜几多钱一斤？猪肉几多钱一斤？农民情绪怎样？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等等。王良将孝感地区的农村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问：“农民有了土地，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谈点你的个人高见吗？”

王良回答：“主席，我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毛泽东说：“对，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们地、县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

毛泽东谈了在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正处在向社会

^① 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147~149页。

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用扳指头的办法给他们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毛泽东让他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毛泽东说：“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问王良对中央、对省委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王良将当前地、县机关存在的“五多”现象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追问“五多”的意思是什么？

王良扳着指头数道：“一是事务多，二是会议多，三是文件、报表多，四是蹲在机关多，五是一般号召多。”

毛泽东说：“‘两头打着坝，中间淹死人’，你们基层难做人。这种情况要改变，要努力改变。”

毛泽东要王良谈谈关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看法。王良回答：“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主席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大力发扬。应该自上而下，然后从下而上。”

毛泽东连连点头表示赞许。这时，武昌县委书记赵学义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身世后，要他谈谈农村的情况。赵学义回答了主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称赞道：“你头脑很清晰，是个秀才书记。”

当时，武昌县委隶属孝感地委，王良作为赵学义的领导，插话道：“赵学义同志深入群众，肯学习，有政策水平，地委已准备让他挑更重的担子。”

毛泽东立即夸奖说：“当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你能慧眼识英雄，说明你更明白。”

会见结束，毛泽东把他们一直送到门口。毛泽东握着王良的手说：“你是一位‘山东好汉’。”^①

17日，毛泽东想去汉阳。他召来了中南交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刘惠农。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164~166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222页。

一见面，毛泽东握着刘惠农的手，第一句话就说：“刘惠农同志，解放前我到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到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事前，罗瑞卿向刘惠农打招呼，为了主席的安全，设法劝阻毛主席汉阳之行。刘惠农只好支吾道：“主席最好不要去。”毛泽东略感惊奇。刘惠农摆了三条理由：第一，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又没有渡河的轮船，坐小木划子很不安全。第二，即使过了河，汉阳也没有码头，整个汉阳连一条可通汽车的道路都没有。第三，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

毛泽东笑着问：“你去过汉阳吗？”

“去过。”刘惠农笑道。

“你是怎样去的？”

“坐划子。”

“你能坐划子，为什么我不能坐划子？”毛泽东步步为营，刘惠农一时语塞。

“那主席，我去准备一下。”

为了安全，长航局专门派了一条船。刘惠农陪毛泽东上船。船从长江边的一个码头起航，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很浓，巡视长江、汉水两岸，边看边问。经过汉水与长江交汇的龙王庙，航行到舵落口回航，船到汉阳高公街，停船上岸。按照规定，毛泽东带上了大口罩。高公街是汉阳的一条老街，街道狭窄，仅能通过一辆三轮车，街面一片萧条。毛泽东问起汉阳兵工厂旧址，刘惠农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就是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工厂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多次轰炸，破坏相当厉害。

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棉纺织厂。毛泽东一行从北侧登上龟山，一直走到龟山东头。从汉阳返回时，毛泽东关切地问：“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

“是的。”刘惠农点点头继续说，“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来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毛泽东高兴地连连点头。^①

17日晚上8点10分，毛泽东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位领导吃饭，吃饭时与饭后，毛泽东向王任重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99~100页。

合营的情况，王任重简要地作了回答。主要是想多听听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营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①

18日早上，毛泽东听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汇报。其中谈到黄石市和华中钢铁公司几年来的发展和民主改革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表示要亲自听听黄石市委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乘船过江，去东湖和珞珈山游览，到东湖疗养院看望了郑位三等同志。

中午，毛泽东来到位于武昌阅马场的湖北省委。毛泽东提出要到省委后面的蛇山，看看计划中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罗瑞卿担心那边人多，不安全。毛泽东说：“人多怕啥，坏人是极少数，我们要相信群众。再说，为了不惊动群众，我们可以来个出其不意，不就过去了！”省委通知了大桥工程局负责人彭敏，让他赶到大桥桥址，准备汇报。毛泽东一行人从省委后面上山，由东向西走。在路上，有几个小朋友认出了毛泽东，兴高采烈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



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蛇山。（摄影/吕厚民）

地跟着走，工作人员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肯，毛泽东微笑地看着小朋友，小朋友越是一步不离地跟着。这个情景被随行记者吕厚民摄入了镜头。

参观了张公祠，在黄鹤楼附近，毛泽东看见一位做小买卖的老者在卖煎豆腐，就走过去与他攀谈。这时毛泽东来到蛇山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毛泽东不断地和群众握手，成千上万的人马上都拥上来了。短短时间就聚集了几万人，把毛泽东团团围在中间，一片喜悦欢呼之声。罗瑞卿等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一步一步保护着毛主席下了山。大家挤得出了通身大汗。毛泽东上了船，向群众一边挥手一边说：“不要送了，回去吧！”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谢谢你们！我要下不了这蛇山哩！”

吃晚饭时，毛泽东对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等同志说：“群众很好嘛，秩序也很好嘛！老百姓是支持我们、拥护我们的，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失望！”^①

饭后，毛泽东把当时在武汉市管工业的一个同志和武昌区委书记找来，听取了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询问了码头工人的情况。

毛泽东说，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他路过武汉，乘船去上海，被搬运工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32页。《怀念毛泽东同志》编写组：《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34~135页。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第242~243页。李家骥、杨庆旺编著：《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第782~786页。

敲了竹杠。王任重说，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做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毛泽东对刘惠农说：“这两天主要是看，没和你多谈，如果你不忙的话，和我一起到南京，我们在路上谈谈。”^①

19日上午8时，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找到汉口交易街（后并入大智街）街长陈光中，带他去见毛主席。

陈光中被引进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站起身，向街长走过来，微笑着说：“你是哪条街的呀？”毛泽东握着街长的手，非常亲切地问道。

“主席，我是交易街的。”陈光中挺了挺胸，立正身体，恭恭敬敬地回答。

毛泽东风趣地说：“啊！买卖街。”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光中。”

“耳东陈，光明的光，中国的中，是不是？这个名字不错呀！”毛泽东高兴地说。“坐下来，今天我找你谈谈街道工作情况。”这时，主席才松开了握住陈光中的手，指指旁边的沙发请他坐下来。

陈光中见主席平易近人，说话随和，刚才那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汇报街里如何反霸，如何进行民主改革。说得很快，满口武汉腔，毛泽东笑道：“你这个湖北佬讲慢点嘛。”陈光中笑了起来，于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往下说，街政府如何发动群众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如何



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在蛇山与小商贩交谈。（摄影/吕厚民）

^①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主编：《毛泽东在湖北》第274页。



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从黄鹤楼下来登上轮船向群众挥手。
(摄影/吕厚民)

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培养骨干分子；如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和建立街政府委员会；如何开展群众扫盲工作。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他的汇报，不时地向他点头，脸上露出微笑。

当陈光中谈到街政府的机构设置，调解、治安、优抚、卫生、妇女等各个委员会的任务和分工时，毛泽东问道：“你为群众办了哪些公共利益的事情？”陈光中回答说，修了马路，安装了水管、路灯，建了公共厕所，办了夜校，解决了部分人员就业。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笑着点头称赞。

“群众拥护你吗？”毛泽东问。

陈光中如实地回答：“我在市、区委的领导下，为广大群众服务，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问：“你那个街有多大？”

陈光中答：“全街3042户，11121人。”还把交易街的地域范围作了介绍。

毛泽东笑着说：“啊！这就是你的小天下。”然后转换话题：“你有没有官僚主义？干部中有没有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陈光中回答说：“我们都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到街道工作的，随时都在注意检查自己，防止发生官僚主义，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街道干部中还未发现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你谈了这么多，到底街道工作任务是什么呀？”毛泽东望着陈光中问。

陈光中想了想，回答道：“从我们全部工作来看，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

毛泽东说：“对！你很明确。”又问：“你看街道应当设什么样的机构好？”

陈光中见主席认真地听取和征询他的意见，毫无保留地说：“街政府既不出布告，不颁发命令，又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主要是宣传市、区政策和规定，落实上级布置的工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是区里的派出机关，只能是办事处的形式。”

毛泽东赞成地点点头。又问：“你是哪个党派的？”

陈光中回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毛泽东高兴地说：“啊！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

毛泽东对陈光中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和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你是基层领导，应经常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不要脱离群众，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关心群众生活。”

谈到这时，毛泽东说：“好吧，你的工作情况，我已了解了，就谈到这里。今天我请你吃饭。”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招呼陈光中坐在他的身边，四菜一汤，每人一小杯葡萄酒，共饮之后就吃饭。毛泽东喜欢吃辣椒，问陈光中爱吃不爱吃？陈光中点点头说，可以。毛泽东就给了他一些，其实陈光中并不能吃辣椒，毛泽东发现他辣得脸发红，汗直淌，就叫旁边的服务人员拿毛巾给街长擦汗，陈光中辣得张着嘴，自己也觉得好笑，毛泽东也笑了。

饭后，毛泽东叫陈光中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又谈开了。一会儿谈到百货公司的袜子不大众化，一会儿说到某某学校的房子中不中，西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式的。当谈到民间风俗时，毛泽东问陈光中：“武汉市是土葬还是火葬？”陈光中回答说：“现在大部分是火葬，也有少数土葬的。”

毛泽东说：“火葬好，移风易俗。”

毛泽东针对街长提出的一些问题问王任重：为什么有些手工业要停工？王任重说要停工的主要是织毛巾、袜子的工厂，这是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他们技术不高，产品质量比较低，商业部门怕积压，既不加工订货，也不收购。毛泽东说，让这些失业工人没饭吃是不行的。实际上到秋季是商业旺季，运到农村去是会有销路的。

毛泽东说：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原则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谈话结束了，毛泽东满面笑容，再次和陈光中握手，并对工作人员说：“街长要回去了，用汽车送街长回去。”毛泽东一直送陈光中上车。^①

19日10时，毛泽东把中南局的几位领导找到他的住所谈话。

毛泽东说：你们的东湖不错嘛！昨天我在船上大致观察了一下，自然条件绝好，真是少见啊！李先念、王任重问：西湖和东湖哪个更好？毛泽东说：我看西湖、东湖都好，但东湖还有待开发。毛泽东谈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二、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指甲所、乙所）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毛泽东说：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说话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4、167~169页。

贸易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武汉市的，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意见？怎么看法？

王任重说：我们主要担心工人失业问题，我们一定努力把产品质量抓上去。我们没有把情况向中央贸易部报告清楚，是个缺点。我们还是要求国营商业加工订货或收购。

毛泽东说：实际上你也有责任，但我同情你们的做法。^①

这天上午，毛泽东还接见了奉命从黄石赶来的黄石市委书记杨殿魁。

毛泽东询问黄石的情况，对杨殿魁的回答也很满意，表示：“我要去看看。”

杨尚昆、罗瑞卿考虑到主席的安全，竭力劝说毛泽东不要去黄石。毛泽东笑着说：“那里是将来的工业基地，我就是骑着驴驹也要去看看。”^②

上午11时半，毛泽东乘海军的一艘舰艇离开武汉去南京。李先念、李雪峰、赵毅敏、王任重四个人送他到船上，毛泽东在甲板上检阅了海军指战员。

在船上，毛泽东听取了杨殿魁关于黄石市民主改革的情况汇报。

听取了刘惠农关于长江航运和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对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十分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该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毛泽东说：要使长江上所有私营航运公司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③

毛泽东还找中南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了解长江水灾成因、治理利用办法。

林一山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设在二楼的主席卧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你过去见过我吧？”林一山说：“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后，193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主席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我还问过很多问题。”

毛泽东说：“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接着毛泽东指着林一山的手问：“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林一山说：“是的，是‘七七事变’后跟日本人作战时受伤的。”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4~5页。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19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149页。

③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主编：《毛泽东在湖北》第275页。

毛泽东又问：“你打过几次仗？”

林一山估计了一下说：“较大的战斗不超过十次，小规模游击战可能有一二十次。”

毛泽东听后说：“好！打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毛泽东指着林一山带来的《申报》地图问：“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毛泽东说：“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时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这时，毛泽东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稍稍悬空着在地图上移动，一面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毛泽东拿起一支红铅笔，首先指着西北高原问道：从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都不行。毛泽东问：为什么？林一山做了解释。毛泽东手中的红铅笔指向汉中盆地，问：引汉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上的三千里汉江，问：为什么？林一山回答：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与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问：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林一山说：还没有。毛泽东说：你立即部署勘察，一有数据，就写信给我。

经过几个小时的汇报，毛泽东说：“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主席吃饭很简单，只有两菜一汤，除了辣味以外，没有什么鲜味和香味，可主席吃得津津有味。他一边吃饭，一边愉快地说：“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地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①

晚上6点多，船泊黄石港。毛泽东上岸，视察了黄石钢厂。毛泽东交待：“我要从你们的炼钢、轧钢、锻钢到实验室，从头看到尾，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看。”毛泽东详细地看了工厂的工作条件和生产环境，还登上了高炉的炉台。一边看一边问，问生产，问生活。毛泽东问工人们：“家里

^①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主编：《毛泽东在湖北》第96~97页。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76~77页。

几口人，每月拿多少工资？生活过得怎么样？领导关心不关心你们的生活？”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视察，毛泽东回到了船上。^①

19日晚，船抵九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到舰上迎接毛主席。

“尚奎，延安一别，有七个多年头了。你们几个回江西工作，已经习惯了吧？”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问起了刘俊秀等人的情况。

全国解放前夕，中央把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等几个江西籍干部，调回江西工作。

“陈正人和范式人去了北京，你们的担子更重了。”毛泽东又亲切地说了一句。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调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范式人去中央部门工作，由副书记杨尚奎接替陈正人的工作。

杨尚奎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把江西的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不顾连日来的劳累，在艇上听取杨尚奎、史梓铭的汇报，有时还会提一些问题。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几年，江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说，江西的土改运动发展迅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1950年12月得到了中南局的肯定。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江西也摸索了不少好的经验。他还在省委的报告上作过批示，并建议将报告在党刊上登载。这几年，江西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排在周围几个省的前面。

到晚上12点，毛泽东依然兴致盎然，杨尚奎为了主席休息，和毛泽东告辞。

毛泽东表示：“明天再谈。”

杨尚奎因为第二天江西省委要召开常委会需赶回去，委托史梓铭陪同毛泽东在九江的活动。毛泽东对江西工作的要求，也由史梓铭向省委传达。毛泽东同意杨尚奎的安排。告辞后，杨尚奎立即乘车返回南昌。^②

20日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的陪同下视察九江市容。

他们三人身材都很高大，走在一起更显魁梧。罗瑞卿负责保卫工作，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150页。

^②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江西》第191~192页。

他多次劝主席上车，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他们沿着滨江路，边走边说，边看边谈。

时间长了，群众认出了毛泽东。在中心大街的尽头，迎面涌来了如潮水般的群众，这时罗瑞卿要毛泽东向左转，进了一个小胡同。已安排好的小车停在那里，大家马上乘车离开。这次视察没有像在武昌那样，被无数围观群众挡住了去路，这是罗瑞卿的一次巧妙部署。毛泽东常批评保卫人员，说是用铁板把他和群众隔开，不让他看到社会情况，这次在九江，算是大饱眼福了。

毛泽东由步行改为乘车，继续在九江市区游览、视察。不一会，到了甘棠湖。毛泽东下了车，登上了湖旁的一座小山。在那里，向南仰望庐山。史梓铭跟在毛泽东的后面，向他介绍庐山。

毛泽东注视着云雾缭绕的群峰，感慨地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经把庐山作为“围剿”红军的大本营，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只隔了十几年，庐山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成了人民的天下，这不能不是对他莫大的嘲弄。随后，毛泽东问史梓铭：“现在上庐山的交通条件如何，是不是还要靠人抬轿子上去？”

“从九江到庐山的公路，正在修建，今年可望通车。”史梓铭回答说。

“那就好。这样，有更多的人民群众可以上庐山游览、避暑，也给今后

外国游人提供了方便。你们办了一件好事。”毛泽东说。^①

20日下午，毛泽东乘舰艇去南京。受江西省委的委托，史梓铭陪同毛泽东前往。毛泽东得知，护航舰“洛阳”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军舰上同战士们谈话。（摄影/吕厚民）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江西》第192页。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78页。

号上的士兵希望主席不要光在“长江”舰上，也能到“洛阳”舰上来。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走向“洛阳”舰。服务人员把主席的床板也扛到了“洛阳”舰。毛泽东在“洛阳”舰上睡了一宿。

下午4点多，毛泽东乘坐的军舰缓缓离开九江港。一路上，他继续和史梓铭交谈。

毛泽东向史梓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规模地开展，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如果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工业建设，对地方工作是否会有影响？

史梓铭回答：“虽然有些影响，但不会很大。”

“为什么呢？”毛泽东问。

“三年多来，各地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不少干部，即使抽走一批干部，也可以马上补充上去。”

毛泽东对史梓铭说：“今年，是我国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取得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同时，还要下决心抽调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从而有助于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

沿着江西和安徽的边界，三艘舰艇在滚滚长江里顺水而下。毛泽东跟大家谈道，为了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要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一个转变。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包括抽调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现在，我们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必须坚决地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安排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工业建设的骨干。毛泽东还谈道，我们号称世界大国，可是，却只能造桌子椅子、造茶碗茶壶、只能种粮食、碾大米、磨面粉，却不能造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这样下去，非挨打不可。所以，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下决心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杨尚昆、罗瑞卿、史梓铭等围坐在毛泽东身旁，聚精会神地听他侃侃而谈。

毛泽东向史梓铭了解农村春耕、备耕的情况。他问：“农民分到了土

地，春耕准备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史梓铭认真作了回答。

毛泽东说：“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都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免去了向地主交纳苛重地租，必然会激发生产热情。因此，我们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多打粮食。只有把农业搞好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牢固的基础。所以，你们统筹考虑，帮助困难户搞好备耕，这做法要坚持下去。”又说：“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这一切，都体现了共产党的宗旨，也成为广大农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因素。”

“主席，农民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史梓铭说。

“什么问题？”毛泽东问。

“农民分到了土地，发了地契，理应交地契费。可是，眼下农村正值春荒，所以，农民要求秋收割了稻子再交。”

毛泽东思忖片刻，很干脆地回答：“农民的要求不过分，可以在秋收后再向政府补交地契费。”说完，又补充一句：“小史，你可以把这个意见转告江西省委。”^①

晚上9点多，军舰在安庆江面停泊。

安庆地委书记付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付大章：一天工作多少时间，付大章回答：工作十几个小时。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做一个地委书记没有十几个小时，工作是干不完的。毛泽东看天色已晚，对付大章说：“今天晚上不谈了，明天再找你谈。”毛泽东问付大章家中还有什么人？明天能不能跟他一道走？有什么困难？工作能不能离得开？付大章说没问题。毛泽东笑着说，好！^②

21日上午9点，毛泽东离开“洛阳”舰，临行前，同两条舰上的海军战士合了影，又同随行干部合了影。

11点，付大章和赵瑾山跟随毛泽东到江岸上察看江堤。为了摸清情况，还找来长江治理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

毛泽东指着长江问林一山：历史上此段长江最大洪峰的流量是多少？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江西》第195页。

^②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毛泽东在安徽》第145页。

他详细地询问长江的流量、含沙量等情况，并与黄河作了比较。毛泽东问了马当一段国民党败逃时破坏航道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当听说安庆上下400公里的一段，由于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长期不作治理，造成江岸崩塌严重，有的航道快要冲破堤岸，与后面湖泊相通时，毛泽东非常关心，说：你们要像治理黄河一样，设法把长江控制住。



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和海军官兵合影。（摄影/吕厚民）

然后，毛泽东在江堤边散步，他站在江岸久久地望着振风塔，详细地询问塔的历史、结构，问到安庆为什么叫宜城。他又走到群众的菜园地，一边走，一边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人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①

午饭后，军舰启航向芜湖、南京驶去。毛泽东继续同林一山谈话。

毛泽东漫步在甲板上，对林一山说：要驯服这条长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掌握得怎么样？

林一山汇报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编了长江历年的水文数据，这些数据页以万计，重以吨计，通通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打了多年的内战，干支流、上下游各站的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做些延伸或插补，有些记录还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去“塑造”洪峰。毛泽东听到这里，风趣地说：这个方法真有趣。毛泽东对水文数据很重视，问得很详细。在1962年夏天长办资料大楼发生爆炸事故，主席当时在武昌，他知道

^①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毛泽东在安徽》第6页。

后，要王任重打电话给林一山，询问数据受损失没有？当他得知资料未受损失时，还指示要把原始资料 and 整理好的成果复制四份，分藏各地，以防意外事故造成损失。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的分布怎样？

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他着重汇报了位于湘赣南部的南岭暴雨区以及位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四川暴雨区，说明前者是在3至6月间先降雨，赣江水系和湘资沅澧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延伸，到7至9月。暴雨出现于四川盆地，两个洪峰正好错开。如果川水洪峰到达中下游时，中下游也发生暴雨，往往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

毛泽东马上问：长江水灾成因主要是什么？林一山回答：是暴雨。毛泽东又问：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林一山回答：“根据资料，1935年7月1日开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达1500毫米，一夜淹死了汉水中下游八万余人，澧水下游四万余人。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2000余毫米。”

毛泽东听后说：“真了不得！”说着转过身去对一路陪同的公安部长说：“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罗瑞卿说：约有一米八几。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上和林一山交谈长江治理问题。（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说：“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年降雨深度，比你罗瑞卿这个高个子还要高！”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多次询问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灾的种种问题，问得十分细致，十分深刻。

回到船仓，毛泽东还在考虑长江问题，他询问长江规划的各种问题，并且问道：“怎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汇报了长江防洪的初步设想，指着图上大小水库说，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林一山时而讲，时而被问，时而默记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一直到深夜才听完汇报。

毛泽东在图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

林一山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伸出手，指着三峡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说：“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说：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

林一山汇报了在30年代，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的“Y.V.A计划”（扬子江流域开发管理局计划）。毛泽东问林一山当时的造价，林一山说要13亿美元。毛泽东向罗瑞卿同志问了美元比价，自己算了一下，表示造价不算高，同时毛泽东又问了工期、基础地质条件等许多问题。

毛泽东又问付大章：淮河的水位比长江的水位高多少？提出把合肥附近的将军岭切开，在洪水季节把淮河的水调一部分到长江来，以减轻淮河下游的压力。又说：黄河下游一带有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应该引丹（江）入黄（河），就是说把长江一个支流的水调到黄河去。^①

^①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毛泽东在安徽》第7~9页。《怀念毛泽东同志》编写组：《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64页。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79页。

谈完长江问题，付大章开始汇报工作。为了汇报，付大章带了不少材料。毛泽东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工作，你们想想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付大章汇报土地改革后对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毛泽东说：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人家也不方便。

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地扳着指头数着说：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八项，那么要不要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而是那些条件成熟了，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毛泽东问：土改后农民生活还有哪些困难？付大章说：农民手中无钱，迄今还是以物易物做交易。毛泽东点点头，记下了付大章反映的问题。毛泽东对付大章等人说：做工作不能简单化。他说，刚到陕北，当时开展反对张国焘的斗争，有个指导员给连队战士上政治课，讲张国焘的错误。一个战士站起来说，你讲张国焘坏，我看还不是那样坏。这个指导员向主席反映，主席向他解释，你不要急。你讲张国焘坏，这个战士还没有理解，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让战士从我们的行动上，看到中央是正确的，张国焘是错误的，这要有个过程。要等待，不要简单化。

当汇报到大别山区的老百姓有很多得大脖子病时，毛泽东说：这个病是饮食缺碘造成的，多吃海带可以防治。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赶到安庆，见了毛泽东，并且要求毛泽东给《安徽日报》报头题字。毛泽东说：“你们什么事都找我。”但说后还是提笔题了字。

傅大章讲到高敬亭长期在岳西一带坚持斗争，群众反映是好的。经常提到他，他有错误可以整整风，是不是应该杀？毛泽东讲：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搞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即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电报到时已晚了。

毛泽东问傅大章：陈独秀家在什么地方？

在怀宁独秀山脚下。

毛泽东问：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傅大章答：陈独秀是因山起的名。毛泽东问：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傅大

章答：陈独秀有个儿子陈松年在市窑厂工作，当技师，生活上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毛泽东讲道，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35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

毛泽东问到光升（光明甫）还在不在？傅大章说：在，是个民主人士，总的来讲不错，只是1948年帮助过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毛泽东说：我在武汉革命政府和他共过事。^①

21日晚上，军舰驶抵芜湖。芜湖地委书记张世荣、市委书记姚克登舰。

毛泽东同张世荣边握手边问：“你叫什么名字？”张世荣回答：“我叫张世荣，名字有点封建。”毛泽东微笑着说：“不封建。世荣，世界荣华嘛！”毛泽东又问：“芜湖离南京有多远？情况如何？”张世荣说：“离南京很近，不到100公里。芜湖成立了中共地委、市委。政治社会情况良好。”主席对坐在身旁的罗瑞卿说：“你说芜湖离南京太近，原是国民党控制区，情况很复杂，不能住。据老张讲的情况看，事实不是这样。解放已经几年了，经过镇压反革命，现在政治、社会情况很好嘛！”这次接见时间很短。^②

船快到南京时，毛泽东又找林一山谈话。毛泽东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不需跟他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船到南京后，毛泽东和林一山告别，他握住林一山的手说：“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③

22日凌晨1时，军舰抵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特地从上海赶来的陈毅、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在这里迎接毛泽东。

谭震林对主席说：“主席，你要保重身体啊！有事我们可以去北京向你汇报嘛。”

毛泽东说：“还是自己下来走走好，心中有数么。”

毛泽东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中楼下榻。稍作休息，毛泽东听取了

① ③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80、80~81页。

②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毛泽东在安徽》第150~151页。



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陈毅、谭震林在南京玄武湖。（摄影/吕厚民）

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他对江苏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但同时又指出：“南京是一个臃肿庞大的特等消费城市，是为官僚机构服务的城市。蒋介石搞了一点装配工业、修理工业，那是为了装门面的。一定要把南京改造成为生产城市。要利用南京原有的工业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来恢复和发展生产，还要搞点轻工业。”^①

22日下午，毛泽东在玄武湖畔接见了省级机关部、委、办、厅、局的负责人，以及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各地、市、县委的书记们。随后在陈毅等的陪同下游览了玄武湖。

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紫金山麓，凭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陵墓，毛泽东鞠躬默哀。而后，认真地观看镌刻在四周墙壁上的《建国大纲》。

陈毅见毛泽东伫立已久，怕他受累，便上前说道：“主席，还有几个地方呢！”

“噢，噢。”毛泽东满口应允，却依然一块一块细读碑文，直到读完才走进祭堂后的墓室。

^① 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50页。

柯庆施站在毛泽东身旁，小声介绍说：“这穹窿状的墓室，直径约16米，室顶图案是国民党的党徽。”

毛泽东抬头细细地望了一阵，说：“那中山先生遗体安放在何处？”

“这上面的白色卧像是大理石刻制的，安放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就在卧像下面五米深处。”柯庆施指着孙中山卧像回答说。

毛泽东朝孙中山卧像久久凝视，半晌没有说话，然后，无限感慨地长吁一口气，又背着手，绕着墓穴转了一圈。

走出祭堂，来到外面宽大的平台上。毛泽东双手叉腰，举目远眺，他不言不语，徜徉良久。

从中山陵出来，毛泽东一行的车队驶到中山陵八号原孙科公馆稍事休息。忽然门口出现了大片人群，他们是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负责警卫的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洪沛霖急忙向柯庆施等人报告。他们几人正在商量时，陈毅走过来听说后，沉吟片刻说：“我来！”说着便大步朝外走去。

陈毅朝着人群大声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主席今天已经很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走进南京中山陵大门。（摄影/吕厚民）

疲劳了，要爱护主席的健康。”

激动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罗瑞卿同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黄赤坡和洪沛霖简单商量了一下，来到人群面前大声说道：“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大家都能清楚地见到毛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安排下，人群很快排成长长的两列，坐在草坪上。

毛泽东从里面走出来，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庆施等陪同下来到群众中，毛泽东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地向群众频频点头。

“毛主席万岁！”群众欢呼着。毛泽东披着军呢大衣，摘下草绿色的呢军帽，高高举过头顶，在空中不停地挥动，向群众致意，用那湖南腔洪亮而又有力地高呼：“人民万岁！祖国万岁！”他健步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握着向他伸来的千百只手。

回到驻地，毛泽东喃喃自语：“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①

拜谒中山陵之后，毛泽东视察了紫金山天文台。

毛泽东一行车队沿着蜿蜒起伏的东郊公路，来到紫金山脚下。因山势太陡，道路狭窄，大家纷纷下车，换上了越野性能较强的苏制“嘎斯 69”吉普车向山顶前进。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视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摄影/吕厚民)

抵达山顶时，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孙克定迎上来，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孙克定陪着毛泽东等人首先来到大观测台。毛泽东在大观测台的平顶上来回踱步，举目远望，不觉有些激动，他自言自语道：“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啊！”

大观测台在南京沦陷时，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当时仪器还没有修复，所以

^① 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50~53页。

孙克定只简单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天文望远镜的性能和作用。

毛泽东问道：“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有多大？”

孙克定回答，“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属耶基思天文台的望远镜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折射天文望远镜，长达18.9米。苏联设计了一架使用反射镜的望远镜，直径为6米，它的一块镜片重达70吨。如能顺利制造出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操作的望远镜。”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毛泽东又观看了几件古代天文仪器。他拍拍东汉的浑天仪，对孙克定说：“这些仪器过去是为帝王服务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了，你们要为人民服务。”

从大观测台上下来，毛泽东一行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最东面的小观测台。那天云层比较厚，为了看太阳黑子，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抬头看看天，转过身子说：“我们要看太阳黑子，它害羞了，不让我们看。天公不作美，帮了它的忙。”

在天文台陈列室里，孙克定叫工作人员取来一块褐色的石头，介绍说：“这是1952年在如皋发现的陨石。”

“哦，地球外面来的客人嘛。”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他拿起陨石，仔细端详，反复看了好长时间，然后慢慢地放回托盘里，沉思着说：“世界、宇宙是物质的。”

天文图片展览室里陈列着我国天文科学家的劳动成果和新的发现。当毛泽东看到这里陈列的哈雷彗星的图片时，用手指点着说：

“看起来哈雷彗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很空虚！”随行人员都被毛泽东的话逗笑了。

毛泽东说：“幸亏它质量小，不然这个扫帚星早把我们所在的地球扫掉了，不知道扫到哪里去了！”毛泽东的话又把大家的笑声推向高潮。^①

走出天文台，毛泽东一行观看了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天堡城遗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这出戏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这是极有意义的。”

毛泽东信步走到一处山峰，坐在一块石头上，俯瞰南京，说：“南京

^① 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53~56页。

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几十年，结果被人民赶走了。如今，它在人民手里，我看完全是实言，是现实，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下山时，毛泽东弃车徒步往下走。正好经过明孝陵朱洪武的墓，毛泽东从一个未关闭的东门走了进去，在墓的正北面，有一坐北向南的墓堂，大概是过去拜祭朱洪武的地方。墓堂不算大，在北墙山的中央部分画着朱洪武的全身像，毛泽东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①

毛泽东从明孝陵下来，又遇到不少工人在此等候，要求要见毛泽东。省委负责人建议毛泽东乘车从工人中间经过，毛泽东不同意，执意步行来到工人们中间和大家见了面。

回到驻地，省委负责同志为了毛泽东的健康，让他回卧室休息。

晚上，毛泽东请华东和江苏的负责同志吃饭，饭后召开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谭震林、柯庆施、江渭清、管文蔚和应毛泽东的要求请来的基层同志泰兴县委书记沙克。会议开始，由柯庆施介绍江苏工作情况，毛泽东不时插话，询问华东和江苏的具体情况。座谈会时间很长，内容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家到地方，从政治到经济。谈到江苏的水利，江苏的土产，毛泽东对养猪多，利于农业生产印象深刻。谈到江苏的粮食征购和查田定产，毛泽东说：查田不是查命，搞不好，不算数，要准备五年搞好。毛泽东说：在中央征购粮的计划基础上进行调查、指导和定产，党委要起政治部的作用，弄不好，要作检查。

在座谈会上还谈到党的八大的准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新“三反”等问题。半夜两点钟，陈毅来催主席休息，毛泽东说：没关系，陈军长你坐下来谈谈。到凌晨3点，毛泽东才说：好吧，就是大家谈的几条，把它记下来。毛泽东亲自把要点记下来，座谈会才结束。^②

24日下午1点，毛泽东检阅海军舰艇部队。

^① 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53~56页。

^②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44~47页。

毛泽东抵达南京与陈毅交谈时，讲了他察看“洛阳”、“长江”舰的感觉，他对海军舰艇很满意。

陈毅笑着说：“还有好的呢？要不要调来请你一齐看看。”

毛泽东欣然应允。停泊在上海的“南昌”舰和“广州”舰接到命令，立即装满油、水，开赴南京下关码头。

南京下关码头边整齐地停靠着“南昌”、“广州”、“黄河”舰，和101、104鱼雷快艇。

毛泽东身穿浅灰色夹大衣，头戴浅色便帽，由陈毅、罗端卿、张爱萍等人陪同，观看了“黄河”、“广州”等舰，然后走过“广州”舰甲板，来到“南昌”舰。

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听取有关负责同志的汇报，不时提出一些关于海军建设中的问题。

毛泽东得知海军大多数同志来自陆军时，问：同志们都安心海军工作吗？

舰长曾泉生告诉毛泽东：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都愿意干海军。大陆已经解放了，都希望能参加解放台湾。

毛泽东说：还有帝国主义哩！他说：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大都是从海上来的。

毛泽东说：你们是海军了，干海军就要不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

对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毛泽东说：要多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团结他们，共同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十分关心舰艇部队的物质生活情况。他说：“在海上生活，体力消耗大，应该有足够的营养，以保证他们的健康。”毛泽东也很关心从陆军调来的老同志的学习情况，对“南昌”号军舰上的一些同志说：“我听你们肖劲光司令员讲，有人瞧不起你们，说你们是土包子，不能干海军。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过去我们爬雪山、过草地都过来了，遇到这么点点困难还不能过来？”

毛泽东问他们对海军技术学得怎么样？当听到“不论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掌握了技术。”他高兴地说：“好、好、好。要边学边用，边用边学



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在“南昌”舰上检阅海军。（摄影/吕厚民）

嘛。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没有技术的学技术，技术也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建设人民海军，就是要靠政治思想好又有技术的人。”

毛泽东对海军武器装备的情况十分关心，仔细询问了当时造船工作的情况。当了解到军舰所需要的技术装备还不能自给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光靠人家是不行的，海军的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听说有人认为海军技术装备复杂，我们又没有建设海军的经验，

要全盘地不走样地向外国学时，毛泽东说：“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我军好的传统要发扬，不能丢！”

毛泽东多次询问海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海上也有群众，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

毛泽东还与干部们进一步谈到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于作战原则，他说：事物不是静止的，战争也是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机械搬用，需要因时因地灵活处置。

听完汇报，毛泽东检阅了海军舰艇部队。

曾泉生请求毛泽东为“南昌”舰题词。毛泽东欣然答应。提起笔一挥而就：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然后，毛泽东与全体舰员合影留念。^①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到南京后，本来打算去上海。但就在毛泽东在南京的这两天中，国民党飞机大规模出动，轰炸了上海。于是他决定改变行动路线，返回北京。所谓“国民党飞机大规模出动，轰炸了上海”，查当年的报纸并无报道。这样的事是不可能不上报的。那么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后来查到1978年8月22日《解放日报》上有一篇黄赤波的文章，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其中谈道：

1953年，罗部长陪毛主席从武汉到达南京。他把我和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些领导同志找去，详细检查保密保卫措施，并通知我，中央决定调我去上海工作。他嘱咐我：“上海是帝国主义的老巢，杨帆包庇了很多坏人，那里的对敌斗争形势很复杂，你去后一定要把上海的公安工作搞好。”在同潘、杨的斗争中，罗亲自审查和批阅潘、杨案件的材料，多次要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其他领导同志去京，听取汇报，研究案情，检查和部署工作。他指示我们上海公安部门要“边战边建”。从全国各地调来大批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同时对杨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内部的反、特进行了严肃处理。

杨帆事件已经平反，但这段回忆也许能为我们解开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去上海的打算，做某种解释。

下午4时，“南昌”舰在浦口靠岸。铁道部长滕代远已在这里等候。毛泽东一行在这里乘专列北上。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苏州市委书记刘中、苏州市市长李芸华登上了专列。毛泽东说：叫你们来，是想了解苏州市的一些情况。苏州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著名的城市，苏州的手工业是很发达的，你们苏州的苏笛、苏锣，还有苏绣、丝绸、戏装等都颇有名气，这些都是面向全国。恢复生产对

^① 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57~59页。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95页。

全国其他地方有影响，要抓紧生产的恢复工作。毛泽东问：现在苏州群众的生活怎么样啊？刘中、李芸华汇报了苏州手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刘中、李芸华说：苏州的大工业很少，还是一个消费性城市，现在苏州有42万人口，吃饭的人很多，光车夫、保姆、茶房等等就不少。苏州解放后，这些行业都清淡了，所以一部分人生活很困难。毛泽东说：要抓好生产的恢复发展工作，还要抓好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还有苏州的园林工作等也要抓好，要逐步解决好群众的生活问题。注意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方向引导。

毛泽东说：苏州的文化水平很高，你们苏州历史上还出过许多状元，仅明清两个朝代，苏州大约出了20个状元。还说苏州的古迹、历史文物都很丰富。苏州的城墙怎么办？你们是怎么想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刘中、李芸华说：这个问题我们议论过，总的是城墙要拆掉，但要保存有保留价值的部分。如在建筑学上、在观赏方面有价值的和有纪念意义的部分。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这些要注意保护。

毛泽东问：你们街道工作做得怎么样啊？李芸华说：当前主要是生产自救等，其他不太清楚。毛泽东说：现在街道当中各种人都有，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要做些调查研究，把有才能的人都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你这个市长的家可不大好当啊！特别是苏州这个地方，搞好街道工作非常重要。武汉的街道工作做得就不错，街道是宣传执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很困难吗？对他们要救济，组织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还有社会治安、爱国卫生运动、调解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作，街道都要去做。

毛泽东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不是需要资金吗？要多方筹集资金，把闲散的资金都吸收起来。现在群众在银行的存钱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李芸华说：最近群众在银行储蓄有下降的趋势。毛泽东问：为什么？李芸华说：上级银行变更规定，有对群众储蓄不够方便的地方，影响了储蓄款的吸收。毛泽东说：这不好吧！说着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此后不久，上级银行发来通知，改进了储蓄工作，到4月份银行储蓄存款就开始上升了。

谈话后，毛泽东说：今天晚饭我请客。晚饭是三个人围着一个方台子，四样普通的菜，其中有一样是有辣子的，每人一碗红豆米饭，一盘馒头。

头，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说：你们辛苦了，来，先喝一杯酒。刘中、李芸华说，主席请！干杯后，毛泽东又说：时间很晚了，你们饿了吧，指着一个辣子菜说，你们吃不吃啊？不敢吃就吃别的。毛泽东还说：现在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们要认真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晚饭后，毛泽东送他们到休息室。罗瑞卿、杨尚昆、谭震林等都在这里坐着，毛泽东还念念不忘银行储蓄工作，他问大家在银行存了多少钱。有的说十元，有的说八元。当问到谭震林时说，谭老板你在银行存了多少钱？谭震林说，存了30块钱。毛泽东说：哦，你可是一个“富农”啰！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①

25日，专列到达徐州。毛泽东说：你们是住在这里还是就回去，要回去，由吴副部长（铁道部）给你们安排。至此，刘中、李芸华向主席告辞，并说连夜回去。

毛泽东在徐州又接见了市委书记华诚一、副书记柳林。在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说，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谈及工商业税收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按照资本家的情况，实行多等多级。毛泽东在徐州还凭吊了淮海战役战场。^②

专列途经济南，晚上，到达天津。

26日9时许，毛泽东在黄敬、罗瑞卿、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天津市委负责同志黄火青、吴德、李耕涛，以及市公安局局长万晓塘等陪同下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

毛泽东下车后，黄敬连忙将天津七区区委书记、区长石国珍和汽车制配厂厂长李玉盛等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石国珍的手问：“你到这个区多久了？年龄多大啦？”石国珍回答：“我到这个区不到一年，现在29岁。”毛泽东转问黄火青天津市的干部状况后，说：“你们要注意多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做领导工作，做到后继有人。”

毛泽东握着李玉盛的手问：“你担任厂长多久了，钻进去了吗？”李玉盛回答：“我一进城就在这个厂工作，对工业这一行，正在钻。”毛泽东笑着说：“你回答得好，就要好好去钻。”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63页。

^② 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第59页。



1953年2月26日，毛泽东在天津参观汽车修配厂。（摄影/吕厚民）

黄敬、黄火青、李玉盛等请毛泽东先休息一下，再看车间。毛泽东不肯，说：“不休息，还是先看吧！”

毛泽东从生产毛坯的铸工车间开始，走遍了全厂八个车间。在视察过程中，他对原材料来源、生产各道工序、产品名称、产品用途等都问得很仔细，既听黄敬、李玉盛介绍情况，又不断和工人交谈，几次嘱咐：“你们要积极生产，要注意安全。”

毛泽东在一个多小时的视察中，反复地对黄敬、黄火青、吴德等同志讲，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村来的，打仗、发动群众搞土改，还有些经验，现在我们夺取了大城市，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学会领导生产，做好经济工作。不这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的。毛泽东指着黄敬说：“你这个部长，学管理城市，钻研工业，是带了头的。”毛泽东转身对黄火青、吴德、李耕涛同志讲：“天津是个大城市，工商业仅次于上海，你们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把天津工商业搞好。”毛泽东说：“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就要教育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政治，使他们真正成为我们发展生产、管理经济、治理国家的主人。”

视察结束，大家劝毛泽东到厂接待室休息一会儿，毛泽东仍然不肯。这时，厂内职工纷纷汇集到厂院，拥在毛泽东周围，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招手，向职工们致意。^①

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后，毛泽东离开天津。

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27日，返回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他这次视察的情况，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②

4个月后，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又提到：“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去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毛泽东说：“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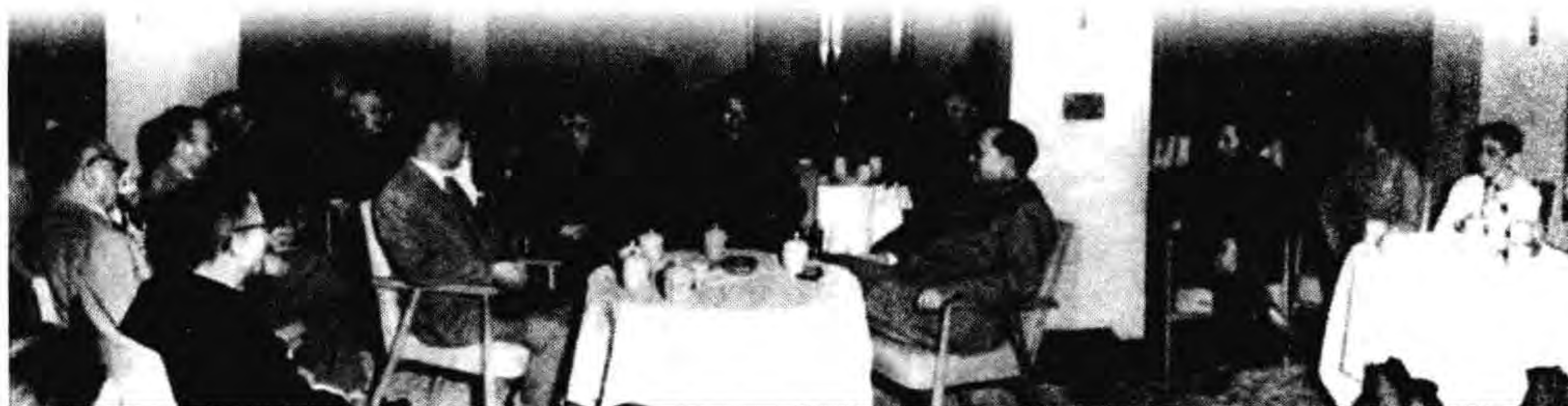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12~13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第22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1页。

第三章

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十四次离京



- 去杭州起草宪法
- 视察官厅水库
- 到天津、唐山、秦皇岛探讨工商业改造
- 1954 年夏天在北戴河
- 赴广州研究“一五”计划
- 对农村情况初次调查
- 对合作化问题再度调查
- 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第三次调查
- 1955 年夏天在北戴河
- 在北戴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 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商讨农业发展规划
- 征询《农业十七条》意见，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
- 到广州扩大调查
- 1956 年夏天在北戴河

六 去杭州起草宪法

1953 年底，抗美援朝即将结束，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党的工作开始转向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党中央考虑着手进行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小组。

12 月 24 日，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赴杭州，组织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外则称“休假”。出发前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在会上，毛泽东向高岗、饶漱石发出警告：“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2 月中旬，毛泽东从陈云、邓小平的揭发了解到高岗的分裂活动。12 月 17 日以后，毛泽东找多人谈话，调查了解，核实情况，并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①为了防止党的分裂，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会议一结束，下午 4 时，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乘专列离开北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 1905~1995》中卷，第 191~192 页。

24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东站出发。

25日上午，专列途经济南，时任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向明上了专列。

毛泽东在行进途中仍然在处理国家大事。在济南，杨尚昆与滕代远通电话，经山东分局发出一封给刘少奇的电报。

在前往杭州的途中，毛泽东复电祝贺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炼炉三项工程胜利开工。

26日下午，专列途经浦口，柯庆施上车。专列经由轮渡渡江。

27日，专列到达上海。毛泽东住华东局。

毛泽东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当时，中央已决定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鼎丞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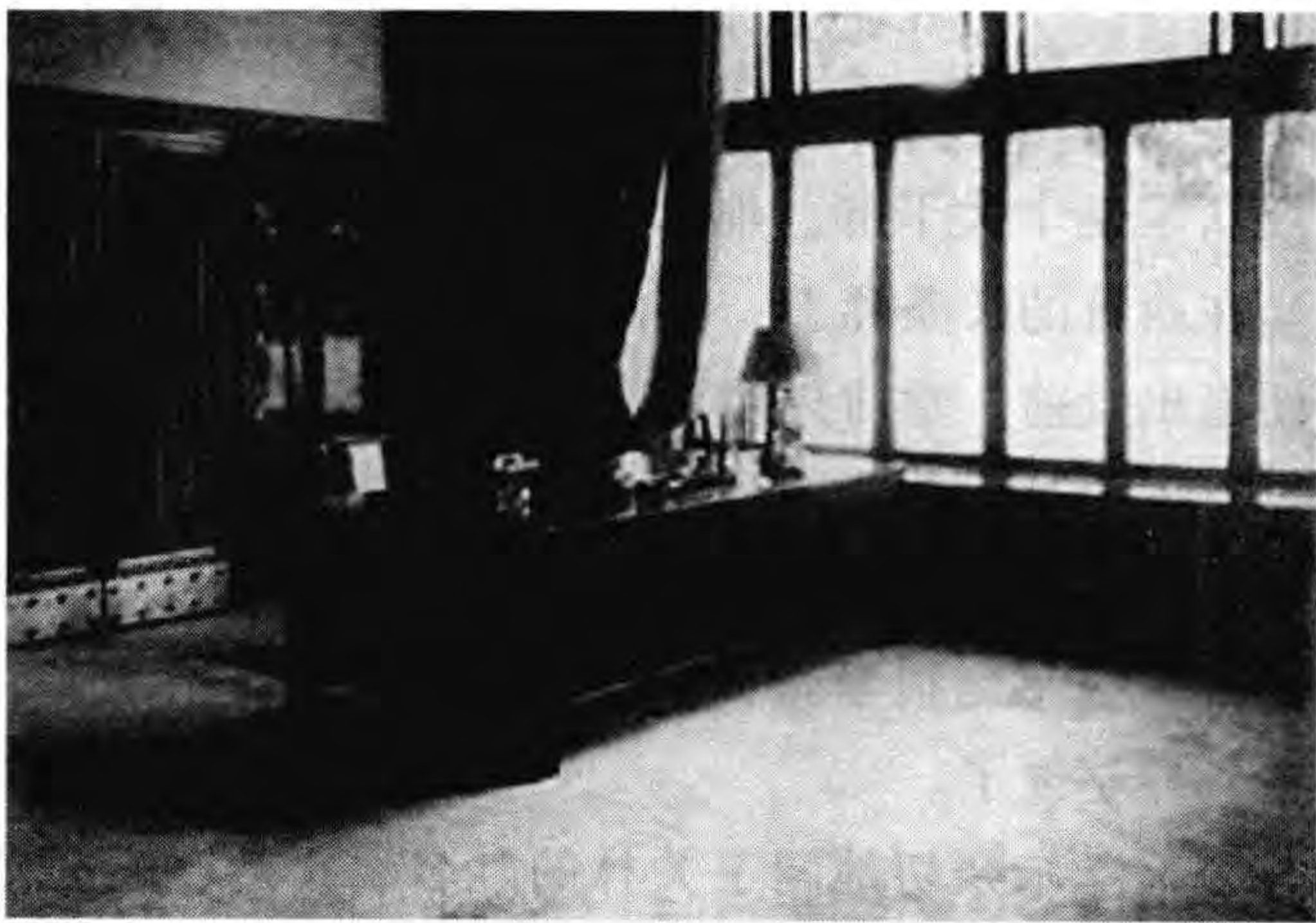
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乘车浏览了市容。之后，到陈云住处探望了陈云。18时余，赶赴车站，登上了专列。

19时20分，专列去杭州，谭启龙同行。

28日，专列抵达目的地杭州。毛泽东下榻于杭州刘庄一号楼，办公地选在北山街84号。

当天上午10时，毛泽东到北山街84号看了看，表示满意。下午游灵隐寺、飞来峰、岳王坟、秋瑾墓、苏小小墓、武松墓。

在杭州，毛泽东听取了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又询问浙江农业合作化



刘庄一号楼，毛泽东办公室。

^① 《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16页。

的情况。谭启龙向毛泽东介绍了浙江新登县，1952年初就试办了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毛泽东决定亲自到新登县去看看。

一天早上6点，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没有休息，带着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往新登县方向驶去。车队到距新登县城约五公里的松溪乡时减速，车过松溪桥东停下。身穿大衣、戴着鸭舌式呢帽子和口罩的毛泽东从车上下来，在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的陪同下，沿公路向新登县城方向走去。

一路上毛泽东时而向陪同的当地干部了解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时而走到稻田边，细细观看。大约步行了三华里左右，公路左边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毛泽东大步进了村。

村里静悄悄的。毛泽东边走边环视着这个小小的村庄。这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立即走上前去，与她交谈起来。由于陪同人员离毛泽东稍远，不知道毛泽东与老大娘谈了些什么，只见最后老大娘伸手向前指了指。毛泽东微笑着向老大娘告别。

离开老大娘，毛泽东朝着老大娘指点的方向，径直来到农业社会会计王关林家。王关林家坐西向东，背靠杭新公路，三室二厅的住房，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宽敞的。所以，农业社的社部就设在他家。毛泽东的卫队长、秘书、摄影师侯波、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和省警卫处的汪龙和也随主席走进王关林家。房主罗彩玉及24岁的儿子王关林，见有客人进屋，连忙迎上来。因毛泽东戴着大口罩，他们没有认出是毛主席，但看其魁梧的身材，便认定是个大干部。他们将毛泽东一行七人迎到堂前，搬凳让坐。毛泽东坐在西首的长条凳上，其他人员分坐两边。王关林的妻子给来客倒好茶水，便退出堂前。堂前只剩下王关林与毛泽东及陪同人员。

王关林，因为有点文化，又积极上进，在村里是个骨干，还上省城开过几次会，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可此刻，面对这么多突如其来的大干部，他感到很紧张，拘束得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更不要说好好地看看这些领导是谁了。

毛泽东亲切地问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这是什么村子？有几户人家？多少田？”

“这个村子叫王家水碓，有14户人家，88亩田。”

“村里有没有地主富农？”

“没有地主富农，都是贫下中农和中农。”

“村里有没有办农业合作社？”

“今年初，村里刚办了农业社。”

“合作社叫什么名字？”

“叫新庄农业合作社。”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社全县有几个？群众欢迎不欢迎？”

“全县有十几个，群众很欢迎。”

毛泽东笑着说：“还是组织起来好。”知道村里已经组织起了农业合作社，毛泽东问得更多更详细了：“农户入社是不是自愿的？”

王关林告诉毛泽东：“农户入社是自愿的。当时有的农户不愿参加，主要是几户中农，因为他们的农具较多，认为入社他们肯定吃亏。”

毛泽东插言道：“要按政策办事，不能歧视他们，要帮助他们。对耕牛和大型农具要处理好，折价要合理，使他们感到入社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会自愿参加。”

王关林接着说：“我们是这样做的，实行土地入股分红，耕牛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小型农具自带入社。秋收后，未参加的几户中农见我们收入有了增加，也自愿参加了农业社。”

毛泽东又详细地询问了耕牛、大型农具的折价情况，归还时间及从何处支出；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配以及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对新庄农业社制订的合理政策表示满意。

对农业社问题作了全面了解后，毛泽东换了一个话题问：“这个村里有人参军吗？有没有转业军人？”

“有一个参军，两个转业的。”王关林回答。这时正好转业军人王金土和社员王培林来到王关林的家门口，王关林就指着王金土说，“他就是转业回来的。”说话间王金土走进了王关林家的堂前。

毛泽东问王金土：“你是哪年参军的？”

王金土回答说：“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反动派的兵。在锦州战役后被俘，参加了解放军，还入了党。以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今年春上复员回家。”

提到锦州战役，毛泽东提高了兴趣，他诙谐地说：“锦州战役我们摆的是口袋阵，专待你们进口袋，然后逐步收拢包围圈，把你们统统吃掉。”

边说边用双手做了合拢的手势，问王金土：“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在的那个营是负责运送粮草的，在锦州战役前就已经撤出了。”王金土点点头说。

毛泽东笑着说：“那次要不是你的腿长，跑得快，否则早就被抓牢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引得大家一阵笑声。

毛泽东接着问王金土：“现在生活怎么样？”

王金土笑着说：“生活蛮好，还造起了新房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问王关林：“合作社生产怎么样，水稻亩产有多少斤？”

王关林告诉毛泽东：“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地造田，生产很好。水稻好的亩产可达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的帮助下，开始试种连作茭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

毛泽东在了解了连作茭稻的种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大约半个小时后，毛泽东起身告辞，离开了王关林家，从小路返回松溪乘车回杭。^①

毛泽东酷爱读书，非常重视研究中国历史。这次来浙江，派人到浙江图书馆。听说全国只有四部《四库全书》，浙江图书馆也馆藏一部，于是毛泽东把《四库全书》借去。

这几天，毛泽东还爬了南高峰、北高峰，视察了龙井。

毛泽东到杭州没几天就是1954年新年元旦。也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这几天，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来中国参加鞍山钢铁厂扩建工程落成典礼。捷沃西在东北时，高岗亲自作陪。高岗利用接待苏联客人之机遇肉麻地吹捧自己、抬高自己，肆意贬低、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等。毛泽东听到消息，马上叫叶子龙告诉中办，邀请正在北京的捷沃西和尤金到杭州访问，毛泽东要见他们。^②

1月1日，杨尚昆为尤金来杭州事去毛泽东处请示，罗瑞卿、谭启龙同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63~66页。

②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88~489页。

去，并向毛泽东拜年。

2日早上8点，毛泽东召杨尚昆、罗瑞卿，谈尤金来电事。

3日，应毛泽东之邀，捷沃西和尤金在师哲的陪同下来到杭州。下午4时至6时30分，毛泽东在刘庄寓所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告诉捷沃西和尤金：“我们党内，或许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毛泽东给他们讲了秦灭楚的故事。毛泽东说：“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对毛泽东讲的故事和毛泽东所讲的党内斗争，捷沃西和尤金当时没有听懂，只是几个月后，在听了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通报后，才明白。^①

4日，毛泽东又在寓所接见了尤金。毛泽东同这位专家谈社会、谈经济、谈哲学、谈政治，但没有再谈党内的斗争。

与捷沃西、尤金谈话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那段时间，北京与杭州之间电话、电报频繁，多是关于高饶问题。

5日下午4点至7点30分，毛泽东召杨尚昆谈话。

6日晚上，在毛泽东处开会。决定杨尚昆7日回京，传达主席指示，建议召开中央全会。

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收到了刘少奇的来信及在北京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草案）》，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主持在杭州的同志对决议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并征求了当时在南方修养的林彪的意见。

7日，毛泽东就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写信：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93页。

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毛泽东写完信，仍觉得有话没有说完，于是又加附言：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

同高岗的斗争，毛泽东开始始终抱着团结的愿望，所以要求在正式的决议里，“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经过考虑，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32~433页。

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一月七日^①

7日晚上，杨尚昆携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和杭州方面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返回北京。

8日凌晨3时，毛泽东又给刘少奇写信：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三时^②

毛泽东让杨尚昆带到北京的修改意见里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③

处理完这些事情，1月7日毛泽东开始把精力集中到宪法起草工作。宪法起草小组也从这一天开始工作。

9日，宪法的起草工作开始运转。毛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毛泽东在平房办公，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每天忙于召集会议、接见客人、审批文件、读书、学英语，很少户外活动，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33~435页。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与田家英、陈伯达、周泽昭、罗光禄合影。（摄影/侯波）

脑子得不到很好休息。好在毛泽东喜爱爬山，西湖周围有的是山，而且都不很高，于是负责保健的医生就每天安排他爬山。天好，他起得早，就爬大一点的山；起得迟，或者天下雨，就爬小山。这两个月里，他几乎踏遍了西湖四周的名山。毛泽东每次爬山，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了解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地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

10日，毛泽东主持起草小组制订了工作计划。

15日，毛泽东就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给刘少奇并中央各同志拍了一封电报：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计划如下：

（一）争取在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二）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

通过。

(三) 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四) 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五) 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为了在二月间政治局便于讨论计，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

毛泽东所列参考文件包括：

(一) 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

(二) 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

(三) 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

(四) 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

(五) 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①

18日，毛泽东就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给中央发去电报：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②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37~439页。

21日晚上10时，杨尚昆从北京回到杭州，带来了一些文件和高岗的一封信。一到杭州，杨尚昆即去刘庄毛泽东处汇报。

22日晚上8时，毛泽东与杨尚昆商谈给刘少奇回电。毛泽东的回电如下：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①

23日和25日毛泽东就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和朱德同志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词的修改意见给彭德怀和朱德拍去电报。

23日这天，杭州下大雪。

24日，大雪初晴。毛泽东特别喜欢雪，他高兴得了不得。一早就起来站在湖边看雪景。摄影师侯波以西湖雪景为他留了影。

只有雪，可以使毛泽东把手头工作放一放。这天，他先带领身边工作人员，每人拿一根小棍，小心翼翼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头，观望西湖雪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40~441页。

然后又驱车郊外，沿着黑黝黝的钱塘江西行。翻过了一道山梁，眼前闪现出一片银色的田野。毛泽东急令停车，大家戴上了大口罩，下了车，卫士们要搀扶毛泽东，他大手一挥，谢绝了，就往雪地里走。可是雪把大地封平了，哪是垄哪是畦哪是田埂，看不清楚，他站住了，站在一条田埂上，弯身抓起了一把雪，在手心里轻轻地拨着，好似要点一点有多少个雪花。卫士们要抢前探路，探出一条实路让他走，被他制止了。



1954年，毛泽东在浙江新登县。（摄影/侯波）

他怕踩破了雪被，他怕惊醒了沉睡的田野。他拉下了大口罩，静静地望着，凝视着，深深地呼吸着那被雪过滤了的清新空气。

听说这里是富阳县的地界。回来的路上，毛泽东仍沉浸在雪的愉悦中。

25日下午，飞机由京来杭。带来了一些文件，包括刘少奇写的自我批评稿。晚上，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又与刘少奇通了电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杨尚昆与陈伯达商改刘少奇的自我批评稿。

26日下午5时30分以后，毛泽东约杨尚昆谈文件修改事。

27日下午，毛泽东参加讨论文件。

当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

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①

28日下午，毛泽东找杨尚昆同志去谈话，要他带上经审定的四中全会文件返回北京。毛泽东还就四中全会的开法谈了自己的意见。

29日9时20分至14时30分，杨尚昆携带四中全会文件从杭州飞到北京。

这天，毛泽东爬上五云山，摄影师侯波紧跟在毛泽东后面，毛泽东边走边和侯波聊起来。

“你最近看什么书？”

“看《红楼梦》。”侯波说。

“看得懂吗？”毛泽东问。

“看故事呗。”



1954年1月29日，毛泽东在杭州五云山与身边同志合影。（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45页。

“要好好看，看三遍、五遍！”

“看三遍？我一遍还没看完呢。”

“哎，要仔细看喽！那样的家庭，那些人，你们可没看到过。”毛泽东对侯波讲：《红楼梦》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读懂它，就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了。毛泽东还谈到《西游记》，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块去西天取经，中途发生了矛盾，闹不团结，但经过互相帮助，战胜了妖精鬼怪，到了西天，取回了经，成了佛。毛泽东说：我们革命不怕有不同意见，只要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目的就一定能达到。

上到山腰一个亭子里，毛泽东看亭子上的对联。侯波发现山下一处房子着火了，就喊：“哎呀，着火了！”

毛泽东回过身来，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不烧了，他就老住茅草房。”

侯波说：“那烧了，他住哪里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

毛泽东没有回答，只是望着火烟沉思。好一会，才自言自语地说：“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唉，还是烧了好，烧了三年盖瓦房，不烧十年住草房，我看朝鲜也可坏事变好事。”^①

31日，毛泽东去钱塘江视察海塘。

2月3日春节。春节前夕，江青和李讷也到了杭州。江青在杭州



1954年1月31日，毛泽东视察钱塘江海塘。（摄影/侯波）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132~133页。

的时间不长，因为和主席吵架，她让杨尚昆找飞机离开了杭州。

6日大年初三，这天是民间祭祀逝人的时间，毛泽东托工作人员向岳飞墓献了一个花圈。

2月6至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全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及其机会主义路线。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由于毛泽东和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宪法起草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2月中旬，拿出了初稿、二读稿和三读稿。

10日，毛泽东登北高峰。

17日晚上10点，毛泽东就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改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拍了一封电报：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现将宪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二月二十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二十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十八）日动身，二十日可到北京。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下午十时

17日晚上，刘少奇打电话通知毛泽东，高岗中午自杀未遂并且谈了政治局讨论的意见。^①

24日凌晨2点，毛泽东就宪法草案初稿、二读稿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

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106页。

发各同志阅看。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二时^①

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

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二十四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二十六）送给中央。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②

26日凌晨2点，毛泽东就宪法草案三读稿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二时^③

28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做了修改和批示：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在这个提纲中也做了修改：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49、450页。



1954年，毛泽东在刘庄丁家山上。（摄影/侯波）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

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带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①

2月28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宪法三读稿，同时决定由董必武等组成的研究小组，研究和修改。

3月1日，毛泽东就乔冠华、黄华等回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发出一封电报：

杜平、乔冠华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

二月二十八日电悉。

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61页。

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杜平、丁国钰三同志署名。

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①

2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托他办几件家事：

家英同志：

（一）杨秀生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形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

（二）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

（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日^②

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并通过了宪法的四读稿。

9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宪法起草工作基本结束。毛主席心情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61、463页。

轻松了许多。他当即向中央请假休息几天。说是休息，实际上毛泽东是想利用工作的空隙尽可能地多做一些具体的调查。他找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要他介绍一些基层的情况。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绍兴东湖有个农场，是浙江省的第一个示范农场，哪里在搞科学种田。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要谭启龙详细谈谈。

谭启龙对毛泽东说：绍兴东湖农场在土质差、产量低、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大搞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实行合理密植，增加复种指数，改单季稻为双季稻，成功地采取了“良田、良种、良制、良法”的配套技术，粮食亩产由1951年建场时的388斤，提高到1953年的709斤，使得当年的“放鸭贩”、“溺煞贩”成了浙江省有名的高产样板。谭启龙还饶有兴趣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东湖农场附近著名的绍兴东湖。

毛泽东听后，决定专程去一趟绍兴。

3月中旬的一个下雨天，毛泽东提出要去东湖农场。因为天下着小雨，谭启龙和身边工作人员劝他天晴再去，但他坚持要去。同去的有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谭启龙、田家英、叶子龙及摄影师侯波、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同志。绍兴市公安局局长刘邦俊等担任警卫工作。

毛泽东的车队没有进城，没有惊动绍兴的党政领导，而是直达东湖农场。

车队停在公路旁。毛泽东走在东湖农场的田塍上。谭启龙跟在毛泽东后面。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看，不时还蹲下身来用手轻轻抚摸一下身边的庄稼，东湖农场的领导在一旁向毛泽东汇报农场的情况，尤其汇报了温水

浸种新技术。毛泽东看着平整的稻田上长着嫩绿的草籽，回过头来向同来的人赞扬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参观东湖农场后，毛泽东来到东湖风景区。当时，东湖还未通公路。毛泽东走在狭窄的黄泥路上。由于天下着雨，路上泥泞不堪，



1954年3月，毛泽东视察绍兴东湖农场。（摄影/侯波）

工作人员便在路上撒上苍糠，以防毛泽东等一行滑倒。到东湖风景区后，毛泽东沿着湖的长堤，欣赏着东湖的山水：惊险的悬崖，陡峭的山壁，飞檐的亭榭，涌流的泉水，拱形的石桥……然后，坐在刻有“此峰自蓬岛飞来”字迹的假山旁的石凳上，一面向谭启龙询问绍兴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一面向谭启龙谈起东湖的景观。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刘邦俊：“东湖水有多深？”刘邦俊答不上来，但机灵的刘邦俊把刻在东湖“仙桃洞”上的一副对联念给毛泽东听：“洞五百尺不见底，桃三千年一开花。”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这不是自然湖，是人工开创湖。这陡立的石壁，惊险的悬崖，不是天然而成的，而是劳动人民开采了不知多少年的石条才凿成这壮丽景观的。”

因为风大，毛泽东后来到室内的走廊上小憩。毛泽东坐在八仙桌的上方，谭启龙坐在毛泽东的右侧。

毛泽东与秘书们从科学种田和东湖的景观谈开，又谈起《红楼梦》和对《红楼梦》的研究。

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六条人命呢！冯渊、贾瑞、鲍二家、尤三姐、司棋、晴雯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着青年人。”

毛泽东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当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



1954年3月，毛泽东和谭启龙在绍兴东湖。（摄影/叶子龙）

毛泽东问：“你去过鲁迅故居吗？”

谭启龙说：“去过。”

毛泽东说：“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知道吗？”

“知道。”谭启龙点点头说。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啊。”

在八仙桌旁，摄影师侯波为毛泽东与谭启龙合了影。

毛泽东这天到绍兴东湖是上午9点多钟，大约11点半离开绍兴。他在东湖巡察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东湖的印象却很深。^①

3月8日，黄炎培老先生就自己在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并随信寄去了3月1日的讲话稿。讲稿中黄老先生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告诉工商界同人，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

12日，毛泽东给黄老写了回信：

黄副总理：

三月八日惠书阅悉。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敬颂大安

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李维汉二同志写信：

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3~4页。

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

复黄信请阅后送交。^①

黄老先生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

12日，毛泽东爬玉皇山。

13日下午，毛泽东准备离开杭州，行前与地方有关领导同志话别。参加的有谭震林、谭启龙、王芳等。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罗瑞卿等在座。

14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无锡。行前通知陈毅，毛泽东要见他。陈毅当时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立即赴无锡迎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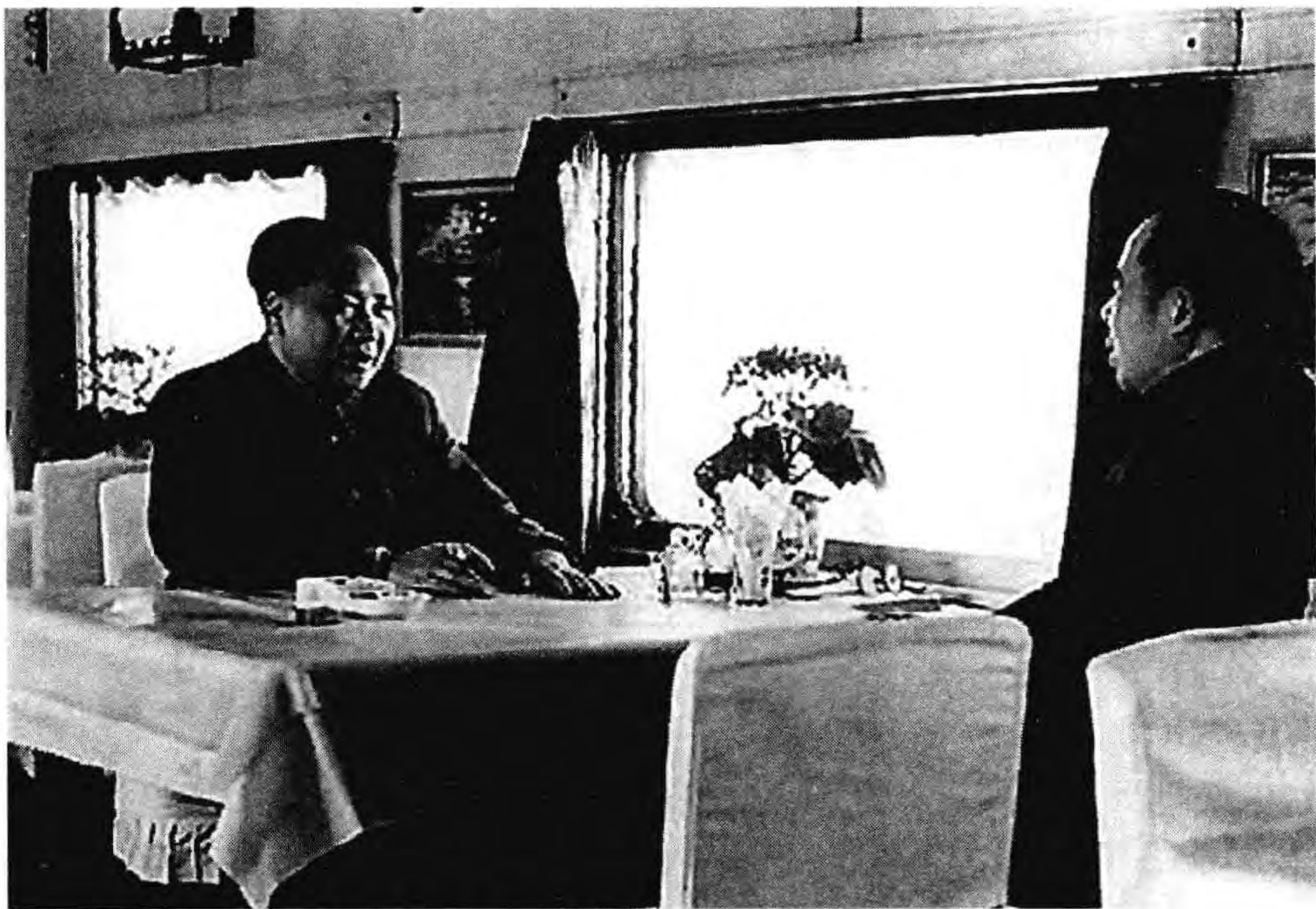
当晚，专列抵达无锡，陈毅将毛泽东接至大箕山畔的华东疗养院。

15日凌晨，陈毅陪毛泽东到太湖边看日出，回来后，毛泽东同陈毅谈



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在江苏无锡华东局疗养院看太湖日出。（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468~469页。



1954年，毛泽东和陈伯达在返京的专列上交谈。（摄影/侯波）

话。他们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生产力聊起，又谈到哲学上的假象与本质等等。在谈到高岗问题时，毛泽东说：“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在这之前，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曾单独同前来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两次谈话，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又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毛泽东此次到无锡，停留不到20个小时，与无锡市的领导没有见面。^①

1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① 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第222页。

七 视察官厅水库

1954年4月11日，毛泽东去官厅水库视察。据毛泽东的警卫张随植回忆：警卫局布置了去官厅水库的准备工作。我的任务是和警卫处的王玉波提前去水库指挥部了解有关情况，为毛主席此行的安全作准备。当天去当天回，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局里作了汇报。

原定乘火车前往，临出发前，才得知西直门火车站有一列车倒不开，便决定乘汽车到清华园上火车。

我们乘汽车到了清华园，在那里上了火车，开到青龙桥去倒车调头。因为尚要一定时间，主席下了车，看到詹天佑的铜像，便向铜像走去。在



1954年4月11日，毛泽东视察北京官厅水库，电影资料。（摄影/徐肖冰）



1954年4月11日，毛泽东视察北京官厅水库，电影资料。（摄影/徐肖冰）

那里，他稍留片刻，又继续往上走去。我们紧随其后。因为上坡，我看到山坡上有根杨树枝子，便捡起来，简单整理了一下，把一些小枝除去，做成一根拐杖长短，送给了主席。主席没有说什么，接了过去，拄着，省了许多劲儿。

上去之后，毛主席在一个土坎上坐下来，给大家讲起了詹天佑修铁路的故事。侯波见主席情绪很

好，取出相机说：“主席，与大家合个影吧！”毛主席没有反对。他选了一块地方准备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向他靠拢，都站好了。侯波见我站在远处没有动，就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因为我下车时，部队还没来。这里山高坡陡，我身上便带了一支卡宾枪。同指挥千军万马战胜敌人的主席合个影，这是我终身的愿望，机会难得。现在，机会来了，我又有点犹豫。带着枪与主席照相显然不雅观，如果把枪放在地上，又觉得这样不妥。一时之下，下不了决心，不知该怎么办。没有敢过去，依然站在那里没有动一步。侯波又向我招手，主席看了看我，说：“人家不想照就算了吧，不要强人所难嘛！”主席这样一说，侯波再也没叫我，我便站在远处看她照相。侯波透过镜头看了一下，取下相机，向主席说：“主席把你手里的那根棍子扔掉吧，那样不好看。”主席说：“西洋人拿的叫文明棍。我们是无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的本色，怎么可以扔了呢！”说着，他用那根棍子点了点地说：“这个正好。”

合完影，主席上了车向官厅水库出发。^①

11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到达官厅水库。参观了两个钟头。

当天，官厅水库工地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气氛。平时和工人一身汗一身

^① 张随枝：《红墙内的警卫生涯》第130~133页。

泥的管理局局长成润，今天穿得笔挺挺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今天都没深入基层，全随着成润身后，站在工地火车站边的小山冈上，一边向火车站张望，一边激动地议论着。“来了，毛主席的火车来了！”成润赶紧领着干部们朝月台跑去。他在参与同国民党谈判黄河堵口归故道时，曾多次见过周恩来，但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今天领着200多人来视察官厅水库，这是他这位当局长的莫大殊荣。

毛泽东在杨尚昆、水利部副部长郝执斋等领导人的陪同下走下火车。满脸笑容地同成润握手，和蔼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成润既激动又紧张：“我姓成，名润。”

“什么成，什么润？”

“成功的成，滋润的润。”

“啊，”毛泽东用右手指在左手掌上写这两个字。“你原来是水电部的？”

“是的，原来在水电部规划局当局长。”成润很激动，看来，毛主席在来之前专门了解过自己。

毛泽东又问：“你会做水坝吗？”

成润回答：“过去没有做过，这是第一次做。”

毛泽东笑着说：“咱们都一样，都不会做。不过，做一两个就会了。”

火车上下来了200多人，有国务院的机关干部，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和少先队员。好像没有人统一指挥，一下火车，他们便三五成群地朝水库走去。

毛泽东边走边问成润：“我看你像北方人。”

“是的，我是北方人。”

毛泽东笑了笑：“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地道的北方人。”

毛泽东和杨尚昆、成润并排走在前面。毛泽东告诉成润：“这次来，一方面看一看官厅水库，另一方面，华北缺水，我想向你们请教请教，怎样解决好华北的水资源问题？”

毛泽东很关心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1951年春，正当农作物急需大量雨水的时候，北京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干旱，连续几个月不下雨。毛泽东仰望着久旱不雨、烈日炎炎的天空，想到了干裂的田园，想到了心急如焚的农民，禁不住常常喃喃自语：“为什么老不下雨？为什么老不下雨？”

5月24日，北京喜降大雨，毛泽东喜出望外地说：“下雨了，今天可下雨了！不知这场雨对庄稼有多少好处？”他立即派人到市郊农村去了解农

民的反映。

成润认为毛泽东研究的题目比较重大，怕回答不好，便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知道一些常识，但我不是专家，如果需要的话，是不是请一个专家来？”

毛泽东笑着挥挥手：“不用请啦，我们随便扯一扯。”

成润努力抑制住紧张的心情，准备好了的汇报内容渐渐地在大脑里映现出来，他沉住气，一字一句地说得清清楚楚：“永定河是海河北系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水系中洪灾最厉害的一条河。远的不说，仅在1949年之前的30多年中，就有七次泛滥成灾。凶猛的洪水冲垮了田园房屋，吞噬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反动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的死活，反而趁机敲诈勒索，害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毛泽东边走边默默地听着，表情略显严肃。开始登坝了，警卫人员将一根竹拐杖递给毛泽东。这根拐杖极普通，长约1.2米。

成润继续说：“官厅水库拦河坝、溢洪道及输水道工程，是在1951年10月开工的，在当时，是仅次于治淮第一期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的一个重大水利工程。总库容22.7亿立方米，是建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去年8月，水库还在修建，永定河又爆发了有水文纪录以来第二次特大洪水，但是，刚刚修起来的水库大坝发挥了作用，把咆哮的洪峰挡在了官厅山峡的上游，免去了下游的一场大灾难。”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好哇，共产党又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当毛泽东来到大坝顶时，在坝内工作的工人们立即欢腾起来，聚集在各个工作中心点上，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再经过峡谷的回荡，形成了巨大的震撼力量。

毛泽东深深地被这种热烈壮观的场面所感动，不断地向工人们招手示意。他从不认为群众的欢呼仅仅是崇敬毛泽东，也包含了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种热爱不仅仅是最珍贵的鼓舞和享受，也是殷切的希望和鞭策。

毛泽东从近300米长的大坝西头一直走到东头，详细察看了溢洪道和输水隧洞等工程的施工现场，又认真地询问了水库的设计、施工和将来的效益等情况。

成润告诉毛泽东：“这座水库可以蓄水20多亿立方米，不仅对解除永

定河下游的水害能发挥重大作用，为首都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提供水源，而且湖中可以养鱼，湖水可以发电，将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今后，永定河不仅可以真正‘永定’，而且还可以‘永乐’。”

“永定，永乐，很好，很好！”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几个来参观的女少先队员说，“这里很好嘛，你们几个就留在这里吧？”

孩子们不知应该怎样回答才好，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笑。“舍不得妈，舍不得爹啊？”毛泽东笑了起来。大家也被逗乐了。

毛泽东问成润：“水泥、钢筋、木料，还有石料，现在的价钱怎么样，修这座水库一共花了多少钱？”

成润一一报了各类材料的单价，并说这座大坝的投资很便宜，才花了124万元。

“噢，才花了124万。”毛泽东点点头，“用124万元换一个这么大的水库，值得，值得！”

毛泽东走下大坝，来到工人中间，边走边和工人、干部亲切交谈，问生产、问生活，始终笑容满面，平易近人，工人们感动极了。

毛泽东走到砌大坝防浪墙的工人中间，亲切地问：“砌一方石头需用多长时间？”

几位工人只是憨憨地望着毛泽东笑，不好意思回答，有一位胆大的工人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

毛泽东又问工人们家住在哪里？家里有几口人？参加工作几年了？当一位工人回答说自己是湖北人时，毛泽东笑着说：“咱们是老乡啊，湖北湖南一家亲嘛！”

当毛泽东在进水塔竖井看到工人登着螺旋梯上上下下时，便关切地对成润说：“能不能做成电梯？工人们上起来就更省力。”

毛泽东回到车站附近休息，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搬来一条凳子，毛泽东见大家都席地而坐，忙向工作人员摆摆手，示意他搬回去。毛泽东在地上坐下，从警卫人员手中接过茶杯，喝了几口，他和蔼地问陪同视察的水库管理局的干部：“你们在这里工作艰苦不艰苦？习不习惯？”

大家说：“我们不艰苦，已经好多年了，习惯了。”

“很好，很好。”毛泽东点点头，又问成润，“你在这里累不累？”

成润感动地说：“不累。第一，我们年轻；第二，已经过了几年了，

毛泽东为官厅水库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习惯了。”

毛泽东高兴地掏出香烟，给水库管理局的干部一人一支。成润接后小心翼翼地把这支烟珍藏在烟盒里，另外拿出一支烟来抽。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热情地赞扬官厅水库，对水库建成后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风趣地勉励大家：“人怕出名猪怕壮。没有出名想出名，一旦出了名就得要注意。官厅水库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大，你们要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成润想请毛泽东为水库题词，话到嘴边又不好意思提，溜出嘴的话却是：“主席，请您对我们水库今后的工作作指示！”

“你们商量决定吧。”毛泽东微笑地摆摆手，举起茶杯一饮而尽，并把茶叶也都喝入口中，咀嚼一阵后全吞咽下去。

毛主席吃茶叶？茶叶也能吃？成润第一次见人吃茶叶，感到不可思议。“主席，我见您喝完茶后连茶叶都吃进去了，这茶叶可以吃吗？”

毛泽东笑起来：“可以吃，吃了可以健胃提神，这是湖南人的习惯，一个老习惯。”

毛泽东回北京后，傅作义请毛泽东为官厅水库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当即挥毫写下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几个大字。^①

下午5时，毛泽东离开官厅水库回京。

晚上10时30分，毛泽东回到北京。

^① 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第115页。

八 到天津、唐山、秦皇岛探讨工商业改造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3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宪法草案初稿。这以后，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思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考虑在农村逐步实现合作化的同时，如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决定到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做些考察。陪同这次考察的有杨尚昆、罗瑞卿及轻工业部部长、铁道部部长和天津市市委书记等领导同志。

1954年4月18日星期天，毛泽东突然想去西安，因准备不及没有成行。

19日，杨尚昆、罗瑞卿为布置主席出发的事忙了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也许是因日内瓦会议，周总理也要赴会，毛泽东改变了去西安的想法，就近到天津和山海关考察。

晚上10时，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

20日凌晨1时，专列到达天津。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市领导的汇报后，宿于原黄敬同志处。当天，毛泽东邀李烛尘一起到唐山、秦皇岛考察。下午1时出发赴山海关。

晚上7时30分，专列到达山海关。毛泽东一行宿于车上。

21日上午，毛泽东在秦皇岛市委书记、市长王植范等市、区两级负责同志陪同下，视察山海关长城。

在“天下第一关”城楼下，毛泽东走下汽车，惊喜地说：“这儿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山海关城楼。（摄影/侯波）

变了！”

1950年2月，毛泽东从苏联回京途中，与周恩来到这里。因刚刚解放不久，山海关城楼，缺门断户，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就离开了。如今这里修葺一新，甚为壮观。毛泽东登上城楼，在城楼北侧，举目望去，是重叠的燕山。城外不远处有一个平台，毛泽东问那是什么。山海关区委书记、区长柴洪山告诉他，那是威远城遗址，是明朝吴三桂投降清兵的地方。由此毛泽东讲起了吴三桂的故事。

毛泽东沿长城向北走，见到前边有一个墙垛，问：“那是烽火台吧？”柴洪山说：“是的，战争时做信号用的。”这时毛泽东又讲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王植范请毛泽东到箭楼看看。毛泽东说：“好，欲穷千里目嘛！”到箭楼上，毛泽东极目远眺，隐约见到远处有起伏的山峦。毛泽东问那是什么地方？王植范说：“那是碣石山，在昌黎县北。”毛泽东俯视山海关全城，

亲切地同大家交谈。他问柴洪山山海关有多少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商店？柴洪山一一做了回答。他又问，工人工资有多少？生活得怎样？柴洪山又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听后说：“山海关人民生活还苦啊，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提出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从城楼下来，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南海“老龙头”。这里，早年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毁坏了，城墙坍塌残破，只是还有一个土坡，像是一道堤坝。毛泽东一下车，惊奇地问：“老龙头在哪呀？”人们指着土坡说：“这就是老龙头。”并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国联军占领了山海关及以后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军队在“老龙头”修建军事营盘的情况。柴洪山手指营盘位置，一个一个向毛泽东作了介绍。特别是日本，在营房内还设有“铁牢”、“水牢”和“狗圈”等等刑房，残酷地杀害中国人民。1933年元旦，日本又以此为阵地，武力夺取山海关。解放后，一时还无力维修。毛泽东向上走去，看到一门旧炮放在那里，问是怎么回事。柴洪山说：“这是八国联军留下的，是德国造。”

毛泽东感慨地说：“现在，中国人民再不受外国的欺侮了。”

在“老龙头”的尽头，毛泽东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与柴洪山交谈起来。“你是一区之长，都管什么呀？”

柴洪山不及思索，便脱口而出：“什么都管呗。”

“那，这大海你管吗？”

“管。”柴洪山回答。

毛泽东风趣地说：“都管可不行啊，还有公海呢。”接着又说：“我们是要把大海管起来，不过现在还做不到，这是一项长远的目标。”

从这里向西南望去，秦皇岛码头隐约可见。毛泽东问那是什么地方，王植范回答，是秦皇岛码头，“也是请主席要看的地方。”^①

中午12点30分，毛泽东一行来到秦皇岛。毛泽东登上东山看了海港。然后视察了秦皇岛海港。港务局局长石新正在那里迎接。王植范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衣着朴素，和蔼可亲，跟下级谈话，总是面带笑容，使人们无拘无束。他在早晨问到苏峰的名字时，因为与苏联的苏同字，所以

^①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76页。

风趣地说：“你怎么叫个外国人的名字啊？”逗得大家一阵笑声。

现在他见到石新又开玩笑地说：“来到你的天下了。”然后问：“你怎么叫石新哪？”当石新说是抗战时，怕连累家庭，改的假名时，毛泽东又笑着说：“你改假名也没用，敌人照样知道，他们是会调查的嘛。”石新陪着毛泽东向码头上边的山坡走去。

登上山坡，极目远望，又是浩瀚的大海。眼前是大、小两个码头。

毛泽东看到码头工人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赞扬说：“干得很好！”石新告诉毛泽东：国民党在撤退时企图炸毁港口，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护卫，保卫了港口的安全。又说：通过民主改革，工人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毛泽东说：“我们要靠他们把海港管好。”

当石新说到秦皇岛是天然不冻良港时，毛泽东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冻呢？”石新说不清楚。毛泽东接着问：“现在都有哪些国家的船只来往？”石新告诉毛泽东：“除了美国的以外，差不多哪个国家的都有，日本的最多。”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但它是封锁不住的。”

毛泽东从汇报中感到对外国海员限制太严，不利于交往，就幽默地说：“你们还要向他们开炮吗？”又说：“要打破封锁，我们要寄希望于各国人民，而我们也要有适宜的政策。”罗瑞卿领会毛泽东的指示，几天后公安部发来指示，改变了原来的一些规定。^①

离开港口后，毛泽东到工兵二十团某部参观机器。在海员俱乐部坐了一会，又来到耀华玻璃厂。

耀华玻璃厂当时是公私合营企业，毛泽东详细了解了这个厂的情况。他冒着摄氏40度的室温，观看了玻璃生产从原料熔化、引上、采板和切片的全部过程。毛泽东针对当时有些领导干部不懂技术，不懂生产的情况，告诫他们要参加生产劳动，向工人学习技术。^②

视察完秦皇岛，毛泽东乘汽车赴北戴河，下午4点半到。

夜晚，毛泽东在北戴河休息，住章家大楼。

22日凌晨5时30分，毛泽东起床，登上山坡去看日出。直到回程时，毛泽东才告别大海。天冷风大，毛泽东的感冒加重了。

上午8时，毛泽东到了北戴河车站，专列开到朱角庄支线宿营。

^{①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76~81页。

下午2时，专列离开北戴河。下午3时，到达唐山。

毛泽东在铁道部长滕代远、天津市工商联主任李烛尘、唐山市市委副书记刘汉生等领导陪同下，视察了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工厂——启新水泥厂。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电影资料）

启新水泥厂是清朝洋务派唐廷枢筹资六万两白银建来起的我国第一家生产水泥的工厂。从1906年到1941年，当年的两座土窑逐步换成八台新式旋窑，一度独霸国内水泥市场。启新厂产的“马牌”水泥还在美、法、意等国际赛会上多次获奖，一直饮誉南洋等地。

滕代远向毛泽东介绍了启新厂的党委书记、军代表赵光。

毛泽东问：“你们总经理呢？”

启新总经理周叔韬，是我国北方民族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是拥护共产党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业家、水泥专家。启新水泥厂，在水泥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在其他一些工商业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周叔韬在天津。”主席略感失望。

“副经理呢？”毛泽东问。

“副经理姒南笙，厂长汪公勤，副厂长陈达有、娄育后。他们在办公室。”

“我要见见他们！”

要见这些资方代表，本来并不难。但是，按照唐山市委的部署，这次主席来厂视察，只安排赵光一人作陪。为确保主席安全，厂党委的其他成员已经分到各重点部位做保卫工作。毛泽东要见他们，赵光没有精神准备，拿不准该怎么办。他赶紧请示市委刘汉生书记。经商议，决定由刘书记亲往办公室，把姒南笙请来。

毛泽东由赵光陪同，向生产车间走去。中午已经打扫过，如今又略有

积尘的地上，印满了新的行行足迹。

“这是什么？”毛泽东指着路旁一大堆花生、核桃般大小的深灰色的块状物饶有兴趣地问。

“这是水泥生产的半成品，叫熟料。将熟料加入适量的石膏，磨成粉就是水泥。”赵光回答。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先参观原料车间的三号、四号、五号磨。这三台生料磨，都是1921年安装的丹麦产球磨机。三台磨的大小、产量略有不同。因噪音大，相互说话，很难听清。大家只从磨机旁一走，就出来了。

此刻，姒南笙风风火火赶到了。

“这是副总经理姒南笙。”赵光向毛泽东介绍。

毛泽东立即伸出右手，姒南笙一惊，赶忙躬着身，轻轻握过主席的手，然后连退三小步，边退边说：“荣幸！荣幸！荣幸！”

毛泽东一行来到了烧成车间八号水泥窑。这是1941年安装的丹麦产回转窑。靠摄氏1600度左右的高温，将原料车间生产的“生料”烧为“熟料”。大家从八号窑尾扶着铁栏杆，从宽不足一米，高三米，斜度达50度的铁梯爬上去。刚爬了十几步，一股高达60至70度的热浪突然从北向南压了过来。顿时，许多人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滕代远急了，说：“赵光！你怎么搞的！温度那么高，主席会受热感冒的！得绕过去！”

“没法绕，只能原路回去。”赵光回答。

毛泽东问：“工人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解放前两班倒，一天干12小时；现在改为三班倒，一天干八小时。”

“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们从这儿走一走有什么关系？你前面走！”

听到主席发话，赵光领着大家继续朝前走去。滕代远迅速赶到赵光跟前，轻声说：“你赶快走，离开大窑之前别站脚，主席问你什么也别说。”

大家沿着缓缓转动并不断散发着灼热的大窑旁，不紧不慢地行走。赵光越走越快，不一会就走出窑门口了。他回头望去，毛泽东仍然迈着稳健的步子，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走到窑头，还同看火工闲谈起来。

“你是当班的师傅吗？”毛泽东走近一位50开外的老工人，和蔼地问。

“是是。”听得出，答话人心里很紧张。

“师傅贵姓？”

“免贵，姓杨。”

“哦！外面的杨柳刚刚吐绿，你可是饱经风霜啰！”

毛泽东风趣地说。周围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领袖与工人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融合了。

“你们几个人看这条窑？”

“一个正火，两个副火。”

“这里温度那么高，受得了吗？”

“习惯了，没啥！”

看到一名稚气未消的青工，毛泽东问：“干几年啦？”

“三年。”

“技术怎么样？”

“比老师傅还差得很远。”

“要好好向老师傅学，向书本学，边干边学。”

毛泽东走近了窑门脸，透过碗口大的紫色玻璃窗口，朝大窑里望去。只见窑膛里烈火熊熊，一颗颗闪着亮光的核桃、花生大小的灰块在窑里欢快地滚动。

滕代远上前催主席快走，并向赵光作了嘱咐。走出八号窑，赵光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启新的水泥窑一共八台，刚才看的是最大的一台，都是回转窑，构造是一样的。按照生产流程，下面是制成车间，同原料车间一样，也是球磨机。水泥的生产过程就这样，没什么新东西了。”

毛泽东点点头，对赵光说：“你和你们副经理，跟我到车上谈谈。”^①

视察完启新水泥厂，毛泽东在专列上同赵光和姒南笙谈话。毛泽东了解到赵光只读过两年私塾，鼓励他努力学习。毛泽东说：我们那里有个张宝金，从前给人家放牛、当雇工，没有读过书，后来跟着我。他就很有眼光，学习很用功。他到人民大学读书，还考第一名呢！毛泽东问姒南笙在哪个学校毕业？学什么专业？公司现在资产多少？搞合营舍得舍不得？姒南笙回答了前面的问题，对最后的问题没有敢回答。因为这是只有董事会才能决定的事情。几天后，经过董事会讨论，启新水泥厂资方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②

①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76、83页。

22日晚上，专列到达天津新港，毛泽东在火车上休息。

23日上午10时，毛泽东视察天津永利大沽厂。

永利大沽厂前身是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为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创建。该厂的“红三角牌”纯碱享誉海内外。1952年公私合营。

厂长陈西平邀请毛泽东到办公楼稍事休息。毛泽东没同意，就站在楼前问起厂里的情况。随后，毛泽东视察车间生产。先来到重碱车间，从一楼直到四楼。将要走近滤碱机时，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迎面走过来，他是和有关人员按视察路线先行的。说：“前面不能去，氨气太大，刺眼睛。”

毛泽东说：“没关系，还是去吧！”于是他戴好口罩和大家一起走到滤碱机前，并和岗位上的操作工人握手问好。

陈西平向毛主席介绍制碱的生产流程，抓起一把重碱（未经干燥的碱）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又问了些情况。出了车间，随行记者在厂房前为毛泽东和大家拍了一张合影。离厂时，毛泽东对陈西平说：“要关心工人疾苦，这么大粉尘，要得职业病的，需抓紧解决”。^①

从永利大沽厂出来，毛泽东视察了天津大沽口炮台遗址。

23日下午3点半，



1954年4月2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永利大沽厂。
(摄影/侯波)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14~15页。

毛泽东视察天津造纸总厂。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有罗瑞卿、滕代远，还有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市公安局局长万晓塘和经保处长桑仁政等。

毛主席和党总支书记徐建和厂长杨冠农握手，询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徐建回答，是从地方上调来的。杨冠农回答，是从部队转业来的。毛泽东说：“好啊，一个从地方上来的，一个从部队上来的，搞工业你们钻得怎么样啊？”徐建说：“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治上努力学习，在业务上刻苦钻研。”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1954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沽口炮台遗址。
(摄影/侯波)

的，一个从部队上来的，搞工业你们钻得怎么样啊？”徐建说：“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治上努力学习，在业务上刻苦钻研。”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天津造纸总厂有些车间工人的劳动条件还不太好，事先安排只请毛泽东视察制浆车间和第二造纸车间，可是毛泽东要从第一道工序开始视察。当时切芦苇的工段卫生条件很不好，切苇时满屋尘土飞扬。徐建说，切苇工段卫生条件不好，请毛主席从制浆蒸煮大锅工段看起吧。

毛泽东问：“切苇工段有没有工人操作？”

徐建回答：“有。”

毛泽东说：“有工人操作，我就能去看。”

毛泽东走进切苇工段，他不顾苇毛乱飞，尘土弥漫，从头到尾看了个仔细，并问徐建：“这里的机器设备都是老的吗？”徐建说：“两台旧切苇机是日本侵华时留下來的，一台新切苇机是我们技术革新的产物。”

毛泽东视察完切苇工段，反复嘱咐徐建：“你们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凡是影响工人身体健康的问题要想办法解决。”

随后又视察了制浆车间。毛泽东边走边问，并对厂领导们说：“你们要努力学习政治，学习企业管理，要由外行变成内行。”并说：“这个厂解放后改造得不错。”又问：“黄炎培来过吗？”

徐建回答说：“黄部长 1951 年来过。”（当时黄炎培是中央轻工业部的部长）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

看完蒸煮大锅，来到第一造纸车间，看了一二号造纸机。这时造纸女工们一看毛主席来了，顿时欢呼起来，情不自禁地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工人们自发地拥到毛泽东的跟前，毛泽东高兴地向大家招手问好。大家陪着毛泽东走出了车间，也没到会议室休息，乘汽车返回市里。^①

视察回来，毛泽东在招待所休息到晚上 7 时，登车返京。

23 日晚上 10 时，毛泽东从天津回到北京。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 16~17 页。

九 1954 年夏天在北戴河

1954 年 7 月 26 日凌晨，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北戴河，住北戴河中直疗养院一号平房。

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毛泽东忙于主持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审阅《宪法》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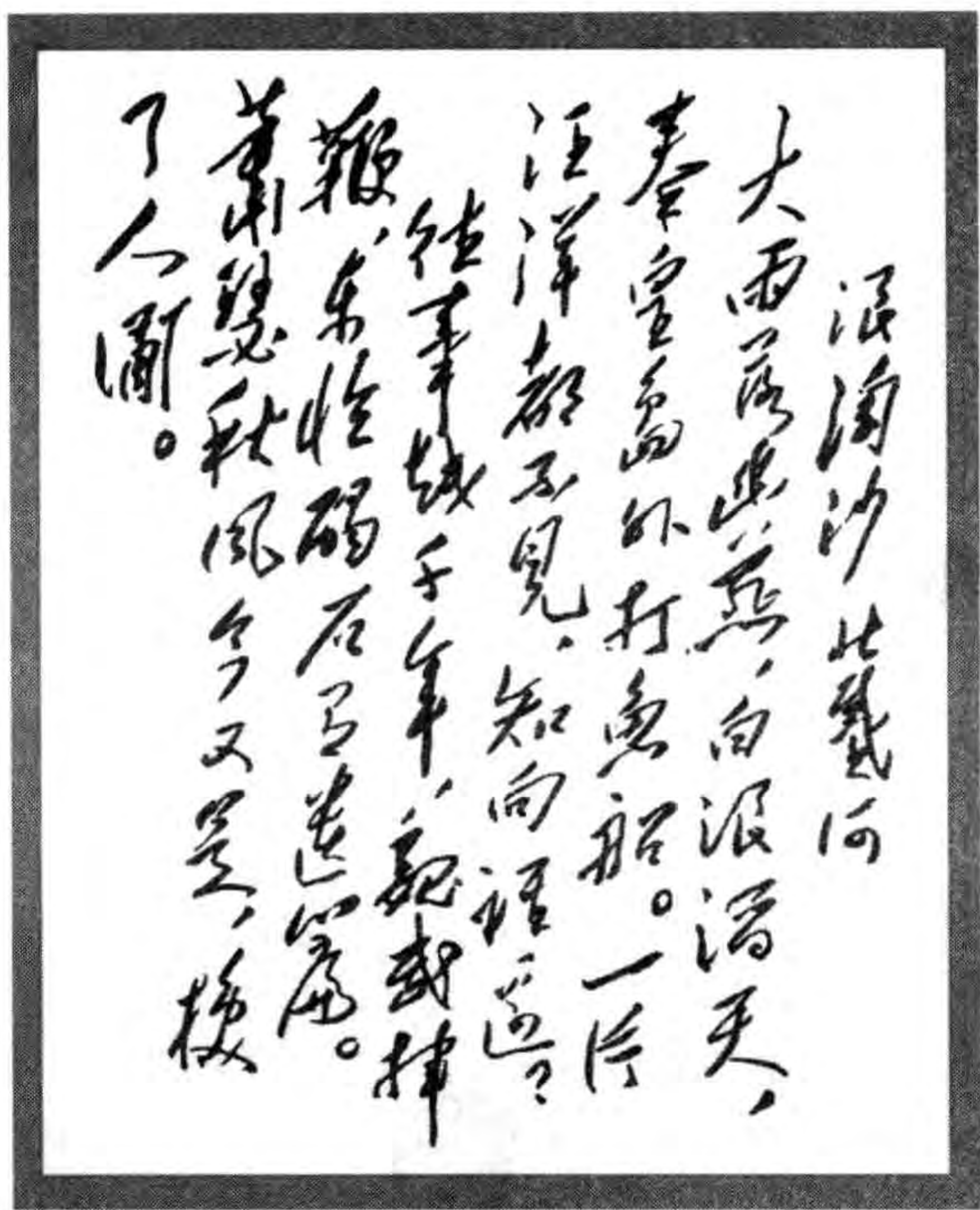
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有些人民代表提出，要授予人民领袖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毛泽东得知此事，在有关报告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①

自从在杭州毛泽东开始游泳锻炼以来，越发不可收拾，游泳和爬山成了



1954 年 7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卷，第 528 页。



毛泽东手书《浪淘沙·北戴河》。

他最喜欢的运动。游泳池很快成了对他的束缚，他要走出泳池，到大江、大河、大海游泳，游泳甚至成了他对大自然的一种挑战。这次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他开始挑战大海。

7月31日，毛泽东冒着大风到北戴河海滩游泳，回来后填词《浪淘沙·北戴河》。

关于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些情况，医生徐涛回忆：

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办公。中央首长来得特别

多，开会也方便。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一定要去游一次泳。

那一年游泳，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特别深。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泳。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

那几天，毛泽东总看《古诗源》。有一天，他让卫士找地图来，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

我惊讶：“曹操也来过这里？”

“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停留最久。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没有走，直到天凉，仍每天下海游泳。可惜他登碣石山我没能一道去。他写了著名词篇《浪淘沙·北戴河》。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

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由于安全上的考虑，公安部门和警卫系统对毛泽东“管”得很严。毛泽东总是想到人民群众中去，想和群众随便聊家常，想多过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保卫部门怕出事，便阻拦。毛泽东有愤怒也有痛苦，没少动肝火：“他们老把我和群众隔开！”

毛泽东坚持要出去走动，保卫部门作一定让步，要求他戴墨镜、口罩。毛泽东走出去遇见农民，就要和农民聊天。又不是冬天，脸捂那么严还怎么聊天呀？农民光眨巴眼。毛泽东愤然摘下墨镜口罩，摔在地上。这下可不得了啦，一声“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蜂拥而来，立刻包围了毛泽东。口号声鼓掌声响成一片，还聊什么天？毛泽东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真难。我们这些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今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毛泽东一被群众包围，保卫人员便紧张。也不能不紧张呀。朝鲜战争刚结束，沿海还有敌特，毛泽东高兴也不许多停，毛泽东发脾气也得“保护”走。回来想想还后怕，更不许毛泽东出去乱走动了。

不能随便行动，不能随心所欲走到人群中去，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事。工作之余，他最怕孤寂，希望身边的工作人员能表现得随便些，可以开玩笑、



1954年7月，毛泽东同李敏、刘松林等在北戴河海滨。（摄影/侯波）

起哄、骂娘，造成一种真正的社会生活的空气。如果大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他简直无法忍受。我理解，卫士们也理解。毛泽东是人，他需要过人的正常生活。所以，工作之余，我们在他面前都表现得很随便，甚至可以说“放肆”。

记得一天，毛泽东游得很远很远。我们跟随的人便轮番上船休息。快望不到岸了，仍劝不住主席。幸好，遇上一条渔船，打鱼的老渔民全身晒得漆黑，衣服半敞，目光里透出淳朴、智慧和善良。我们在船上，先发现渔船和渔民，便招呼毛泽东上船。毛泽东一听说有渔民，痛痛快快爬上了船。不等擦干身体便迫不及待跟老渔民说话聊天。

老渔民没有认出毛泽东。他何曾见过毛泽东光着身子的形象啊？于是，那聊天便完全是社会上普通人聊天的气氛了。我的记忆中，再没见过毛泽东如那次聊天那么开心。从年龄身体聊到吃喝穿戴，从鱼龟虾蟹聊到五谷杂粮，从小小渔船聊到锅台炕头，从老婆孩子聊到国民党共产党。你问我答，我问你答。正经话玩笑话都说，又逗又喊又笑。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生活！

老渔民赔不起工夫，要走。毛泽东不放，追着喊：“多聊聊，多聊会儿，我把你船上的螃蟹全买了。”

“你别拿我开心了。”老渔民不信。

“老同志你别不相信人哪，你跟我一道走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毛泽东认真着急。

“真的？我这可是活蟹。”老渔民动心了。

“活蟹死蟹我全包了。”毛泽东拍响大腿。

“现在螃蟹可是不便宜。”

“你老人家还能骗我？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行啊，我跟你走。随你唠嗑什么都行。”

“我就要听听你那个互助组为啥不团结？”

就这样一路聊来，上得岸，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同老渔民握手道别。老渔民直嘀咕今天走运，却始终不知道让他走运的人是谁。

毛泽东让卫士把螃蟹送伙房全蒸了，弄个大长桌子，倒满一桌。毛泽东喊：“来来来，今天我请客，我请客啊！”我们二三十人全是泳衣泳裤，跟毛泽东来到长桌旁。毛泽东抓起一只螃蟹，一掰两半，张嘴就是一口，

他一边大嚼一边喊：“还不动手？别装正经了。”

大家哄然而笑，立刻围上去抓螃蟹。官不分大小，年不分老少，人不分男女，学着毛泽东扯开螃蟹便咬，一边大嚼，一边互相逗闹，再没那么热烈开心的了。一个个都吃成大花脸，互相你看我，我笑你，你捅他，乐个没够。

毛泽东心血来潮，喊：“嘿，咱们合个影吧？照张相！”

大家一哄而起，立刻包围了毛泽东。簇拥着，就那么光不哧溜，随随便便，热热闹闹地合了一张影。

接连几天大风大雨，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要去游泳。

“不行，绝对不行。”我吓坏了，拦住他说：“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一旦我们横下心来抱成铁板一块，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

那几天，我们特别紧张。一刻不离地“监视”毛泽东，怕他溜去海边。他几乎每天“闹”一次，都被我们顶住了。

这天，雨终于停了。我跑去海边，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测温的同志报告，水温不到20度。

中午刚过，毛泽东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准备去游泳。

“不行，主席，今天不能去。”

“雨停了，为什么不能去？”

“水很凉的，会抽筋。”

“我不怕冷。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

“那才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么。”

“那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几次，都被浪打回来了。”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主席，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要扎伤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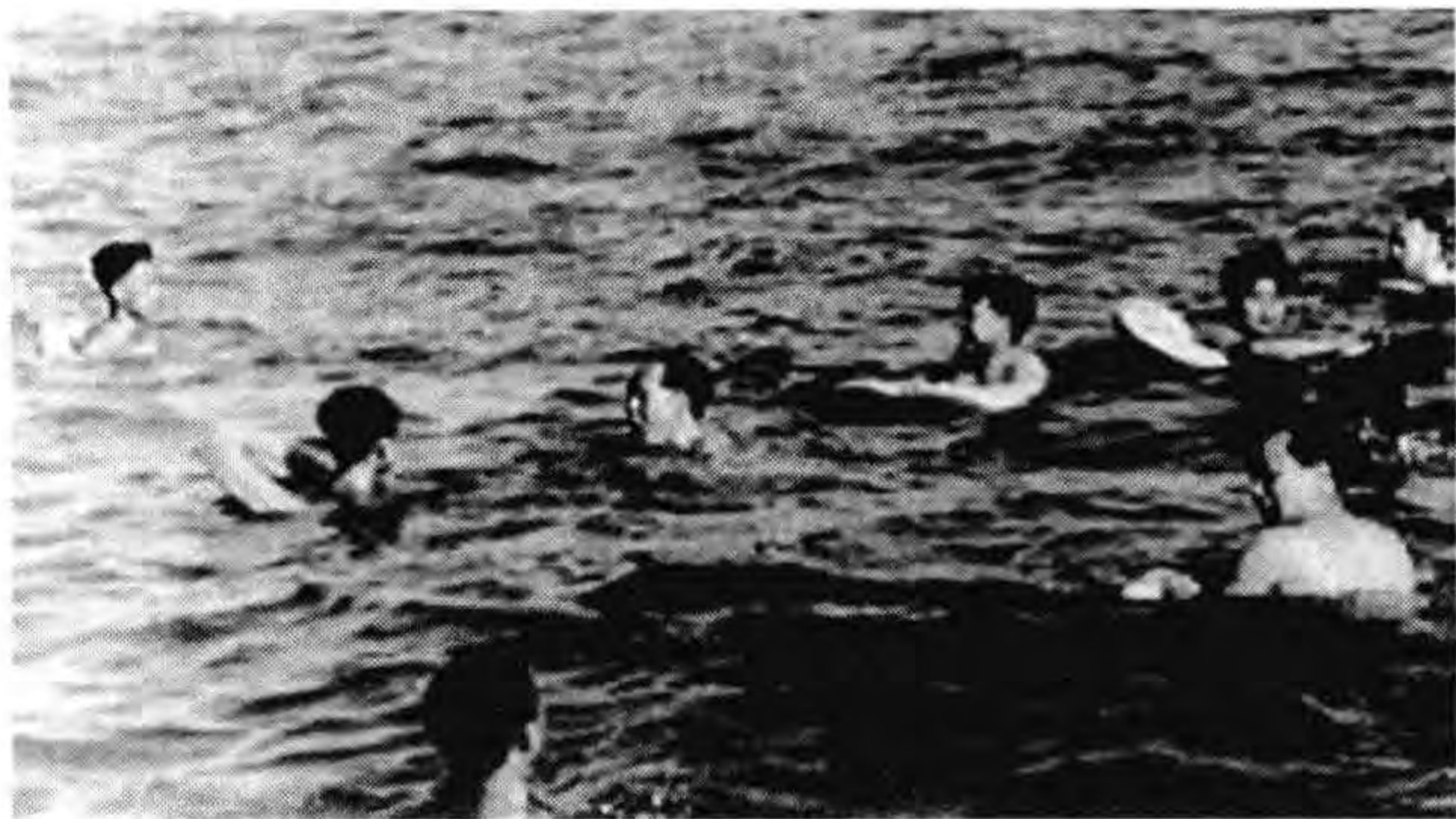
“从小我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我。

“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

“他绊跤我就一定要摔跤？”毛泽东甩开我，大步出门。



1954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冒着大风前往游泳场。
(摄影/侯波)



1954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摄影/吕厚民)

事已至此，再无挽回希望。我和卫士及警卫人员紧张行动起来，抢先脱衣，冲在毛泽东前边。

“赶浪，我们赶浪。”毛泽东小孩子游戏一般开心。我们簇拥着老人家急追那退缩的浪潮。又一列长浪凶猛扑上来。我急忙扶住毛泽东。一人高的浪劈头盖脑压下来。不容站稳，轰然一声巨响，一群人都歪倒在沙滩上，竟被浪打出四五米远。

毛泽东在卫士的搀扶下站起来，甩甩头上的咸水。我想喊什么，舌头恰似贴在上腭动不了。

毛泽东笑了，“嘿嘿，我总算找到一个好对手。”

毛泽东召唤我们向海浪发起连续冲击，可是每次都被浪潮打了回来。我和不少人都胆寒了。

毛泽东显出少有的严厉。他问卫士长：“这点浪比刘戡的四个半旅还难闯吗？”他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觉得跟我走太危险？你们要是害怕，我可以另外组织人。”^①

就这么几句话，热血便在我们心中涌起。我们从地上爬起，迅速集合在毛泽东身边，手挽手，肩并肩，警卫人员前冲开路，卫士左右护持，向大海冲。我们一连闯过四道长浪，终于游进大海！时而跃上波峰，时而跌下浪谷。

^① 陈晋：《毛泽东之魂》第62页。

我们都拼尽全力向毛泽东靠拢，要升一起升，要沉一起沉。拿救生圈的人更是随时准备应付意外。

“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只会被冲上岸，不会被拖进大海回不来。”毛泽东轻松自在，随波起伏，他说：“你们正年轻，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我多次听到看到毛泽东讲“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一类的话。1954 年在北戴河游泳是第一次讲。^①

8 月 20 日，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北京。

^① 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第 59~69 页。

十 赴广州研究“一五”计划

1954年10月29日，中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各地区、各部门讨论，征求意见。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计划在12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这次会议要讨论两个文件：1. 五年计划文件；2. 有关高饶事件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是否增选部分候补中央委员？会议决定不选为好。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有三项议程：1. 政治报告；2. 修改党章；3. 选举中央委员。

会议议论了中央最近的工作：中央在北京要讨论的，除了五年计划、高饶事件外，还有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的各项问题。这次会议计划1955年1月召开，后来提前到1954年12月下旬召开。

会议同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休假一个月，去广州审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留京人员以陈云为主。书记处仍在北京，由朱德、陈云、彭真（临时由候补补上）组成书记处，邓小平、彭德怀参加，政治局还有六人在京也是多数。

政协会议由李维汉负责筹备。会议通过了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的名单。会议同意把五年计划草案发省市讨论，吸收已当选的代表和各业务部门有关同志参加讨论。^①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125~126页。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蔡畅、陈伯达及罗瑞卿等一行多人和随卫人员从北京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广州。

11月1日，专列途经汉口。当时长江大桥还在计划中，往南的列车都必须经轮渡过江，然后方能继续行驶。毛泽东一行人赴中南局休息了两个小时，然后乘“延安”号渡轮渡江，从武昌南站上车，7时10分专列向南开进。

2日下午，专列途经长沙。

当时湖南省委机关才搬家，没有招待所，周小舟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接待毛主席。毛泽东在长沙听取了周小舟、周里、周惠、谭余保的汇报。又到隔壁程潜家探望了起义将领、湖南省长程潜。

3日早上，专列离开长沙去广州。

夜里7时，专列到广州。毛泽东等在管理局前下车，杨尚昆等到站下车。

从北京到广州，沿途毛泽东找各地领导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当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给黄炎培写回信，其中谈道：“购粮事，我在京所闻，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①

周恩来于3日乘飞机抵广州。这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聚齐广州。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住小岛2、3号楼，其他首长及随员住东一楼至“海屋”一带的房子。在穗期间，毛主席在“海屋”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在广州工作，对广州有很深的印象和感情。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他就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山纪念堂、广州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并到越秀山游泳场游泳。

5日12时，毛泽东再次去越秀山游泳。

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开会。据杨尚昆日记记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612页。

刘少奇提出：

关于高饶问题的报告，请乔木起草。正面讲，提到原则高度，说些事实。

党员守则，是否需要这样一个文件？还值得考虑，如做寿，全党党员都不能做吗？

毛泽东插话：党员不能坐轿子，可发一通知（支部）。跳舞：不能专为首长组织，一周一次，本机关的人不要去外面接舞伴（北京可考虑一下）。

刘少奇谈到李雪峰提出：党内没有工业部。

刘少奇对五年计划纲要的起草和时间做了安排。

主席请假问题。五月一日天安门。纲要可以写详细些，作正式文件，使全党干部有全面了解。

周恩来提出：

财政一年的写法：要分析，主要依靠是什么（企业收入）。支出的分配，与苏联比较是40%。因国防需要大，第二是文教，苏联比我们的工业比例大。40%的分配可以在分配中去说。在投资方面141项的投资少，应说明。可以在519万亿中去议论。工人的全部计算。有些问题可以在报告中去说。一切数目字的确定在北京。

李富春谈了关于五年计划报告的内容，传达了毛泽东对纲要的意见：

基本可用，不全、不透。

不全：

1. 缺财政计划（说明收支情况、比例），着重说财政监督。

2. 文教单独成为一章（培养干部要写全；各种人才统计，缺多少，要培养多少，学校培养多少，生产提多少），工人阶级的总数（要北京搞）。

不透：

615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和141个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重大

建设项目的联系问题，工业投资用到141的不到42%，为什么要如此用法未说透。

事后，毛泽东在住处谈纲要的内容，财务计划应加一章。文教事业应单列一章，不要混入物质生活一章内。要有一个报告，如此则序言、尾巴均可纳入报告并作若干解释，说明为什么如此。^①

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杨尚昆返回北京。

10日，毛泽东起草了请各省市制定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电报，指出：中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②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两次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作了批注。^③

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写信：

刘、周、李、陈、罗、陶铸各同志：

《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十四两日载有苏联新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的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请伯达同志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④

23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回信：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128页。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597、599、605页。

十月三十日惠书收到。购粮事，我在京所闻，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余案，已请陈云副总理注意。尊恙如何甚念，尚希注意护养。此复。顺致敬意^①

同日，毛泽东在越秀山游泳场与工作人员合影。

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乘专列离开广州返京。

25日中午，专列到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毛泽东坐汽车进城，到程潜先生家探望还约见了语言学家、湖南大学教授杨树达，同他探讨了学术问题，会见了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周士钊、省政协委员曹子谷。并乘车在市区转了一圈，巡视这些年来长沙的变化。这次短暂停留，毛泽东吃住都在列车上。



1954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越秀山游泳场与工作人员合影。（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612页。

25日下午19点以后，专列离开长沙，深夜到达武汉。

那时，东湖招待所还没有建好。武汉市委选了冈村宁茨住过的一幢小楼给毛泽东住。那幢楼有个土暖气，算是额外优待。在这幢楼的旁边有一排平房，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每人住一间。这些房子没有暖气设备，每间设了一个火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安顿下来后，听取了武汉市委的汇报。做了些简短谈话，会议结束后吃晚饭。晚饭地点在住宅旁边临厨房的侧室。这个侧室既不是餐厅，也不是客厅，是一个长方形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因为还有别的什物，房里摆不下方桌，便摆了两张长条桌，条桌的一侧放些板凳，便是主客的座位；条桌的另一侧，是去厨房的通道，厨师们由这条通道上饭上菜。

晚饭的主食是饺子，有炒红菜苔、炒豆腐、红烧肉等共四五盘菜，外有辣椒；汤就是饺子汤。

毛泽东一行对这顿饭看来是满意的，不但辣椒催汗，厨房里的蒸汽喷涌而来，也起了催汗作用。毛泽东抹嘴擦汗。刘少奇还打趣说：“热气腾腾，蒸蒸日上！”^①

26日上午，刘子厚、李雪峰、王任重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接毛泽东再游东湖。

1953年春节，毛泽东到武汉思考长江治理问题，那次毛泽东到了东湖，对东湖印象很深。毛泽东称赞东湖“自然条件绝好，真是少见”。这次毛泽东到武汉，当地领导自然要邀毛泽东再游东湖。毛泽东对他们说：“今天什么也不干，一起再逛东湖，你们赞成不？”

毛泽东一行乘车至江边，换乘轮渡去武昌。在渡船上，毛泽东和李雪峰、王任重、刘子厚，谈古论今，谈刘邦，评李渊，风趣幽默，笑声阵阵。过了江，乘车直驶东湖。

毛泽东沿湖岸的碎石路，边走边谈。突然，他停下来，静静地临湖远眺。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处平房休息，边喝茶，边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问答答，非常随意。

离开东湖，毛泽东一行来到了蛇山。这里是规划中长江大桥的桥址，又有著名的黄鹤楼，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看桥址，没有成功，这次再提。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60页。



1954年11月26日，毛泽东、罗瑞卿在武昌东湖。
(摄影/侯波)

这一次，因不是节假日，又是“出其不意”，警卫工作提前做了准备，没有像上次那样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在回汉口的江轮上，毛泽东一言不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下船时，毛泽东回首遥望武昌，遥望蛇山，说：“湖北的人民真好哇！”^①

26日傍晚7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要离开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接到通知，要他马上赶到汉口车站。

林一山被引进停在汉口车站的专列，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已在等候。林一山上车后，列车开动。简单几句问候，毛泽东便让林一山谈谈在长江三峡建大坝的想法。

这次是开门见山，一见面就谈工作。周恩来、刘少奇的插话很简短，直截了当。汇报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毛泽东这次就是想利用从汉口到广水三个多小时行车时间，要林一山把想法谈完。不像1953年2月在“长江”舰上，时间安排得比较宽裕，题外的随便谈话很多。

谈话开始，毛泽东就问：在三峡建大坝在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34~35页。

山表示，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期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泽东问：根据是什么？林一山说：目前，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在技术和规模上同美国已建成的相差不多。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也应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林一山说，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工程建成以后。因为丹江口水库如果按 170 米的大坝方案建成，也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工程的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不过，设计工作完成的时间就要推迟。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

当林一山汇报到有关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问题时，周恩来问：你认为布可夫的技术水平怎么样？林一山说：苏联政府派遣布可夫这样的水利专家来，这在建国初期还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和我们合作得很好，他的工作态度比电力部门来的某些苏联专家好得多。布可夫是苏联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专家，他原来还是个码头工人呢。至于说，布可夫认为中国水利专家不能做三峡工程，苏联专家也不能做，林一山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的技术力量是可以胜任的。再说，布可夫的水平也不能代表苏联水利专家的水平，布可夫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但两三年后我们就超过他了，如果苏联派最高水平的专家来指导，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长江”舰上林一山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就提到过技术力量问题，那时他就问过林一山：你们工程师有多少人？林一山说有 180 人。毛泽东说：噢，工程师讲百呀！接着又问技术员有多少？林一山说有 1000 多人。毛泽东说：噢，技术人员讲千呀！

当毛泽东问到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时，林一山说：我们已经有的地质勘探设备都用在丹江口水利工程的坝区了。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三峡坝区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岩石只是风化问题比较严重。坑探 30 米以后，才发现有了较好的岩层。

这时毛泽东有些担心地问：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林一山说：根据已掌握的世界资料，花岗岩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这时毛泽东显出焦虑的样子问：如果三斗坪坝区也有 100 米，那么 100 米以下呢？

林一山说：当然 100 米以下就是没有经过风化的新鲜岩层了。林一山感到毛泽东对这个回答有些失望。便接着说：请主席不必担心，100 米深的风化层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风化情况，而我们这里，根据岸边的勘探，30 米深的风化层在这个地区可能是最深的了。林一山看到毛泽东还有些担心的样子，就又向他汇报说，在 25 公里的火成岩坝区河段，我们才开始从几个点线上做了勘探工作，而在这以上的一段坝区属于片麻岩区，还未勘探过。

听林一山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话问：什么是片麻岩？还未等林一山回答，毛泽东就面带笑容，伸出五个手指晃动着向刘少奇说：好了！好了！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问题的。

从毛泽东听取有关地质问题的汇报来看，他对水利工程的地质问题极为重视。他了解了许多地质情况，掌握了不少地质知识，概念也很清楚。所以，林一山汇报到世界著名的美国工程师萨凡奇，过去曾确定在石灰岩的南津关地区选坝址，我们不同意萨凡奇的见解，这时毛泽东没有提出过疑问。他知道三峡花岗岩地区的岩石强度高，不漏水，地质情况稳定。

在汇报到三峡工程的其他问题时，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坝形问题。

毛泽东对于水利工程的一些概念掌握得很准确。他知道水利工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水文数据的分析和整编。在“长江”舰上那次汇报中，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听取林一山的汇报至少有六个小时，所以这次汇报中，毛泽东便没有再提起水文资料这一问题。^①

26 日深夜 10 点钟，专列进入广水车站。汇报基本结束，周恩来对林一山说：行啦！汇报完了，你可以回去了。林一山这时才明白，在汉口上车后之所以抓得很紧，目的是让林一山在列车到广水以前把工作汇报完，林一山可以返回武汉。但林一山表示，天很冷，又没有南下的列车，已经回不去了。毛泽东说：不要走啦，我们聊天吧！于是，林一山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开始了一场比“长江”舰上那次更为自由活泼的谈话。

毛泽东问林一山：长江在世界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林一山把长江的概况说了一下，说明长江属于世界上几条著名的大河流之一。毛泽东问：你说，长江在世界上能不能算是第一？林一山回答，从综合条件看，也可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 81~83 页。

以算是世界第一。毛泽东又问：为什么？林一山说：长江的水量在世界上居于第四位，次于巴西的亚马孙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印度的恒河。虽然长江水量不算最大，但从能源上说，由于它落差大，可以说它在世界上居于第一位；长江流域居住的人口众多，我们的祖先开垦了大量梯田，补救了可耕地的不足，已开垦的梯田远远超过了可耕地的面积。另外，世界上许多大的河流，除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几乎全在美国境内外，其他都是跨国界的，而长江则是我国人民独享的。毛泽东听了表示默认。

毛泽东又问林一山：你看，美国就总的条件和我国相比，怎么样？林一山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分析了一下，认为我国和美国的条件都不错，各有所长，而我国可能稍为优于美国。毛泽东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林一山作了互有所长的比较后，着重说明了我国所跨的纬度适合人民居住条件的比美国宽广，亚热带面积也比美国大。我国的可耕地面积不如美国多，这是由于山多，而山多则矿藏丰富，地下资源得天独厚。

毛泽东询问这些情况，说明这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他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比欧洲各国要快，除了美国的资源外，远隔大洋，没有遭受大战的摧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发展快的其他原因，毛泽东也在经常考虑，他不仅向林一山了解，而且也向别的同志调查。他所考虑的问题，也可能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体制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毛泽东过去了解过美国之所以发展较快，不同于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因之一是西欧在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了有识之士和某些资本家的发展，而美国州议会都有独立的立法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毛泽东重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是因为通过对比，可以得到启发。他当时已在考虑体制问题，考虑怎样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①

27日拂晓，毛泽东表示大家可以休息了。毛泽东对林一山说：你不要走，我请你吃早饭。稍事休息，天就放亮了。火车停在郑州附近的一个小货车站郑州北站。

小站来往人很少，不需要岗哨，这是中央警卫人员想出的一个好办法。

早饭，还是照例的两菜一汤，素食，只有一点辣味，同那次在“长江”舰上一样，边吃边谈，毫无拘束。林一山清楚地记得这次吃饭进入餐车时，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84~85页。

刘少奇进去后，周恩来一再让林一山先进，把林一山当做客人。林一山执意不肯，相让多次。最后，林一山只好巧妙地把总理推进了餐车。总理回过头来，对林一山微微笑了笑。^①

专列在郑州北站停留一夜。当时，郑州正在下大雪。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省委副书记赵文甫、黄委会副主任赵明甫到专列上汇报工作。毛泽东主要听了赵明甫关于《黄河综合治理规划》和水土保持工作的汇报。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指着《黄河综合治理图》向赵明甫说：“这图是否可以给我？”赵明甫回答：“欢迎主席审图。”把地图送到毛泽东手里。^②

28日早晨，专列离开郑州当天返回北京。

关于毛泽东在返程途中调查研究的有些情况，12月19日在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毛泽东谈道：“我接到了很多来信。这次由广州回来，经过五个省都找各省的负责同志开了会，调查了农村情形。有人说农民每天只有六两米，这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实际上，说农民苦的是富农，他们拿这些话来反对统购统销。农村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他们过去是贫苦的，是拥护统购统销的。我亲自问过一些农民，他们说每天有米十四两六，加上杂粮每天有一斤粮，不是六两。今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国家共征购770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其中主要是购的，占500亿斤，征的只200多亿斤。购的部分国家出公道价，相当于卖给私商的价钱。有的县长、科长、乡长，自己有余粮不肯卖，山西甚至有存几万斤粮的富县长。

今年湖南有300万户灾民，湖北有500万户，都安置好了。政府跟着灾民走，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灾民在哪里，供销合作社就设在哪里，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证明了我们的组织能力，在前几年是没有可能的。”^③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85页。

② 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1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6页。

十一 对农村情况初次调查

1954 年底，一些部门和人士不断反映，统购统销、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商业改革，引起各地不满和关系紧张，有些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生产积极性。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想到各地跑一跑，调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1955 年 1 月 2 日晚上 7 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赴紫光阁庆祝沈钧儒老人 80 岁宴会。

夜里 12 时，毛泽东偕杨尚昆登上专列沿京汉线南下，开始了调查研究。

专列途经保定时。毛泽东让杨尚昆给邓小平同志通电话，请他通知安徽的曾希圣、黄岩两同志于 4 日上午到徐州，毛泽东要与他们谈话。

3 日下午 6 时，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吴芝圃、杨蔚屏的汇报。杨尚昆受毛泽东的委托，乘汽车去河南省委打电话：告诉彭德怀，军委会议总结待主席返京后再发；讯问邓小平给曾希圣打电话事是否已经落实。^①

毛泽东同吴芝圃、杨蔚屏等在专列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通过这次谈话，可以看出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农村的情况比以前摸底了，他们对农业增产有把握。因为三统、合作化和征兵工作同时在搞，农村工作有紧张情况。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河南省的计划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 134 页。

会议开过了，开了18天，结果很好。吴芝圃、杨蔚屏都说，元旦社论中提到的农村阶级路线很明确，对他们的帮助很大，过去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清，现在有了提高。

通过谈话毛泽东觉得，河南省委同志对工作已较有信心，对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一个多月前，他由广东返京时的谈话要好些了，毛泽东勉励吴芝圃、杨蔚屏两同志，要他们多抓农业生产。^①

在郑州，毛泽东没有下车，就在专列上办公、休息。专列宿于陇海线的一个小站，距郑州八公里。

4日凌晨5点半，毛泽东派人叫杨尚昆起来，毛泽东说他一夜没睡好，想约吴芝圃、杨蔚屏再谈一次，还是谈昨晚未谈完的问题。

早上6点半，吴芝圃、杨蔚屏应邀再次登上专列，毛泽东继续他们关于农村情况的谈话，专列则向东开去。

吴芝圃、杨蔚屏反映，在统购统销中，有些农民反映，“不怕三统一”，就怕红薯顶粮食。他们对红薯顶粮食有意见。认为红薯可以而且应该顶粮食，但四斤红薯顶一斤粮食，他们不满意，他们认为不能顶得太多，应该改为五斤红薯顶一斤粮食。

因农民对农业合作化有抵触，河南出现大量宰杀耕牛的情况，河南牛的存栏数急剧减少。吴芝圃、杨蔚屏说，牛的存栏数确实大为减少，但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因灾饲料减少；第二，牛的市场价格不对，牛皮的市场收购价高于牛价，促使一些人杀牛；第三，一些农业合作社只要大牲口，小的不要。去年河南牛的养殖增加了60万头，但杀了30万头，卖出的至少也有30万头，两相抵消实际没有增加。

对批发和零售商的改造问题，吴芝圃、杨蔚屏感觉有些快，他们说，小市镇私商现在只剩下20%。

他们还反映，农民对粮食意见不多，意见多的主要是油料和棉花，主要是留少了。

谈话结束后，吴芝圃、杨蔚屏在商丘站下车。^②

4日下午3时，专列途经徐州。曾希圣、黄岩、省委秘书长吴文瑞在此等候。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主要问题仍然是农业生产问题。

^①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134、135页。

曾希圣、黄岩说：去年安徽水灾很严重，由于省委注意了农业生产，采取了“三改”办法，如按灾情计算应减产78亿斤，但实际只减了19亿斤，成绩是很大的。由于注意了灾后的防疫工作，在受灾时和灾后死人都很少，这些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对地方工业，曾希圣提出，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工业限制太多，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他主张在财政上不牵动中央预算、不影响全国平衡和地方确有需要的原则下，应该让地方多搞些工业。曾希圣还谈到，中央一些机关办事手续多，到北京很难见到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油料的经营管理，曾希圣说，现有的四道手续、三次税收，不合理，农民需要的油饼肥料又不能供应。对治淮问题，曾希圣说，有些不应修的水渠修了，如在河南境内；对内涝注意不够，经费上未着重投资于内涝；技术上也有些问题未解决。在建设设计上，为600亿至800亿流量争持不下，水利专家们不注意去群众中调查研究，有许多都是凭主观办事。

对批发、零售的商业改造，曾希圣、黄岩认为，对有些人，可考虑使他们转为农村副业，如种菜、养鸡、养鱼等。安徽全省私商零售还有41%。^①

下午7点半，专列由徐州北开，晚上，到济南。专列停济南飞机场专线。毛泽东在专列上休息。

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舒同、谭启龙的汇报。

舒同、谭启龙主要谈话要点：

(1) 向明问题和若干干部问题。(2) 如何改变山东党的工作作风问题。(3) 农业生产问题和农村中紧张状态。(4) 工商业问题。

舒同要求让他在山东再搞半年，不忙去《人民日报》。毛泽东意见，舒同去《人民日报》后仍可兼山东省委书记，以便必要时来济领导，同时对《人民日报》也有好处。此事要回京后再商定。

舒同、谭启龙反映：山东工作中，在作风上已习惯于“单打一”、“片块包干”、“大呼隆”的办法，要改变这种作风，还需长期工作才行。舒同提出“七要、七不要”。

杨尚昆与舒同、谭启龙说了些有关统一战线的工作问题和周恩来的政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135~136页。



1955年，毛泽东在专列停车点同地方领导交谈。（摄影/侯波）

治报告内容。^①

5日下午3点，专列离开济南继续北开。夜里10点左右，专列途经天津。

毛泽东去游泳池（即天津干部俱乐部），黄火青、吴德和市委其他同志均到。

5日夜，毛泽东宿于天津铁路支线的专列上。

6日，毛泽东从昨夜躺下大概睡了九小时，为几个月来难得的事。几

天来的疲乏一扫而光。

专列回天津东站，毛泽东约黄火青、吴德、耕涛谈话。黄火青、吴德、耕涛主要汇报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天津地方工业与私营工业的生产问题；（2）商业工作中对批发、零售商的改造问题；（3）农村的货物供应问题。

从他们的汇报中，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总安排很重要，过去计划中没有注意地方潜力的发挥。毛泽东1954年12月在广州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说过：“不全”，其意义是深刻的。天津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能力，现在闲着未用，反而弄成失业人数多起来，使国家背上包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才行。陈云同志关于私营工业的安排，他们认为能解决问题，但还嫌如何发挥地方企业的力量说得不够。^②

6日夜8时2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回到北京。

^①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136~138页。

十二 对合作化问题再度调查

一、1955年4月前，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

正当1955年1月毛泽东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邓子恢1月4日向周总理递送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去年十月间，中央批准全国各省办60万个合作社，下边积极性很高，将计划提到70多万个。现在看来，办好60万个都不容易，原因是县区干部几乎12个月都在做统购统销等工作，只有很短时间发展合作社。现在全国已办起38万个新社（老社尚有10万），大部没有立住脚。又赶上统购统销，农民抵触情绪很重，他们怕“归公”，所以出现普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例如，不积极沤粪积肥，大批出卖牲畜，宰猪杀羊，有钱不买生产资料，抢购不急用的商品，甚至修坟买棺材等等。必须警惕小私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态度。报告提出：合作社运动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某些地方，完成计划力所不及，主动减低。避免统购和合作两种紧张碰在一起，引起更大不利于生产的现象。这个报告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工作简报（第一号）》发出。^①

针对中央一些部门不断反映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问题，而毛泽东在外地看到、听到的与之不同。毛泽东开始并没有采取否定态度，而是有些怀疑。为了多了解真实情况，1955年年初，毛泽东提出：从全国每个省和广西自治区、每个专区选调一名军队干部；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478页。

五个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负责毛泽东的警卫任务，是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些身边警卫，接触群众，直接听到各地的真实情况。

1月10日，邓子恢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发出。通知中说：对合作化运动，不能盲目叫好。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基本完成或超过原定计划的，停止发展，转向巩固；离完成计划尚远的地方，在巩固中发展；计划过高，可以报请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适当收缩；对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允许社数和社员户数合理减少。^①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2月2日，华南分局向中央并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了《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央3月1日发出了批复。

2月初，毛泽东指示卫士李家骥以探家的名义回乡搞调查研究，16日归队。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汇报。毛泽东对他的汇报给予了肯定并且表示，等有时间，再详细听他汇报。让他先搞一个提纲，写一个调查报告，不但要有具体内容，还要有分析，有本人意见。^②

3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全国粮食购销出现紧张局面。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通知》和《国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紧急通知》一开始就说：“目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报。”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③

这个《紧急通知》毛泽东签发了，他找邓子恢谈话，告诉邓子恢：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农户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毛泽东认为粮食征购已经到了界限，征购任务是900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邓子恢说，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

①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479~480、501页。

②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479页。

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毛泽东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10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①

3月中旬，毛泽东听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毛泽东与他们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②

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

25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电浙江，要求缩减农业合作社。这份电报写成后，邓子恢曾托陈伯达带回呈请毛主席审阅。为此，浙江减少了1.5万个合作社。^③

二、4月初毛泽东南下视察

4月4日，中央召开了中共七届五中全会。

5日晚，毛泽东在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

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了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革新成果展览。

当晚12时，毛泽东登上专列，准备去南方再实地看看农村情况。随行的有叶子龙、田家英、林克、徐涛、洪敏大夫、江青等。毛泽东拟经平汉线转浙赣去杭州小住几天，五一前回北京。因为工作原因，毛泽东没有让罗瑞卿、杨尚昆同行。

7日凌晨零时10分，专列离开北京，沿京广线南下。

专列经过石家庄，毛泽东找卫士李家骥谈话，详细听他汇报2月探亲搞调查研究的情况。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当汇报到农村中的新富裕中农时，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连说：“好，你具体说。”李家骥举了他姑姑家的情况说：“她儿子今年当了干部，本来有粮食，却把它埋起来，在外边则放风说没有粮。”毛泽东插话：“这是我让你调查的重点。你们（指毛泽东身边的卫

① ② ③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480、481、485页。

士)如果把你们亲属的情况都了解了,就能掌握不少情况,就能对我们制定政策起很大作用。”

毛泽东问:“农村有多少这样的人家?”

“富裕中农,有一半以上是这种情况。”李家骥问答。

毛泽东问:“那一般农民呢?”

“一般农民中有一部分维持有余,有一部分缺少农具,还有一部分缺粮。”李家骥说。

“缺粮的能占多少?”

“在我走的这几个村中情况不一样,有的比例大,有的比例小。如有个村占比例大的是因为他们这里山坡地多,条件不好。”李家骥答。

毛泽东说:“对嘛,好坏不一样。这样分析对。”

这次毛泽东听汇报,连讨论用了一个多小时。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满意地说:“总的看还可以,你基本完成了任务。回去后在这基础上(因李家骥只写了个汇报大纲)再加工一下。”

毛泽东后来对李家骥说:“现在你学会做事了,这次比上次搞得还好。这是个进步,我很高兴。你告诉大家,都要抓紧时间学习,学会搞调查研究,学会写调查报告,这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基本功。如果能学会这些我就放心了。”^①

8日,专列到武汉,毛泽东住惠济路16号招待所。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湖北省、武汉市部分领导干部李尔重、王海山、刘惠农、张体学等。

刘惠农回忆:这年春天,毛泽东来到武汉,我和张体学、李尔重立即前往拜望。那天,主席兴致勃勃,和我们谈了一会话后,就约我们同去院子里散步,叶子龙提着照相机为我们拍了几张照片。

翌日下午,刘惠农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刘惠农的手说:“你好嘛,交通部长不当了,当起市长来了,有什么打算啊?”

刘惠农说:“以前我虽然在武汉,但搞的是中南和长江的交通运输工作,对武汉的情况不很熟悉。武汉市的情况很复杂,工作面宽,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我没有经验,需要学习,边工作边摸索城市

^①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第479~480页。



1955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惠济饭店与武汉市委第三书记李尔重、副省长王海山交谈。(摄影/叶子龙)

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点头道：“你过去在交通部门工作时，搞了一个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搞得很好嘛！现在做城市工作，也要做好！”

刘惠农说：“主席，关于武汉的城市建设规划，省委、市委多次研究过，现在我将主要内容向你汇报。”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

刘惠农知道毛泽东不喜欢长篇大论，也不喜欢照稿读。因此刘惠农简单扼要地讲了些。刘惠农首先汇报了武汉市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的状况。着重说明，经过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已为把武汉市由一个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惠农说：为建设好武汉，必须办好以下几件事：第一，大力发展工业。以国家在武汉地区重点建设的骨干企业为主体，带动其他中小企业。第二，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尽快修通汉水公路桥和武汉长江大桥，使武汉三镇连成一片，京汉、粤汉铁路连成一线。第三，积极改造旧城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城区。

武汉市民住茅棚、板棚的有相当比例，而且吃水用水困难，全市仅有两个小水厂，市区内仅一半人能用上自来水。整个汉阳地区没有自来水。

解放后，政府建造新住宅区、抢修危房，逐步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还要尽快解决武汉市民饮用自来水问题。

毛泽东听到这里，说：“自来水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不同，居民、工业都要用自来水，希望武汉人民都能很快喝上自来水。”

刘惠农继续说：第四，城市不光要建设，还要美化，应把绿化工作做好。

第五，城市要把大学、中等专科学校办好。实行普及教育，根据我国的现状，教育工作一是办好普通教育，二是办好业余教育。

毛泽东对这条很感兴趣，说：这条很重要，城市发展教育比农村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如学校比较集中，知识分子多。武汉市高等院校就有十多所嘛，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市还应该多办一些大学，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安排到国家事业、企业单位，还要输送一部分到农村去，改变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业余职工学校应该大力提倡，我们许多干部、工人政治觉悟很高，但文化程度低，科学与经济日益发展，没有文化就跟不上形势需要。他们中一部分年纪较轻的可以送到大、中专学校深造，但大部分脱产学习也不可能，办业余小学、中学、大学是一个好办法。他们可以到这些学校里学习，摘掉文盲帽子、提高文化水平，更好地为国家的建设服务。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刘惠农同志，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讲都是新课题，我们都需要学习，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习国家管理、国家建设；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只有把国家建设好，人民才会拥护我们，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武汉是一个大城市，一定要建设好，管理好。^①

4月10日晚上，毛泽东到杭州，住刘庄。

4月11日，杜润生、袁成隆从杭州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二办发出《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浙江省农村紧张状态确未平息，若干地区正趋向于高度紧张。由于过去工作基础好，工作有成绩，迄今尚未发生严重事故，但估计生产受影响是难免的了。

粮食方面，产量打高了，不少地方购过头，统销面过大（多者达百分之八十）和中农、贫农关系都很紧张。合作社发展过多，从去春2000多社，千分之六发展到目前50000多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参加农户达百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101~102页。



1955年4月10日，毛泽东赴杭州途中在金华视察农田。（摄影/侯波）

分之三十以上的有29个县)，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因政策准备不够，问题很多，经济政策上很混乱；有一部分办不下去，办下去也办不好的。

由于粮食、合作两紧张，领导力量顾此失彼，拖得全盘工作有些被动。加上去年贯彻阶级政策不完整，主要的偏差是对团结中农有所忽视，这就加重了党和中农之间贫中农之间关系的紧张，不少的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了，新的生产秩序无法确立，拖下去，将会既脱离中农又脱离贫农，有使我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工作中陷于被动还是小事。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省委已有预见，过去已有一些措施，并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下粮食之马，省内要决心做好合理销售，但恐需要中央予以支持，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销售计划恐不易保证。下合作之马，这是省内可以自行解决的。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这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丢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①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40~541页。



1955年4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在杭州茶场合影。（摄影/侯波）

4月11日下午，毛泽东爬北高峰。

当天深夜，罗瑞卿从北京打来紧急电话，向他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从最近获得的情报分析，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谋破坏所致，并报告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将于两天后从昆明启程飞仰光。毛泽东指示在京的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得知飞机坠毁后，焦虑不安。他说：恩来还在昆明嘛，台北的电台就迫不及待报道他葬身海底了。真是司马昭之心，自我暴露而路人皆知。敌人越是要阻挠和破坏，我们越是要去开好这个会。当天，毛泽东吃了安眠药也没有睡着。他取消了所有活动，专候代表团出发的消息。^①

4月1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曹县合作化运动情况的通报》。

13日夜里，北京打电话告诉周恩来，毛泽东在杭州取消了所有的活动安排，焦虑不安地专候代表团出发的消息。

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电话，谈总理去亚非会议事。第二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开会，讨论总理出席会议事。

14日早晨，周恩来一行从昆明出发，开始了亚非会议的行程。

当日下午，毛泽东在刘庄与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谈话。朱琏是13日午夜

^① 陈敦德：《周恩来飞往万隆》第162~163页。

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所招待所。

第二天下午，有关负责人就来通知她去见主席。在一小段等候的时间里，朱璉听了毛泽东关于针灸工作的一段指示的传达。

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在跟朱璉谈话的时候，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这本书是在3月23日送呈主席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璉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①

15日晚上，朱璉被请去和主席一道吃晚饭。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但因为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说说笑笑之中，毛泽东也很快了解各个同志的籍贯、姓名及职务。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95~97页。

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琰和洪敏大夫。

大家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 10 分钟，第二天散步 15 分钟，第三天散步 20 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 25 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外国人是没有什么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毛泽东最讨厌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边上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说：“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 支至 15 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晚上近 10 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请了几次，他才动身。^①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 95 页。

16日下午，毛泽东到西湖散步两个多小时，游览了“花港观鱼”、“苏堤春晓”等西湖景点。

17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上海。

18日，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了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①

19日，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派身边警卫战士赵桂来等几名山东籍卫士回家搞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农业合作化及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三、4月南下视察后，毛泽东改变了对合作化形势的看法

19日，邓子恢向刘少奇汇报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情况。

20日，刘少奇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会议定下今后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一）现在全面停止发展，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区、乡未办又有条件的，可个别试办。一区三五户，准备经验为以后发展打下基础。停止发展，是为了把现有社巩固下来稳定成绩。历来工作都是巩固一批发展一批，从巩固中求发展，西南、中南几个省，粮食任务不大，还可发展一下，但不要发展太快。

（二）要巩固几十万社，首先要搞好生产，帮助社解决牲口、饲料不足的问题，调整干部，保证社的增产，至少不减产，这是巩固社的基本关键。

（三）适当收缩，指发展过大的而言，如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河南等，某些县份发展过大的也要适当收缩。

停下手来就可以巩固，否则可以巩固的也难以巩固。^②

20日晚上，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毛泽东问了问邓子恢出访匈牙利的情况，对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未置可否。^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374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48~549页。

③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487页。

21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他说：我昨晚向主席汇报，分析形成紧张形势的因素有三：

（一）最为突出的，是粮食统购统销；

（二）城乡对私商改造太快太猛，因此造成城乡间“大通小塞”现象，要影响到近几个月财政税收，要影响城市的一些人们失业；农村中则也有一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农，减少副业收入；

（三）更根本的因素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主要是生产合作）出了毛病。^①

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观礼时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搞快点。他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农民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柯庆施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毛泽东认为，三四月份农村工作部的反映是发谣风。^②

5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邓子恢谈话。毛泽东发出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③

7日11时，周总理和陈毅开完亚非会议回京。晚上6时，毛泽东约周恩来、陈毅和全体政治局同志吃饭，随便谈了一下亚非会议的情况，决定在最近即向人大常委作一次报告。饭后继续谈，到10时散。毛泽东就当前农村情况和镇压反革命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并准备在月内约集党外人士谈谈。主席有意将人大代表组织下去看看，并发动他们提意见，为7月的第二次大会做准备。总理对警卫工作太严，限制了自由，提出了一些意见。^④

9日晚，毛泽东又约见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周总理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46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4页。

④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202~203页。

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他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1955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①

10日17时30分，毛泽东约十个党外人士谈话。

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前院接见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干部战士。

毛泽东说：“我要和同志们见见面，讲讲话。”“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如吃菜一样，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工作，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大家齐声回答：“同意！”

毛泽东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项是警卫工作；一项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去看家，一方面搞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

毛泽东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毛泽东接着讲了调查的内容：“要调查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5页。

麻、烟叶，农民生活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征购的情况，多了，数也数不完。还要了解干群关系好不好，农村干部民不民主，有没有强迫命令，打不打人。你们要尽量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

毛泽东谈到对当时农村一些情况的不同看法，他说：“现在有不少人说没有粮食吃，有一个是真的两个是假的。粮食部有五个干部说，老婆都骗丈夫，存着两千斤粮食说没有粮食。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赵在她家里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赵问他为什么哭穷呢？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一个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饿着肚子的，顶多是百分之十是真叫没粮食。你们回家时，发现家里有粮食不要骂，心里知道就行了。要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征了过头粮，今后不要征过头粮，允许农民完成征购任务自己存粮食，变非法为合法。”

毛泽东谈到在当时农村反映强烈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讲了统购统销的五条好处：“第一，对农民有利，保证他们有粮食吃；第二，对灾民有利，不会饿死人。去年水灾有五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四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灾民。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千年没有的好政府，我看是五万年也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区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人民有利，我国有八千万城市人口，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可以统一由国家供应，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还可以出口换机器，拿些豆子出去，没有统购出口就少一些，统购了就可以多出一些，不能出得太多了，我们是一个缺粮的国家。”

毛泽东说：“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多，有六亿，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三国刘备破曹操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看过三国没有？”

大家一齐回答：“看过！”

毛泽东说：“三国我们可以看，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现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轻机器、细机器。”

毛泽东说：“你们团结好不好啊，团结起来，勤奋学习，调查，把工

作做好。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①

16日，毛泽东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送审的、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上作了批示：

尚昆用电话〔问〕周、陈、彭真有无意见，如无，立即发出。

退尚昆于十七日发出，并立即印发给来京的各省市代表。^②

通知中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1955年7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

在即将召开的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彭一湖1955年4月24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转给国务院的一封信，印发会议代表。毛泽东批示：

即送杨尚昆同志：请将彭一湖的信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的会的各同志。

各省市同志可能于十七日夜车或十八日早车回去。

小平修改的中央的那个通知（全国代表下去考察问题），亦请于明日印发给各同志。

彭真发给常务委员及常委一些工作人员及政协在京常委委员。^③

彭一湖在信中反映了他的家乡所在的湖南省东部地区农村中的一些情况：

一、留粮点过低。1954年办统购的时候，由于给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体力不足，生产情绪低，影响了生产，农民无力养猪，副业也受到打击。

^① 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75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116页、118页、119页注。

二、定产量的问题。1952年查四定产的时候，由于对平地水田的产量定得过高，加之一九五四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统购时由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

三、区乡干部作风问题。一些区乡干部遇事不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执行，引起群众的反感。^①

5月16日，应召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关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同志大部分到达北京。毛泽东找他们谈话，为明天的会做准备。

17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谈关于胡风问题。

上午8时，毛泽东叫通知下午1时开会。

下午1时，主席，书记处，中央各副秘书长，邓子恢、廖鲁言、陈毅、李先念等及华东、中南各省，京津沪汉市委共30多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即所谓15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运动。

毛泽东首先谈了四个问题：

1. 粮食紧张情况的分析和粮食工作问题。
2. 反革命活动与镇压反革命问题。
3.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停、缩、发的问题。
4. 民主人士（人大代表）下去考察问题。

各省、市都就此四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同意主席提出的方针。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的精神还是要发展（当然要巩固），而不是大大的收缩。

晚上10点散会。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意见，会议前后共三天，短促，重要，今后应经常召开。^②

会上，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毛泽东提议，江苏要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在会上重新报上1956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118页、119页注。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206~207页。

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省份。这一次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

‘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从事盐、林、渔、牧、船、经济作物六业的人——《毛泽东传》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376~378 页。

十三 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第三次调查

浙江是当时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运动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下令浙江农村合作社要坚决收缩，要砍掉大批合作社，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浙江要下马。为了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亲赴浙江调查。

1955年6月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直奔杭州。

10日，毛泽东到杭州，下榻在刘庄一号，毛泽东这次在杭州住了8天。一边调查农业合作化情况，一边审阅有关胡风问题的材料。

一到杭州，毛泽东便听取了浙江省委领导关于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让他将他收集的关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包括下面大发展，省委核减等数字，写一个简要材料，“给我为盼。”^①

到杭州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省委领导的陪同下，到新登县视察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对陪同视察的省委领导说：“实现农业互助合作，要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②

毛泽东还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头到周围农村，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情况。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167页。

^② 毛岸青、邵华主编，李林达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情满西湖》第41页。

到余杭调查的同志了解到，当地农村血吸虫病发病严重，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不几天，毛泽东亲自赶到余杭，走进农民家中，了解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的发病情况。他把卫生部的负责同志请到杭州，专门研究怎么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很快派出血防人员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调查，免费为疫区人民治病。^①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还审阅、编辑了有关胡风案件的材料。

12日2时，毛泽东批示：“定一、周扬、邓拓同志：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②

16日2时，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③

这次到杭州，毛泽东像前几次一样，除了散步、爬山，还几次到南屏俱乐部室内游泳池和玉泉游泳池游泳。但后来毛泽东再没到玉泉游泳池游泳了，因为他发现，每次他来，游泳池门口都挂出“内部整修，暂停开放”的牌子，他心里不安，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让护送文件的飞机将正在北京的毛仙梅、毛泽嵘、文炳璋等带到杭州，好随车将他们带回长沙。

6月18日下午7点50分，毛泽东告别杭州，毛仙梅、毛泽嵘、文炳璋随毛泽东回长沙。

19日，专列途经南昌，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就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

19日晚上，专列途经长沙，停在大托铺专线。

20日上午10点，在罗瑞卿、汪东兴、周小舟、谭余保、省长程潜、语言学家杨树达等人陪同下，毛泽东来到湘江边，他要横渡湘江。

当时湘江涨水，大家劝说毛泽东不要下水，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① 毛岸青、邵华主编，李林达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情满西湖》第74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110页。

10点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在船上，毛泽东接见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秦简要汇报了长沙市的情况。经过20分钟的航行，到达猴子石。毛泽东在此下水，一小时后，顺利到达河西，在牌楼口北侧登岸。

上岸后，毛泽东乘车至岳麓山。登山前，省委准备了两抬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健步到达云麓宫。在云麓宫，毛泽东请客吃午饭。下午3点，因下雨，毛泽东未去爱晚亭，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在参观岳麓书院时，毛泽东同杨树达讨论了文字改革问题，征求对文字改革的意见。略览岳麓书院后，毛泽东又来到省长程潜住处探望。

晚上7时，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前往大托铺，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湖南农业合作化兴起状况及初步经验与问题。并以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合作社经过整顿，树立了贫农优势为例，说明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当即嘱咐，把有关材料迅速整理寄给他，以供研究。^①

6月20日午夜，专列离开长沙赴武汉。

2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湖北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

22日，专列途经郑州。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副书记赵文甫、杨珏和省军区司令员毕占云等赶到车站迎接。河南省会刚从开封迁到郑州，毛泽东应邀来到新建的省委办公区，在省委北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毛泽东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问到杨珏时说：“杨珏名字不错，两个玉字，古书上有这个字，一个玉好，两个玉更好。”毛泽东看到王化云说，“化云呀！你这个名字么，把云都化了，怎么下雨呀！”

毛泽东让王化云谈谈治理黄河的情况。谈到修建三门峡水库，毛泽东说：“黄河每年流入三门峡水库十几亿吨泥沙，泥沙淤积怎么办？历史上治理黄河有堵、疏的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治理办法。”

谈到在黄河上游搞水土保持试点时，毛泽东说：“这是治本的办法，但黄土高原面积大，人口少，任务艰巨，堵、疏、水土保持都可搞。”

毛泽东说：黄委会是治理黄河的专门机构，省委要支持把治理黄河这件大事办好。

谈到治理贾鲁河时，毛泽东说：“贾鲁是一个人的名字，治河有功，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3页。

后人称为贾鲁河。历代王朝都治理黄河，都没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你们的责任很大呀！”

王化云谈完治黄工作，吴芝圃汇报了全省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情况。毛泽东说：“河南是农业大省，既要积极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又要注意做好巩固工作，特别要注意培养干部，学会经营管理工作。”

汇报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室里吃午饭，午饭很简单，四菜一汤。饭后，毛泽东回到专列，离开郑州。^①

22日晚，专列途经邯郸，在邯郸停车，毛泽东没有休息，在专列上办公。

23日凌晨3点，毛泽东就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给刘少奇写信：

少奇同志：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请考虑邀安子文，钱瑛，刘景范三同志到会，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因这个问题曾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宜使他们与闻中央的决定。请予酌定。

毛泽东

六月廿三日三时

如少奇同志已睡，则于上午送交尚昆同志。

又：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②

23日，专列途经保定停车，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

下午7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晚上，毛泽东约见邓子恢，提出原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同现有的65万个社比较只增加35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65万个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国20多万个乡都有一个到几个社。毛泽东问邓子恢，你看怎么样？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他回到部里，找互助合作处负责同

① 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1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180页。

志商量，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 100 万个的原计划好。

24 日，邓子恢见毛泽东，谈了五个多小时。邓子恢说，上年由 11 万个社一下子发展到 65 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年发展到 100 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 130 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 100 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双方发生了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①

6 月 25 日，毛泽东到机场欢迎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胡志明主席拜会毛泽东后合影留念。

6 月 25 日至 7 月 7 日，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

7 月 9 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

10 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11 日中午 12 时至下午 5 时 40 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毛泽东说，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②

15 日，邓子恢又向刘少奇反映，说 130 万不行，还是 100 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①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 49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379~380 页。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杜润生。

杜润生同志：

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4、5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个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①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警卫战士探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

19日，毛泽东看了身边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在每个报告上都写了批语。

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主要原因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批：“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报告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

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

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204页。

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还表扬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①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

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②

26日，毛泽东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

陶鲁笏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1954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55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81、382页。

陶鲁笱说：1954 年全省减产 4.8%，而初级社占 60% 以上的平顺、武乡等 20 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 3.8%。全省的大牲畜，1951 年到 1954 年，年递增率为 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陶鲁笱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①

同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

这个《简情》提到：1955 至 1956 年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 103 万余个，而不是毛泽东要求的 130 万个。

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文字（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记录了他此时此刻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许多思考。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 1951 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383 页。

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①

29日，毛泽东将中央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7月末，柯庆施到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有意把7月28日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向中共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处理好，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的人们，并对“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但他对收缩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点，认为可以使人们认识收缩的危害性。^②

会前，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邓子恢从毛泽东调阅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之后，也着手写《农业合作化的几点意见》发言稿。发言稿7月31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定名为《邓子恢的讲话稿》。^③

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会后，邓子恢立即找到刘少奇，说：我不是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浙江收缩当时是对的，希望中央不要再鼓励大发展，突破150万，减产如何办？刘少奇劝他，要正确对待主席的批评。在毛泽东报告之后，邓子恢发言，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扩大），继续在更大范围内批判邓子恢。

8月3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问：你土地改革中那样坚决不怕中农害怕，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坚决了？^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38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228~231页。

② ③ ④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第495、496、497~498页。

十四 1955 年夏天在北戴河

1955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去北戴河，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有时到六七点。

从 8 月 7 日到 9 月 5 日，近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二、直接掌握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权；三、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农村合作化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毛泽东希望将合作社数字增加到 130 万个，每个乡都有一至几个合作社，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适当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①

8 月初，接到中央关于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休假的通知，毛泽东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卷，第 234、238 页。

② 陈晋：《毛泽东之魂》第 61~62 页。

8月7日，毛泽东去北戴河休假。

13日，毛泽东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关于为什么“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给予明确的回答。关于各省区在1956年秋季以前按照实际情况究竟能够发展到多少个社的问题，望和较多的同志加以研究，确定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①

16日，毛泽东就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②



1955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左罗道让、李讷、罗瑞卿、毛泽东、叶子龙、孙勇、马武义）。（摄影/侯波）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300~301、304~305页。

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23日，毛泽东就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作了批示：

各同志：

此件已根据七月卅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一、两天内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见，于八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即发刘、周、陈云、小平、彭真、董老、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等十三人。^①

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印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通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修正本），发给你们。你们收到后，可即印发给各级党委、党组、党内干部直至农村支部，但暂时不要在公开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带去的未修正本，请缴还中央办公厅。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②

当日，毛泽东起草了各地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直接由中央拟电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320、321页。

答复的批语：

小平、尚昆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①

同一天，毛泽东还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作了批示。

2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召开有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②

当日，毛泽东还就中央转发热河、青海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

31日，毛泽东就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作了批示。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324、327页。



1955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李敏、李讷及工作人员、当地渔民合影。（摄影/侯波）

9月1日，毛泽东就通报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和同意拨付农业合作社干部训练费和农业贷款分别做了批示。

3日，毛泽东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分别作了批示。

4日，毛泽东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

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

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个二千五百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一百二十五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①

4日，毛泽东在住处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350~352、355~357页。

(扩大)，议程有两项：

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

开会时间：十月三日到七日，共五天。^①

9月5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355~357页。

十五 在北戴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毛泽东说：“我是用十一天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篇报告。先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①

毛泽东说：“解放后 11 年，我做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不好。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 34 个部门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②

据逢先知同志回忆：“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有些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修改好的稿子和写好的按语，再由我们进一步作文字加工。”^③

9 月 5 日，毛泽东休假结束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第二天，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

① ②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382、383、385 页。

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

11日晚上，毛泽东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他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

12日凌晨4时，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看完，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央委员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①

1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了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14日，毛泽东再去北戴河。

此次毛泽东到北戴河，是准备编一本合作化运动经验集，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发给各地代表。他离开北京，再次来到北戴河，闭门11天，集中精力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9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入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毛泽东写了编辑计划：

(1) 依地区排列，制一个目录（照每篇文章上的题目。不照原件每一省市的总目）。

(2) 有几篇，要鲁言查明材料来源，注明在每一篇的题目之下。

(3) 校对一遍，文字上加以修改，使更加通俗化。

(4) 几天内先印几份清样，至少毛、田、乔木、伯达各一份，可能时再送刘、周、小平各一份。

(5) 争取月底或下月初印出四百本（样本）。

(6) 用人民出版社印，告知尚昆。^②

15日，毛泽东开始《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编辑工作。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380、389页。

24日，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编辑工作即将结束，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最后部分付上，请付排。八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载有邢台地委书记写的一篇关于邢台地区合作化的文章，请清出加印到河北省部分中去。此外，请商廖鲁言同志翻阅一下今年一月至九月的人民日报看有无好的（要是很好的）材料可用的。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①

25日，毛泽东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写了序言，其中谈道：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

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②

9月25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389~390、395~398页。

十六 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 商讨农业发展规划

1955年10月上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已为中央和各地领导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考虑加快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27日在颐年堂和29日在怀仁堂毛泽东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第一次只有黄炎培、陈叔通等少数几个人，第二次人数较多，除全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还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毛主席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谈话后，毛主席去杭州，除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座谈农业发展规划外，就是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①

后来毛泽东谈到这次出巡，说：“在一九五五年十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一九六二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苏州的一位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07页。

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四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二千六百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①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已为中央和各地领导所接受，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奠定了基础。这个时候，毛泽东又谨慎起来。11月1日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稿，《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其中说：“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附言：“即送刘、邓先阅，再送周、朱、陈、谭震林、子恢、鲁言即阅后，发。发后另印如前示。”^②

1955年11月1日晚上21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23时50分，专列途经天津，停车一小时。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2日凌晨6时58分，专列途经德州，停车一小时。毛泽东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原德州地委第一副书记朱永顺回忆：

^① 《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第5~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428~430页。

列车车停稳后，车上下来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同志（后得知是叶子龙）。我向他走去。他问我：“你是德州地委负责人吗？”我说是的。他说，“请上车吧！”我问：“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他说：“主席。”我一听蒙了，心想，这不是做梦吧？叶子龙把我领进车厢一间会客室，室内一个固定的方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一打16开的白纸和一束削好的铅笔，还有一筒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桌子南北两面各放着一把软椅。叶子龙让我在南面的椅子上坐下，并告诉我稍候一下，主席就来。

大约四五分钟以后，毛主席在车厢会客室北门出现了。我急忙上前与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看到我穿着棉大衣，对我说：“车里热，把大衣脱下来，走时再穿上。”并示意我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同时自己也在北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主席拿起一支香烟递给我，我说，我不会抽烟。主席便自己点燃了一支烟。主席慈祥的目光望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朱永顺”。主席又问：“是永远的永，顺利的顺吗？”我说“是的”。主席拿起铅笔说：“名字不错，永远顺利。”并记下了我的名字。他边记边问：“你担任什么工作？”我说：“担任地委第一副书记。”主席放下铅笔又问：“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我说：“四年了，担任副书记三年了。”主席又问道：“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是山东寿光人。主席说：“寿光在哪里？是不是靠近潍县？”我说：“是的，在潍县的西北边。”主席问：“为什么叫寿光？”我说：“不知道。”主席说：“找一份县志看看，上面或许有记载。我喜欢看县志，过去打仗的时候，也常找来县志看看，县志里面有许多东西。”主席接着说：“山东有一个老同志叫王芸生，是不是寿光人？”我说：“是的，是寿光县王高村人。他说过去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您的讲课。”主席又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34岁了。”主席风趣地说：“青年团！青年团！娃娃，娃娃！”我笑了，毛主席也笑了。

主席问：“你们这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怎么样啊？”

于是我便分整社和建社两部分向主席作了汇报。汇报过程中，主席不时问话或插话，有时还拿起铅笔作记录。例如当我谈到整顿现有合作社和建立新的合作社的关系时，主席说：“要把现有的合作社办好，这样就有吸引力了。”当我汇报到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产时，主席说：“合作社一定要增产，不增产办合作社干什么。”当我讲到加强对整

社工作的领导时，主席问：“省委有没有人到这里来？”我说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路宾同志曾来指导工作。主席问：“王路宾是哪几个字？”我回答：“是三横一竖的王，道路的路，宾客的宾。”毛主席记下了王路宾的名字和职务。主席问：“你们的县委书记是不是都亲自动手抓合作社？”我说：“都亲自抓了。”主席说：“要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农业生产合作化遇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困难是缺少会计人员。已经配备的会计人员也十分缺乏会计业务知识。许多会计都是采用记“流水账”的办法。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德州地委在全区总结推广了禹城、平原等县“会计互助网”这一办法和经验。具体做法是，由县委、区委从供销社、银行或县府财政科等部门抽调若干会计人员，到县、区基点村的农业合作社帮助工作，对该农业社会会计人员进行业务辅导，并吸收周围村庄的农业社会会计自愿参加，定期在基点村开会，边辅导学习，边交流经验。这个办法叫做“会计互助网”。毛主席对这一办法很感兴趣，边听边记，然后问我，“这个办法效果怎么样？”我说，这个办法不但深受会计人员欢迎，而且得到各村党支部书记的积极支持，效果十分明显。主席放下铅笔又问我：“这个办法，你看可以不可以普遍推广？”接着又说，“我看可以。”我说，普遍推广，只有好处，没有风险。主席点了点头。

十几天之后，德州地委收到一份中央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内容是关于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若干具体情况的通报。通报中谈到解决农业社会会计的问题时，对“会计互助网”这一经验作了肯定和介绍。

毛主席向我提问的所有农业合作化方面的问题，我都回答上来了，主席也很满意。但是，当毛主席问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时，我基本上没有回答上来。我对主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我没有抓，对于城市工商业的问题，我不懂。这方面的情况，我说不清楚。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讲，就不再问了。主席对我说：“不懂不要紧，不懂的事情，抓上几次就逐渐学会了。”主席还询问了其他许多情况。^①

2日中午10时43分，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

^① 魏余秀、邹庆忠编：《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第76页。

舒同谈话。13时结束。晚21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21时55分结束。

深夜23时56分，专列途经泰安。在火车行进中，毛泽东向地委书记刘众前、泰安县委书记田勤耕调查研究。

毛泽东问刘众前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他，刘众前说：“泰安地区最大的新闻是合作社从六中全会前的18%发展到现在的56%。”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最后，毛泽东问刘众前县级干部的年龄、政治水平、能不能自己写发言提纲。当刘众前回答到县委书记能作长篇发言时，毛泽东非常高兴。^①

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途经兖州。2时，毛泽东与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2时25分，毛泽东听取了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专员邱天乙的汇报。

3日早上6时45分，专列途经徐州，停车一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途经符离集。45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0时55分结束。

中午11时45分，专列途经蚌埠。11时50分，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13时30分结束。

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途经滁州。1时54分，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途经浦口。3时25分，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早上7时21分，专列途经镇江。25分，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据当时担任镇江地委书记的陈西光和镇江专署专员高俊杰回忆：

毛泽东说：“我关照江渭清同志不要事先告诉你们的，结果还是提前告诉你们了。”

陈西光和高俊杰首先汇报了镇江专区的面积、人口、行政区划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情况。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做记录。他着重了解了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不时提出一些询问。当我们谈到地委规划时，毛泽东以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04页。

量的口吻，与我们讨论了农业合作化的步子是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

在刚刚结束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当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会上发言时，毛泽东问他：“老柯，你也是五省督军，你说说你们华东实现合作化需要多少年？”柯庆施答：“大约要三年。”毛泽东又问坐在近处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你们四川合作化要几年完成？”李井泉回答：“我们四川落后些，要五年才能完成。”毛泽东说：“你们三年、五年完成都可以。”

陈西光和高俊杰依据镇江专区的实情谈了自己的认识。在办社的进度上，我们是主张快一点的，同时也提出要有先后，少数偏远的地方，办社条件不具备，暂时还可缓一步。至于办社规模，他们说：“村子大、人口密集的平原圩区，合作社办大一些好。社大了，人多劳力多，牛多，农具也全，生产容易搞上去，贫下中农经济上翻身就能快一些。而丘陵山区，村庄散，人口少，耕地也不集中，农业社还是办小一点好，这样有利于生产，也容易管理。”

毛主席细心地听，有时在白纸簿上作记录，眉宇间不断掠过思索的神色，却没有对我们的回答表态。

陈西光和高俊杰回忆，这是主席的一次纯粹的对基层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调查。我们和主席的谈话有一个多小时。^①

4日上午10时54分，专列途经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包厚昌、市长江坚谈话，11时55分结束。

毛主席向他们了解无锡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主席提问，他们回答。有时他们答不上来，毛泽东并不介意，只是抿一抿嘴，再换一个问题。提问时毛泽东态度随和，丝毫没有架子，就像在聊天一样。在汇报中包厚昌感到有些热，就把手中的烟蒂放在桌子边上，然后脱外衣。那烟蒂上的烟灰掉到了地毯上，毛泽东看到了，他不声不响地拿起了那烟蒂放到烟灰缸上。

毛泽东对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十分注意，他详细询问了无锡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48页。

的情况及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毛泽东要包厚昌和江坚详细谈谈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其中的私股的。包厚昌曾在华昌丝厂蹲点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包厚昌和江坚又汇报了无锡市第一个由资本家自愿主动申请公私合营的工厂是荣德生的开源机器厂，这家厂在合营前夕累计亏损已达65万元之多。1952年10月批准公私合营，后改为无锡机床厂，公私合营后第一年就扭亏为盈。无锡市委在1953年年底作出全面规划，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对有影响的大型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为此，市委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有关厂家开展调查研究。市委的方针是成熟一个就合营一个。这个“成熟”，主要是指资本家对公私合营的自愿程度。无锡的荣毅仁是在全国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他在1954年年初就从上海专程赶来无锡，主动到市委找我，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当年7月，荣氏在锡企业全部公私合营，为无锡的私营企业起了示范作用。同年年底，全市已有18家公私合营企业，其中私人资本额占全市私人资本总额的一半以上。1955年8月初，又有27家私营企业被批准公私合营。这样，全市主要的大中型私营工厂基本上已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无锡市的私营工商业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从总体上讲是积极的。许多私营工厂已建立了党、团、工会组织，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广大职工都盼望早日实行公私合营。听到这些，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对于无锡如何处理好跑到海外去的资本家在锡私股的方法，毛泽东也十分注意，遇到他们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他总要问个明白，一问到底，在记录时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不放过。

包厚昌和江坚向毛泽东重点汇报了市委关于私营缫丝厂公私合营合并方案，以及第一批试点的情况。无锡市的私营缫丝厂绝大部分是小厂，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仅有两家，厂房简陋、设备落后、生产率低、资金不足且周转不灵，有些厂靠贷款维持生产，甚至有的厂还以煤油灯作生产照明用，生丝品级不高。这些厂长期处于困难境地，人民政府多方设法加以扶持，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些小厂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市委按照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决定以大厂带小厂，以立车带坐车，以先进带落后，先合并再合营，即把全市22家私营厂与两家新合营厂先合并为八家中型厂，再实行公私合营。从试点结果来看，产量、质量及劳动生产率均有提高，消耗也有降低。原先对并厂持

怀疑态度的资本家惊喜地说，这真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仔细听了缫丝业这种“先私私合并，后公私合营”的改造方案，很感兴趣，当即用形象的比喻表示赞许：好嘛！前个时期我们先吃了苹果，现在再吃葡萄嘛！这就是在“对资改造”中家喻户晓的“吃苹果”和“吃葡萄”这一生动提法的由来。

毛泽东原计划在无锡停车一个小时。汪东兴提醒毛泽东停车时间已到，请示专列何时开车。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汪东兴说，延长十分钟吧，怎么样？接着继续听取汇报。^①

12时47分，专列途经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孙加诺、副书记刘铁珊，苏州市委书记吴仲村、代市长惠廉谈话，14时30分结束。专列向上海开去，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

5日早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谈到9时40分，中间吃早餐。

然后，毛泽东在柯庆施、陈丕显及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陪同下乘“港申”轮视察上海港。

毛泽东站在栏杆边，举目四望。韩克辛向毛泽东介绍了上海港的分布情况和上海港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并不时插话提出问题。

毛泽东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操纵，发展不快，现在变成我们自己的港口了，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港口。

韩克辛又汇报了上海港解放后，接管、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生产改革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不时点头亲切地嘱咐：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大港口管理好，使它有个比较快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毛泽东不时询问看到的码头和停泊在江中的轮船的情况。到高阳路码头时，韩克辛主动向毛泽东介绍说：“这里原来是英商公和祥码头。”

毛泽东问：“这个码头的情况怎么样？”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58~61页。

韩克辛详细地向老人家作了汇报。

毛泽东关切地问：“对外国人的码头仓库，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韩克辛汇报说：“是通过转让的办法接收过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问：“怎样转让的？”

韩克辛又详细地向老人家汇报了转让的过程。毛泽东听后马上问：这么转让，对我们来说，是吃亏还是有利？

韩克辛回答说：当然是有利啦。

毛泽东高兴地说：转让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十分关心上海的改造情况，关切地询问了上海港私营码头仓库和轮船公司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和做法。韩克辛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私营航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

毛泽东问：对私方人员怎样安排的？

韩克辛说：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私方人员作了适当安排：如北洋航线 27 名私方人员中，安排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二人，副总经理三人，正副科长八人，其余 14 人分别按其专长在科室担任业务工作。

接着，韩克辛向毛泽东汇报了私营码头仓库业和私营驳船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毛泽东仔细听了关于上海私营航业和上海港私营码头仓库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汇报后，特别详尽地询问了民族资本企业家刘鸿生的家庭情况和他的企业情况。刘鸿生 1918 年为堆存开滦煤炭而创办中华码头公司，逐步扩大发展，成为上海港华商码头中最大的一家，它所属的中华南楼、中华北栈六七处码头，是上海港有名的煤炭码头。这几个码头及仓库，已公私合营，划归上海第七装卸区。

韩克辛向毛泽东汇报说，刘先生是位了不起的爱国企业家，他除创办了中华码头公司，还陆续开办了中华煤气公司、上海章华毛麻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还在民建——工商联任职。刘先生现在年事已高，不大过问码头公司的具体业务，他的儿子刘念智担任中华码头公司经理、较早地向市政府和港务局提出申请，要求合营，现在是公私合营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毛泽东听后神情严肃地嘱咐：这些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处

理时一定要讲政策，要注意掌握好政策。

毛泽东信步走到驾驶台后面的甲板上。驾驶台后甲板设有信号旗杆，信号员根据各种情况，随时升降不同形状色彩的旗帜，告知来往船舶和码头值班人员信号，以便保证安全。青年信号员崔汝功正在聚精会神的值班。毛泽东向他走去，亲切地招呼小崔说：同志，你好！并和小崔握手。24岁的小崔激动兴奋得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慈祥地问小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什么人？

小崔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还关心地问小崔：读过书吗？一般的报纸、书刊能看懂吗？

小崔回答说：“读过几年小学，对一般的报纸和通俗书刊能看懂，但要进一步学习，就有困难。”

毛泽东鼓励说：那不错嘛！还应该不断地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多为人民服务。

这时，风渐渐大起来，船有些颠簸，大家劝毛泽东回驾驶台。毛泽东进了驾驶台，站在舵工陈绿庭身旁，随手拿起望远镜瞭望前方。

中午时分，“港申”轮开到江南造船厂附近，征得毛泽东同意，调头返航。毛泽东回到休息室。

他老人家从餐桌上拿过四片文旦，分两片递给韩克辛，边吃边问：你过去在哪里工作？

韩克辛回答说：在山东渤海，搞地方工作。

在场的柯庆施对韩克辛说：“你写给主席看嘛。”于是韩克辛写了：“我叫韩克辛，进上海前在渤海三地委，担任过书记。”

毛泽东又问：从农村转到城市，工作有困难吗？

韩克辛回答：“困难不少，港口工作面广，也较复杂，而且还涉外，有好些问题不懂。”

毛泽东亲切地嘱咐说，不懂就学嘛，学会了就不困难了。

我们就是从不懂到懂，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从农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大的转变，要努力学习。

12时50分，“港申”轮驶回外虹桥码头。^①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82页。

5日中午，毛泽东再一次下车到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然后登上专列前往杭州。

5日下午14时45分，专列途经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李楚和专员李崇谈话，3时37分结束。

毛泽东在松江车站讲话不多，主要是提问，听回答和汇报。

毛泽东问，松江地区的农村合作化搞得怎么样了？李楚和李崇汇报，当讲到松江地区已有80%左右农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时，毛泽东说：农民的兴趣很高嘛！

毛泽东问，松江地区关、管、杀反革命有多少？李楚向主席实事求是地说：答不上。毛泽东听后没讲什么，也不再提问。

毛泽东深知松江血吸虫流行的严重情况，他问：松江血吸虫流行很严重是吗？李楚和李崇回答：是很严重，已影响了生产、参军，危及群众生命。毛泽东接着问，血吸虫是怎么感染的？李楚和李崇虽然作了回答，但是讲得还不清楚。毛泽东听后追问，这小虫怎么钉到钉螺里去的？由于李楚和李崇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时没答出来。毛泽东说，南方的血吸虫很严重，你们要很好重视。

毛泽东从上海到松江，一路上注意到绿化的情况，他指出：浙江的绿化好，你们要到浙江去看看。毛泽东在松江火车站停留约40分钟时间。^①

5日下午19时，专列到达杭州。

7日，毛泽东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

10日，毛泽东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这一天，毛泽东还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做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19人。

12日，毛泽东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11月中旬，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华东、中南九个省（市）的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15条意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91页。

见。附带谈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会议开始，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讲了有关发展农业的15条意见。他说，这15条意见是他从北京出发，路经天津、济南到达杭州，一路上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逐步形成的。当时，这些意见还没有形成文字。在杭州会议上，他一面听取一个省、一个省的汇报；一面指定几个同志组成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对文件的要求非常严格，几乎对起草小组草拟的每条内容及文字，都同起草小组一起商量推敲，字斟句酌。会议结束时，他还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大家回去亲自做些调查研究，同地委、市委、县委书记一起商量，准备明年再开一次会。^①

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作了修改并写了批语。

11月16至2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会。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7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我召集了九个省（市）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②

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写回信，其中谈道：“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③

这天，毛泽东召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到杭州，研究治疗和防治血吸虫病问题，决定成立中央血防小组，准备全国血防工作会议。

夜里，毛泽东就《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给胡乔木写信：“此件看过，可用，可

① 陶鲁笏：《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27页。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437~438、445页。

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①

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返京。

20日，专列途经天津。毛泽东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笏、黄欧东、欧阳钦。

当天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435~436页。

十七 征询《农业十七条》意见， 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

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外，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农业合作化的提速和农业十七条的提出，大大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也逼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

11月30日和12月1日，毛泽东连续两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初，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指出，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是严重问题，过去农业落后于工业，十七条出来赶上来了，压迫工业进步，工商业国有化也许要提前，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八大的思想。^①

12月5日，中共中央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3卷，第1216页。

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能加快我们的发展。”“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一、有二十二年根据地工作的经验，经过四次革命战争。二、现在有了伟大的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三、有六亿人口，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现在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①

周恩来当时也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他在那次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他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半个月后，他又说：《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钢的生产由一千八百万吨改成二千四百万吨。“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②

周恩来说：最近毛主席紧紧抓住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两个环节。这样在“一五”计划完成时就可以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的门坎了。现在两翼都前进了，也就推动着主体更加前进。主体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毛主席说，检查过去六年的工作，主要倾向还是保守倾向。当然保守主义倾向的主要责任又在于我们领导。这样，给了我们一个推动，也就使得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完成的工业化，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求，就是要使我们国家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工业生产的增加也如此。有没有可能呢？最近我们讨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3卷，第1216、1217页。

了一下，肯定这是可能的。例如，钢的生产，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许每年产量还不到两千万吨，现在，我们估计能够超过两千万吨，甚至可以达到两千四百万吨。^①

9日，杨尚昆受毛泽东委托给一些省打电话，询问对办高级农业合作社有何打算，准备发展多少？杨尚昆说，主席认为半社会主义发展了，就要搞社会主义。他老人家现在又开始抓高级社了。并且告诉说，主席可能在12月底要召集你们来开会，讨论高级社的问题。谭震林证实，主席确实在抓高级合作社了，杨尚昆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给你们通气的。^②

2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周就全面规划和反对保守主义问题讲话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钢生产一千八百万吨。现在改成二千四百万吨，粮食生产将达到一万亿斤。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他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一句话，要“多、快、好、省”。^③

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

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

①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526、529页。

② 丁群：《刘顺元传》第246页。

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

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一九六零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一九五六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一九五七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三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三十万个，或者四十万个，或者五十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十万个社，我国是否以三十几万个社或者四十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一九五六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一九五七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分，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一九五六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

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三年，最好七年，可以到十二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 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 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 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 在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区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 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十四) 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十五) 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 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 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以上各

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①

12月22日凌晨2时，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经保定、邢台、郑州，并找当地干部座谈，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23日，专列途经武汉，停在大智门车站。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李尔重进站迎接。

毛泽东在中南局招待所召开了有省市委书记、市长和几个地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张若谷和四位地委书记孟筱澎、王家吉、赵修和姜一。毛泽东一个个询问他们在哪里工作。当时，姜一任黄冈地委书记。当介绍到宋侃夫时，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个故事。宋侃夫在长征时曾任张国焘的机要秘书，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他立即报告了中央。主席说：“你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场的人都笑了。

毛泽东说：“我是来和你们座谈，作些调查研究，向你们请教。就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想听听省委、市委和地委同志们的意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先向主席汇报了湖北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农业基础建设以及生产技术改革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很好。并请坐在的同志踊跃发言，有什么讲什么。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表了意见。听完同志们的发言，毛泽东说：“制定政策，计划，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正确方针、政策，来源于正确地分析形势和调查研究，只有真正了解农业问题的实际，才能准确地制定出农业发展纲要，也才能起到动员群众，实现农业生产发展的目的。”^②

座谈会后，毛泽东乘轮渡过江，在武昌南站乘专列离汉。在船上，毛泽东问：有人在长江游泳吗？有人回答：长江水深流急，水域复杂、逆流漩涡多，市政府出布告，禁游长江。毛泽东听了默不作声。^③

专列到达湖南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等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478~481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65~66页。

③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8页。

往汇报。毛泽东请省委找几位地市委书记一道座谈。检查农业合作化工作，征求省、地、市、县领导对十七条的意见。

23日晚上8时，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周小舟、周惠、胡继宗、谭余保、徐启文、李瑞山、秦雨屏（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常德地委书记）、华国锋（湘潭地委书记）、陈郁发（郴州地委书记）、张振江（益阳县委书记）、张鹤亭（宁乡县委书记）等人。与他们座谈讨论农业十七条。

毛泽东说：我在杭州写了农业发展十七条，这次从北京出来，一路都在征求意见，现在看起来十七条不够，要搞个几十条，把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都规划一下，请大家发表意见，看能不能完成。今天请你们一条一条地发表意见，看能不能实现。^①毛泽东自己念，一条一条征求意见，并亲自做记录。座谈一直到晚上11点。

据参加座谈的老同志回忆：省委派车接他们去专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小舟规定，不带本子，不带材料，凭心记，凭嘴说。专列车厢会议室，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铺了白布，桌子两旁摆着整整齐齐的靠背椅。在毛泽东坐处，桌上放着一大把削尖了的铅笔，一叠稿纸，一盘中华香烟，一杯茶水。

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老式棉布鞋，慈祥可亲。毛泽东一一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学历、籍贯，并一一用铅笔记录下来。周惠通报自己是江苏浔云人。毛泽东说，那里有个云台山，是花果山，那里出了个孙悟空呵！孙云英通报姓名时，毛泽东打趣道：“你是从天空上来的呀？”接着讲了一段神话故事。《今古奇观》里有个云英，是樊夫人的妹妹，修身成仙上天而去。几句话将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初次见毛泽东的几个地市委书记那种拘谨情态全都消失了。

当张鹤亭通报自己的籍贯时，毛泽东插话道：“啊！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接着问宁乡情况：“双江口你去过吗？回龙山你去过吗？”张鹤亭答后，毛泽东又说，“回龙山我也去过，那山很高，和尚也多。我们给寺院送了对联，寺院给了我们一元光洋，并让我们宿了一晚。那里虱婆子很多，一夜没有睡好哩！”毛泽东回忆起1917年他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25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407页。



195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与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摄影/侯波）

与萧子升作农村调查的情景，继续说，“浏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转入调查。他询问周小舟：湖南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多少？周小舟回答：有60%多。毛泽东含笑说：你们主动了。周惠补充说：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原来省委规定控制在30%，现在达到60%了。毛泽东说，是农民群众推动你们吧！步子还可快一点，不仅要大力发展初级社，还要办高级社，“韶山就可以组织大社试试”。

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如何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上了。毛泽东说：“农民组织起来后，合作社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看是否增产。要抓经营管理，管理好才能增产，增产了才能巩固。评工记分，要发扬民主，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歧视妇女劳动。”张鹤亭请示道：我在宁乡县珍洲农业社劳动模范王国华那里调查，看到农民组织起来后，农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有剩余。毛泽东反问道：“怎么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呢！”张鹤亭答：“精耕细作。”毛泽东赞扬说：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出路，是个好办法。毛泽东边谈，边取出1955年12月7日的《湖北日报》

说：“你们看看王任重写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人民幸福的新生活》一文吧！他有一些设想呵！”

随着毛泽东的提示，省委副书记胡继宗谈了湖南农业发展方面的设想，也谈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状况，讲得有条有理。毛泽东表扬道：你有学问，懂得讲科学种田，像个知识分子。在听取省地市县同志的简要汇报后，迅速转入商讨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毛泽东逐条逐句地念，念一条，讨论一条。当讨论到“四、五、八”的奋斗指标时，毛泽东问：“湖南再过12年能不能达到亩产800斤？”周惠答复说：没有特大灾害，按现在发展速度能达到。胡继宗说：深耕细作，改良品种，扩种双季稻，多种绿肥，防止病虫害，小密植，晚稻躲过寒露风，修好水利，是可以达到的，也许不要12年就可以达到。大家又补充了许多增产条件、措施。毛泽东听了喜笑颜开，说：粮食指标就这样定了，到那时，我国的粮食就不紧张了，工业化也有了基础。

讨论到“除四害”，毛泽东提出：乌鸦要不要消灭，麻雀要不要消灭？狗要不要消灭？周小舟说：狗有两重性，一是看家，二是咬人。消灭它，群众会有意见。毛泽东同意这个看法，在草稿上将“狗”字删去了。经过热烈争论后，毛泽东说：乌鸦有害有益，可以将功折罪。麻雀吃谷子，大家都知道，给它划入“四害”内，也不冤枉，多数赞成。麻雀嘛，意见不一，有人说是害鸟，有人说是益鸟，麻雀吃虫子，有保护庄稼作用，在座的都没有解剖过麻雀，难于说服人，但可以保留意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嘛！毛泽东富有风趣地作了裁判。老鼠、苍蝇、蚊子，是世间公认的百害无益的害虫，消灭它，众所赞成。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三年消灭这些东西，参加座谈者都觉得操之过急，难于实现，甚至是一种幻想。孙云英爽直地说：“洞庭湖水面大，蚊子多，三年消灭不了。”毛泽东当即在草稿上，改为“基本消灭”。

商讨一直到晚上11时。^①

24日，毛泽东与省、地、县负责人继续交谈。据华国锋回忆：毛泽东这次谈话强调调查研究，包括农业合作化进度、增产条件、兴修水利、垦荒造林、医药卫生、除四害、扫文盲等。毛泽东还询问了湖南的地方疾病情况。华国锋突出地汇报了血吸虫病。当年岳阳黄沙街的血吸虫病最厉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8~41页。

害，死了很多人。除了积极治疗晚期病人外，政府还采取了许多防御措施。第二种地方病是草虫病。湖南有一个镇流行草虫病，华国锋把标本给主席看了，并说开始用草药治疗，效果不大，后改为铊剂。第三是钩虫病，宁乡较多，有脚肿症状。第四种是疟疾。“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是蚊子传染的疾病。毛泽东时而插问，时而速记。后来他把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血吸虫病，都写入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央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南方十三省也分别建立了该组织。湖南是谭余保为组长，唐麟为副组长。^①

当日晚上，毛泽东在蓉园一号设便餐宴请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听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的意见。周小舟陪宴并参与听取意见。毛泽东再次赞扬程潜、章士钊在历史上的作用，期望他们在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方面多做工作。同时再次叮嘱周小舟：省委第一书记要抓统战工作，尤其湖南应摆在首要地位。席间，周世钊谈到一位老教师原湖南一师二班学生彭庆鋈，年老体衰，生活困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程潜猜测到了毛泽东的心思，连忙说：“这事交给我去办，不要主席费神。”不几天，彭庆鋈安置在湖南文史馆任馆员，解决了生活来源。毛泽东回京后，又从自己的稿费中寄去了200元。^②

当天夜里，专列离开长沙，途经江西，毛泽东与当地领导座谈。

25日，专列抵达杭州。毛泽东并没有在杭州停留，而是赶去上海，约陈毅参加对农业十七条的修改。

专列到上海，当时陈毅正在参加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接见了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毛泽东对上海制笔公司副经理汤蒂因说：“啊！你就是‘金笔汤’！”他对汤蒂因说，“你要做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啊！”^③

毛泽东在上海做短暂停留后，返回杭州。

26日，毛泽东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作了修改和批示：“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即送刘、周、陈、彭真阅后，由你处理。”

① 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7~38、41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365、425页。

经毛泽东修改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潮流是这样地勇往直前，以至一再地超过了任何最乐观的估计。成万万的农民涌进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完成。”^①

27日，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

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零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482~483页。

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①

通过一路的座谈，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在杭州召开 16 省领导人会议，进一步探讨农村社会主义发展规划问题。

30 日，毛泽东给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写信：

周、刘、陈、彭各同志：

社论写得很好，陈伯达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

我已约陈毅、柯庆施二同志来此，先行商量一下，准备一月五日开会的事情。陈云同志病情如何？不知一月四日能来此否？如未愈，则不要来。谭震林、廖鲁言请通知他们于三日或者四日来此。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一月四日到达杭州，准备于五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

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同志。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②

31 日，陈毅开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当夜就赶到杭州毛泽东的住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卷，第 484~487、576 页。



1955年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按语。（摄影/吕厚民）

处。两人先谈了一个多小时，共进晚餐。毛泽东委托陈毅参加对十七条的修改。

1956年1月1日元旦，毛泽东到上海。在上海市委领导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邀请陈望道等几位著名人士共进午餐。毛泽东对陈望道说起，自己最近又读了他著的《修辞学发凡》一书，称赞说：“写得很好，就是古代的例证多了一些。”又关切地问他，目前是否仍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说，“现在许多人写文章就是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①

当晚，毛泽东返回杭州。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毅留在杭州做会议的准备工作。上午陈毅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下午安徽曾希圣、江苏刘顺元到杭州，陈毅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晚上，陈毅到毛泽东处，又同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曾希圣和刘顺元同去。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425~426页。

2日，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组织对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改。

这天，周恩来就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事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

月初，由郭沫若任团长的赴日科学代表团回国九名团员，其中七名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他们。^①

3日，几个省的代表都赶到了杭州，毛泽东召集他们开会，讨论《农业十七条》。实际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笏、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25人。

4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增加为22条。

5日上午，《农业发展纲要》的起草修改工作到了最后阶段，陈毅和



1956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教育家陈望道。（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3页。

省委书记们继续研究有关条文，完成最后的准备。

1月5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会议。

5日上午，毛泽东对新写成的《农业发展纲要》条文进行了审议，提出了很多增删意见。下午开始开会。

在北京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主席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委书记的会议，到会的有：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上海局柯庆施和现在上海的陈毅同志也去了。由北京去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罗瑞卿等同志。据电话讲，下午3时30分即开第一次会议。^①

当晚，陈毅和廖鲁言等改定了题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当即付印。

6日，杨尚昆日记记载：因报告尚未准备好，原定10号召开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会议，经请示主席后改为13号。因电话通知各省市已来不及了，大多已经动身。主席处的省委书记会大约10日可以开完，对农业规划议定了30余条。^②

7日前，《纲要》（草案）增加到36条。

7日，在《纲要》（草案）的铅印件上，根据毛泽东前一次批注的意见，增加了有关青年的一条，并加写了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一条，共38条。

8日凌晨2时，毛泽东就《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

①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第220~221、222页。

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来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二时

有些指标数字尚待填入的，待廖鲁言同志回京后，查明填入。^①

8日，《纲要》（草案）的铅印件上，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两条，成为40条。

9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53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将未改的52本加以改正。

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得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2页。

我拟于今晚十时动身返京。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上午四时

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一月九日），在这一稿上，毛泽东写有：“送周总理。其余各本，请照此本改正。毛泽东。”^①

9日上午，“纲要四十条”，正式作为草案供政治局审议。杭州部分省委书记会议结束。

下午17时，刘少奇在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纲要（草稿初稿）》，讨论后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用长途电话报告了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9日晚10时，陈毅陪毛泽东返京。当晚到上海。

抵达上海后，陈毅

陪同毛泽东在南京西路的上海展览馆接见了文化教育界的40多位代表。赴日科学代表团中未去杭州的两位苏步青、冯德培也得到了补见。毛泽东握住苏步青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接见后，大家在一个圆桌旁就座。毛泽东讲了近一小时的话。

讲话后，服务员上酒上菜忙个不停。罗瑞卿、陈伯达也同桌就坐。许多同志纷纷向毛泽东敬酒。^②



1956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数学家苏步青。
(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2~3、6页注。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13~114页。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柯庆施、荣毅仁陪同下视察上海申新九厂。
(摄影/吕厚民)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视察。(摄影/吕厚民)

第二天，毛泽东在陈毅、柯庆施、荣毅仁陪同下视察申新九厂，毛泽东向荣毅仁了解了该厂公私合营以后工人的生产、生活及劳资关系情况。

然后，又视察了上海江南造船厂，参观了我国正在制造的第一艘潜艇。

当天晚上，上海各界民主人士 70 多人参加欢迎毛泽东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工商界人士大多是以前没有参加过毛泽东接见的，毛泽东向与会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召集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谈（参加座谈的有胡厥文、荣毅仁、胡子婴、刘靖基等）。（摄影/吕厚民）

人士号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会后，一些工商界人士谈道，毛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时来到上海，胜过十万大军。^①

11日，毛泽东离开上海。

早上，专列抵达南京。

8时许，毛泽东视察了紫金山脚下的红光农业社和栖霞镇的十月农业社。

位于紫金山脚下的红光农业社的社员刚上工，几辆小汽车开来，到村口停下。毛泽东下车向村里走来。

毛泽东与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孙其金亲切握手，笑着问：“你是社长？叫什么名字？”孙其金一一回答。毛泽东又指着挖塘泥的社员问：“那边的人在忙什么？”孙其金向毛泽东介绍，这个社原来是种粮食的，现在改种蔬菜，社员们正在挖塘蓄水，准备浇菜地用。毛泽东迈步走上田埂，朝着挖塘的社员走去。到塘边，女社员徐淑贞正从塘底挑泥上来，从毛泽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366页。

东身边经过，一抬头，认出了毛泽东，她激动得怔在那里。毛泽东亲切地问徐淑贞：“你们挑塘泥做什么用？”

“挑塘泥又能积肥，塘里也能盛水更多。”徐淑贞赶忙说。

毛泽东连连点头夸奖：“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向孙其金提出了几个问题。问：“你们男女社员是不是同工同酬？”

孙其金答：“女社员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就拿一样多的工分。”“女劳力一年能得多少工分？”

“二百三四十个。”

“男的呢？”

“男的能得三百三十个左右。女社员比男社员出勤少些。”

“一个劳动日能分多少钱？”

“一块五角九分六。”

毛泽东扳着指头一算，对身边同来的负责同志说：“收入还不坏。”

这时还有一些社员正在邻近的田里挥起镢头刨地，他们看见毛主席大步走过来，心情很激动，镢头挥得更快了。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微笑着点头向他们致意。

在路上，毛泽东问走在身边的社干部：“你们晓得合作社的性质是什么？”

驻社干部牛泰武回答：“是社会主义性质，按劳分配。”

毛泽东笑着说：“呵，你还是办社专家哩！”

经过一个水塘边，毛泽东问：“这塘里养鱼没有？”

“养的。”孙其金说。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毛泽东来到社员俱乐部，在门口见到70多岁的老木匠徐广连正在干活，衣衫单薄，关心地问：“你冷不冷？”

“不冷，不冷。”老徐连连回答。

毛泽东走进俱乐部。看见橱子里有着不少书籍，桌子上还放着锣鼓、胡琴等乐器，便高兴地抽出一本书来翻看，又仔细地把它放好。在俱乐部的另一个房间里放了不少课桌，陪同人员向毛泽东介绍说，这里是农民夜校。毛泽东关切地说：“要注意防寒，不要冻着大家。”毛泽东见教室的墙上贴着份名单，就问这名单做什么用。社员们告诉他：这是冬防值班名单。社里养了很多猪，怕夜里狼来吃猪，所以组织社员看夜。陪同毛主席参

观的一位市委负责同志插话说，1953年，有一只狼窜进南京城，吃了一个小孩。毛泽东说：“呵，野狼闹了南京城，这还得了！你们要搞好预防，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呵！”

出了夜校，毛泽东又来到村办的养猪场，有四个女社员正在清扫猪圈。毛泽东推门进去，青年社员孙桂芳一眼认出了毛主席，惊喜地迎上前说：“毛主席，您好！”毛泽东笑着向她们伸出温暖的大手，亲切地和她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见猪圈里小猪依偎着卧在一起，风趣地说：“你们看，这猪仔好团结哟！”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毛泽东见猪场里的猪长得肥肥的，称赞社员养猪养得好。

临上汽车前，毛泽东同孙其金等人在农业社的办公室前合影留念。还紧握着孙其金的手良久，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许。

半晌时分，毛泽东离开玄武湖乡红光农业社，又来到了栖霞镇的十月农业社。当毛泽东出现在十月村的村头时，社里的两位少年飞跑着过来迎接。

毛泽东一左一右地拉着两位少年的手，朝村中走去。见到社长何昌椿，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今年多大了，入党了没有，这里什么时间土改的，土改以后农村的变化怎么样？何昌椿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办社的情况，何昌椿说，这社是他们自发办起来的。毛泽东边听边高兴地笑着，用洪亮的湖南口音说：“办社就是要群众自愿，群众愿意办，你们干部又肯带头办，就能办好啰！”

毛泽东察看了十月村南面的土地。当时的田垄高一块低一块的，零碎而又贫瘠。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同志说：“这里要把土地平整好，将来还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他环顾四周，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那里有没有栽树呀？”

“新栽了一些桑树。”何昌椿回答。

毛泽东说：“走，我们去看看。”

毛泽东走上山顶，眺望十月村远近的农田和周围的几个山头，挥动起右手，对在场社员和干部说：“把四周的山都种上树多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地变良田。”

毛泽东又来到社员吴帮林家。吴帮林大早起来为合作社进城拖粪肥，这时，刚回到家，便迎上前去热情地说：“请坐，请坐。”

“你家人社了吗？”毛泽东笑着问。

“入社了。”吴帮林回答。

毛泽东详细询问吴家的生活情况，进屋看了粮囤，看了腌好的咸鱼、咸肉。吴帮林乐滋滋地说：“现在我家能吃上两顿稀饭一顿干饭了。”毛泽东走到灶边，看了看锅里，果真是煮的干饭。吴帮林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托毛主席的福啊，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年终还分了几十块钱。”

吴帮林老两口眼睛不好，当时没有认出毛主席。在毛泽东离开他家后，邻居前来告诉他们，刚才来的客人就是毛主席，老两口急忙追出门外，久久地望着毛主席离去的方向，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毛泽东来到新办的夜校，看见桌子、凳子都是用土坯垒成的。社干部汇报说，合作化以后，这里的干部、社员对文化知识的要求十分迫切，为了满足大家学习文化的需要，就因陋就简地办起了夜校。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们勤俭办学很好！”

毛泽东又来到社里的牛房，看见牛房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社员把牛养得膘肥体壮，他满意地点点头，鼓励饲养员吴帮忠说：“你养牛养得不差嘛！你这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干！”又说：“今后办农业社要注意两条：一是增加生产，二是不死牲口。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搞好农业的重要生产工具！”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尧辰乡十月农业社视察。（摄影/吕厚民）

社员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跑过来，围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微笑着，不断向社员们挥手致意。

一群下课的小学生，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天真地喊着：“真是毛主席，真是毛主席！”毛泽东听了，朗声笑着，拉起孩子们的小手，抚摸着他们的脸颊说：“这可不能是假的啊！”

一位双脚沾满河泥的青年妇女跑过来，拨开人群，挤到主席跟前。毛泽东向她伸出大手，她两眼的泪珠扑簌簌地滚落出来。这个旧社会的童养媳，从心里掏出一句最真挚的话：“毛主席，你老人家好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余福珍！”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余福珍的劳动情况和生活情况。随后，毛泽东指着身边的何昌椿问余福珍：“你认识他吗？”

余福珍笑着说：“认识，他是我们的社主任。”

“他的工作怎么样？”毛泽东又问。

“好，他带领我们办社。”余福珍答道。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说：“你们社员都说好，就好嘛！”

上午10点多钟，毛泽东向社员群众告别。临上汽车，毛泽东还殷切地嘱咐社干部们说，你们要努力把合作社办好，过几年我再来看你们。^①

上午10时许，毛泽东又来到南京无线电厂。厂党委书记、厂长槐亚东等连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随后，毛泽东在罗瑞卿等和南京市负责同志彭冲等陪同下，视察了工厂。

毛泽东首先来到机器轰鸣的一车间（工具车间）门口，他老人家欣然摘下帽子，脱去大衣，健步走进车间，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正在操作精密镗床的工人吴展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毛泽东细心地观看着精密镗床，关心地问：“这台机床是哪个国家制造的？”陪同参观的总工程师李奉贤回答：“是外国的。”毛泽东说：“哦，我们自己还不会造！”又说，“这是一部的事。”（一部指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位工人向毛主席汇报说：“据说上海已经能制造了。”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能制造就好了。”毛泽东仔细观看正在进行的划线工作，问正在操作的吴展兴：“这是干什么？”吴展兴向主席汇报：“划线。”主席仔细看了以后称赞说：“真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33~39页。

行！在钢板上画花。”

毛泽东来到镗床边，工人刘和太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最快的速度把尺寸计算好，工具定位好，按动电钮，刀具急速地旋转，铁屑像银龙一样地从屑槽里飞旋出来。毛泽东问，操作这样的机床要多高的技术等级？正在操作的工人是什么文化程度？是几级工？每月工资多少？工厂负责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刘和太把孔镗好，毛泽东认真地看了看，热情赞扬说：“很好！很好！”离开镗床车间时，毛泽东转身向工人们挥手告别：“麻烦！麻烦！”

毛泽东来到车床工段，女职工李琦看见毛主席向自己这边走来了，激动得两眼含着喜悦的泪花。毛泽东关切地问：“女同志做机床吃得消吗？”李琦回答：“不累。”毛泽东看到李琦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关心地问：“做的什么东西？”李琦报告：“车模子里的小冲头。”接着把图纸捧给毛主席看。就在毛泽东伸手接图纸时，摄影记者拍摄了这一极其珍贵的镜头。毛泽东看过图纸后，将图纸放回原处，图纸没靠牢，倒了。毛泽东又伸手将它放好。李琦把车好的零件送给毛主席检查，毛泽东看着这又小又光的零件，高兴地说，“很好！很好！”

接着，毛泽东在姚泰珊的车床旁停了下来，仔细地观看姚泰珊的操作。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摄影/吕厚民）

小姚有些紧张，把车速开得飞快，对工件进行砂光。第一次砂好后，他用环规一量，大了，套不进去。毛泽东亲切地说：“紧了！”小姚将工件又重新砂了一次，再量，还是嫌大。小伙子头上渗出了汗水。毛泽东鼓励说：“再来！”小姚尽力控制内心的激动，使自己平静下来，仔细进行第三次砂光，终于使工件完全合乎规格要求。毛泽东颌首微笑，向姚泰珊祝贺说：“胜利了！成功了！”

离开车床工段，毛泽东走在过道上。这时青工李孝平躬着身子正要从地上把一块大约50斤重的工件往钳台上搬。毛泽东看到后，立即卷起袖子，抢步来到小车身边蹲下，要帮小李搬工件。旁边的一位老师傅见了，连忙把主席扶了起来。旁边的同志一起动手，帮小李把工件抬上了钳台。工件放好后，毛泽东亲热地拍拍小李的肩膀问道：“你多大了？”小李回答说：“19岁。”毛泽东关心地嘱咐说：“年纪还小，下次搬重的东西要两个人搬。”

在磨床上工作的年轻女工焦秀玲是个急性子，她抑制不住兴奋的感情，情不自禁地说：“毛主席怎么不到我这里来呀！”不知毛泽东是否听到了，但他老人家转过身来，来到了焦秀玲的磨床边。小焦如愿了，她连声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向焦秀玲微笑着招招手，问：“这是什么机床？”厂总工艺师刘世骅回答：“是磨床。”毛泽东亲切地问焦秀玲：“你在磨什么？”小焦向毛主席汇报说：“磨的是条槽子。”毛泽东仔细地看了凹进砂轮的工件说：“哦！是一条沟。”小焦激动地答道：“喂！”又继续紧张地操作着磨床。毛泽东关心地问：“女同志吃得消吗？”总工艺师回答说：“女同志吃得消。”毛泽东关切地问焦秀玲：“你有眼镜吗？”她连忙回答：“有！有！”毛泽东叮嘱说：“要戴眼镜呀！”砂轮在飞旋，工件在前移。毛泽东问：“还有多少时间才能加工好？”焦秀玲连忙说：“快了！快了！”当她把工件磨好后，毛泽东鼓励说：“胜利了！”接着他老人家拿起亮光闪闪的工件仔细看着，夸奖说：“很好！”并伸出大手向焦秀玲表示祝贺。

毛泽东离开一车间时，向全车间的工人们挥手告别，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同志们！”

到了四车间（原组件车间），时间刚过11点，毛泽东向工人同志们挥手。车间主任陈奉桂连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听陈奉桂的介绍，很快听出这位车间主任满口的湖南话，便问：

“你是我的老乡吗？”陈奉桂回答：“是！我是湖南人。”毛泽东高兴地

伸出手，和陈奉桂亲热地握手。

毛泽东看到这个车间里工作的同志都很年轻，就对陈奉桂说：“这些同志看来只有十七八岁。”陈奉桂立即汇报说：“是的，这些都是刚培养起来的青年工人。最大的不过21岁，是个班长。”毛泽东问陈奉桂的年龄，当听说他只有27岁时，高兴地微笑着说：“很年轻，好好干！”

11时30分，毛泽东来到五车间，仔细地观看了一部崭新的收音机。厂党委负责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解放几年来工厂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个修修配配的烂摊子，发展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设计制造并能大量生产多种军用和民用无线电产品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当毛泽东知道这些收音机和里面的零部件都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时候，他老人家十分高兴地用手抚摸着崭新发亮的收音机，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在经过流水线时，主席指着一个个纸包问大家：“这包的是什么？”工人们回答说：“这是加工好的零件。”毛泽东指着上面写了一个“毛”字的纸包，风趣地问：“这是送给我的吗？”同志们说：“这零件是谁加工的，就在纸包上写上谁的姓。”毛泽东指着这包零件诙谐地说：“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呢，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同志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11时40分，毛泽东来到了广场上，这时大楼前已聚集了许多人，楼窗也打开了，人们在楼上楼下一齐鼓掌欢呼。毛泽东频频挥手，向欢呼的人群微笑致意。然后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去。^①

下午3时，毛泽东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军事学院。

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率院、部、系领导和各教授会主任迎接毛主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经刘伯承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当刘伯承介绍到曾在抗大当过教员，现任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

在介绍到战史教授会主任方正时，毛泽东说：“你是方正，不但要方，还要圆，没有方圆不成规矩嘛！”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25~30页。

毛泽东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勉励大家在刘伯承院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好。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视察南京军事学院。（摄影/吕厚民）

接见完部、系领导，毛泽东又在

大礼堂亲切接见全体学员。他们中间有杨得志、韩先楚、刘震、陈锡联、李天佑、廖汉生、张震、吴克华、杜义德、张翼翔、李成芳、罗元发、黄新廷、陈先瑞、刘忠、贾若瑜等著名将领。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总结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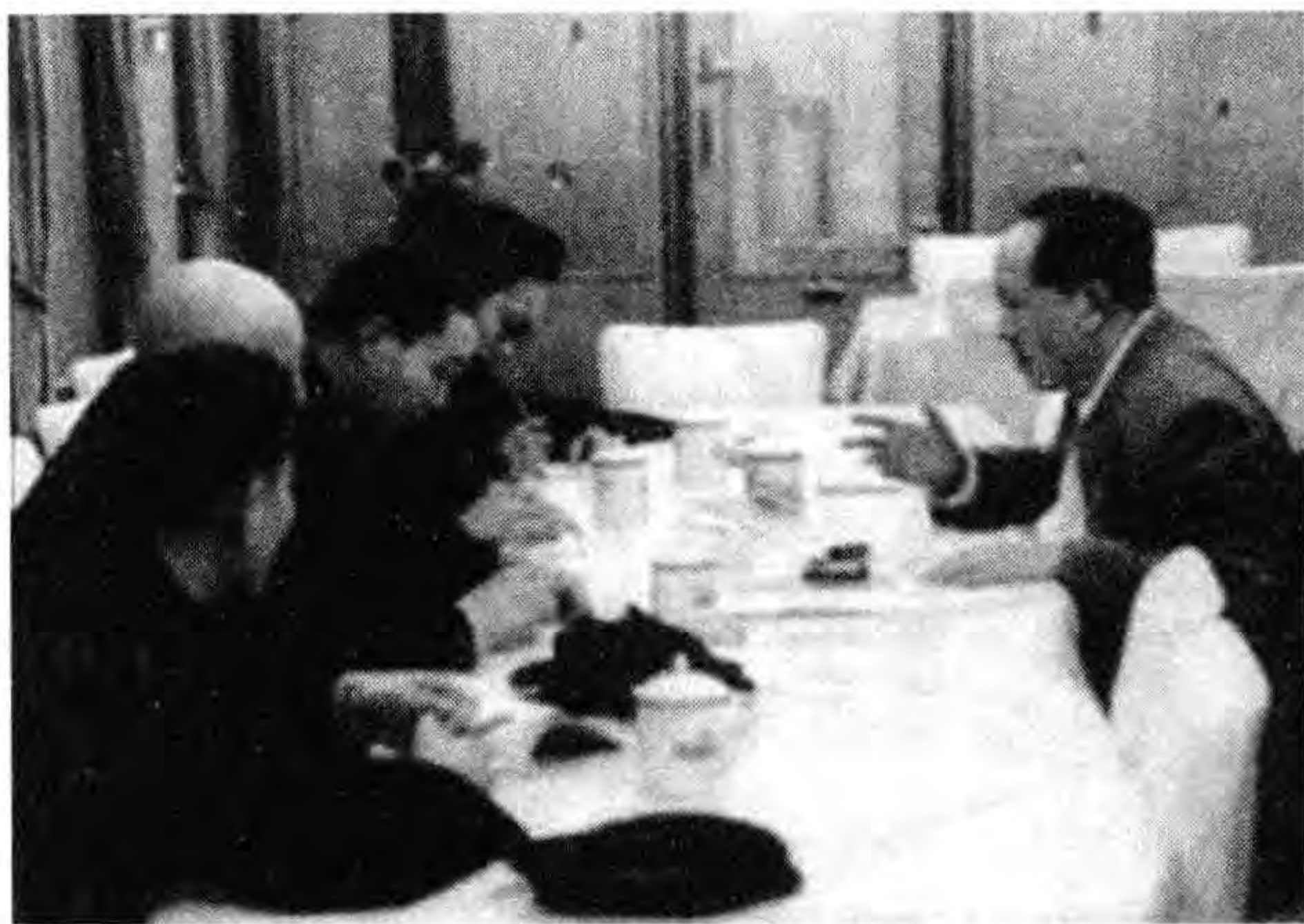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好的室内游泳池时，随即提出要到游泳馆游泳，并在这里愉快地游了一个多小时。休息时，他和刘伯承等领导同志谈笑风生。毛泽东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①

视察完军事学院，毛泽东到北京东路南京市委机关大院，接见了正在参加中共南京市第四次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出席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南京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代表200多人。毛泽东说：“让我们共同开辟社会主义大道。”^②

下午，毛泽东结束了在南京的视察，在陈毅的陪同下离开南京北上。

在经停站和行进途中，毛泽东还不断与各地同志谈话，征求对农业发展规划的意见。

① ②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105~107、140~142页。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我见到了毛主席》第250~251、252页。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地方领导。
(电影资料)

12日，专列途经天津。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视察了西郊王顶堤村。

村干部示意让群众闪开一条路，将毛主席请到村办公室。这里条件简陋，只有一张长方桌和两条长板凳。毛泽东刚坐下，南郊区白塘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吉顺

赶来，毛泽东同李吉顺亲切握手，并请大家都坐下。毛泽东指着站在门口的杨起发问：“你领导什么？”杨起发说：“我管生产。”毛泽东同他握握手，又指徐茂起说：“他负责什么？”书记介绍说：“他是村长，他身边的陈玉兰是村团支部书记。”毛泽东点点头，用手指点着说：“支部书记、村长、团支部书记、妇女队长、民兵队长，好！你们这是农村五大领袖，怎么还差一位？”书记赶紧派人叫妇女队长徐茂芬来。毛泽东问：“你多大了？”徐茂芬说：“24岁。”毛泽东看徐茂芬这么年轻便关切地说：“你领导老太婆行吗？”徐茂芬说：“能行。”毛泽东又拿起桌子上的报纸问：“能看报吗？”徐茂芬说：“能看，现在正上识字班。”毛泽东点头说：“好，好。”

毛泽东问：“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口人？”徐茂起回答：“365户，2000多口人。”毛泽东又问：“怎样计酬？”徐茂起回答：“记死分。”毛泽东问：“合理吗？”徐茂起回答：“不合理。”毛泽东又问：“不合理怎么办？”徐茂起回答：“现在改为‘死分’活记，就是干完活评分，根据干活多少、干活的质量，大家坐下来评，有记工员记分，就是时间长点。”毛泽东说：“这样比较合理。”毛泽东又问：“村里有多少地？”书记回答：“村里土地比较多，主要是稻子、苇子、鱼、藕、韭菜五大产品，荒地种苇子，水里养鱼、栽藕，洼地种稻子，高地种韭菜。”毛泽东接着问：“收入高吗？”书记回答：“收入不低，一个劳力一天收入三块多钱。”毛泽东又问：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与合作社干部交谈。（摄影/吕厚民）

“搞合作社有困难吗？”书记回答：“没有困难。就是富裕中农不愿入社。”毛泽东又问：“为什么？”书记回答：“他们的土地好，劳力多，农具齐全，入了社怕吃亏，他们还想跟合作社竞赛呢，他们暗地里偷偷施肥料，力图使他们的产量高。”毛泽东听了点点头。

毛泽东还询问了李吉顺南郊白塘口合作社及计酬情况，李吉顺都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和村干部们座谈了一个多小时。^①

下午2点，毛泽东视察了天津第二毛纺厂和天津示范机器厂。

黄火青市长向毛泽东介绍了厂里的领导。大家陪同毛泽东，先走进梳毛车间。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看着梳毛机生产过程，问：“原料从哪来？”刘耀珍厂长把原料生产地、来源、性能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从梳毛车间走出来，下个工序是东二楼精纺车间。大家陪同毛泽东走上楼梯。这时，刘耀珍厂长伸出手，要搀扶一下毛主席。毛泽东轻声说：“自己可以，自己可以。”他老人家迈着稳重的步子，健步走上东二楼。正要走进精纺车间，工人郑鹤举正好从门里迎面出来。郑鹤举一抬头愣住了，他局促不安地将油手在工作服上揩擦着，不好意思伸手。毛泽东看出工人的为难处境，抢先一步，将郑鹤举的油手握住了，问他：“你好！你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27页。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天津仁立毛纺厂精纺车间。（摄影/吕厚民）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天津仁立毛纺厂整理车间（黄火青、陈毅）。（摄影/吕厚民）

辛苦了！”

毛泽东来到精纺车间，车间的工人们顿时沸腾起来。毛泽东微笑着，不时地和大家招手，挨着工序察看到细纱机旁，看见一位女工正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擦钢领（细纱机的机件），毛泽东在她身边停住，和蔼地问候说：“同志！你辛苦了！”

毛泽东下楼梯时，问：“私方人员在吗？”厂里领导回答：“在。”当即由公方副厂长袁书强去请朱继圣，其余的人继续陪同毛泽东参观织呢车间。

毛泽东见到朱继圣时说：“哦！朱先生，老朋友啦！”朱继圣赶上去和毛泽东握手，热情问候：“毛主席好。”然后一起陪同参观。当走出

织呢车间的时候，看见门框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外边天冷，出去穿衣戴帽！”毛泽东指点着一字一字地念完了，满意地说：“很好！”在整理车间，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细致看完了各种呢绒成品，称赞道：“我们也能做出这样的好产品了。”当走出整理车间的时候，陈毅副总理问了一句：“朱先生，这个呢子落色不落色啊？”朱继圣忙说：“不落色，不落色。”“要在‘五反’以前可就不保险吧！”陈毅副总理幽默地随

上了一句，引得大伙儿哈哈地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你办公的地方在哪里？”毛泽东问朱继圣。朱继圣向大楼一指：“请您到里边坐一坐。”

大家随着毛主席走进办公大楼，来到朱继圣的办公室里。朱继圣让毛泽东坐在他的办公椅上，毛泽东风趣地说：“还是你坐吧，帅不离位嘛。”随即坐在一张木椅上，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英文书，随便念了几句，又问朱继圣说：“朱先生！你过去学什么的？”朱继圣坐在对面说：“在美国学经济。”毛泽东又问：“公私合营前后有些什么变化呀？”朱继圣回答道：“党和政府对仁立的公私合营非常重视，工厂里的生产、工作、人事安排等都是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毛泽东问：“生产怎么样？”朱继圣回答：“仅以毛呢纺织厂为例，合营的第一年总产值为1949年的2.4倍。”毛泽东站起来，以亲切关怀的口吻勉励大家：“加倍努力，好好工作。”

下午4点半左右，毛泽东又来到示范机器厂。毛泽东和市委书记黄火青一起下了车，同来的还有陈毅、罗瑞卿和市领导万晓塘等。厂领导请毛泽东上楼休息一下，而毛泽东却健步走向车间。

厂领导边走边向毛泽东介绍情况。当汇报到工厂已进行了一次“四马分肥”，给资本家们分了红，而资本家们还总对重工业发展慢有些意见时，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天津示范机器厂。（摄影/吕厚民）

毛泽东似乎已了解了这些情况，鼓励他们说：“你们发展得不慢嘛。”

毛泽东在车间里边走边问，时而走近机台，时而停下来观看工人操作。当走到 Su50 车床时，工人正在加工火车大轴，毛泽东很感兴趣地停下来观看，问：“这是新技术吗？”厂领导回答：“这就是强力切削。”毛泽东连连点头称赞。

毛泽东询问了产品质量情况，当时正在成批生产 Cb15 车床。厂领导向毛泽东汇报产品质量有三大问题：丝杠变形、齿轮噪音、车活不光，正在发动技术人员、工人攻关。走到磨齿机前，厂领导介绍了齿轮经过磨削后可以提高精度和光洁度，可以解决噪音问题。当看到丝杠吊挂在架子上，厂领导告诉毛泽东，现在还只是用土办法，加强时效处理，在导轨磨前看到磨削床身解决床身凹心问题，在钳案子旁看到工人正在仔细进行齿轮倒角，厂领导介绍了这些措施对解决产品质量都有关。毛泽东观看得很仔细，也很有兴趣。

毛泽东对每项技术革新和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发明创造都很认真地听取汇报和仔细地观看。当走到工具车间看到地上放的是加工直径为两米多的大齿轮所用的大滚刀时，毛泽东问这是做什么用的，厂领导介绍说这是加工大齿轮的滚刀，这种滚刀以前国内还不能生产，是厂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了一些国外数据、图片而自行设计、采用镶片办法制造的，质量很好，而且节约了大量的高级钢材。毛泽东很感兴趣，便蹲下来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在毛泽东视察的整个过程中，职工始终全神贯注地紧张地坚守在机台岗位上。看到毛泽东要离开了，工人们再也沉静不住了，立即沸腾起来，三个车间的人都拥了出来，不约而同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临别时，毛泽东和厂领导一一握手，在欢呼声中毛泽东登车离开了工厂。^①

当晚 21 时 15 分，毛泽东回到北京。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 18~20 页。

十八 到广州扩大调查

1956年春夏，毛泽东仔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之后，毛泽东又准备到各地去视察。他对当时工业农业方面出现的增产增收和群众日益高涨的生产热情非常高兴，打算到各地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工业、农业的进一步大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5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

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

北京。”^①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党的八大问题。

30日，毛泽东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接见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

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队伍。

2日上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谈《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时，毛泽东又作了结论，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日，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乘飞机外出视察，从北京飞广州。

飞机飞越长江，毛泽东将脸紧贴在窗户玻璃上，半站半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江上正在修建，已露出水面的桥墩。说：多么好看啊！

12时30分，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专机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加油。毛泽东对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下午6时，又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专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毛泽东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首次乘专机抵广州与机组和随行人员合影。（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3卷，第1227页。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白云机场与机组通信长柳昆尚握手，中为领航长张振民。
(摄影/侯波)

在广州住在小岛宾馆一号楼。

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

晚上，毛泽东在广州召集陈云、陶铸开会。会议开至翌日凌晨1点。

11日，周恩来在北京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这个月内，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再次就解决定得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交换意见，并指导起草预算报告稿。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①

5月中旬，在离京之前，毛泽东选派了家在不同地区的26名警卫战士，让他们回家，一边探亲，一边帮助他调查各自家乡农村的情况，4月23日出发，限期归队汇报。回家探亲的战士5月13日纷纷回到北京，又即刻赶到广州向毛泽东作汇报。毛泽东利用晚上时间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有时还把战士们找来细谈。他和战士们一起讨论，经常谈到深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3卷，第1227~1228页。

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通知说：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

汇报的内容有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农、林、水；财政金融；干部（即教育工作）；统一战线安排；反革命分子安排；失业安排；少数民族问题；其他特殊问题，共十一项。

通知说：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①

5月19日以前，广东省和广州市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广东省委提出：广州毗邻香港，是否可以吸收香港游资，弥补国内外汇和建设资金的不足。毛泽东表示：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完全可以利用，如果办一个轻工业厂，不出两三年就能赚回一个工厂，再把钱还给人家。^②

5月19日至20日，湖北省和武汉市王任重、张体学（省长）、王延春（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宋侃夫（武汉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16~117页。

② 吴晓梅：《毛泽东视察全国纪实》第68页。

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以取消。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①

毛泽东在听取广东汇报后，提出要专门了解广东发展渔业和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21日，他在陶铸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广东水产馆。他仔细地观看了南海水产资源分布图和各种海产品及标本。他说：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②

5月21日至25日之间，由湖南汇报。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偕同于明涛、徐羽、尚子锦、杨第甫组成汇报组赴广州。同时听取各省汇报的有彭真、谭震林等。

湖南这次主要汇报了1956年至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湖南工业、手工业以及当时突出需要请示的问题。谈到工业时，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中国，就只有一个鞍钢！各省是不是也可以办钢厂？一个省要有几个大厂做骨干，把小厂带动起来。他联系武钢的情况说，一个大厂可以一个东西为主，还可以搞点其他。大工厂可以带几个孩子。湖南是否办一个年产20万吨的钢铁厂？你们去研究。当听到醴陵瓷厂是由许多家庭手工业个体户联合起来的，原料、加工都有不少矛盾时，毛泽东插话说：在我国，农业是大洋，手工业是大海，必须慎重处理。我们不能超越这个现状。又说，一万年都有手工业，譬如用牙齿吃饭，你总得用牙刷，生产牙刷的手工业就存在。国营、私营、集体、个体，个体与个体都会有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怎样解决，靠大家去摸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19页。

^② 曹希岭、姚植传、张文海：《毛泽东出巡纪事》第90~91页。



1956年5月21日，毛泽东参观广东农业生产展览会。（摄影/侯波）

听取农业汇报时，毛泽东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究竟走什么道路，值得探索。苏联是先工业化，后合作化，我们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合作化后如何处理工业农业的关系，还没有解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无疑的。但是建设工业需要资金，需要原料，需要市场；还有城镇居民、工人要吃饭。这要靠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才能解决。我们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工农业并举，适当地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湖南是农业发展较快的省份，醴陵县种植双季稻的经验在长江以南各省正在推广。“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农业的好坏，对全国有很大影响。你们要宣传好《农业发展规划纲要四十条》，把农业搞上去。

正在汇报中，陶铸进来了。他介绍了广东的典型事例，对湖南很有启示。

毛泽东说，看来，省与省之间要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①

5月26日至28日由广西自治区和江西汇报。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43~44页。

29日，毛泽东视察了广州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械厂。视察后游珠江，从白鹅潭至海角红楼。

毛泽东这次在广州共住了27天。召开了20次会议，先后听取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五省汇报工作29次。专门研究这五个省的工作。在广州期间下珠江游泳12次，到越秀山游泳场游泳七次。

毛泽东不满足在珠江游泳，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都坚决反对。毛泽东指示：先派人去试试水性。于是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受命考察。他在沿江作了一些询问，没有下水就回来汇报说长江不能游泳。毛泽东再派副卫士长孙勇实地考察。孙勇游一趟回来，报告说“完全可以游”。于是，王任重赶回武汉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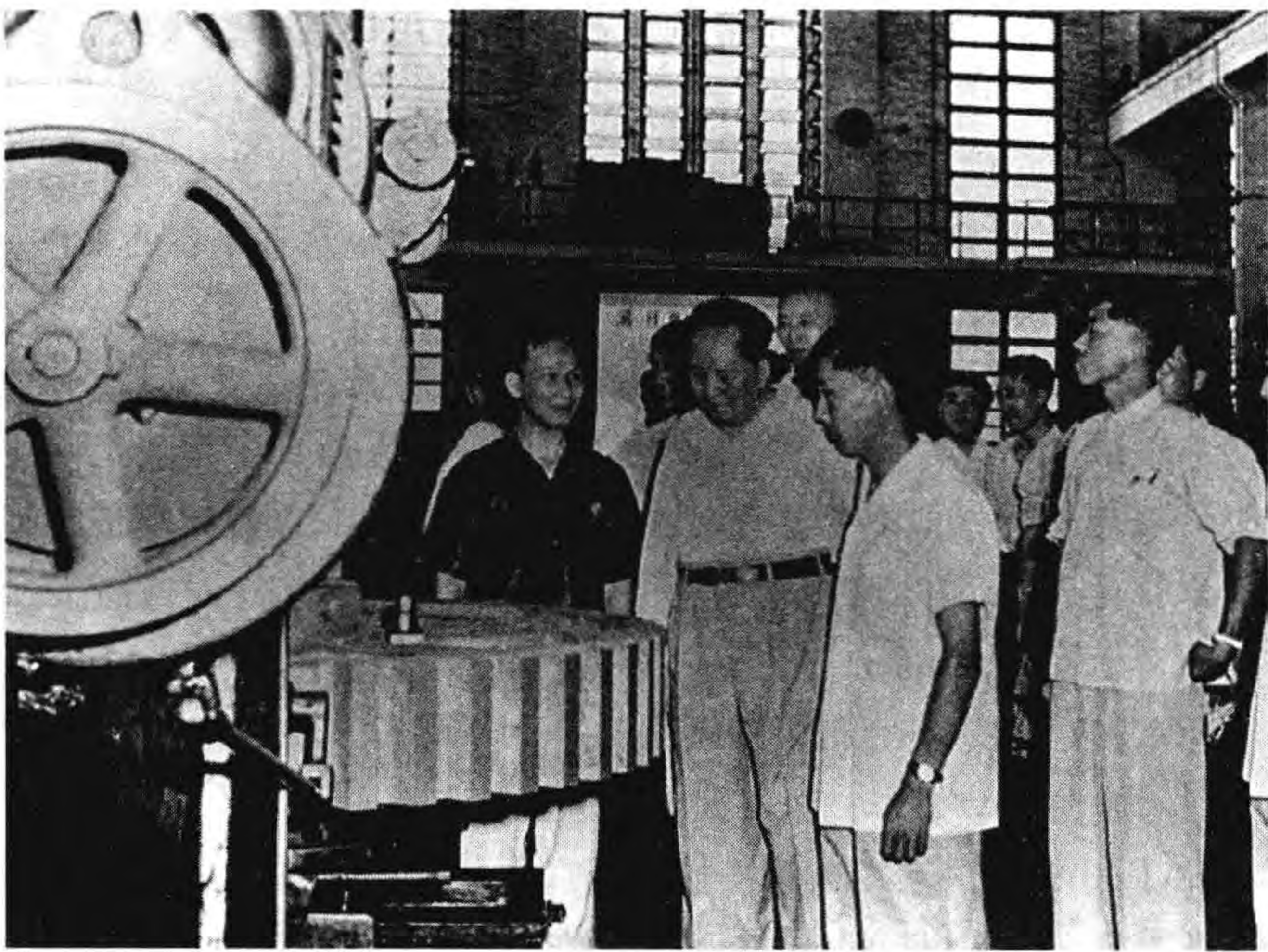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结束广州之行时对陶铸说：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①

30日上午6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广州去长沙。随机的有罗瑞卿、杨尚昆、张耀祠、汪东兴、叶子龙、杨德中等八人，其余人员则乘火车。



1956年5月29日，毛泽东在广州造纸厂向工人询问工厂情况。（摄影/侯波）

^① 曹希岭、姚植传、张文海：《毛泽东出巡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93页。



1956年5月29日，毛泽东视察广州通用机器厂。（摄影/侯波）

毛泽东走出机场，乘坐停泊在机场附近的湘江内的一艘汽轮巡视湘江。毛泽东触景生情，吟诵出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毛泽东在船上与湖南省委领导同志交谈。午餐后，毛泽东稍事休息，约1点更衣，从猴子石下水畅游到水陆洲后登岸休息。毛泽东身披浴巾，向正在洲上种菜的菜农走去，和他们交谈。半个钟头后回到汽轮上，驰向东岸。由程潜陪同游览了烈士



1956年5月，毛泽东离开广州时在白云机场与工作人员合影。（摄影/侯波）

公园，瞻仰了烈士塔、纪念亭。

晚上，毛泽东住在蓉园。这次毛泽东到湖南，听取了省委负责人周小舟、胡继宗、谭余保、周惠和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汇报。

31日早上7点20分，毛泽东乘飞机离开长沙到武汉。飞机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

随行的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刘亚楼、江青。湖北省领导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李尔重在机场迎接。

毛泽东在机场看到有一座他的大型塑像，满脸不高兴，对王任重说：“一定要搬掉，不然惟你是问。”^①

毛泽东从机场出来，直接登上停在长江的“武康”号轮船。在船上和省、市、武汉军区的领导见了面。接着听取了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的汇报。

轮船徐徐前进，近处，长江大桥工地，热火朝天。

“武康”号轮到了汉阳晴川阁附近水面，彭敏请示毛泽东：“是水上看？还是岸上看？”毛泽东说：“水上看。”在船上，可靠近工地，更清楚地看到汉阳岸边露出水面桥墩的脚手架。

“武康”号轮，在大桥二、三号桥墩和三、四号桥墩中穿行。装吊工、范本工和钻探工在离长江面20至30米高的架子上操作，潜水工人不时潜入水中作业。桥墩周围是宽大的工作平台和安全钢绳，建设者在这里上上下下紧张地忙碌，钢梁正在向江中心延伸……

毛泽东望着正在施工的工人，频频招手。

在船的甲板上，毛泽东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武汉军区的领导一一握手后，听了彭敏的汇报。他听得专心致志，非常认真。令毛泽东高兴的是大桥用的钢梁杆件，都是新中国自己制造的。

彭敏详细地汇报了中苏建桥专家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

毛泽东赞道：“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人西林发明的，他们不敢用，我们敢用，证明是成功的。”“困难中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但他对汇报中提到的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说法不以为然。假如美国采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9页。

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他说：“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而劳动方法只是科学不科学。”

王任重说：“劳动方法和社会制度不应该混为一谈。”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翻阅资料，还不时地提问。他说：“要在建桥中培养上百个建桥工程师。”“我们的任务是要建成，学会。”

毛泽东又问：“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多大年纪了？在哪里做？”

“茅以升，罗英。”彭敏回答。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

杨尚昆问：“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给他解释：“就是岩石上的沙层。”并问彭敏：“是不是？”

彭敏说：“是。”

毛泽东关切地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潜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

彭敏详细地做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为什么铁路 1957 年 10 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

“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路即可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要有一段时间铺路面。”彭敏回答。

“长江还要修几个桥？”毛泽东问，但没有人回答。毛泽东自己回答：“将来长江再修上 20 个、30 个桥，黄河上也修几十个，到处都能走。”^①

中午，毛泽东在船上吃饭，东湖客舍厨师杨纯青为毛泽东准备了四菜一汤。

下午 2 时，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

毛泽东说：“经常游泳的好处多得很哩！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接触各方面的人，是了解社会情况的好时机，又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兑现了他在飞机上对罗瑞卿、汪东兴、刘亚楼等人的许诺，在江中示范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

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到汉口湛家矶才上船，时间两小时零五分，共游了 30 里。^②

① ②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 57~60、61~63、99 页。

晚上8时，毛泽东到武汉歌舞剧院看文艺演出。

这次，毛泽东在湖北，叶子龙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边需要一个人，帮主席做点资料工作。主席的意思是要一个本地人。”

王任重决定叫梅白去。梅白当时

是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开会有个习惯，就是不要秘书参加。他对罗瑞卿说：“罗长子，你不要搞神秘主义，妨碍我接近群众。”又对梅白说，“小梅，你来我身边，我高兴。但不要什么研究研究，审查审查，要随便。”

毛泽东又说：“不要秘书参政，更不要秘书专政。你到我身边来，不能干扰我，你可以做些减少我的劳动，增加你的智慧的工作。”

毛泽东告诉梅白如何整理报纸，必看的画红记号，反动的新名堂画蓝记号。代看的报纸有香港的《真报》、《大公报》，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报纸。^①

6月1日上午7点30分，毛泽东听取了裕华纱厂和六渡桥百货商店党支部的汇报。

10时左右，毛泽东由王任重等人陪同过汉水桥来到了坐落在晴川阁下的武汉第一棉纺织厂。

在通往车间的路上，毛泽东问厂党委书记杜良英：“听说你们这里1954年涨大水，涨得有多高啊？”

“到了堤边。”杜良英指着厂门边的防水堤说。

“这么高呀！”毛泽东非常感慨，盯着堤坝，又看了看。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在武汉首次畅游长江。（摄影/侯波）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61~63、99页。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一厂，与欢迎群众挥手致意。（摄影/侯波）

王任重在一旁补充道：“1954年防汛，国棉一厂紧靠长江、汉水，危险最大。但职工们不仅保住了厂房，还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权力下放。毛泽东问：“你们要什么权呀？”王任重接过话题：“他们什么权力也没有。比如1954年防汛，职工们不但保住了工厂，还超额完成了任务，国家奖励他们十万元。但他们想建一个俱乐部都不能做主，还要请示上级，哪有权哪！”

毛泽东说：“那就不对了。”

进了清花车间，厂长刘锦堂详细介绍了车间的生产工序和生产情况。毛泽东边走边看。当他看到清花车间的上包工序还是手工操作，工人要先抖好花再抱到机台上抓棉，6月暑天，穿着短衫依然汗流浹背，身上沾着朵朵棉团，毛泽东注意地看着，不觉微微皱起眉头，心疼地对刘锦堂说：“要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啊！”

去钢丝车间的路上，卫生员递给毛泽东一个口罩。毛泽东接过来，风趣地说：“这是要我戴的吗？”他将口罩握在手里。

走进了钢丝车间，只见整洁的地面上，一台台锃光发亮的机器排列有序，棉卷从机身后吸进去，随即又变成雪白的棉条从前面源源不断地吐出来。

“这是什么机器？”毛泽东问。

“梳棉机。”刘锦堂看到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用手轻轻抚摸机身，接着说，“我们厂的机器全部都是国产的，是我们工人自己安装的。”话音未落，只听到有人发出惊喜的呼声：“毛主席，毛主席！”

在后纺车间，老工人徐心善拨开拥挤的人群，挤到毛泽东面前，颤声叫道：“毛主席好！”两行热泪流下来了。

毛泽东握住徐心善的双手，连声说：“工人阶级好，工人阶级好！”

到了成包车间，毛泽东站在小包机旁，注意地看着工人拉纱。当时，成品纱在打成小包装箱前，还有一个人工墩纱的工序，操作工必须不停地走动，把摇好的纱墩直、绞好，再打成小包。由于长年行走的缘故，那一方地板上留下了两行墩纱工踏出的脚印。毛泽东认真地对身旁的厂长刘锦堂说：“工人的劳动强度这样大，为什么不能改一下？你们要搞技术革新，改变这种消耗工人体力的状况。”

在变电车间，毛泽东走到变压器旁，兴奋地问：“这是国产的吗？”

“是的。这是您的家乡湘潭生产的。”工人回答。

毛泽东笑了。

回到办公室。毛泽东与厂领导亲切交谈。毛泽东问杜良英：“情况熟悉了吧？”又问厂长刘锦堂：懂不懂生产？工人现在的工资一月是多少？工人文化程度怎么样？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职工生活。他们都是些新工人，要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你们是一个新厂，要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又指着墙上挂的劳动模范光荣榜问：“这上面，你们厂里有几个人？”

“三个。”杜良英马上把厂里几位劳模向毛泽东做了介绍。

“你们到过北京吗？”毛泽东问。

“去过。”劳模们回答。“那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在欢快的笑声中，毛泽东又问劳模陈爱娥：“你是哪一年进厂的？”

陈爱娥回答：“1952年。”

“读过书吗？”

“在厂里的夜校学习。”

毛泽东鼓励说：“你们是先进，要好好学习文化技术。”

毛泽东要走了，他提议道和大家照张相。几个劳模围在靠椅旁，毛泽东

站了起来，连声说：“怎么你们都站着，就我一个人坐着？不行，重来。”

厂门口站满了工人，水泄不通，他们要亲眼看看毛泽东。罗瑞卿一见急了，急忙喊道：“同志们，人民领袖来了，大家都想见到，请大家站两旁，让出道来，让毛主席走，好不好？”

“好！”大家齐声说，整齐地站在两旁欢送毛泽东。毛泽东坐在车里，微笑着向送行人群告别。

在回汉口的路上，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我要下汉水游泳，然后出汉水进长江。”

王任重劝道：“今天休息，明天再游吧。”^①

2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党委书记、厂长史梓铭和副厂长孙毅关于武重建设和生产准备情况的汇报。

武汉重型机床厂当时刚破土动工，厂区一片空白，谈不上生产，也没有产品，拿什么汇报呢？毛泽东也知道，武重开工建设两个月，不可能马上投入生产，但武重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不能不使毛泽东操心，他很急切地想了解有关情况。

史梓铭、孙毅随王任重走进一简陋的会客室。一进门，毛泽东就招呼他们坐下。史梓铭向毛泽东汇报了武重筹建情况、工厂规模、主要产品以及生产准备工作。当汇报到武重边建设边在外厂试制产品时，毛泽东高兴地点头说：“你们在工厂建成前，就在外厂建成了新产品，这个做法很对。”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看起来企业的协作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

当汇报到武重正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培训新工人的情况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及早抓住对工人的培训工作，使新生力量很快地成长起来，将来新老结合，床子开动，你们就主动了。”

当史梓铭告诉毛泽东，许多兄弟工厂都在积极给武重支援人才时，毛泽东问道：“你们去过那些厂吗？”接着说，“要亲自去。请他们及时支持，而且不能要差劲的支持。要像相亲一样。你们亲自看看对象，如果是个大麻子，你同意吗？”“做公婆的要了解新媳妇是什么样，凡是老厂支持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64~67页。

你们的人员，你这个厂长都应该看看，要他们认识你。”“反正，不能一个长相，反正不能独裁。”说完微微一笑。大家听完毛泽东中肯而风趣的话，都笑了。

当史梓铭说到要进一步培养锻炼技术干部、管理干部和工人骨干的措施，采取“三班两套”（即一班派往苏联学习，一班分赴国内各兄弟厂学习，一班留在厂里边搞基建边学习。两套是一套人马在国外，一套人马在国内）时，毛泽东拿起铅笔在汇报提纲上改为“两套三班”。

毛泽东听史梓铭说武重职工决心提前一年半把工厂建成，尽早发挥国家投资效益，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早做贡献的决心后，毛泽东欣喜地说道：“你们要有雄心壮志”，“路是人走出来的，经验来自于实践！”

汇报结束，毛泽东笑着说：“你们的汇报，我很满意。我请你们吃饭。”

王任重插话：“主席，您很忙，他们的饭我已准备好了。”

吃完饭，当史梓铭、孙毅向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却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厂。”

史梓铭、孙毅一听，急了。因为厂里正在搞土建，到处堆放着建筑材料，设备器材，道路高低不平，车子进出很颠簸。史梓铭说：“厂里路不好走，请主席不要去了。”

毛泽东坚持要去，说：“你们能进去，我就能进去。”

正当毛泽东、王任重、史梓铭、孙毅一行的车到达工厂时，突然一阵暴风雨从天而降，厂区本来高低不平的路，遍地积水、泥花四溅，汽车无法前行。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在大家再三劝说，才没有进入厂区。但毛泽东让司机开着小车围着厂区转了一圈，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透过水帘，朝厂区望着，望着。

分手时，毛泽东对史梓铭、孙毅说：“你们今后工作中发生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写信给我”，“到生产机床时，我再来看。”^①

下午2时，毛泽东第二次横渡长江。这次，他提出要从长江上游下水，穿过桥墩，游过长江、汉水汇合处。

下午两点多钟，雨停了，毛泽东出现在汉阳鹦鹉洲附近江面。这次是从汉阳江边下水，计划游到青山武钢码头。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68~70页。

这里是长江、汉水的汇合处——龙王庙。水势异常湍急，漩涡套着漩涡。正常情况流速每秒三米，是游泳的险要地段。毛泽东就在这里下水。穿过长江大桥 1、2 号桥墩后，一直向前游去。这天气温不到摄氏 20 度。三四级的东北风把江面卷得浪滚潮涌。

毛泽东对陪游的王任重说：“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到武昌徐家棚，毛泽东上船，游程 30 里。^①

晚上，王任重请毛泽东移居东湖宾馆。

6 月 3 日晨，王任重来到东湖客舍毛泽东住地。卫士向他示意，毛泽东尚在熟睡，这一觉，睡了九个多钟头，这是近几个月来睡得最香最甜的一夜。因为睡不惯高级弹簧床，这一夜，毛泽东睡在地板上。

因为东湖客舍是第一次接待毛泽东，没有经验，出了点纰漏，王任重也没说啥，他只是要求立刻请木工做一副宽大的木板床，可以睡得下两个像毛泽东这样身材魁梧的人。做完大木板，又马上做了一张可以搁得下大



毛泽东当时下榻的东湖宾馆南山甲所。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 71~72 页。

木板的大木床架，使毛泽东第二天就睡到了他喜欢睡的木板床上。

3日11时至下午1时，身穿睡衣、脚穿拖鞋的毛泽东接见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听取他们关于武钢工程建设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笑着说：“冶金工业过去不熟悉，大家都要好好学习。今天你们谁先讲？”

韩宁夫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武钢的建设规模、平整场地、施工进度、施工队伍与工程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李一清介绍了施工中修改苏联设计方案的两个问题。李一清说：“苏联专家为兴建哈尔滨亚麻厂提供的初步设计中有马厩和洗马间。中国工厂不养马，难道也照样修建？”李一清说，苏联专家在设计武钢厂房时，也有这个问题。武汉的夏天胜似火炉，而武钢厂房按苏联地处寒带设计成全封闭式，岂不成了一座座“蒸笼”。武钢将厂房由全封闭改成了敞开式的结构，这符合武汉实际。再一件是中国缺钢材，而苏联设计的厂房全部是钢结构，武钢统统改成水泥结构。这两项改动，既省时间又省资金。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不时微微一笑。他对李一清、韩宁夫的汇报是满意的。

下午1时，毛泽东和王任重留李一清、韩宁夫一起用餐。饭后吃水果，毛泽东随手拿起一块西瓜，却将一盘芒果推到李一清、韩宁夫面前，说：“楚汉分界，你们吃高贵的，我吃卑贱的。”

李一清、韩宁夫不好意思地笑了，将芒果推向毛泽东这一边。毛泽东阻止了他们，并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你们吃芒果，要吐出钢铁。”^①

听完李一清、韩宁夫汇报，毛泽东又召见了长办主任林一山。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召见林一山。因为有了上两次的详谈，这次，毛泽东只是与这位老朋友见面，问了些三峡上的技术性问题。

下午3时30分，毛泽东决定要在雨中游长江。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建议毛泽东去东湖游泳，毛泽东不乐意。他认为，东湖是静水，长江是动水，是最好的天然游泳池。

这次，毛泽东从汉阳下水，穿过正在施工中的长江大桥的桥墩，向武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73~74、87页。

昌游去。这时长江两岸堤上的群众发现了在长江中游泳的毛泽东。顷刻，人潮涌动，观看领袖游泳的人群形成长龙，随着江中的毛泽东向前游动，形成了数万人观看领袖畅游长江的壮观场面。毛泽东在水中向岸上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次，历时两小时，游程在30华里以上。^①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填词《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7年1月，此词在《诗刊》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将词题改为《游泳》。^②

3日，毛泽东到工农业展览馆参观。

6月4日毛泽东本来约谈财经工作，后取消。中午，他乘飞机离汉返京。

下午5点16分毛泽东回到北京。途中因遇雷雨，飞机避让，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毛泽东对叶子龙、汪东兴说：“我们必须抢时间，争速度，走到时间前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的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把革命事业干到底。”^③

① ②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73~74、87、87~88页。

③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第249页。

十九 1956 年夏天在北戴河

1956 年 7 月 6 日到 14 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八大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15 日和 19 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耐。7 月 23 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23 日下午 3 点，毛泽东登车去北戴河开会。

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 28 天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重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8 月 3 日晚，毛泽东在住处同周恩来谈话。

5 日，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作了修改和批示。

当天，毛泽东在秦皇岛接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和同来访问的国会议员等，并一起留影。

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上作了批注。

当天，毛泽东约见民主人士，座谈各民主党派为支持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

11日，毛泽东给罗哲烈士的妻子曹云芳写了回信。

14日，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党的领导部分”作了修改。

15日，毛泽东对《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面告周恩来：“同意照此发表。”

1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商谈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8日，毛泽东给达赖喇嘛写了回信。^①

8月20日返回北京。

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开幕。

这以后，毛泽东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9月14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从8月上旬直到9月14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21份。^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7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512页。

第四章

宣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组织反右派斗争



- 宣讲“百花齐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组织反右派斗争
- 1957年夏天在北戴河
- 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调查研究

二十 宣讲“百花齐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下半年，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二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共高潮。国内也有些人蠢蠢欲动，一些地方发生群众闹事。怎么看待形势，怎么应对形势，党内有不同的声音。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鸣，思想斗争，共产党整风，化解矛盾，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各阶层群众。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高瞻远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有创造性。也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个性。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党内的传统和通行做法不同，在党内遇到了很大阻力。党内、党外反映截然不同。所谓“一句顶一万句”根本不存在。为此，毛泽东离开北京，直接向基层游说，到各地宣讲他的思想。

1957年春，毛泽东四天之内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杭州。每到一地，都在干部会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报告，讲知识分子问题、青年问题、长期共存问题，讲人民内部矛盾，也讲解放台湾问题。毛泽东忧国忧民，一路风尘。他此次到南方，发现人民日报不宣传国务会议，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感觉很不妙。4月7日他飞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胡乔木谈话。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话，谈话长达四个小时。

一、1957年1月至3月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活动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主要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

2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讲话，号召中国学生要团结起来。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会越来越黑暗。

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共28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

23日，毛泽东召集开会，谈周恩来在政协会上的报告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等问题。

27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连续6次召集文教、新闻和知识界人士座谈会，调查和了解情况，与他们沟通思想。

6日，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发表谈话。

7日晚8时40分至12时05分，毛泽东在颐年堂与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普通教育工作。

8日晚8时至11时55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一些著名作家、艺术家召开座谈会。

10日下午3时至6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

11日晚8时30分至11时25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等座谈。

13日晚上8时至次日1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

在经过这些密集沟通的基础上，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与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逻辑问题。

16日凌晨4时，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

作了批示：“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我今天乘车去天津，明天去济南。”^①

3月17日（星期天）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京。

中午专列抵达天津。毛泽东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在专列上谈话。

毛泽东表示，他计划在天津接见党员干部并讲话。毛泽东接见后，黄火青等赶紧回去四处找人，通知会议，安排会场。

当天，毛泽东在天津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写信：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②

下午，毛泽东在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游了泳。

晚上，毛泽东在市委几位书记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的陪同下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干部见了面。毛泽东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题作了报告。

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是社会大家关心的，社会上民主人士、各界人士关心的。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意见不完全一致。“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毛泽东对有人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396、398页。

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他们这个话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也领导他们。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上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主张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

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①

报告结束，当晚，毛泽东登上专列赶往济南。

18日凌晨，专列到达济南。

晚上7时50分，毛泽东在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作题为“思想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济南看大字报。（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42~644页。

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向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讲话。（摄影/侯波）

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一个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

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①

毛泽东谈道：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②

晚12点报告结束，毛泽东改乘空军专机飞徐州，专列也到徐州机场。

19日晨，毛泽东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宏、市委书记陶有亮、市长张洪范。

毛泽东向他们了解徐州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陶有亮介绍了徐州的煤矿和利国铁矿的情况。毛泽东问：利国铁矿的矿石品位如何？陶有亮答：质量很好，可以直接炼钢。毛泽东又问：含硫量怎样？张洪范回答：含硫量很高。毛泽东听了马上纠正说，应该说是含硫量很低。

毛泽东说：徐州的煤和铁在江苏省地位很重要。你们要做好工作，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了煤炭、钢铁，其他工业就好发展了。

谈到发展工业要合理布局，毛泽东说：徐州要发展重工业，也要发展轻工业，照顾市场，不要畸形发展。毛泽东问：徐州离周围大城市有多远？陶有亮回答：徐州离南京、济南、郑州三地都是700里左右。毛泽东强调说：你们要发展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样，城市就业问题也好解决了。

谈到徐州的交通，毛泽东说：徐州除了是铁路交通枢纽外，还有运河、有湖。毛泽东问徐州北面是哪几个湖？陶有亮回答：是微山湖、独山湖、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44~64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285页。

阳湖、昭阳湖。毛泽东还问到下四湖，即骆马湖、成子湖、洪泽湖和白马湖。

这时，胡宏向毛泽东汇报了新沂、宿迁两县之间的骆马湖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徐州也要相应地发展水路交通。这次谈话共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吃早饭，一个炒鸡蛋，一个炒肉片。^①

早饭后，毛泽东登上专机飞南京，上午飞抵南京。

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下榻处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领导座谈，然后起草了《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20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上讲话。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71~73页。

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左、中、右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在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陈毅同志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

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①

下午1时，报告会结束，毛泽东从南京飞至上海。

毛泽东游了一会儿泳，算是放松。

下午5时，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向一千多名处以上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这是毛泽东这次南下的最后一场报告。报告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

毛泽东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毛泽东说，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我们要这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647~65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287页。

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題，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种“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的议论。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他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又讲了这样一层意思：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①

连续四天的游说结束，毛泽东要转往杭州，临走前，他邀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畅谈。

晚上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去杭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50~652页。

当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

到杭州的当晚，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了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

24日晚，毛泽东召集开会，听取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问题的汇报。

28日，毛泽东前往钱塘江上游的果园视察，在途中察看了庄稼的长势。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向胡乔木推荐《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

4月3日，毛泽东登将军山并去高甲外马家坞村看农作物，视察了浙江省军区的一个油库。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从汇报中毛泽东了解到，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



1957年4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将军山。（摄影/侯波）

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说：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说：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说：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

石西民说：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说：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说：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说：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说：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说：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说：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说：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说：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抓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说：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强调守法的一面，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说：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不解地说：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

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说：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说：“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又说：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说：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接着说：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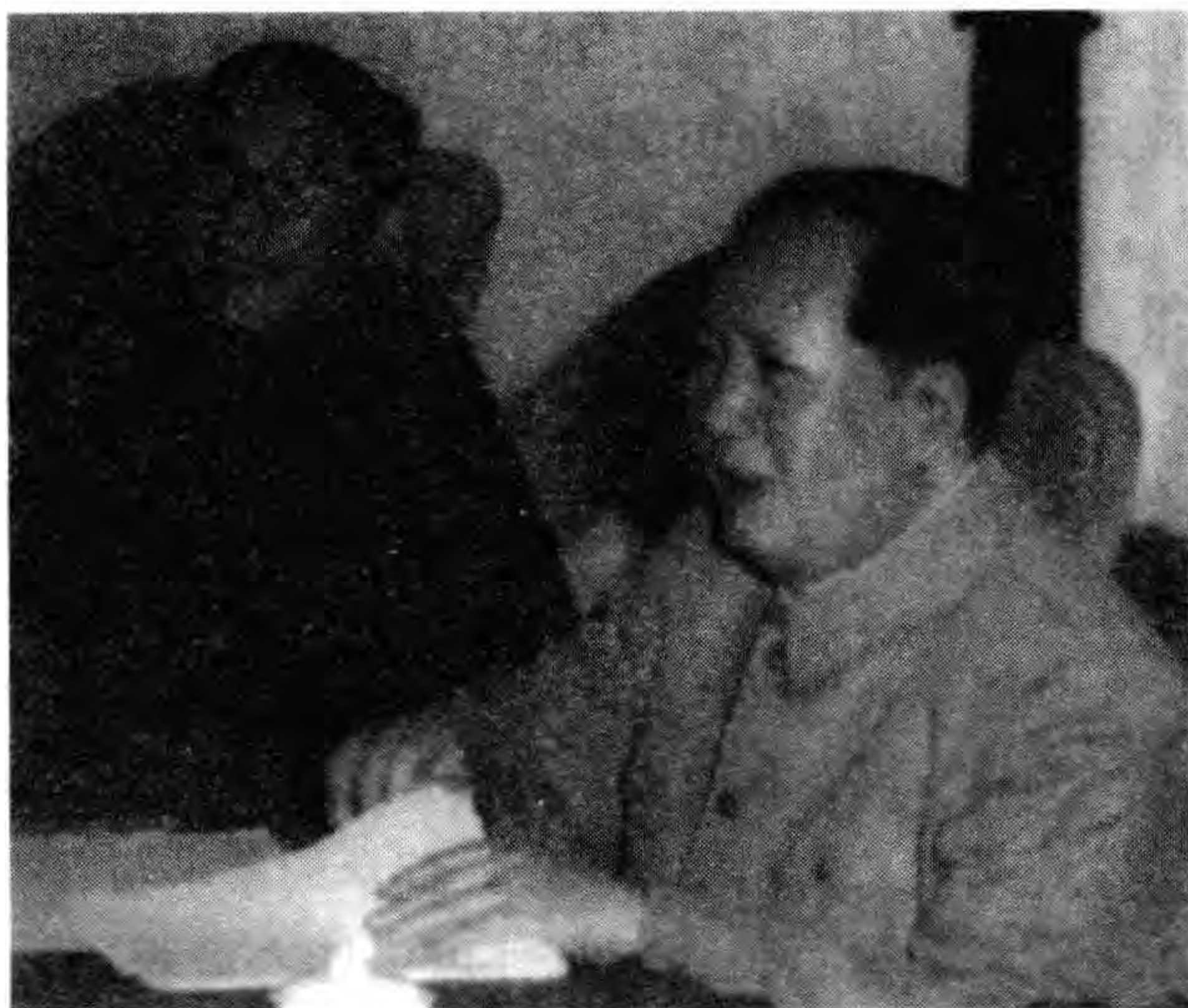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说：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说：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说：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1957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左边是陆定一）。（摄影/侯波）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问：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说：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导？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说：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说：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说：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说：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问：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说：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接着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说：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

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说：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说：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又说：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说：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报刊、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说：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说：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陆定一的任务。你们搞个三人小组去招兵。王亚南这个人可以吸收入党的嘛。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说：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

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①

6日，上海局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委负责人会议结束。

同一天，毛泽东就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问题作了批示。

第二天下午1时，毛泽东要返京，出发前，他乘直升机鸟瞰古越（杭州）大地，后来提笔书写柳永的《望海潮》词。

从直升机下来，毛泽东登上专机飞离杭州回北京。

二、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的活动

回到北京，毛泽东对《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作了批示并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这个通知后来没有发出。

4月9日，毛泽东找胡乔木谈话。

毛泽东说：此次到南方，发现国务会议《人民日报》不宣传，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感觉很不妙。^②

10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12时35分持续到下午5时10分。

毛泽东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654~661页。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1、53页。

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①

毛泽东后来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胡乔木）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做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663~668 页。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53~54 页。

二十一 组织反右派斗争

原本毛泽东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放”而不是“收”的方针，是真心诚意的。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但一方面在党内他的思想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另一方面，客观环境也被迫改变了他的初衷。一些过去的政治盟友，借帮助共产党整风，“幼稚”地提出建议：要成立政治设计院；有些人建议搞轮流执政。这些想法不论出于多少“真诚”“善意”，但在政治上，少说也是“幼稚”的。他们不理解，在阶级社会，“人民民主”和“议会民主”的本质区别。有些人更跳出来，公开辱骂共产党，甚至对跟着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进行威胁。这种政治上的挑战，不可能不受到政治上的回击。为此，毛泽东6月8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不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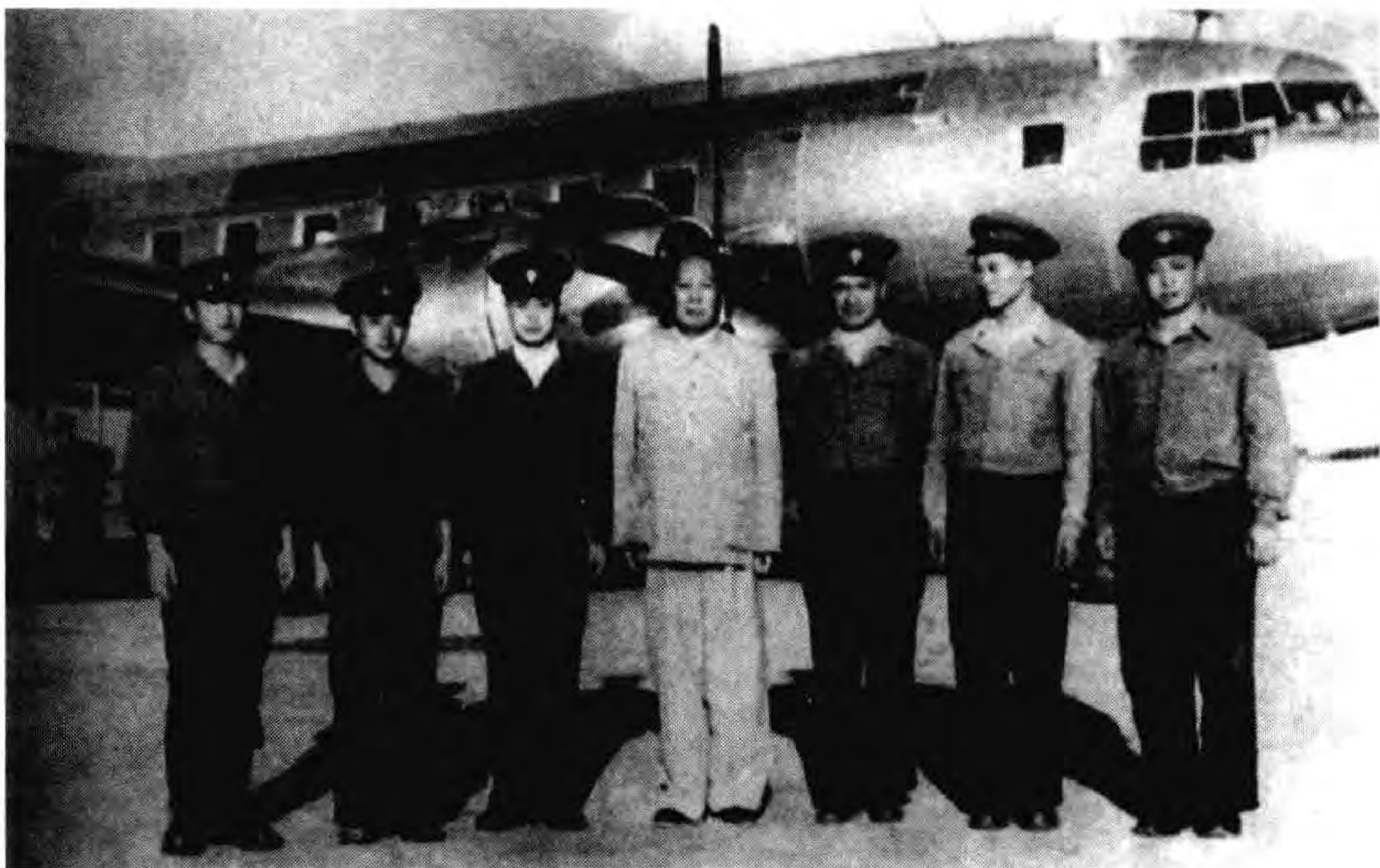
7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当天凌晨5点50分，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

9点30分，毛泽东到了杭州。

5日，苏共特使米高扬秘密来到杭州，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情况。

晚上7时半至次日凌晨3点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等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听取了通报。毛泽东简单地向米高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抵达杭州，在机场与机组成员合影。（摄影/侯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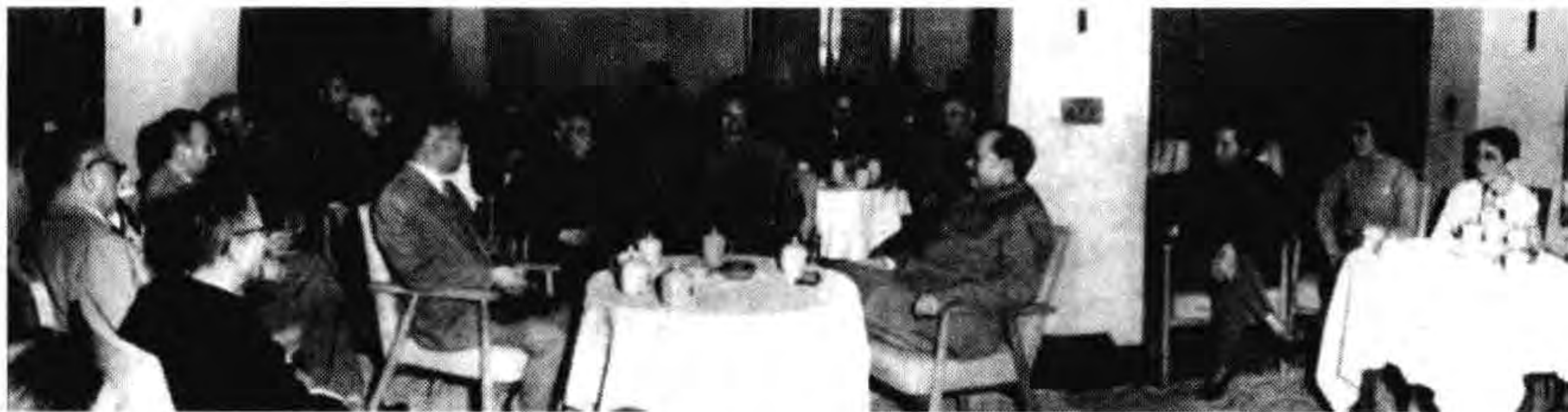
扬提了一下中国的反右派问题，还谈到他计划二次访苏的时间。^①

6日下午1点，米高扬回国，毛泽东去上海。

毛泽东当天在上海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及全体印度尼西亚客人。

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36人，并和代表们谈了话。毛泽东谈及延安整风、上海反右派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病等问题。谈话后，毛泽东和代表一起观看了越剧。

当日，毛泽东给中央发电：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教育、新闻、艺术以及工商界著名人士代表座谈。（摄影/侯波）

^①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第66~67页。

中央，并请转罗瑞卿、王任重二同志：

拟七月廿四日到重庆，廿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7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毛泽东

七月七日^①

8日中午，毛泽东视察了上海机床厂。毛泽东说：工厂应该自己设计产品，要走独立设计的道路；领导要全面关心工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的进步。^②

下午，毛泽东在柯庆施、陈丕显陪同下登上“港申”轮，从十六铺码头出发，向龙华方面视察黄浦江。途中听取了市委工作汇报，内容涉及工商业改造后的上海生产建设、市场供应、人民生活情况。

晚上，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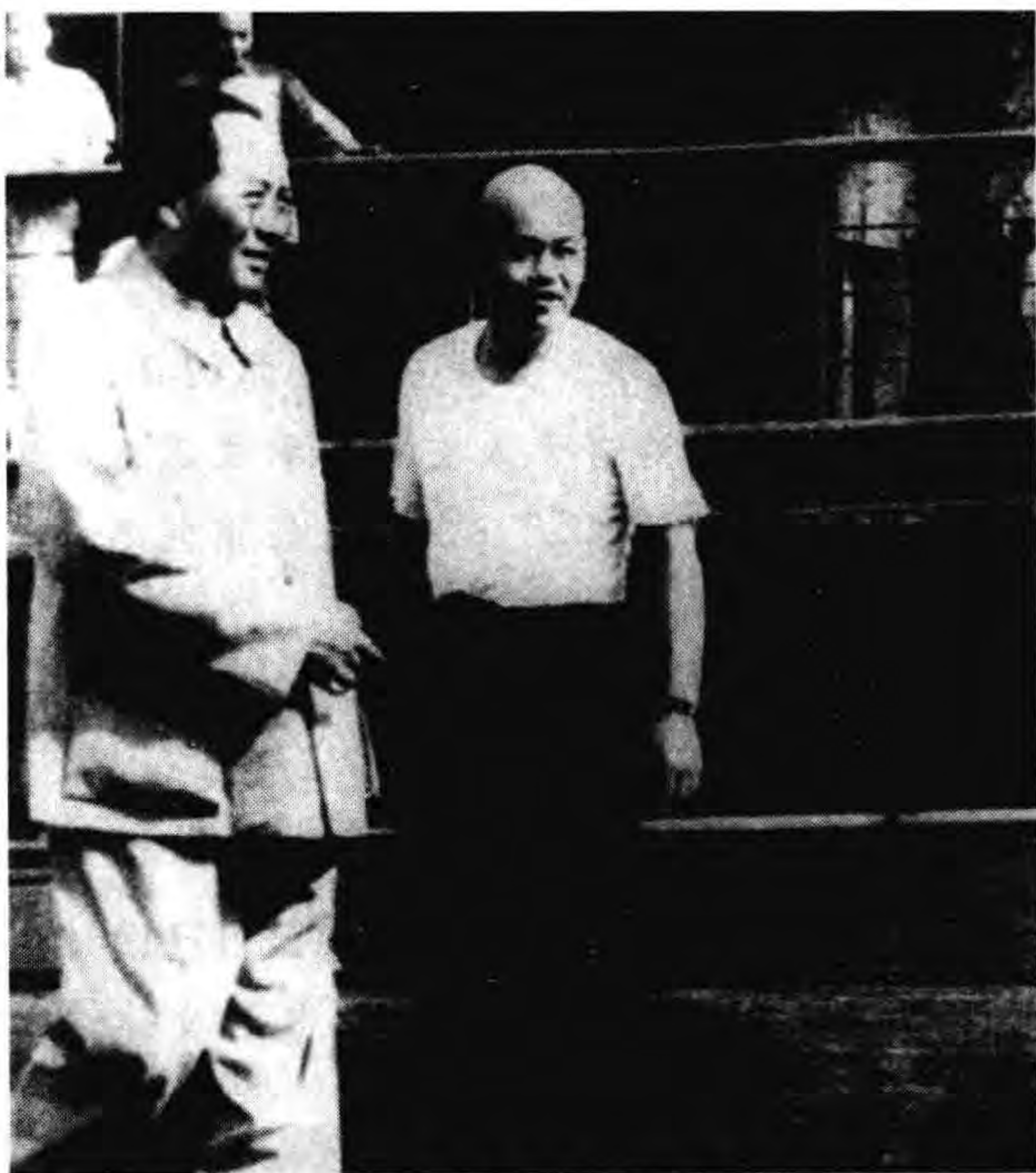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说：我看7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



1957年7月8日，毛泽东视察上海机床厂。（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535页。关于毛泽东这次游三峡的想法，中央常委根据试水情况，没有同意。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428页。



1957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登上“港申”轮视察黄浦江。（摄影/侯波）

月。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他点了上海知识界几个人的名。他说，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①

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当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南京。

毛泽东在南京计划召集华东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部署反右派斗争。在这期间，毛泽东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

据江渭清回忆：毛泽东问他：“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泽东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13页。

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泽东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我这样说，完全出于对毛主席的由衷崇敬。在同我个别谈话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当着各省的第一书记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就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嘛！”

话虽如此，7月青岛会议结束以后，按照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中央要求各地的反右派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彭真于8月来南京，坐镇指导江苏的反右派。他先同我个别谈话，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他说你‘右’。”我说：“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和我个人打招呼。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请你在会上当众宣布，向全体常委打招呼。”彭真同志说：“主席要我个别向你打招呼。”我说：“你要对大家讲，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彭真同志说：“好吧，那就开常委会。”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省委常委开会。彭真同志到会讲话，传达了毛主席派他来南京，向我个别打招呼的话。他在会上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这是因为他当着全体常委的面，所以笼统讲“江苏”，实际意思是问我们省委领导班子内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当即回答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这两次谈话，一次是毛泽东当面向我下达的指示，一次是他派彭真同志前来传话。我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都“打坝”了。所以，可否这样说：我们江苏反了右派，并且同样出现了“扩大化”错误；但就党内来说，还没有因为反右而到过分“伤筋动骨”的地步。从省委常委起到地、市、县委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右派”帽子，保护了下来。^①

7月上旬，毛泽东原准备在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整风、反右情况。由于南京气候不适，会议中途停下来，决定移会青岛。

^①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15~417页。

7月12日6点30分，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南京，8点30分抵达青岛。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笏、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20日，毛泽东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作了修改，并将原来“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改为“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的一级”。^①

21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结束。毛泽东亲自指导胡乔木修改文件，一批又一批找人谈话、作调查。

25日，毛泽东再次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26日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



195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青岛第二浴场。（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553页注。

《1957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30日，毛泽东再次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并批示：“小平同志：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之。如无修改，即可发出。”^①

3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并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提请政治局通过，发出。^②

8月1日，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发出。

当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下午4点多，毛泽东到荣城路海军交际处肖劲光处谈话，并吃晚饭。

7月12日，毛泽东结束在杭州、上海等地的巡视，经南京到青岛。按照计划，他是来度假休养的。实际上，除在疗养区第二海水浴场游了几次泳之外，便再没有闲暇时间了。到达之日至8月11日离青返京，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在这里亲自起草了关于国内形势分析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接见了缅甸议会访华代表团，先后找了地方各方面若干领导谈话。此外，还要例行处理大量文电。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思考、运筹着诞生不久的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和未来。

当时，海军北海舰队尚未成立，但青岛仍不失为年轻的人民海军部队比较集中的地区。自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这里陆续诞生了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第一支潜艇部队、第一支快艇部队，军港设施逐步配套，并且已修建了海军航空兵流亭机场。毛泽东到青岛后，作为海军司令的肖劲光立即从北京赶到青岛看望。毛泽东在海滨“八大关”附近原先由德国人建造的“提督楼”接见了肖劲光。

肖劲光首先向毛泽东简要地汇报了驻青海军部队的情况，最后说：“主席，纪念建军30周年，海军准备在青岛组织一次阅兵式，请您检阅。”毛泽东爽快地回答：“很好，我要去看看海军。”

17日，也就是青岛会议召开的同一天，海军海上检阅计划在青岛基地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553页注、第554页。

正式部署实施。青岛基地政委卢仁灿等基地首长和各编队领导，听说毛主席要来检阅部队，异常兴奋，个个摩拳擦掌，表示一定严格要求、严密组织，把好每一个环节，以崭新的面貌、优异的成绩向自己敬爱的领袖和统帅汇报。经过动员、演练，24日、29日，先后进行了两次预演，反复修改、完善阅兵计划。根据气象条件，毛泽东的检阅定在8月4日进行。为确保万无一失，8月1日上午，肖劲光又按照毛泽东检阅的预案，分别在陆上、海上进行了检阅。省、市委书记会议一直开到7月21日。接着，毛泽东又亲自指导胡乔木修改文件，一批又一批找人谈话、作调查。在繁忙的公务中，毛泽东没有忘记对肖劲光的许诺。

8月1日下午4点多，住在荣城路海军交际处的肖劲光，正凝神回忆、思考着上午的阅兵仪式，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毛泽东一边向屋里走着一边喊道：“肖司令，我要饭吃来了。”肖劲光边迎上去边说：“那天准备了你说有事来不了，今天可没有什么好吃的。”

“要求不高，填满肚子就行了。”毛泽东说道。

卫士附在肖劲光的耳边小声说：“主席今天真的在这吃饭。”

肖劲光面露难色：“怎么不早通知呢？”

“用不着早通知，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有辣椒么？”毛泽东说着摆了摆手，“吃饭是下一步的事，先听听你们的情况。”

肖劲光介绍了近年来海军建设的情况，说：“主席，这次准备8月4日在胶州湾海面举行的阅兵，主要是青岛基地的兵力，同时吸收了东海舰队在青岛执行任务的部分舰艇及海军航空兵。近几年，海军部队有了发展，有将近20万人，但装备仍然主要靠炮艇和一些老的、杂牌的护卫舰。护渔、护航、剿匪、解放沿海岛屿，主要是靠它们。实践证明，经过整修和训练，这些老舰艇还是有战斗力的，有些仗打得不错。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快艇显示了威力，打沉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的就是鱼雷快艇。这个东西，反应快，速度快，灵活机动，应付小战斗，很有用处。航空兵的战绩突出，在解放一江山、大陈岛的过程中，夺取制空权，发挥了很大作用。目前潜艇的力量还很小，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在训练中显示出是有战斗力的。今后，我们重点还是要发展空、潜、快。”

毛泽东说：“目前海军20万人，本不算多，下一步还要减。海军要有装备，光有人没有用。要把人减下来，集中财力搞点好东西。”随着谈话的

深入，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搞海军，购置的舰艇是苏联的，好多东西也是学他们的，这很重要。学苏联，要老实地学，但不要原原本本地学，有些东西学不了，也不要学。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正在肖劲光和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谈自己对毛泽东讲话的理解的时候，工作人员小声地对肖劲光说：“饭已准备好了。”

毛泽东听到了，随即说：“好啊，边吃边谈。”

在简单的餐厅里，肖劲光、刘道生陪毛泽东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一共六个菜，三个时鲜青菜，一个红烧肉、一个海参、一个鱼。外加两碟小菜，辣椒和酱豆腐。毛泽东边吃边称赞味道好。其实，他不知这些菜除了鱼之外都是他自己的。原来，知道毛泽东要在肖劲光处吃饭后，海军的同志立即与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取得联系，了解到他们不知毛泽东要在这里吃饭，已准备了晚上的饭。因为是建军节，还加了一个红烧肉。那时，刚解放不久，考虑到社会情况复杂，中央主要领导人外出食宿，警卫工作很严格。鉴于这种情况，双方工作人员商定，把已准备好的毛泽东的饭菜运了过来。毛泽东当时只是称赞味道好，却不知吃的是自己的饭。

饭后，他们又接着谈，谈海军发展、谈国内形势，一直到晚上九点多。临下楼时，毛泽东说：“现在情况很复杂，一些右派要和共产党争天下，要轮流执政，你们要把部队搞好。军队要起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要把工作抓好。”

肖劲光当即表示：“海军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什么时候都听党的话，听主席指挥。”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意想不到的的是8月4日，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期检阅海军。原来，到青岛不久，毛泽东就患了感冒。8月2日发烧到39度，于是决定委托周恩来总理赴青代他检阅海军部队。为了弥补未能亲自检阅部队的缺憾，8月5日下午，毛泽东又在肖劲光的陪同下接见了青岛基地大尉以上军官，并与大家合了影，留下了永恒的纪念。^①

8月2日，毛泽东在青岛接见以德钦登貌为首的缅甸国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① 吴殿卿、袁永安、赵小平主编：《毛泽东与海军将领》第26~30页。



1957年8月2日，毛泽东在青岛接见缅甸国会代表团。（摄影/侯波）

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信，“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①

5日，毛泽东在青岛接见民族工作座谈会代表。

下午，毛泽东在肖劲光的陪同下接见了青岛基地大尉以上军官，并与大家合影。

11日，毛泽东离开青岛返回北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558页。

二十二 1957 年夏天在北戴河

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 8 月 18 日到 28 日，他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18 日、21 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8 月 11 日，毛泽东从青岛回到北京。

18 日，毛泽东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作了批示。

当天，毛泽东给达赖喇嘛写信。

然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8 月 18 日至 28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18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19 日，毛泽东就同意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作了批示。

21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

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北戴河返回北京。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与胡志明谈话中的一些问题。

晚上，毛泽东会见胡志明。

几天后，9月3日，毛泽东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乘专列沿京广线南下调查研究。

二十三 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调查研究

1957年9月，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亲自到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了解整风、反右、工农业生产情况与群众情绪。

9月3日，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南下。

专列途经石家庄。河北省委及石家庄地委、市委的负责人登上专列随车汇报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专列途经邯郸。毛泽东接见了河北的省地市委书记。

4日，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接见了河南的省地市委书记。

5日，毛泽东从郑州改乘空军专机当天到武汉，住武昌东湖招待所。

下午，毛泽东乘坐轮渡15号，在长江大桥五号桥墩处下水，游到汉口四维路附近，历时36分钟。

6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观看了职工反击右派的大字报。

国棉四厂是湖北省委抓整风运动的一个点，毛泽东一进工厂就被大道两旁的大字报专栏吸引住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党能领导一切吗？》，公开叫嚷：“共产党只能领导打仗，只能搞土改，搞农村斗争有一套，搞工业生产不行，还是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这张大字报毛泽东从头到尾看得很细，看完以后，说：“好家伙！”毛泽东询问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这些人过去是干什么的，在场的厂领导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厂党委书记张元一、经理尚金修，你们怕不怕？两位领导回答说：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怕。毛泽东又问，你们能不能顶得住？尚金修说，我们顶得住！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并嘱咐在场的干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摄影/侯波）

部和工人，在资产阶级右派进攻面前，不要怕，要顶住！

又有一张大字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那上面画着五个头像，头像的嘴上还打上封条。下面的文字写着这些党员干部是靠“吹牛拍马”上去的，在整风时为什么不开口揭发党的问题。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前停留的时间很长，他详细地询问了漫画上画的是谁？他们原来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尚金修回答说，这上面画的都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有的在旧社会是童养媳，有的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现在都分别担任了厂和车间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又问写大字报的是些什么人。尚金修说：他们都是资本家的留用人员。当主席听到是这些人在丑化工人干部时，十分严肃地说：“怎么能丑化工人干部呢？”毛泽东问，被贴了大字报的人，他们怎么样？尚金修说：他们还好，该怎么样工作，就怎样工作。毛泽东这才放下心，高兴地说：“那就好，那就好。”

毛泽东在厂领导的陪同下，边看边往前走，广大职工紧紧相随。有一张仓库工人写的题为《绣楼闺阁》的大字报，内容是说厂领导作风不深入，没有到仓库去过，希望走出“绣楼”，深入实际，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看完后，对尚金修说：“你这个经理，是光吃饭，不干事，还是既吃饭，又干事呢？”尚金修回答说，我们还是工作的。这时，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插话

说，他们既吃饭又干事。毛泽东又问在场的领导，这张大字报是写哪个的？尚金修回答说，这是写的我。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男的嘛，不是闺阁。尚金修说，我们的书记是女的，大字报是写我们。毛泽东问，对不对（指群众的批评对不对），你是不是没有到仓库去过？尚金修回答说，我去过但去的次数不多，每月盘存的时候去。毛泽东又问，你是不是在楼上办公？尚金修说，我们的办公室在一楼。毛泽东听后说：哦，不是“绣楼”啊！毛泽东对尚金修说：“当厂长的每天要到工人中去走一走，全厂范围内每天要转一转，要走出绣楼，深入实际，接触群众。”

毛泽东冒着暑热观看大字报一个多小时了，尚金修请主席到会议室休息一下。毛泽东说，到车间去看看工人吧！接着不顾疲劳，首先到筒摇车间，边走边询问生产情况，不时和工人握手。从清花车间出来后，走到工厂靠长江边的小路，毛泽东问看完了没有，尚金修回答说，看完了。毛泽东同在场的干部、工人亲切话别，然后迈向长江边，上了停靠在岸边的轮船。毛泽东微笑着向送别的群众招手致意。^①

6日傍晚6点半左右，毛泽东乘车来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附近，开始对长江大桥工地的第三次视察。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大桥公路桥面视察。

毛泽东从汉阳桥头徒步走到武昌桥头。陪同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政治部主任杜景云等。

毛泽东在桥上漫步，一面眺望武汉三镇，一面问大家修大桥用了多少钢材水泥，花了多少资金。他感慨地说：“在长江上修这么一座大桥，是要花费大量的财物啊！不过，这座桥连接武汉三镇，是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

毛泽东走到一排涂着各种颜色的栏杆面前，问：“这是干什么的呀？”

“这是让大伙看看，挑拣出什么颜色好。”

“行呀，这是走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问杨在田：“修桥工人最多时有多少？”

“有13000多人。”杨在田回答。

“哦，好多，简直是大兵团作战了啊！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①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主编：《毛泽东在湖北》第124页。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长江大桥上与群众交谈。
(摄影/侯波)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现在如果没有苏联专家也可以修吗？”

“可以。”

“真可以修吗？”
毛泽东重复问了一句。

“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了。”

1956年开始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毛泽东曾指示：“要

建成学会。”建设者们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在大桥建设过程中，有2412名普通工人被培养成技术工人；有90名技术员、实习生晋升为工程师；有153名实习生被培养成技术员；有九名技术工人被培养成技师。这支建桥队伍已基本上能够独立运用世界上最新技术建设任何大型桥梁。

毛泽东来到桥的中部，面向长江上游，问：“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的吗？”

“从前是在江中心，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王任重回答道。

“啊！那可成了‘鹦鹉一去不复返’了。”忽然，毛泽东想起了黄鹤楼，1953年他来武汉时曾游览过。

“黄鹤楼因修建大桥已经拆除了，我们正计划重修。”王任重解释说。

“应当好好修，那可是天下名楼，历史留给湖北、武汉的财富呀！”毛泽东点着头。

夜幕降临，两岸灯火辉映。陪同的同志劝毛泽东回去休息，毛泽东没有答应，他笑着说：“长江上的夜景可真是美不胜收，不领略一番，太可惜啰！”

毛泽东扶着栏杆朝桥下看，问杨在田：“这时候桥面离江面有多高？”

“有40公尺高。”“游泳时可以当跳板。”有同志补充道。

“当跳板太高啦。”王任重不同意。

“从这儿跳下去会插到岩层上去的。”毛泽东比划着说。

大家都笑了。

从汉阳走到武昌，毛泽东已经大汗淋漓，兴致仍然很高。

他还想到铁路桥看看，因随行的同志纷纷劝阻，才作罢。

在武昌桥头堡，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建设画册》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一封大桥工程局全体职工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欣然接受，并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告别。^①

6日晚，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召集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孟筱澎、赵修、王家吉、姜一座谈。

会前，毛泽东发了

话，请大家讨论一下：“第一，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还有没有‘小脚女人’？第二，每个省应搞一个农业发展规划，怎么样？第三，我想编一本书，希望你们能提供材料。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老话：‘湖广熟，天下足。’林彪在华中局时，我曾对他说：希望他带头。但看他送来的通讯，没有做到，很失望呀！这使我想起，到底是我的主观主义，还是下面不认识。”

开会时，毛泽东的座位在正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在第一排，省委领导坐在第二排。毛泽东一看就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开会时，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又说，“现在不按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言之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看大桥画册。中为王任重。（摄影/侯波）

^①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主编：《毛泽东在湖北》第122~124页。

会议冷场了 15 分钟。后来有人发言，讲的也是一个调子，只讲农业合作化的好处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宣布休会，明天再开。毛泽东会后说：“真可惜，时间浪费了！”“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有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党魁怎么讲，下面跟着讲。尽用领袖的语言讲话，鹦鹉学舌么？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再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以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又说，“今日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毛泽东让梅白转告王任重，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能否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①

7 日，毛泽东第二次召集省委和四个地委的负责同志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孟筱澎、赵修、王家吉和姜一开座谈会。

毛泽东说：“这次就围绕农业合作社生产形势问题，请大家敞开思想，多讲讲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反映。”

大家纷纷发言，向毛泽东汇报了高级社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边听边做笔记。当大家谈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巩固和发展高级社有不同



1957 年 9 月，毛泽东与王任重及卫士李银桥在武汉军区大院。（摄影/侯波）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 103~105 页。

意见时，毛泽东不时插话、提问，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高级社发展的形势、问题。经过上次的座谈会，大家在毛泽东面前发言毫不拘束，能畅所欲言，从巩固合作社谈到农业生产形势，从粮棉油增产、发展多种经济谈到统购统销政策，农产品收购价格等，谈了许多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王任重还向毛泽东反映了山区的茶叶、蚕丝外贸收购价格过低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毛泽东就这些问题和大家一一研究。

毛泽东说：“农村发展高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把粮食和农村经济搞上去，搞好农村多种经济，不断增加集体经济和社员收入，这样才能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更好地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干部如果没有眼睛向下、求实的工作作风，任何事也做不好。关于茶叶、蚕丝外贸收购价格低的问题，你们可请示总理。”

接着，毛泽东讲了开会要注意抓思想动向的问题。他说：“你们回去开会要注意抓思想动向，要像这次会议那样把它当做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如现在有些干部争权夺利，惟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补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了三级才起床。过去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省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有很大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在社会上有一种思想动向对农业合作社有无优越性议论纷纷，因为有些合作社农业减产，社员收入减少，于是就有人跳起来说农业社没有什么优越性，兔子尾巴长不了，富裕中农单干思想抬头，想退社。这种动向反映到党内，有些干部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这种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也值得我们注意。”

有人告诉毛泽东，黄冈县有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这次鸣放中放出了一些反动意见。人们在会上和他辩论，并把他当雇工、讨饭时穿的破烂衣服和他现在用的好东西，都拿到会上展览。后来他痛哭流涕地说：“就是开除我的党籍，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参观的人都受到教育，甚至连在场的资本家都骂他。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故事好。你们把他的东西买下来，送

到北京展览。在第二天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问对这个决心痛改前非的干部怎么处理，毛泽东说：不处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编电影。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他还说：有些文学家、艺术家不想下乡，觉得下乡不光荣，丢面子。看来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是短时期的事情，但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困难，这些人一时鸣放起来，猖狂进攻，天昏地暗，可是只要三篇社论，空气就变了。

毛泽东说：“昨日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付蒋介石的不变的。”

毛泽东讲到这里，叶子龙进来对毛泽东说：“主席，走的时间到了。”

毛泽东放下笔记本，向大家告别。^①

7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当天抵达长沙。



1957年9月7日，毛泽东到长沙后在机场与机组人员握手。（摄影/侯波）

一到长沙，毛泽东由机场直接去湘江游泳。公安人员仓促上阵，对所经路线、草地，未来得及做安全检查，上船时，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在江边草地上，被毒蛇咬伤，毛泽东建议速送医院治疗。李强肩负保卫重任，不愿离开岗位。毛泽东劝说道：隐藏在湿草地的蛇，多是剧毒蛇。蛇毒

随着人的血液流动，进入内脏器官，可致命。两个小时后，李强返回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很高兴，“这么快好了！要注意，以后不要太紧张，太激动了。”^②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105~106页。

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47~48页。

毛泽东这次到长沙住蓉园一号。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游泳两次，跳舞两次，接见了杨开智夫妇和柳直荀烈士遗孀李淑一，感谢李淑一代他到杨开慧墓地扫墓。回湘前，毛泽东准备回韶山，省委也作了部署，但终未成行。

8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蓉园听取省委、湘潭、常德地委的汇报。

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周惠简要汇报了湖南整党、反右斗争、粮食生产、积累与消费诸方面的情况。周惠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湖南日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主党派、高等院校。大字报、大辩论对于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发挥了作用。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

周惠继续说：现在湖南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基本实现了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后主要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展农业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农村生产力。毛泽东对此很赞赏，认为农业合作化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

谈到积累与消费时，周惠说：湖南的农业总产值还只有30亿元，工业总产值18亿元，生产比较落后。因此，需要勒紧裤带，扩大积累，压缩消费，计划以总产值的20%作为生产费用，在生产费用中又以20%作为基建费。毛泽东认为这些比例关系可行，并强调：积累与消费，是生产与分配中的基本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家庭积累，均很重要。特别要藏粮于民。粮食储存丰歉不同，丰年多储点，歉年少藏些。

究竟每个人一年要多少粮食？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说：“不久前，我在韶山清溪乡住了几天，作了一些调查，整理了一个材料，记载了朝阳队农民胡文生，一家五口，人均408斤，精打细算，瓜菜掺杂，勉强糊口。”他将这材料递给毛主席，并说：大小人口平均400斤谷子就够了。毛泽东出身农民，对400斤谷子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是新秤，只有280余斤米，如果是老秤，则有320余斤米。他继续追问：是老秤，还是新秤？（在当年，湖南农村仍保存有16两秤，新秤、老秤并行使用）王治国继续答道：市秤。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使我心里有底了。粮食问题是这几年闹得最凶的问题——征购过头了。湖南也有这个情况，韶山、湘乡、衡山的农民给我反映过。俗话说，手中有粮，做事不慌。但

征购过头，农民吃不饱，总是不好吧！征购多了，还得返销。当然，我们应向农民宣传，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节省过日子。俗话说：蔬菜半年粮，多种蔬菜，也可节省些粮食。后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介绍了王治国汇报的情况和湖南关于多搞积累的意见。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还问了韶山清溪乡党支部的情况，王治国蹲点天数。王治国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到王治国在乡里住了七天，感叹道：可惜我办不到了。转过身子问周惠，干部是否经常下去搞调查？周惠答：省里的下去少一点，地、县同志下去多一些。^①

座谈、汇报至4点半，毛泽东提议：“去湘江拱一拱。”船至猴子石，测验水温摄氏27度。毛泽东即更衣下水。他没有什么专用的游泳服，还是延安时期穿过的长外裤，剪去半截。

晚上是中秋夜，毛泽东在船上用餐，四菜一汤，外加一盒月饼。

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见人多菜少，又是中秋佳节，就进入厨房，建议再加一个菜。厨师回答：这是主席的用餐制度，不能违背！就座后，毛泽东手执筷子，一边划弧，一边说：“省地市同志辛苦了！今天我请客，慰劳诸位！”随之，他把筷子伸向红烧肉，微笑道：江青不要我吃红烧肉，今天我倒可以多吃一块！这是地地道道的家乡菜，湘潭、宁乡人民每逢佳节，少不了红烧肉。乡里人讲打牙祭，主要是指吃红烧肉。这时厨师又送来一碟豆腐拌浏阳豆豉辣椒，又香又辣。毛泽东双眉舒展，说：这又是好东西。我是少不了它。^②

晚餐后，毛泽东提出要浏览长沙市容，邀周惠“上街去逛逛”。周惠不假思索地说：不行呀！老百姓不认识我，却认识你呀！上街一挤，那还了得！毛泽东抓住他的心理，笑道：你们这些人就怕丢乌纱帽。你们出去前呼后拥，是不是？在毛泽东激将下，周惠只得同意了。^③

9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长沙，当天抵达南昌。

在南昌，毛泽东听取了省委、省人委负责同志的汇报，观看了人委院内的大字报。

10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昌，当天抵达杭州。

11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车去海宁七星庙观看“钱江秋涛”。下午2

① ② ③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48、49、50页。

时，离开七星庙。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回到杭州，毛泽东填词《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①

12日，毛泽东修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并作了批示。

15日，毛泽东修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并作了批示。

同日，毛泽东为查找《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写了批语。

16日，毛泽东来到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了解浙江杭县（今余杭县）农村整风及社会主义教育情况。省委副秘书长薛驹介绍了情况。

当天，他给陈云写了一封信。

17日午后，毛泽东离开杭州，当天抵达上海。

晚上，毛泽东接见了赵超构、舒新城、束世澄等，并在一起吃了晚饭。

赵超构回忆：同年9月，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同时被接见的还有舒新城、束世澄两先生，这已是反右以后了。一见面，主席就诙谐地对在座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主席的笑话，使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接着，主席对我说，已经看到我的两篇检查，他还问起我检查时的心情怎样。我向主席老实讲了，说是感到很紧张，好多天睡不着觉。主席笑着说，睡不着觉是好事。接着就亲切地教导我说，要养成勇于自我批评的习惯，不习惯的人觉得自我批评很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还说犯了错误，吸取教训，改过来就好了。

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还向上海市委同志和舒新城先生交付了修订旧《辞海》的任务。主席说，解放这么多年，不能再让人查老《辞海》了。^②

晚上，毛泽东还接见了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接见了黄浦区区委第一书记陆文才和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

毛泽东详细询问上海锅炉厂工人的情况。当听到厂里有位老工人爱厂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16~717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33页。



1957年9月18日，毛泽东在柯庆施陪同下到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看大字报。（摄影/侯波）

如家，毛泽东说，要发挥这种精神，这样的老工人是我们依靠的力量。毛泽东还指出，对青年人还是要教育。“要青年学生去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轻视劳动；要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毛泽东向陆文才和仇启琴了解了机关、学校有关整风和大鸣大放的情况。^①

18日下午，毛泽东在柯庆施等人陪同下到上海第一棉纺织厂观看职工贴出的大字报，了解工厂反右情况。

当天，毛泽东乘专机返回北京。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问题。

20日至10月9日，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会。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429页。

第五章

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七次离京



- 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
- 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间隙到济南调查
- 视察东北工业基地
- 召开成都、武汉、广州会议
- 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
- 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 巡视大炼钢铁

二十四 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21日回到北京。他感到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于是于12月8日离京。到华东停留将近一个月时间，并在杭州召开会议。

1957年12月8日13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南方。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济南。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听取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在珍珠泉礼堂与参加山东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会面谈话，然后看了大字报。

中午，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济南抵达南京。

据专机工作人员回忆：

1957年12月，因毛主席“一时兴起”，发生过一起几近泄密的事件。我们从北京飞上海，再熟悉不过的航线，但机组丝毫不敢松懈，紧张的情绪随着航线的缩短才逐渐减轻。飞机接近古城南京，大家稍稍松了口气，因为从南京到上海“就是闭一只眼也能飞到”。可在这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却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

“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楼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楼开会。”

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都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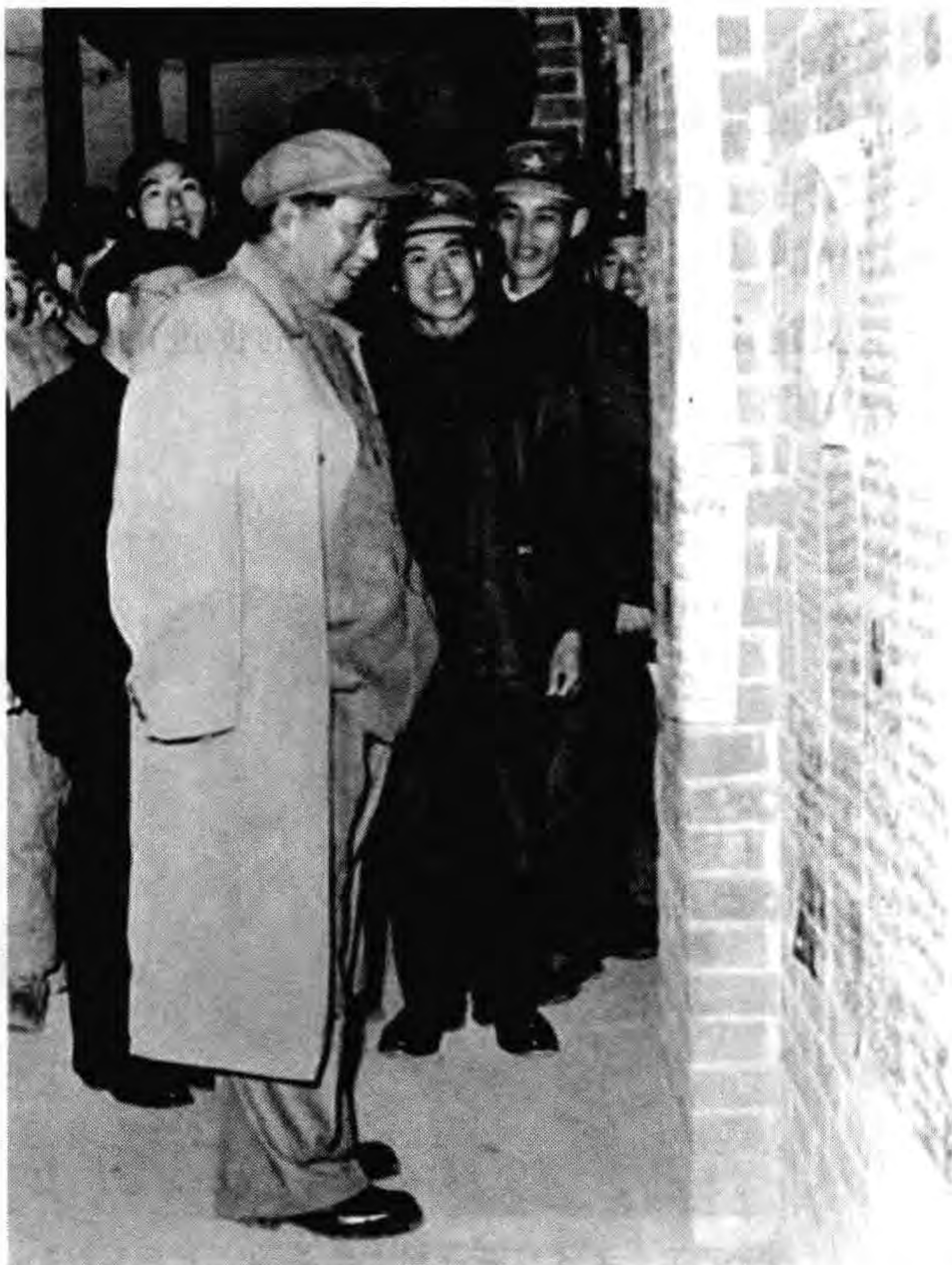
“能试一试吗？”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楼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何廷一边说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问地面收到没有。”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地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地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



1957年12月9日，毛泽东在济南某部队视察时看大字报。（摄影/侯波）

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①

12月9日毛泽东到南京。

毛泽东在南京期间，接见了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当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京，飞抵杭州。

12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

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7年，毛泽东在飞机上学习英语。（摄影/侯波）

^① 李克菲、彭东海：《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第116~117页。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①

12日，戴高乐当政之前五个月，毛泽东非常注意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这天他说：要继续进行观察。^②

当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审查全国各地的工农业计划问题，提出搞地方工作的应该管三件事：工业、农业生产、意识形态问题。^③

14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由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人员。

16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开会。陪同缅甸副总理来杭州的周恩来总理也参加了会议。按毛泽东的话说，这次是：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④

16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主要矛盾、整风重点是抓基层等问题。

晚上，毛泽东看到江华同志12月9日的一个讲话，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十分高兴和重视。^⑤

17日凌晨2点，毛泽东给叶子龙写信：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66页。

②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2页。

③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25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6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08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9页。

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①

下午，毛泽东召集以上同志以及江华继续开会，主要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②

当天，毛泽东还写了三封回信。

给周世钊复信：“惇元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祝好！”^③

给李淑一复信：“淑一同志：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500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顺祝教礼”。^④

给孙燕复信，对孙燕的工作安排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声明：“此事应由党作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⑤

18日，毛泽东对陈赓关于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报告作了批示。要求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⑥

当天，毛泽东继续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恩来等七位同志开会，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⑦

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江华、胡乔木、田家英同志谈江华同志报告的修改问题。^⑧

25日，毛泽东为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谈到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亲自做了一些修改。在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指出：柯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

①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671、674、675、676、677页。

② 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页。

⑧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页。江华的报告经修改1957年12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说关于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

的主要矛盾，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通意义的”。通过发表江华和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公之于世了，并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中正式确认。^①

27日，毛泽东再次给胡乔木写信，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九张有关照片。并要胡乔木告新华社“注意报导除四害和卫生运动”。^②

31日，毛泽东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作了批示。

1958年1月2日，毛泽东对《江苏红领巾支持四十条》新闻作了批示：“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③

2日，周总理飞杭州与毛泽东商谈接见也门巴德尔王太子事。

晚上6时，毛泽东会见并设宴欢迎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

3日，毛泽东对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作了批示：“乔木：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1958年1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④

当日，毛泽东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作了批示：“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⑤

同一天，毛泽东对胡乔木等人起草的通知仍不满意，亲自动手，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并批示：“刘、周、朱、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抄卫生部和各部门。”^⑥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浙江省的领导向他汇报：杭州市区夏天无蚊子，不挂帐子。毛泽东午夜2时亲自到西湖饭店核查。

1月3日至4日，毛泽东在西湖边的大华饭店再次召集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开会。陪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63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667~668页。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6、8、4页。

用毛泽东的话说，与1957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一次杭州会议比，这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会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①

毛泽东事前为3日开始的杭州会议起草了讲话提纲：

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间〈期〉）

大量：先进、落后

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领导的原因——领导好，形势先进占多数，落后迅速克服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②

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主要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一些问题，提出要抓两个十二条。还谈了干劲和反右倾问题。

4日，毛泽东再次在杭州会议上讲话。他对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提出了17个问题。

1月4日，杭州会议结束。

晚上，毛泽东派飞机到上海，将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接到杭州，聊了一个通宵。

谈家桢回忆：

1958年初，春节将临的一个傍晚，我在学校刚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6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第11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0页。

海市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杭州去。同行的还有周谷城、赵超构两位同志。我们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叫我们去。等我们上了飞机，这猜想便得到了证实。飞机座舱里的陈设，同我们见到的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所摄完全相同。哦，毛主席是派了他的专机专程来接我们的。当时，我们的激动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们到达主席在杭州下榻的处所已是晚上10时以后。当我们乘坐汽车到达的时候，主席已经站在门前等候我们了。在这之前，他刚刚开完一个重要会议。

主席亲切地把我们迎进室内。那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主席和我们三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主席同我们的谈话，涉及到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我们的领袖学识渊博，古今中外，历史现实，各方面知识都了解得很深透。在谈话中，他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幽默风趣，把我们开始时的拘谨和紧张心情一扫而空。就在这种轻松随便的谈话中，主席了解了我们所接触和熟悉的各方面情况，征询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向我们进行了许多启发和教育。我们几个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都曾有点摇摆。主席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一夜的谈话中，他老人家反复地启发我们：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显然，主席是在教育我们正确解决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

在谈到新闻工作的时候，主席对赵超构同志说：你别老呆在报馆里，你的老家不是温州吗？可以到那里去跑跑嘛。他又对我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主席的这些指示，也正是针对我们的弱点，向我们指出了知识分子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必要性。毛主席十分关心遗传学的发展，他再次关切地问我：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

谈话进行到深夜，主席邀我们共进晚餐，这时，我们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没有吃晚饭。我们听说主席平时的伙食是极其简单的，今夜却为了招待我们，特地多做了两个菜，斟上了几杯黄酒。我们边吃边谈，餐毕又继续谈下去。主席的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3点钟，还兴致勃勃，毫

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其实，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听他那思想深刻妙趣横生的谈话，丝毫也不觉得时间过得慢，也没有什么疲倦感。我们倒是怕主席太累，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一下。于是，我们依依不舍地同主席告别。从主席住处出来，到我们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主席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等我们上了车才走回去休息。^①

5日（星期天）早上8点，毛泽东给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打来电话，邀他们一同吃午饭。

中午，毛泽东请谈家桢、周谷城、赵超构吃午饭。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②

午后，毛泽东视察了浙江省农科所。

毛泽东一进实验大楼就注意到走廊里放着的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他弯下腰仔细察看，并问：“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双轮双铧犁？改进的犁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农科所向科研人员请教农业科学知识。
(摄影/侯波)

① ② 《怀念毛泽东同志》编写组：《怀念毛泽东同志》第208页。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视察浙江省农业研究所观看双轮双铧犁耕田。

(摄影/侯波)

臂是不是已经装上了？”楼宇光作了回答，并介绍了有关情况。

参观了双轮双铧犁，毛泽东走进会客室。他脱下帽子，要楼宇光坐下来谈谈所里的情况。楼宇光把所里的研究工作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当时的省农科所规模不大，重点是研究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也做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研究工作。所内共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四个系和一个园艺组。毛泽东注视着楼宇光，对他说的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很感兴趣，而且对许多作物还很熟悉。楼宇光有点紧张，一时忘记介绍油料作物的研究情况。

毛泽东问：“还有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你们是否研究？”楼宇光作了补充。

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楼宇光回答：“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毛泽东说：“要做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楼宇光回答说：“好的。”毛泽东问旁边的一位省委负责同志：“他（指楼宇光）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那位负责同志回答：“赞成。”毛泽东说：“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毛泽东问楼宇光：“你是学什么的？”“我学的是土壤农化。”毛泽东说：“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毛泽东和楼宇光谈了各种元素的比重后，还谈到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日光、水分与农作物的关系。末了，毛泽东向楼宇光借一本关于土壤方面的书籍，

楼宇光立即取来两本土壤科学方面的书，呈送毛主席。

离开会客室，毛泽东健步来到大楼前面的试验田。在试验田的东边，有一群人正在忙着准备用双轮双铧犁为毛主席作耕地表演。工人张有根用心调整着调节杆，又吆喝着前面两条耕牛，唯恐出差错。这时，毛泽东走到他的面前，问道：“你会耕地吗？”“我会耕地。”“好哇！你就耕吧。”

张有根牵动一下牛绳，两条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开始耕地。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察看双轮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耕到地边，毛泽东望着张有根和刚刚跑过来的楼宇光，问：“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纵。”

“我行吗？”毛泽东转过脸来对着大家。张有根和吕其千立即调转犁头，重新将犁插入土中。毛泽东对站在旁边的楼宇光问：“你行吗？”楼宇光没有说出话来，而脸却红了，因为他没有耕过地。

毛泽东走近双轮双铧犁开始扶犁耕地，周围的人，尤其是楼宇光，注视着毛主席驾驭双轮双铧犁。犁到地头，毛泽东放下农具，询问了职工的生活情况。省农场农具管理局李安邦副局长向毛主席呈送了有关双轮双铧犁的试验资料。毛泽东要走了，他再一次同职工们热情握手。^①

5日下午，毛泽东要离开杭州去长沙。在去机场的途中，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到小营巷看看。此时，警卫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均已乘车直奔机场，毛泽东身边只留下叶子龙、王金山、李银桥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杭州市市委书记王平夷等人。

走下汽车，小营巷给毛泽东的第一观感，就是街头巷尾干干净净，没有垃圾纸屑，也很少痰迹。在那些很陈旧，但都擦洗得能辨别出木板纹路的大门上，都贴着写有“清洁”两字的红纸条。毛泽东心情很舒畅。他走进61号墙门。门槛边，两个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

毛泽东见她们把军棋都仆倒在棋盘上，便问：“你们怎么下仆棋？”

她们没听懂毛泽东说“仆棋”的意思，一边埋头下棋，一边纠正说：“我们是在下暗棋。”

毛泽东听了，微微地笑了，问：“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95页。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卫生。（摄影/侯波）

好吗？”

只顾下棋的姑娘们，眼睛盯着棋盘，回答：“好！好！欢迎！”

戴桂芳一抬头，怔住了：毛主席？看错了吧？她定睛再仔细地看，立刻涨红了脸。

毛泽东向她伸出了宽厚的大手。戴桂芳赶紧站起身，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不知道说什么话好。

“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毛泽东说。戴桂芳和何天瑞使劲地点头。这时，石侶琼、程瑜也走进了61号墙门。毛泽东见到她们，微笑着点点头。石侶琼上前握住毛主席的手，低声说道：“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又握着程瑜的手，问：“这里住了几户人家？”程瑜连忙回答：“十户。”

准备去上工的杭州永安丝织厂青年工人郑肇勇刚跨出房门，一眼看到毛主席，便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

“你们这里卫生工作搞得怎么样？”毛泽东问郑肇勇。

郑肇勇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这里的卫生工作搞得还好。”

毛泽东在大家的簇拥下走进过道，看了放在那里的饭桌，又看了菜橱，

都像刚擦洗过一样，毛泽东问大家：“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大伙儿回答。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走进厨房。这厨房是十户居民共享的，虽然光线暗淡，有点潮湿，但是锅盖、碗橱等几乎一尘不染，锅灶、煤球炉和炊事用具，都放得整整齐齐，靠着炉灶的那一面墙虽然被烟熏得黑里发亮，但却见不到成串的灰尘。刚下班的女工游静之正在烧菜。毛泽东问：“你怎么现在才烧饭？”

“我加班。”游静之有点紧张。“你烧的是什么菜？”“豆腐。”“还有什么吗？”毛泽东又问。

游静之忙说：“有，还有牛肉。”毛泽东打开锅盖看看，笑着说：“不错，不错，营养不错嘛。”毛泽东细心地看了看厨房内的一切，然后向郑肇勇家走去。“里面可以进去看看吗？”毛泽东站在郑肇勇家门口问。

郑肇勇打开房门，高兴地说：“毛主席，欢迎您进来！”

房间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桌上放着几摞书。毛泽东坐下来，指着桌上的书问：“这些书都是你看的吗？”“是的。”郑肇勇把自己的日记本交给毛主席看。

毛泽东接过日记本，很仔细地看了几页，笑着说：“很好。”并伸出手握了握郑肇勇的手。毛泽东转身看到郑肇勇的哥哥从厂里得来的先进工作者奖品，便问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永安丝织厂的青年工人。”郑肇勇随手拿了一块永安丝织厂出品的丝绸给毛主席看。

毛泽东称赞地说：“很好，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和61号墙门里的男女老少一一握手道别，满意地离开了他检查的第一个院落。

毛泽东来到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小营巷，人们带着欢乐和兴奋的心情，愈来愈多地汇集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慢慢地向前走。他来到居民俱乐部门口，见墙上贴着墙报，便停下来观看。

“这是谁出的？”毛泽东问站在身边的程瑜。“居委会出的，庆祝元旦的。”“内容不错嘛。”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程瑜兴奋地涨红了脸。

看了墙报，毛泽东又走进56号墙门。这座大院的房子比61号的好一

些。居民的客厅、卧室窗明几净，箱笼、板壁、盆盆罐罐都擦得很亮，屋子角落看不到蛛网，连窗格子上也摸不到灰尘。毛泽东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来到天井。

天井里，一字排开五口大水缸，每口缸上都盖着木盖子，毛泽东走到一口缸前，揭开缸盖，仔细地瞧着。

“这是天雨水。”站在旁边的程瑜向毛泽东解释。当时，自来水还不是很普及，居民们一般都饮用河水或天雨水。

“为什么养鱼？”毛泽东指着水缸中游来游去的金鱼好奇地问。

“鱼吃孑孓。”孑孓是蚊子的卵在水中孵化出来的幼虫，身体细长，游动时身体一屈一伸。蚊子最喜欢在天雨水里繁殖孑孓，居民们便想到在水缸里养金鱼的办法。

毛泽东听了程瑜的回答，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推广噢。”

56号里还有一个菜园子。居住密度如此高的院落里竟然还有菜园子，毛泽东很感兴趣，他随着石侣琼、程瑜等来到菜园子。菜园左角上有一口粪缸，贮存着浇菜用的人粪尿。粪缸上加了双层盖子，外面也刷洗得挺干净。所以，站在粪缸边也闻不到臭气。

程瑜揭开粪缸盖子，对毛泽东说：“这个粪缸在夏天也不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说着，盖上粪缸盖。毛泽东笑着点点头，亲切地握着程瑜的手说：“不错。”

看了两个大院落后，毛泽东兴致依然很高，对紧跟着他的王芳说：“再看看。”

王芳点点头，寸步不离地跟着毛泽东走出56号大院。

毛泽东看到巷子里有一棵用草绳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树，问程瑜：“这树是你包的？”

“不是。”

“你住哪里啊？”毛泽东边走边和她聊了起来。

“住新开街。”

“你姓什么？”“程，工程的程。”

“叫什么？”“程瑜，周瑜的瑜。”

“你干什么工作呀？”毛泽东问。

“我是居委会负责卫生工作的。”程瑜回答。

“噢。”毛泽东停下脚步，重新打量了一下程瑜，第三次握住她的手，说：“你们的卫生工作搞得不错。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2号大院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已相当陈旧，但是，泥地上没有一点垃圾，连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找不到一根杂草。看得出来，这里的主人们是非常注意卫生的。

毛泽东还未跨进42号院大门，居住在里面的孩子们已飞身奔回院子报信：“毛主席来检查卫生了！”院子里的人赶紧从各自的家门奔出。

毛泽东果然来了，他微笑着亲切地向居民们伸出手去，还不停地招呼着：“老太太您好！小朋友好！”

经程瑜介绍，毛泽东来到教师胡澄章家。

“这是你们的房间吗？”毛泽东问。

“是的，毛主席。”胡澄章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胡澄章。”

“在哪里工作？”

“杭州铁路中学。”

毛泽东点点头，视线移到挂在板壁上的奖状，逐字逐句地念了起来，念完后，又握住胡澄章的手，说：“哦！原来是一个先进教育工作者，很好！”

当毛泽东看到挂在床前板壁上的一张“拼音字母挂图”时，问胡澄章：“你们在学习吗？”

“我们在学习，小孩也在学习。”胡澄章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自己的孩子。

毛泽东低下头看看孩子，用手摸了摸他们的头，说：“很好！”

毛泽东发现一张床上没挂帐子，便问：“不挂帐子，有没有蚊子？”

“没有蚊子。”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从胡澄章家出来，毛泽东又来到军属居素吾家。毛泽东走到那张临窗放着的书桌边坐了下来。他看见桌子上有一张《杭州日报》，便拿起来问程瑜：“是今天的报吗？”

程瑜凑上前看了看说：“是的。”

“你们都订报吗？”

“都订。”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打开报纸，看起了头版的新闻。

外面的群众越来越多，不少人趴在窗框上向屋里张望。

毛泽东朝外看看，笑着站起身。他发现室内两张床也没有挂帐子，关怀地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告诉他：就是在夏天，这里蚊子也很少。毛泽东满意地点着头，走出了房门。

此刻，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奔到巷子里来了，大家把42号墙门的里里外外围了个严严实实。毛泽东一出来，大家主动闪出一条道，簇拥着毛泽东向前走。毛泽东在大门口一出现，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人们问候：“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微笑地走着，不断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几个胆大的年轻人把手伸过来要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立即把手伸过去。这只手还未放下，另一只手又把他握住了，接着几十双手又伸向毛泽东。毛泽东无法前行了。

王芳建议毛泽东该走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早嘛，不急嘛。”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来到车边。这时，毛泽东看到人群中有一位胡须雪白的老人伸着手，想和他握手，可是总挤不到前面来。毛泽东立刻向前两步，握住了老人微微颤抖的手。那老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①

毛泽东看到小营巷无蚊子，家家户户不挂帐子，高兴地说：除四害杭州可作样板。^②

视察了小营巷，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杭州，飞抵长沙。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小营巷居民家阅读当天的《杭州日报》。（摄影/侯波）

① ②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86、28页。

刚下飞机，毛泽东就向迎接他的省委书记们介绍了双轮双铧犁并建议湖南大量生产双轮双铧犁，推广双轮双铧犁。毛泽东把在杭州起草的 17 个问题向湖南省委书记作了介绍，听取意见。

毛泽东提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农村副业、林业、渔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金融、劳动工资和人口、科学、文教、卫生 14 项。其中工业又可细分 15 项：产量指针、产品质量、新产品试制、新技术、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和寻找代用品、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成本、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企业的分工和协作、供产销平衡、地质勘探、资源综合利用、设计和施工。这是以后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雏形。

农业方面，他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抽出 14 个要点，要求各省地县委抓住不放。

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提出要掌握时机；计划要有两本账，要推广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相互参观学习，开展评比活动，加强检查督促，加强调查研究；领导干部一年要有四个月在下面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增加感性知识。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

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断革命。他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 1949 年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又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今年 7 月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但还没有完结。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 15 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做到红与专、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要求重视知识分子，各部、省、地、县都要培养专家“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毛泽东当时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认为是发动“大跃进”的好时机。他说：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 15 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毛泽东寄希望于湖南省委做

促进委员会，不要做促退委员会，要多快好省，不要少慢差费。

湖南省委详细汇报了干部蹲点办试验田及湘江机械厂（即株洲 331 厂），采取“自建公助”解决职工“房荒”等问题，毛泽东很感兴趣，认为可以推广。他在南宁会议上表彰湘江机器厂的作法是群众自动打破限制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①

5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看木偶戏《追鱼记》。

第二天上午 10 时，毛泽东在接见省委、军区主要负责干部后，特意在省委办公楼前同军队、地方科、处级以上干部 500 多人合影留念。省委书记周小舟和省长程潜陪同。

当天，毛泽东乘飞机离开长沙，飞抵南宁。

1 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 27 人，于 11 日、12 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20 号完毕（中间休息两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到八天）。



1958 年 1 月 6 日，毛泽东在长沙和程潜接见省委干部。（摄影/侯波）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 51~52 页。

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①

南宁会议原只想找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周总理对毛泽东说：2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时间已经迫近，是否先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一下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这样，毛泽东同意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未到。

到南宁的第二天，毛泽东畅游邕江30分钟。

8日凌晨1时，台湾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我空军进行了拦截。毛泽东当时正在读《楚辞》，他坚持不进防空洞。

9日，毛泽东带大口罩漫步邕江北岸，和路旁一家糖果店主人聊天，询问他的生意和生活情况，和码头准备过渡的群众交谈，后来被群众认出，毛泽东摘下口罩，和围过来的群众握手。毛泽东后来说：就是不应怕群众，不要害怕群众嘛！^②

11日至22日，南宁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11日下午，毛泽东再次畅游邕江50多分钟。

晚上，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你们平时就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1页。

② 何绍榜：《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第37~38页。



1958年1月7日，毛泽东在南宁游邕江。（摄影/侯波）

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农业纲要四十条，最初是八条，后来是十七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四十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二十多条。他说：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用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

(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

12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

毛泽东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涨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毛泽东接着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毛泽东谈到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他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廖鲁言向我反映，40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个东西。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

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68~769页。

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说，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①

吴冷西回忆：

1月12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一个因由。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69~770页。

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①

1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②

12日7时，毛泽东关于办好省报问题给刘建勋、韦国清写信。

1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14日，南宁会议继续开会。

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③

从15日开始，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1958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15日，毛泽东在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时插话：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十年计划能六年完成，农业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

毛泽东表扬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表会上的报告，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8页。

②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70页。

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说：“大家都要学习柯老”。他说：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

毛泽东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①

15日晚上，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

吴冷西回忆：毛主席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9页。

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谈到这里，毛主席提起他几天前（1月12日）写给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韦国清的一封信，信中是谈办好省报问题的。毛主席说，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毛主席又说，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

毛主席问我，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我回答说，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毛主席严肃地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毛主席接着就谈到了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三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他说，这三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我向毛主席汇报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五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毛主席听后说，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导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

毛主席还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向他汇报人民日报干部情况后，他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

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毛主席毫无倦意。最后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到此结束。^①

16日，柯庆施在大会上做汇报，汇报期间，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他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53~57页。

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谈起。柯的这个报告，毛泽东后来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①

17日，李先念在南宁会议上汇报。毛泽东作了插话。毛泽东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

第二天，毛泽东把战国时代楚国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赋印发给大家看。^②

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③

当日，根据林一山和水利部门意见，主席主张修三峡。薄一波反映，此事有反对派；还讲了水电同水利之间，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于是主席当即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将林一山与李锐找来，当面各抒所见。

中央办公厅通知李锐、林一山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参加中央的会议。办公厅负责人说：电报上写的是讨论三门峡问题；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时，接林一山一起去。

18日中午，林一山和李锐被专机接到南宁。

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工程的会议。

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林一山答，要两个小时。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说只要半小时。林一山先讲。他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如何为害，还谈到长江如同黄河，河床也在逐渐抬高。谈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提出三峡大坝200米至210米的方案，从国家急需化肥和化纤等工业情况看，三峡电站不但经济而且合理。讲的时间超过了两小时。

李锐讲得比较简单，首先讲长江不同于黄河，轮船从上海可以通到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泥沙远不如黄河之严重，水量为黄河的20倍，洪水量为50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200多倍，长江只25倍。黄河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害河，对国家威胁太大，治标治本，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71~7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7~18页注。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72~773页。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8~5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72页。

须及早解决。三峡大坝如按坝高 200 米方案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就至少要 105 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李锐强调说，三峡水库防洪能保护荆江大堤，对武汉并不起作用。李锐将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引起了毛泽东和与会者极大兴趣。之后，李锐又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三峡这样大的电站，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谈到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多级船闸、电站机组容量以及施工，都是超世界水平的。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系。

毛泽东这时插话：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有人插话，那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林一山、李锐讲完后，毛泽东发言：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①

19 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20 日凌晨 1 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当日，毛泽东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作了批语和修改。

20 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毛泽东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②

21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结论。事前他写好了提纲，主要谈工作方法。杭州会议的 17 条在这里已成了 42 条。也就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前身。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要求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讨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凡是有群众的地方，讨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会议精神如何传达？毛泽东说这些现在还只是建议，需要发展，在 4 月党大会以前形成正式条文，准备在以后随时修改。

^①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秘书手记》下卷，第 2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773~774 页。

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研究三峡工程的会议。

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仍是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特别赞赏李锐的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现在南宁接见现场。（摄影/侯波）

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十五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这时李富春、薄一波也插话，都赞成只要有条件，应当尽量多发展水电，现在赶不上，第三个五年计划总可以做到水主火辅。

毛泽东最后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毛泽东很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还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你师范大学毕业，写文章文理不通，大而无当。

薄一波和胡乔木也对林一山重重批评了几句：要说实在话，再不要在中央面前讲煽动性的话。

在散会之前，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连忙说，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这时，旁边的人也讲赞成的话，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会后，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处理。^①

^①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秘书手记》下卷，第29页。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南宁冒雨走过群众的欢迎队伍。
(摄影/侯波)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广州接见奉调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
(摄影/侯波)

22日，南宁会议结束。

下午2点，毛泽东冒雨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了五千多各族人民代表和群众。

23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宁，飞抵广州。住小岛一号楼，毛泽东在那里休息了两天。

当天，毛泽东在广州会见了奉调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及其夫人。

春节期间，毛泽东在中山纪念堂接见了省、市直属机关和军区的干部，观看了文艺演出。

26日，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广州，飞抵北京。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见省、市和军区干部。（摄影/侯波）

二十五 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间隙到济南调查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去作调查。

1958年2月5日上午8时，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

上午10时，毛泽东飞抵济南。在住地，毛泽东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座谈。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①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一次。^②

当天下午，毛泽东乘专机飞返北京。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83页。

二十六 视察东北工业基地

人不离蹬，马不卸鞍。从南宁归来，毛泽东即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并作讲话，主要阐述工农业发展目标、工作方法、知识分子和对右派分子的政策等问题。他信心百倍地说，经过去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群众热情甚高，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

他还从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引证“小米加步枪”的威力，他说：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东方人吃素，东方风味，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样身体健康。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说西方肉食者鄙。我们过去的战士每天是四钱油，三钱盐，可是能够打胜仗。那些美国大少爷兵却打败仗。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提出要向两个方面开战：一是像除四害一样打掉官风官气，最好根绝；一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注意力要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去，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

毛泽东对明朝人徐霞客充满钦佩，认为他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发现了“金沙江——导江”，从而推倒了以前经书上的“定论”、陈陈相因的旧说——“岷山导江”。毛泽东还说到郦道元，那部《水经注》的作者：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1958年2月2日、3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口号，并视1956年的反冒进为反跃进，

要求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

2月12日，毛泽东的专机离开被他视为只“是个加工厂”的北京，往能出产“原料”的基层而去。^①

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②

1958年2月12日15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到东北视察。

傍晚，到沈阳。辽宁省委的有关负责人冒雪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一下飞机，互相认识寒暄之后，他提出第一个要求是：去工厂看看。

去工厂？这会儿？他们都愣住了。按预先的安排，应该是去宾馆休息。省委负责人上前说：“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不松口，重复说，他要去工厂。而且他对这个理由不屑一顾：“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又有人过来劝说：“天黑了，都下班了。”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反问道：“工人不是三班倒了？”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他。于是在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负责人黄欧东、焦若愚的陪同下，毛泽东直接从机场到黎明机械厂。

在此等候的厂总工程师程华明既兴奋更紧张。毛泽东下车后，拉程华明一起坐进了车，并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问清了程华明的职务，毛泽东说：“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

说话间，总装车间到了。毛泽东径直走进厂房。正在工作的工人们被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31~3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85页。

照相机的闪光灯吸引，都怔住了——这不是毛主席吗？大家纷纷朝前聚拢。

毛泽东边走边询问生产情况，有时为弄清楚一个细节，一连询问好几次。他问程华明，全厂总共有多少人？年生产能力是多少？厂里的工人、职员、管理人员各有多少？程华明一一回答。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职员，不是太多了吗？”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但语气和蔼。

在光荣榜前，毛泽东站住，问起干部下放劳动的情况。程华明汇报说，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第一线当工人。毛泽东满意地点头。并说，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当他听程华明说边上一名正在操作的工人就是下放干部时，他特意走过去，和他握手。

宽敞的车间里，贴着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指着这些大字报，毛泽东扭头问程华明：“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有时也出废品的。”毛泽东又问：“有停工现象吗？”程华明说：“有的时候会由于原材料、零件供应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内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程华明回答：“除生产主产品外，我们打算生产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毛泽东很高兴：“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持农业是没有道理的。”短暂的视察很快结束。^①

12日晚，毛泽东在宾馆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然后继续工作。午夜1点，负责保卫的同志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说：“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凌晨4点，毛泽东还在看书。当保卫人员再一次催促他休息时，毛泽东却催促他：“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②

13日7时开始，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松陵机械厂）、沈阳小型开关厂和高坎乡。

清晨，通宵未睡的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便紧着催促安排下面的活动。由于昨天已经去过了黎明机械厂，所以今天的日程上便只剩下视察松陵机械厂，然后乘车去抚顺。

① ②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32、35页。

谁知这一天，毛泽东又两次改变计划，增加了对沈阳小型开关厂和高坎乡的视察。

早上7点半。毛泽东和随行人员的四辆轿车开进松陵厂。

厂领导一一被介绍给毛泽东。厂长牛荫冠，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听说了他的名字。说：“噢，你就是牛荫冠，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今年47岁”，“还是青年团员嘛！”

踏进总装车间大门，毛泽东一边和工人们打招呼，一边听介绍，有时还登上窄窄的工作梯，观察产品的内部结构。他看到车间黑板报上的时事专栏，就伸出一个指头，点点说：“应该注意时事！”他的目光停留在报上“关于7003号废品卡片”的标题上，问道：“这写的是什么？”车间干部说：“是批评官僚主义的。”毛泽东说：“官僚主义应该批判”。他转过身来环视周围的干部说：“群众贴没贴你们的大字报？”又说：“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才能管好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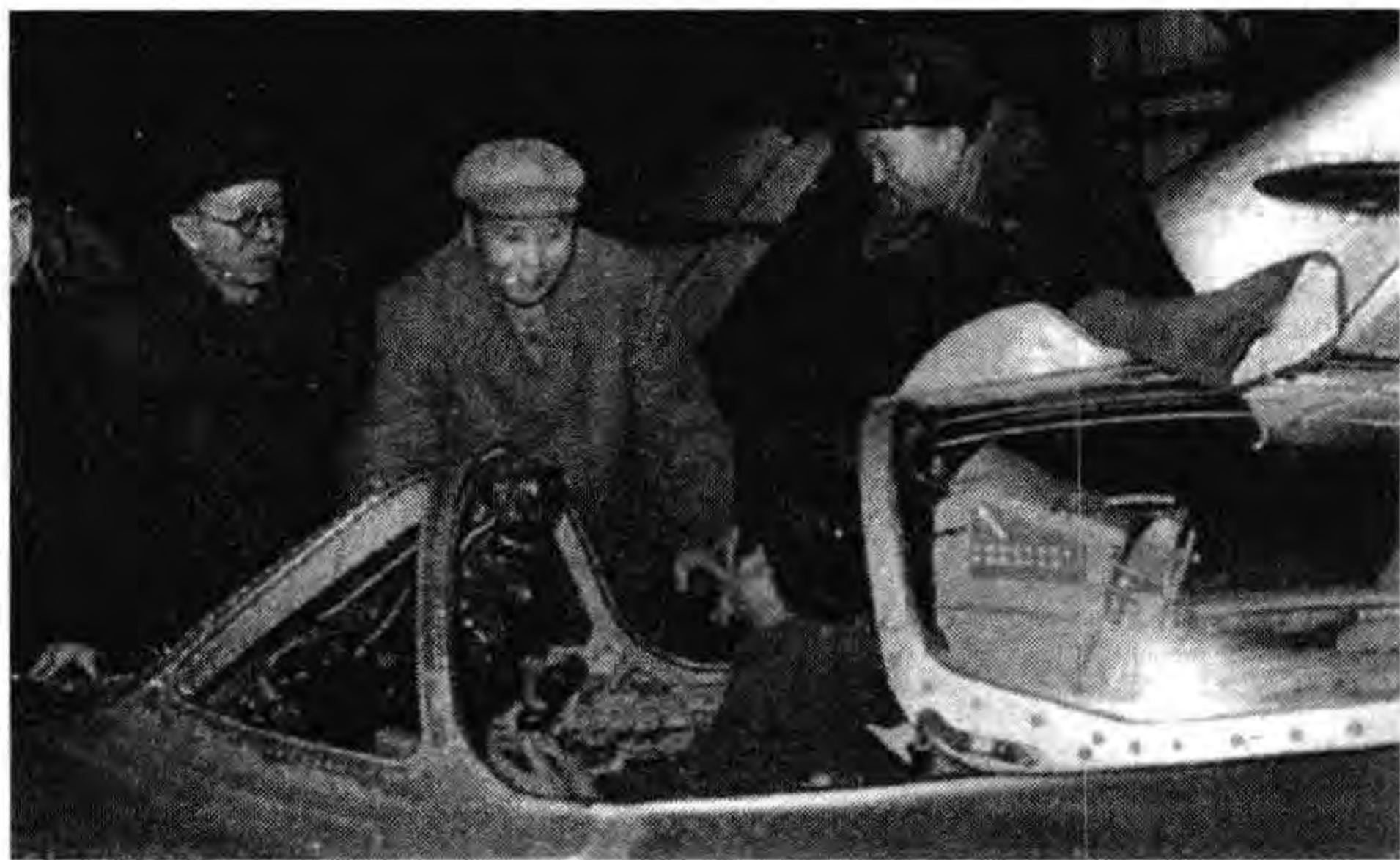
毛泽东特意问一名车间主任，是否出国学习过。车间主任回答，是在工厂里学习的。毛泽东又问：“有没有工程师帮助你？”车间主任说：“有一个助理工程师，是车间副主任。”毛泽东说：“这很好。”

谈到如何培养技术工人，牛荫冠介绍说：“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工人固定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占用的人多。”毛泽东问：“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牛厂长说：“叫工人再学会第二套本领。”毛泽

东问：“学会两套本领就可以少用人吗？”

毛泽东走到工人苗春雨、刘智渊跟前，没等他们擦掉手上的油泥，就握住他们的手。他还弯腰拿起他们使用的风钻掂了掂：“再轻一些就好了。”

随行人员提醒毛泽东，时间不早了。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沈阳参观国产歼击机。
(摄影/侯波)

大家朝门外走去。到了墙角前，毛泽东忽然停下，伸手去摸暖气片，问：“那么大的厂房用这样的暖气片冷不冷？”

坐进车，毛泽东说：去沈阳小型开关厂。

原来，在视察黎明、松陵这样的大厂时，毛泽东注意到，由于有些原材料和重要零部件不得不依赖进口，生产主动权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他

一再问，哪些零部件我们自己能造，哪些还不能造？

听说沈阳市小型开关厂在设备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几百个人在窄小破旧的民房里，硬是靠牛头刨、皮带车床、老虎钳子这样的简单工具造出了供机床控制用的电器开关时，他十分高兴，表示：“要去看看。”

小型开关厂接到通知，准备得匆忙、仓促。猜测会是哪位首长来。这时，毛泽东已经进厂。

毛泽东十分详细地询问电器开关的制造工序。特别问到车间是否有通风设备，关心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

他拿着机床自动控制电器开关，翻来覆去地看。

离开开关厂，前往抚顺。路过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叫停车。

高坎乡旧站村的饲养员老王头屋里屋外忙活着，他端一簸箕苞谷，套上车准备去拉料。刚推门出来，就看见几辆汽车开进村饲养场院里。车上下下来几个穿大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

老王头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上前也不知说什么，看着毛主席在那里和生产队长赵文泉说话。

毛泽东问赵文泉：“大牲畜是分槽饲养还是集体饲养？”赵文泉一个劲地重复：“是集体饲养，是集体饲养。”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沈阳国营开关厂车间。
(摄影/侯波)

毛泽东询问生产队的土地、劳力、产量、社员收入等情况，特别关心农田基本建设、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等问题。当赵文泉介绍去年入冬后农业社社员冰天雪地里破土动工打高坎乡第一眼电井时，毛泽东来了兴趣，拉住赵文泉的手：“走，你领我们看看电井去！”

踏着积雪，一行人来到打井工地。毛泽东探身望着挖了九米多深的井筒，问赵文泉：“你们为什么要打电井？”

赵文泉说：“因为电井坚固，用水泥灌的，打得深，水量大。”

毛泽东问：“能浇多少亩地？”

赵文泉答：“能浇三百多亩！”

毛泽东又问：“电从哪里来？”

赵文泉指着远处高压线的大铁架子说：“就从那里引过来，电线杆都埋了。”

毛泽东很高兴，指着第一眼电井的井架，又指指远处刚竖的电杆，说：“这就叫集体化！机械化！”

他嘱咐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辽宁的工业比重大，一定要再把农业搞上去！”

从电井工地往回走，毛泽东问积肥的情况，问社里壮劳力一年干多少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多少？男女劳力各占多少？种多少旱田，种多少水田？今年能完成多少水浇地？^①

离开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直奔抚顺。

毛泽东漫步沈阳小型开关厂和高坎乡旧站村的时候，抚顺市的负责人心急如焚。照原定的时间表，毛泽东早该到了，怎么还不见踪影呢？别会出现什么情况吧？毛泽东临时去开关厂和旧站村，当时无法通知抚顺。他们在毛泽东要来的方向放了瞭望哨，随时通报消息。

就在越来越焦灼不安的时候，瞭望哨有了消息：毛泽东的车队到了，正往这里开来！抚顺市委负责人立即驱车前往迎接。没多远，毛泽东的车队就迎面而来，掠过他的车朝前开去。市委负责人坐的车连忙调头。就在这调头的工夫，车队已开出一段距离。抚顺市委负责人忙叫司机加速，追上车队。追上了车队，他又让司机超车超到车队的最前面。他要赶到前面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35页。

领路，等着毛泽东下车才行。超车可没那么容易？一次两次，屡试屡败。为毛泽东开车的司机弄不清这辆小车的身份。好好的干嘛非要挤到前面去？何况安全保卫制度一点也马虎不得。这边的负责人急得出了汗，伸出脑袋大声向车队那边报出身份姓名，说明要赶到前面去的目的。这一招管用，只一会儿，他便超到了前头。气喘未定，毛泽东的车队到了。毛泽东下了车，好奇地问：天不热，你怎么出这么些汗？^①

毛泽东上午视察了抚顺西露天煤矿。

矿长王齐芳介绍了露天矿解放前后的变化和目前的状况。讲到厂矿在总体改建设计施工中，常常因为进口材料、设备不能按时到达，影响生产，毛泽东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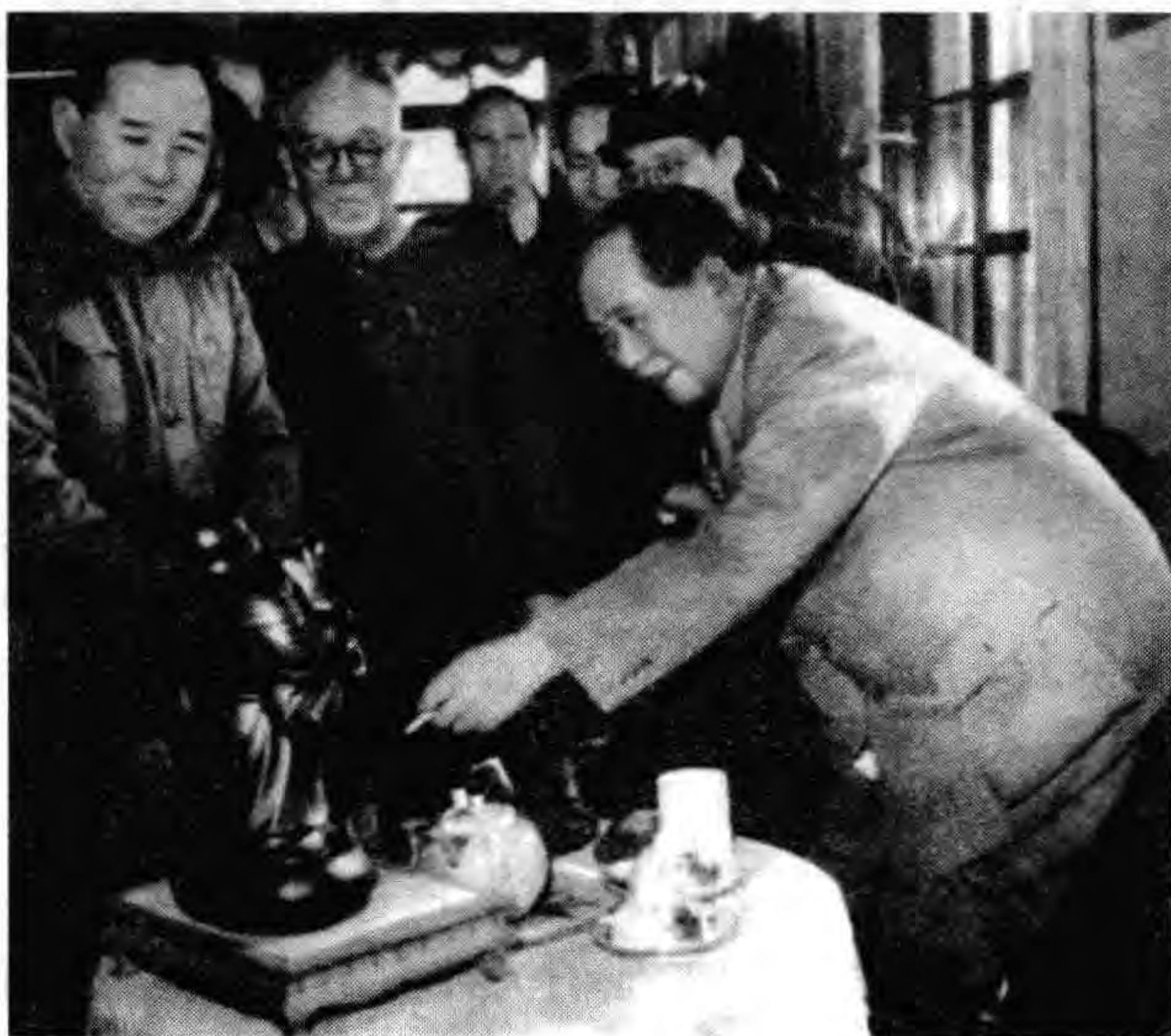
王齐芳告诉毛泽东，矿工们跃跃欲试，要在1958年增产60万吨煤。

毛泽东问：“要不要增加人？”“不增人，也不增加投资。”

“那用什么办法来增产呢？”毛泽东问。

“靠发动群众，搞老矿挖潜。”矿党委书记葛玄吾说。

毛泽东点头：“这样做好。我赞成。”听取汇报后，毛泽东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懂马列，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他拿起一块带有树叶、昆虫的叶岩，颇为内行地讲到煤的生成过程。讲到抚顺的主要产品煤、油、电、钢、铝中，电是动力，是为其他工业服务的。他举出十多种特殊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抚顺观看用煤精制成的艺术品。（摄影/侯波）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40~41页。

钢含有的化学元素，谈到什么是特殊钢。

他说，抚顺是个以燃料为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煤的埋藏，量多质好，油的产量在逐年增加。煤和油含的成分很多，要研究如何把煤和油的原料提炼出来。综合利用很重要，价值很大，要把综合利用的问题好好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央支持你们搞。

毛泽东谈到抚顺农业的发展，说，应当很好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争取超过四十条。郊区应当很好地发展副食生产，建立副食基地，郊区生产要为城市服务。蔬菜供应要做到自给，肉蛋供应要逐步做到多解决一些。养猪就看你们干不干了，要干，肉食就能自给。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抚顺看油母叶岩。
(摄影/侯波)

谈话后，毛泽东踏着很陡的梯蹬，登上观望台，俯视露天矿全景，远眺抚顺市景，对露天矿的生产资源及过程，对180多公尺厚煤层及丰富的人造石油的资源——油母叶岩，发生很大的兴趣。他问得很详细，从大问题到小细节；他看得也详细，从远到近，从南到北。看台风大，寒冷，陪同人员几次劝他下来，他都表示

再等一会儿。看到老远有几个工人沿着大卷下盘铁道一步步向坑上爬，便问：“那是工人吗？他们为什么不坐在上下坑道的车上来呢？”

“他们是大卷扬机铁道检修工，在那里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

忽然，他的视线停在远处冒着的几股烟上，问：“那是什么？”

王齐芳答：“伪满时，日本侵略者乱掘乱挖，造成不少暗洞自燃发

火。”

“能解决吗？”

王齐芳答：“能有办法。”

毛泽东说：“要加紧灭火，不要把国家的资源白白烧掉了。”^①

中午，毛泽东又视察了抚顺铝厂。

毛泽东出现在车间门口时，人们惊讶又激动。正在检查铝锭质量的常桂荣放下小锤，摘下手套，想和主席握手，伸出一半却迟疑地缩了回去。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去握常桂荣的手，问厂里的负责人：“是自己培养的工人吗？”“都是本厂自己培养的。”

天气很冷。来抚顺前，随行的人看毛泽东衣服单薄，准备了一件皮大衣。毛泽东不要，说：“不用。冷，对自己是个锻炼，要不怕冷不怕热才行。”抚顺铝厂车间温度特别高，室内室外相差30度。有人提出，这样容易感冒，最好给主席送件大衣，毛泽东又谢绝：“工人同志穿得单薄不是照样进出车间吗？”

电解车间弥漫着烟尘和怪味。毛泽东一进门，车间干部就送来两个口罩。他接过来，却不在意地用手拿着向电炉跟前走去，看工人操作，了解炉体结构和生产过程，还看了炉头上的电压表。直到离开车间，那两个口罩还在他的手里拎着。^②

参观完抚顺铝厂，毛泽东到抚顺宾馆休息。他应大家的要求，接见了市委机关部委以上的领导干部，照了相。

结束在抚顺的视察，毛泽东乘车赶往沈阳机场。

毛泽东在机场，同辽宁省、沈阳市、沈阳部队和辽宁省军区的两千多名干部一起合影留念。

下午，毛泽东乘专机离开沈阳去长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欢迎主席再来辽宁视察！”毛泽东微微一笑说：“你们辽宁的粮食什么时候过了关，我再来！”^③

13日下午，毛泽东飞抵吉林省长春市。

一下飞机，省党政军负责人都迎上去彼此问候。毛泽东眼尖，竟在人群中发现了曾经在自己身边做过警卫员、一年前已到吉林工作的申虎成。

① ② ③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41、43、44页。

“噢，小申，你也来了！”他很高兴地向申虎成打招呼。小申告诉毛泽东，自己这次还是担负主席的警卫工作。有人请毛泽东去休息室休息，他不同意，要求直接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他首先到铸造车间。走廊上贴满了大字报，内容是反浪费反保守，既有对干部提出的批评，也有对整改的合理化建议，还有对新人新事的赞扬。毛泽东放慢了脚步，又停下来，从头至尾细细地看了几分钟。他对大字报中表现的工人主人翁的责任感尤其赞赏，说：大字报好啊！看到大字报下面的实物展览，他又说：又有大字报，又有实物，这好。毛泽东问工作，问生活，周到细致。

从铸造车间出来，毛泽东来到总装车间。这里扳手哒哒，手锤叮当，好不热闹。工人们见到毛主席，都赶紧把手底下的活干完，站起来欢迎他。毛泽东边走边看边和工人打招呼，还问他们累不累？

厂领导说，这个车间的工人大多数是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点头，关切地说，青年人很多，要好好教育，加强青年的思想教育很重要。

在总装配线，一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装成开出。毛泽东注视着它，脸上洋溢着舒畅的笑意。

在底盘车间，毛泽东看了正在飞快运转的一台台平行排列的自动机床，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摄影/侯波）

看了加工成型的零件。他拿起一个齿轮细细地看，又轻轻地用手摸着表面的光洁度，然后鼓励工人们说：“好好干！”^①

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归来，毛泽东听取了吉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

在长春，毛泽东喝的茶，吸的烟都是自己带。头一顿吃的是大米和小米掺在一起的二米饭，外加一块红薯，两三样菜和一碗汤。第二顿依然如此简单。人们送来吉林的特产松花江白鱼，盛情难却，他才让厨师切下一段，算是额外加了菜。

13日晚上，毛泽东又工作到深夜。

14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吉林省党政负责人。毛泽东谈笑风生，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哪里人，毛泽东说：“好啊，你们这是五湖四海啊，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毛泽东很关心吉林省的农业。一再强调，要搞好农业，农业搞不上去，其他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要把农业搞上去，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变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跟大家讨论有关农业科学的知识，问大家，“看没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还向大家介绍中外土壤学的各种版本。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读有关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赞成一位土壤学专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人定胜天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土壤的团粒结构，说破坏了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他强调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

毛泽东还打听吉林省的肥源，当听说肥源中有草炭时，他很感兴趣，详细地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并指示，要多搞农家肥。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靠细菌帮助的。

这时，毛泽东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一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啊？”在场的人谁也答不出来。见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吭声，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要注意学习，除了政治理论，还要多读一点专业方面的书。”他这次到长春，随身就带了不少农业问题的书籍，还让省里的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45~46页。

同志帮他找有关土壤学的著作。

毛泽东问：“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有同志介绍，常用的是“拉刀切土”法。就是头一天先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沿着格印，一大块一大块地撬起来，又会露出下面的暖土。

“附近有搞的吗？”毛泽东问。他是想去实地看一看。

有同志讲，吉林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较低，有人主张应放弃一部分耕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总产量就会下降。请示毛泽东，怎么办好？

毛泽东回答：“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定。”他鼓励大家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方针。谈话中他叮嘱又叮嘱，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

毛泽东在机关大院分别和省市负责人合影，和机关干部以及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合影。天气虽不错，室外也有摄氏零下十多度，许多人还穿着棉袄、皮大衣，毛泽东却只穿一件灰大衣、单皮鞋。照相时，他还专门脱下了帽子。

14日上午，毛泽东视察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到制片厂时，一些人正在办公大楼的走廊看大字报，看见毛主席突然出现在眼前，真是又惊诧又激动。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看大字报，又向厂负责人询问工作情况，问长影这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地制片厂一共拍多少片子？

“只能拍50多部？”他似乎并不满足这个数字。

第六摄影棚正在拍摄故事片《红孩子》，场景是一条羊肠小道，两旁绿树成荫，青草满坡，虫声唧唧，一片秋夜景象。故事情节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儿童团在一个夜晚机智地勒死了敌人的哨兵，缴获了武器。

毛泽东蛮有兴致地看着。一个场景拍完，负责人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这些就是红色儿童团，请毛主席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孩子？”

毛泽东笑了，拉过小演员们到自己身边，问他们是哪里人？哪个剧团的？在哪个学校上学？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围着毛泽东，小嘴呱呱啦啦地讲个不停，都争着回答问题。尤其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更是偎到主席跟前。

看见如此动人的场景，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抢开了镜头。毛泽东抬头发现了，用手挡住，风趣地说：“不要把我当戏拍进去啊！”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走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的树叶和青草问，真的能不能用？又指着院内堆着的拆卸下来的旧布景布，问这些东西能不能再用？

第一摄影棚在拍另一部影片，情节是：一

位青年渔民得了重病，他的母亲为此忧愁无比。毛泽东一出现，情况大变，扮医生的忘了给病人看病，忧愁的老母亲笑逐颜开。毛泽东也乐了，说：“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大家笑得更欢了。扮演青年渔民的演员，光脚从床上跳下来，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毛泽东夸张地说。大家更乐了。

时近中午12点，毛泽东到了第一录音室。那里正在进行《火焰驹》的录音工作。他一出现在检听室旁，一刹那，演员忘了歌词，乐队忘了伴奏，只是出神地望着这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半晌，大家才如梦初醒般叫道：“毛主席！”

毛泽东举手致谢，并和大家握手。厂长介绍说，他们是由陕西来拍秦腔《火焰驹》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秦腔电影剧团的一位演奏员，眼睛几乎全失去了视力，只能见一丝微光。他摸摸索索挤到毛泽东身边，使劲地看，看到了毛泽东的大衣。他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他的眼睛没有瞎，他看到毛主席啦！



1958年2月14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和《红孩子》小演员在一起。（摄影/侯波）

和大家见完面，毛泽东走到录音室门口，院里已围得水泄不通。毛泽东转过身，面前是一片欢腾的人海。^①

下午，毛泽东登上专机从长春飞抵北京。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49~51页。

二十七 召开成都、武汉、广州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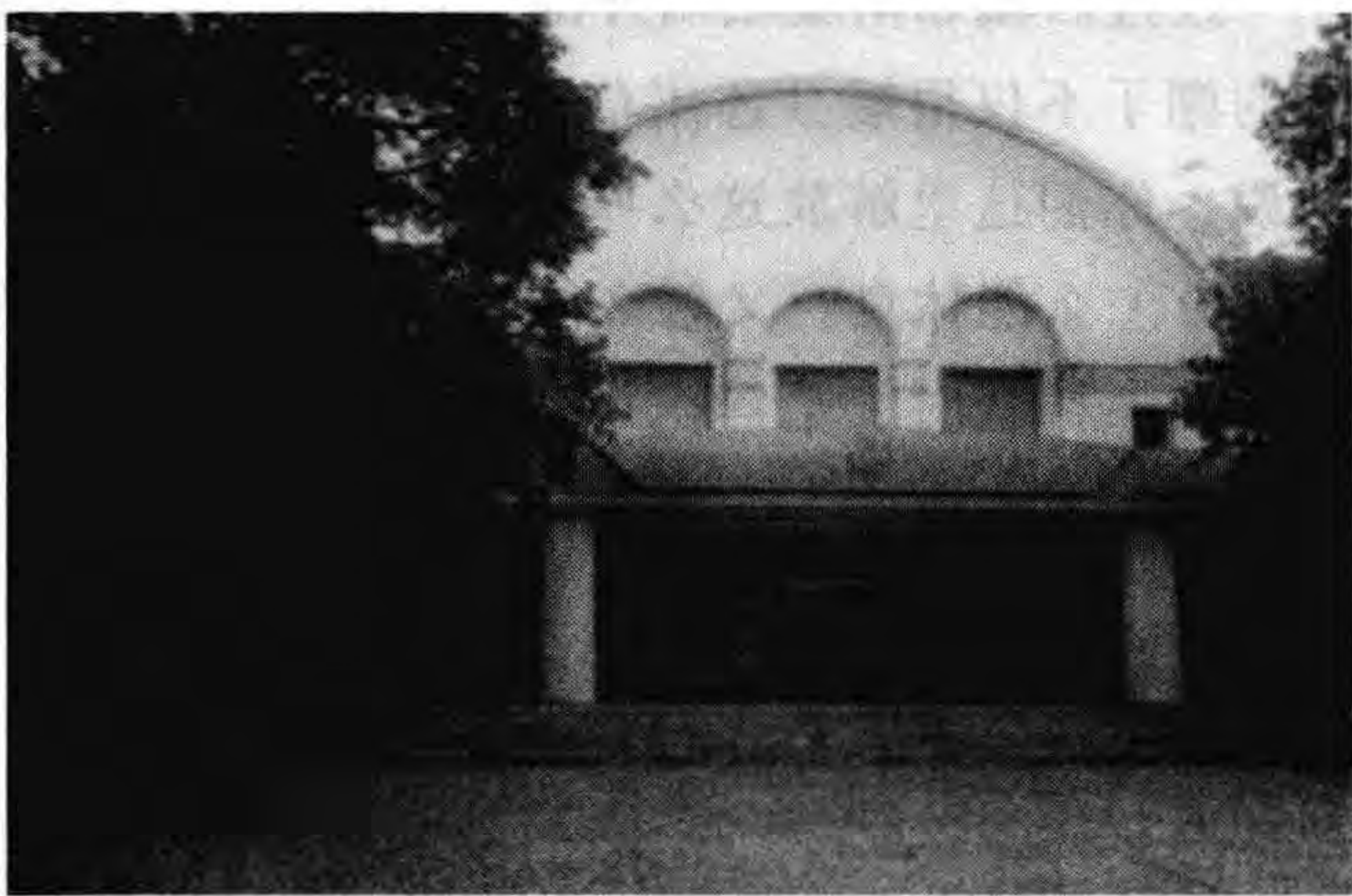
3月2日，毛泽东就陈正人2月26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稿批示：“电话告知陈正人同志：文件收到。因我即日出巡，不能谈话了。”^①

3月4日上午，毛泽东乘坐“伊尔—14”，从北京飞成都。负责这次专机任务的是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机长是胡萍。

“伊尔—14”中途在西安加油。毛泽东见接待他的是袁学凯，开玩笑说：“你和袁世凯，只一字之差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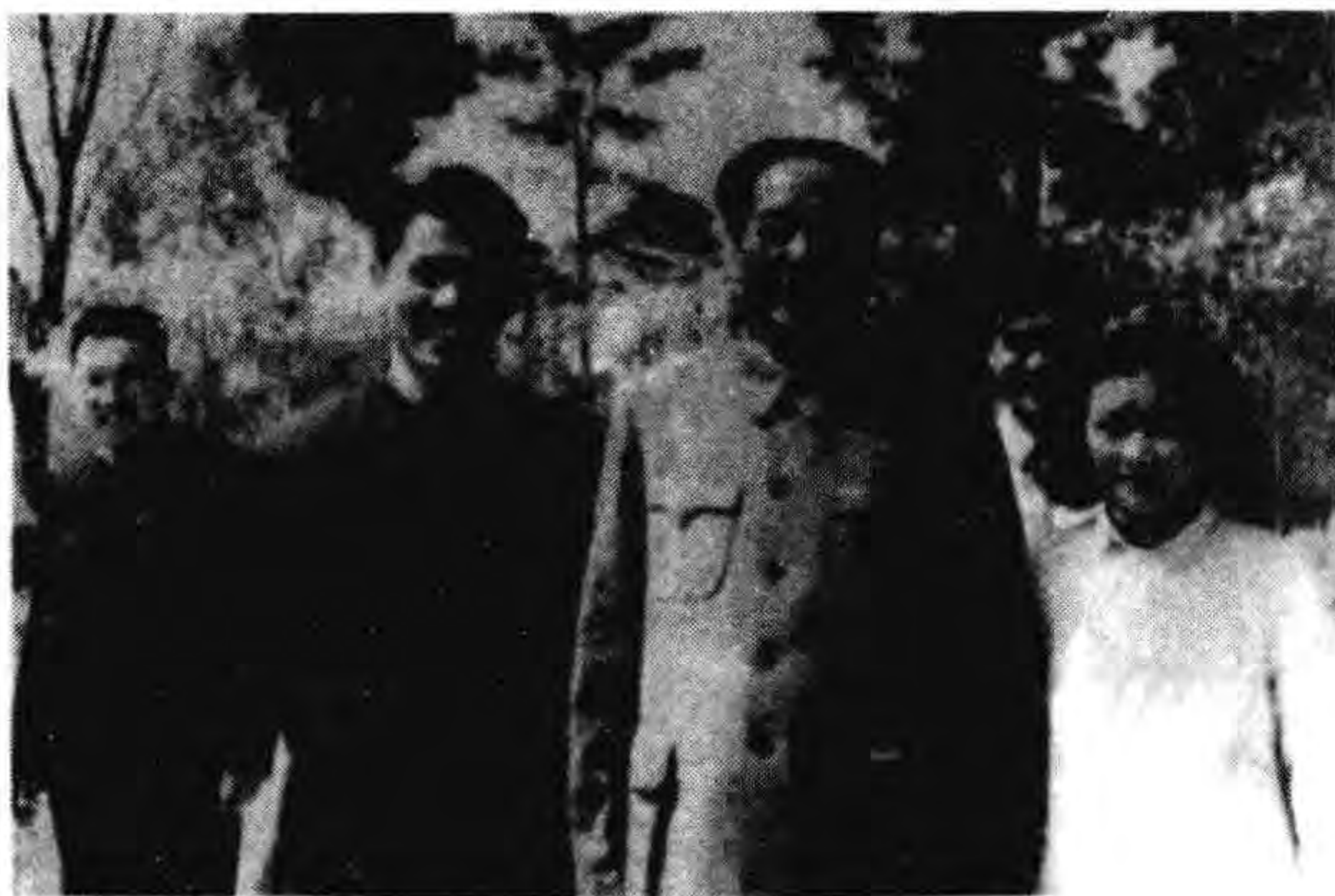
下午，专机到达成都上空。只见树上、房顶上、墙沿上到处站满了人，有的挥舞麻袋，有的摇晃竹竿，有的嗷嗷乱叫，有的敲锣打鼓，热闹得不得了。原来他们正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赶麻雀！

专机飞抵成都，毛泽东下榻金牛坝招待所。到招待所，看了住房，说：“我住的房子这么大呀，太



成都会议会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02页。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金牛宾馆和工作人员合影。
(摄影/侯波)

浪费了。”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撤去招待所原来的软床和新卧具，换上硬板床和自带的卧具。

4日，到成都，9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这其中的几天，毛泽东主要用来读书看报和了解有关情况。毛泽东随身携带了几大箱子书籍，到成都后，又叫秘书从省、

市图书馆借来了许多有关四川的书，如《华阳国志》、《四川省志》、《蜀本记》。他听取了有关负责人的汇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情况。

5日上午，毛泽东就山东灾情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①

下午，休息起来，毛泽东坐车察看了成都市容，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长势，视察了成都量具刃具厂。

经过西城和南城城墙外围，看见靠马路和城墙边上有不少破烂的棚户，有的棚子不仅很矮，还用草和树枝盖顶，不能遮蔽风雨，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消除“四害”？当看到不少茶馆里围坐着许多群众时，毛泽东说，四川茶馆真多。陪同人员告诉他：不仅城市有，乡场上也不少。毛泽东问：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陪同人员说：场期不一，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还有的是一四七，在一个区范围内，几乎每天都有场可赶。毛泽东又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陪同人员告诉他：看茶叶好坏，三五分钱不等。毛泽东用指头算了一下说：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吧，光茶钱一年就要好几块钱。他说：场期过密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05页。

不可以改革一下吗？又说，改革场期关系到各个方面，要研究好，不然会受到影响的。

汽车在城墙边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说，这个城墙为什么不拆除，陪同人员说：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议论过，有人提议要拆，有的人说这是文化，不能拆，要保留。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群众交通方便，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

毛泽东十分关心民主人士的生活和学校的情况。在车上他问：李劫人现在怎么样？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怎样？陪同人员说：李劫人现在安排为成都市副市长。毛泽东说，1945年在重庆时一个座谈会上见过他。毛泽东还询问了其他几个民主人士的情况。

车经过四川医学院后门，毛泽东问这是什么学校。陪同人员说：是四川医学院，即原来教会办的华西大学。毛泽东说：可不可以进去看看。说：进去绕一周，不下车。在车上，他询问了学校的情况，还对陪同人员讲了加拿大友人文幼章先生的情况。

看了市容，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去郊区农村察看庄稼长势。闲聊之中他得知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便即兴赶到量具刃具厂视察。毛泽东说：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摄影/侯波）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下午4点多，毛泽东到了量具刃具厂，在备料车间主任王德明陪同下到车间参观。

进车间不远，就看到锻工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干得正欢。王德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是太原的产品，大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走得很慢，问这问那，什么都很感兴趣。在调直台前，他问：“这是什么？怎么用？”王德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在材料库，毛泽东摸摸一盘带钢，问它的用途。王德明答，带钢是作量具千分表的材料。一个检查台上面放着新做出的许多配件，毛泽东拿起一件：“这是量尺吗？”王德明说，是量尺，也叫卡尺。毛泽东点点头，询问各种检查器的效能，对量具刃具的精密程度格外注意。

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住一位青年工人油迹斑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看完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厂党委书记和厂长急急忙忙地赶到。毛泽东向他们打招呼，解释因为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他看得高兴，便要再到铰刀车间看看。

5点，这是工人交接班的时候，下了班的工人们一群一群涌向铰刀车间。写在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一条条看着，忽然回头问道：“什么是文明生产？”“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厂干部回答。毛泽东挺满意，称赞道：“很好。”

离厂时，天都快黑了。^①

7日下午4点，毛泽东游览了成都杜甫草堂。毛泽东没从大门，而从草堂寺这边过来。踏过小桥，环顾着四周的翠竹、苍松和高大的楠树，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走去。

工部祠是杜甫草堂最后一幢建筑，因杜甫当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

^① 陈文书：《毛泽东与四川》第179~180页。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53~55页。

郎而得名。一室三楹，肃穆庄严。毛泽东在看左壁间嵌着的后人凭吊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时，十分入神。有时用右手轻抚下颚，有时把微弯的左臂背在身后，口中似乎低吟微咏。看了题壁，又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走出来往诗史堂走去。

“这是什么地方？”毛泽东问杜甫草堂的负责人林延年。他是从后面步入堂内的，因此没有看见悬在前面镌有“诗史堂”三字的匾额。

林延年介绍说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毛泽东很有兴趣地看了堂两壁间悬挂着的各种杜甫石刻像和画像。

堂正中有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毛泽东在它面前站定，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着一支烟，慢慢地吸着。

诗史堂东西两侧配有对称的陈列室，有回廊连接。毛泽东沿着这回廊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浏览宋、元两代杜诗书影。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版面宽大，字迹清晰易认。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有多少本？”毛泽东问。“发行到成都的约有十多部。”毛泽东叹道：“太少了。”

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是政治诗！”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参观成都杜甫草堂。
(摄影/侯波)

最后，毛泽东走到大廨，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休息。他的神情从容轻松，吸着烟，四下环顾。他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蜺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地念着，然后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

从大廨出来，便是草堂的大门。毛泽东参观结束。^①

8日，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和楹联50余种。

当天，毛泽东还对彭德怀关于空军进入福建问题的报告做出批示：“已阅。退彭德怀同志：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②

同日，毛泽东在金牛坝宾馆接见了参加成都会议的全体代表。

3月9日至26日，成都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

中央各部只有冶金、农业、铁道和化工四部部长参加，地方上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武昌会议（4月1~9日）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参加成都会议的共39人（比南宁会议多14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王鹤寿、廖鲁言、滕代远、彭涛、林铁、刘仁、陶鲁笏、黄火青、欧阳钦、黄欧东、吴德、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张德生、张仲良、高峰、王恩茂、李大章。

在成都会议上，全体人员参加的称大组会，主要开大组会；另外分成三个组，小组会开的次数很少，主要是通过文件。

头十天是大家轮流发言，结合讨论，后七天主要是大组讨论。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发言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5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07页。

9日上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事前他写好了提纲。

毛泽东提出了25个问题以便大会讨论，他的讲话也围绕着这25个问题。

1. 协作问题。
2. 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
3. 税制和价格问题。
4. 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
5. 第二本账问题。
6. 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

毛泽东对行将开始的大跃进表示了某种担心：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12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

毛泽东说，湖北五至七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毛泽东说，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要接腿。

原先说三个五年完成工业化，究竟能缩短多少时间？

7. 招工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可不得了。山东要15万人，山西招临时工17万人。如果不注意就是真正的浪费。

8. 平衡问题。

毛泽东说，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调整分工，要好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失业，如何办，哪里去吃饭？

9. 平衡理论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社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10. 粮食包干问题。

11. 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

毛泽东说，欧洲现在没形成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起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一万年后写历史，各有褒贬。

12.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13. 两种方法的比较。

毛泽东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苦战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改变面貌”，是办不到的，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14. 文教有人提倡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15.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16.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

毛泽东说，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毛泽东说，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

17. 整风问题。

18. 右派大会开不开？主要的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们一条出路。

19. 农具改革运动，要普遍推广，要一直改到拖拉机。

20. 六十条现在还非正式，要修改或重写，基本观点不变，还要有所增减。

21. 报纸如何办？

22. 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

23. 国防计划问题。

24. 出版理论刊物问题。

25. 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

毛泽东说，南宁会议提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质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25个问题谈完之后，毛泽东又谈了规章制度问题。

毛泽东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

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毛泽东讲完之后，余下的时间，由乌兰夫和陶鲁笳发言。^①

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事前写好了提纲。

毛泽东讲话的主题是借规章制度问题，讲思想方法。题目是“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毛泽东回顾了我党的历史，说了各个历史时期教条主义对我们党的影响。

在谈到解放后教条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汤，害得我三年不准吃鸡蛋，不准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总之，是苏联第一，一切照办，一切奉行。“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关于中医中药，同卫生部作过斗争。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教条主义的一些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90~79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20~121页注。关于规章制度一段话，《大跃进亲历记》记述如下：南宁会议提过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还有其他：一曰化验（食物）；二曰出去前呼后拥；三曰不许参观，不许游水，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自己姐姐做饭，这是好事，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其他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开国之初，没有办法，但也不能认为非都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好像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落魄，丧失独立思考。

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们的同志应当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么迷信。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

从3月10日起，会议安排得很紧，除白天开会外，有时晚上也开，中间两个星期日（3月16日、23日）休息。

10日至15日下午，17日至19日上午，各地负责同志先后发言，共有16人，谈本省、市的基本情况，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也谈问题，都提到跃进的计划。这些大组会，毛泽东都参加了，都有或长或短的插话。

上、下午或晚上，共有五次大组讨论会，讨论那25个问题及印发的30多个文件中比较重要的和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这种讨论会。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各部部长，发言比较多。晚上开的三次小组会，都是通过会议文件。其他时间则阅读文件。

10日至19日，毛泽东在各地负责同志发言时有很多的插话。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91~793页。

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谈到在努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要注意增加农民的收入。他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 and 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

南宁会议以后，各地都在研究农业四十条的落实规划，这次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省汇报规划。南宁会议后王任重受命联系河南、湖南的情况，在会议上王任重汇报：河南的吴芝圃提出1958年麦收前全省消灭四害。（毛泽东说，怎么能消灭那么多？）1958年底全省消除文盲。（毛泽东说，这怎么行？哪个文盲字认得这么快？）王任重继续汇报：吴芝圃还提出今年实现四五八。给他打了电话，说主席的意见，不要讲得过死了。问他是不是登报了，吴芝圃说，没有登报，在党内讲的。以后吴芝圃来电话，活了一点，说今年或明年实现四五八。王任重说，现在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速度到底有多快，到底一年实现四五八，三年、五年或者七年？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说，你河南这一来，把我们什么都捅破了。假如它能一年实现四五八，只有两个月就要全部实现水利化，今年就要消灭文盲。毛泽东的话说了一半，谭震林插话：这两条，一个水利化，一个消灭四害，我看是可能的。由于谭震林的插话，毛泽东的话只有减半，说，一个四五八，一个消灭文盲，不一定能做到。）

在欧阳钦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在黄欧东发言，谈到两年实现亩产400斤时，毛泽东插话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在吴德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靠得住靠不住？

在张德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对那些（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在李井泉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标准是工农业不出大乱子。

在李井泉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毛泽东说：“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棉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有伸缩好些。

毛泽东在大家汇报时还谈道，党、政、军、商业机构要缩小，技术机构要扩大。

毛泽东说：“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弄，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弄。”

毛泽东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陈伯达谈道：最近主席了解了一下渤海区的情况，我们去住过几天，就感觉到的确是“大跃进”。毛泽东插话：我看了一下渤海黄骅合作社，只有两年时间，根本翻过来了，只种一季水稻，亩产1000斤，是新开垦的一个区，80%至90%以上的人口都是外来户。从北京坐吉普车，经天津、大沽一天即到。那个地方过去出蝗虫，现在产水稻。

毛泽东说，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又有现代工业、又有现代农业、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真正的醒狮派。但发起威来，不搞大国主义。^①

16日周日休息，下午6点多，毛泽东到四川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视察。红光农业社的社长周桂林，副社长刘贤松，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和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赶到社机耕道，毛泽东下了车。握手的时候，毛泽东说：“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毛泽东一边和大家在机耕道上慢慢地走着，一边向干部们问起生产情况。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93~795页。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征询社长们的意见。

“好！”社长们回答。

屋里只有一位正患眼病的60多岁的老婆婆林赛华在家。她看见许多人簇拥着一个高大身躯的人进了门，以为是来了一位外省的大干部。

毛泽东在堂屋坐下，学着用四川话对老婆婆说：“我们摆一摆好不好？”

他问林赛华什么时候入的社？一家几口？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统筹粮？一年分多少口粮？

说到口粮，毛泽东很关切地问：“口粮够不够吃？”

林赛华说：“够吃。”

副社长刘贤松说：“去年平均每个社员分400多斤粮……”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对林赛华说：“他说的不算，你说，是不是真的够吃？”

林赛华连忙道：“真的够吃！”毛泽东这才满意地笑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的社长？”毛泽东问。

“认得到。”林赛华转身指着周桂林和刘贤松说，“这是我们的周社长，这是刘社长，我们社还有张社长、穆社长……”

“社长对你们好不好？”毛泽东问。

“好。”林赛华笑着说，“我们的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

毛泽东换了话题：“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七害。”林赛华胸有成竹。

“七害？”毛泽东俯身向前要听一听。

林赛华扳着手指数道：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七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林赛华说。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社。
(摄影/侯波)

毛泽东问：“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它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留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毛泽东挺满意地对林赛华说：“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呢！”

毛泽东起身进了灶间，想看看偷油婆是什么样。打开碗柜没有发现，却看见里边的碗筷收拾得干净整齐。他又到堂屋，问林赛华，能不能再看看你们的房间？

房间虽不大，但也整理得清洁整齐。毛泽东走出来，幽默地说：“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林赛华一本正经：“我们是贫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

走出林赛华家，毛泽东一边往前去看农田，一边向社长们问起社里有多少户，有多少田，有多少生产队，生产队下有没有生产组。

毛泽东问：“三个队长里边有没有女队长呢？”

“有，每个队都有一个女队长。”

“组长里边有没有女的？”

“每个组都有两个组长，一个男组长，一个女组长。”

“有没有女社长？”

“有一个女社长。”

“怎么没有看到她？”毛泽东回身打量身边的一群社干部，有人立即找

人去把女社长萧绍群找来。

不一会儿，萧绍群来了。毛泽东和她握手，关切地问：“你们社有九百多户人家，管得下吗？”萧绍群说能管下。周桂林社长这时也说：“有党的领导。”毛泽东听了点头。

路边有一块麦地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在成都红光农业社和农村大娘交谈。（摄影/侯波）

的苗显得比较矮小，毛泽东看见了，说：“这些麦子算不算好的？”

社长们说：“这是社员们在自留地上种的小麦，不算好，是中等的。”

前边一块菜籽田长势不错。毛泽东走进去，站到金黄色的油菜花中，问：“这样一亩田能收多少斤菜籽？”

周桂林估摸了一下说，大约能收一百七八十斤。毛泽东把右手比划着胸前：“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又往上一抬，比到齐颈的高度：“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再往上举，到一人高的时候：“能不能长这么高？”一边比划，一边开心地笑着。

村里的一帮妇女和孩子围着毛泽东看个没够。毛泽东走过去，指着跟前的孩子问：“你上学没有？”他一直问了四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时，边上有人说她已经高小毕业，正在家劳动。毛泽东问她：“劳动好不好？”那小姑娘说好。毛泽东赞许地说，很好。

接着，他问社长们：“社里办了民校没有？”周桂林说办了一个。毛泽东说：“再办一个好不好？”社长们应允了。

转上一条小道，去看一块麻田。麻田前有一个三尺多宽的沟。周桂林跨过去，转身要扶毛泽东一把，却见他已跃步而过。走到麻田边上，毛泽东问：“会不会踩坏麻？”周桂林说：“不会，苗子小，从中间走不要紧。”

一个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走过来的小女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这女孩叫王祖运，她回答说：“是开荒的时候被锄把震裂了虎口，正在化脓。”

“给她点药，把伤治好。”毛泽东给随行的保健医生说。隔了两天，毛泽东还惦记着这个女孩，又吩咐医生专程来为王祖运换药。

返回时，毛泽东又问起社里除七害的事：“今年能不能把七害除完？”

“一定能除完！”周桂林向毛泽东保证。

“你们用什么办法呢？麻雀怎么消灭呢？”毛泽东问。

“麻雀好办。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熬更守夜地干，到处吆赶，只留一块空地，让它们停下来，落一个打一个。”

“老鼠呢？”

“老鼠也好办。”周桂林又讲了灭鼠方法。

“苍蝇、蚊子呢？”

周桂林说，苍蝇蚊子就更好办了。

“为什么？”毛泽东挺有兴趣地问。

周桂林讲，社里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并说“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把它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了。

毛泽东好奇地问：“它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解释说：“以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的。”

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接着，他又问，这种“打破碗花花”好找吗？

周桂林说好找。说完走到田坎边随手拔来一株。毛泽东拿过来看了看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并嘱咐，县委书记和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天色落黑了。毛泽东离开了红光社。

“打破碗花花”的事三天后也有了结果。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材料介绍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里能杀蛆灭子孓，还能毒杀土蚕、蜈蚣，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毛泽东把这个材料专门推荐给参加成都会议的同志，并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转述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的由来：“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后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向全国农村介绍这种植物及其用途。^①

19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部分按语，写了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58页。

如下的话：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①

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事先毛泽东写好了提纲。

毛泽东讲了四个问题，大意是：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应同时进行，请各省市迅速推进。河南、河北已形成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39页。

再来一个运动，岂不更好。毛泽东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挡，但领导上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目的是调整生产节奏。如果只有急和劳，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武昌县委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在会议散会的时候，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毛泽东：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毛泽东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①

21日，陈云在大组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毛泽东随后讲道，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谈了，不要再作检讨了。

21日上午，毛泽东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到达四川灌县都江堰，毛泽东特意来看都江堰。毛泽东站在玉垒山腰，拿望远镜眺望都江堰和远处的大雪山，参观了伏龙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都江堰灌溉分区图，然后参观了宝瓶口。

返程路上，毛泽东心情极佳。看见路边田里有社员劳动，就停下车，跨过路边小石桥直奔庄稼地。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95~797页。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2页。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视察都江堰。（摄影/侯波）

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

“要把草锄干净哩！”麦田里有一些杂草没锄尽。毛泽东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冉贵全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伸出了四个手指：“400斤？”

冉贵全这才醒过来似的说：“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围拢来的农民都有些惊奇，毛主席还会估产，连田里能收多少麦子都知道？

毛泽东问：“割了麦子种什么？”

冉贵全说：“种水稻。”

毛泽东又问：“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冉贵全道：“600多斤。”

毛泽东把头转向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说：“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冉贵全肯定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冉贵全吭哧吭哧不知怎么对答，正想再说些什么，毛泽东已迈上田坎。

一个农民迎面走来。毛泽东上前和他打招呼，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看都江堰建设模型。（摄影/侯波）

读没读书？那农民说自己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指着他的肩膀：“好哇！”

沿着田坎走过去，毛泽东跨进一块苕菜地。地里几个女社员正忙着摘苕菜。“你们摘什么？”王应岗说：“摘苕菜。”毛泽东走过去：“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说着，弯下腰就摘起来。不一会儿，把一把嫩绿的苕菜尖递给了王应岗：“这行不行？”王应岗连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别的几个女社员这时也停下手里的活，想喊几句毛主席，话到嘴边又激动得喊不出来。

出了苕菜田，毛泽东沿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去。几个孩子呼叫着紧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叫任国民的少年：“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任国民说：“认得。”

毛泽东弯腰随手摘了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任国民，问：“你敢不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说：“敢拿！”就伸手去接。毛泽东笑了，很欣赏孩子的勇气。大家也都笑得挺开心。

毛泽东返回公路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也很愉快，和大家握手告别。^①

返程途中，毛泽东在街边一家普通餐馆用餐，吃豆花和辣子回锅肉。返回成都已经是晚上7时许。

22日7时，毛泽东给滕代远写信：

滕代远同志：

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悉的地名不要重写。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②

当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事先写好了提纲。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说，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并不砍你的头，撤你的职。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高，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毛泽东说，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那很危险。

毛泽东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46页。

毛泽东说，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真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①

24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的意见，从这天上午起，会议采取召开大组会（差不多是全体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泽东不出席，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②

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第五次讲话。毛泽东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97~799页。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4~65页。

毛泽东说：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東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東西。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

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毛泽东说：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过高的指标要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支票开得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又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好措施。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笏、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①

26日，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六次讲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一年抓四次很重要。不抓，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799~801页。

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掌握建设的进度就会稳一点。下次会议重点放在工业，七月间开。河北的一百亿斤粮食，一靠人民，二靠上帝。“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

毛泽东还谈了阶级分析问题说，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最后，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这很有必要。从中央、省到地这三级，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较大的问题，才可能做一些研究工作、调查工作。必须如此。总之，少管一些事，才有可能多管一些事。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今天会议就结束了，明天如何走法？分道扬镳。^①

晚饭的时候，田家英告诉吴冷西：毛泽东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毛泽东说他将去武汉，要吴冷西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②

成都会议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成都的生活情况：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繁忙，他经常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用一个小时游泳、散步，其他时间几乎全部放在工作和学习上，连吃饭和游泳休息的短暂时间，他都在批阅文件或看书报。毛泽东的生活十分俭朴，招待所给他准备了软床他不要，要睡硬板床。招待员看是硬床，又给他准备了三床棉絮。他说只要一床就够了。他的衣着也很朴素，穿的衬衣还打有补丁。毛泽东经常与招待员谈心，问他们家庭、个人生活和学习情况。毛泽东吃的饭很简单，只要两菜一汤，稍稍多做了一点菜，他就要批评。他还要炊事员在米饭里加苞谷、豆类等杂粮，还要每天给他送一块烤红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802~803 页。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65 页。

在饭桌上，说这样既节约又有营养。他还指示会议伙食也要这样办。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除了主持会议、批阅文件、处理国家大事和外出参观考察外，阅读了大量图书。数量之大，使人惊奇。在归还图书时，一部69嘎斯车满载图书，分别归还给省图书馆、杜甫草堂阅览部、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馆和成都市图书馆。

由于毛泽东的习惯是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10点以后阅批文件和读书。因此，毛泽东常常晚上10点以后，甚至深夜提出要某一部书，为解决这个问题，省图书馆古书部确定了晚间值班人员，做到一天24小时都可以借阅图书。

27日上午，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离开成都，计划经重庆去武汉。

上午11时5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成都，往自贡方向而去。

途经资阳站，毛泽东下车散步，查看菜地，顺路到一位铁路职工家坐了约10分钟，问了一些家庭情况，然后由职工家的后门出来回到站台。

离开资阳站，柯庆施找到铁路局长胡景祥问：“怎么车站看不见一个群众呢？领袖不能脱离群众嘛！”

胡景祥表示，这不是铁路的问题，是地方公安部门布置的。于是，把省公安厅一位护送专列的副厅长找来，要他通知前方停车站允许群众进站，但同时考虑安全，在专列将要出发之前放行。

途经内江，李井泉、胡景祥等人又陪毛泽东下车走动。

看见不远处有两幢农舍，毛泽东便朝那个方向走去。无奈小道两旁全是水田，道不好走，他只得说：“往回走吧！”

回到站台，胡景祥向毛泽东谈起，内江是产糖的名城，南边的自贡市产盐，也很有名，那里还有天然气。毛泽东来了兴趣，对李井泉说：“天然气我还没有见过，让我看看行不行？”预订的计划原本要去自贡，但计划已临时被取消，再要改变计划很难。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李井泉紧张起来。“前面隆昌县有炭黑厂，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看也可以的。”胡景祥出主意说。毛泽东同意了。^①

下午6时，专列停在隆昌火车站。毛泽东带领随车领导参观了隆昌气矿炭黑车间。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70页。

在隆昌火车站，车站站长跑来告诉胡景祥：“隆昌县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他们都不在家。”

胡景祥也慌了，急忙告诉李井泉，他也着急没办法。李井泉陪着毛泽东，还有柯庆施等不少陪同人员都在那儿等着，从车站到气矿有20多华里，急需用车，怎么办呢？

就在胡景祥带着车站站长来回奔忙，想办法的时候，突然从内江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车停下，跳下来一位省公安部门的同志。原来，专列在内江车站开动时，这位公安同志因故漏乘，只得临时找来一辆车赶往下一个停车站隆昌。他的这个差错，没想到救了这里的急。这辆车既小又难看，破旧不堪，但有总比没有强，只好让主席将就了。主席由李井泉陪同坐小车，柯庆施他们十来位陪同人员怎么办？

胡景祥问站长，能不能找来一辆卡车救急？站长犹犹豫豫地说：“刚才炭黑厂来一辆卡车到站运煤，行不行？”胡景祥听了，只得说：“你快去叫司机把车开到这里来。”一辆既脏又没座位的卡车开到柯庆施等人跟前，正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毛泽东有些心急了，他一挥手，大声叫着柯庆施的名字：“快上嘛！”于是柯庆施等人只好一拥而上。

毛泽东和李井泉上了小车。李井泉招呼胡景祥上车带路，胡景祥说车站还有事，就让一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坐在了司机旁边。天空乌云密布，汽车出发不久，突然下起挺大的雨来。胡景祥心里叫苦，主席坐的车虽然不好，尚能避雨，柯庆施他们坐在大卡车上怎么办？

再说，隆昌气矿接到火车站的电话，要气矿矿长火速带着小车到火车站。一时找不到小车，矿长刘选伍急忙坐上一辆中吉普出发。公路凸凹不平，司机也管不了那么多，加大油门猛开。

快到隆昌县城时，迎面来了一辆小车，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会车时，大车上有人向刘选伍招手示意。刘选伍急忙叫司机调头。而隆昌县委领导得知主席专列到隆昌站的消息时，也派了两辆吉普车赶来，在离车站不远的途中与车队相遇，及时使柯庆施他们换了车，免遭一场雨淋。

刘选伍乘坐的中吉普车速较慢。当他到矿上时，毛泽东等人已被行管科副科长冯占海迎进矿的小招待所会议室。气矿的几个年轻人林国浓、谢奉露、王大芬远远看见小车里坐的是毛泽东，急忙跑到招待所，从门外探头探脑。毛泽东招呼他们进来，问他们的姓名，和他们握手。

这时谢奉露等看见刘选伍推门进来，忙说：“刘局长来了！”

刘选伍忙向毛泽东解释说：“我原在四川石油局，去年来这里兼任矿长。”他伸手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手，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气矿的关怀。”然后，他转身向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李井泉说：“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吧？”

李井泉说：“主席主要来看一下气井和天然气生产，边看边介绍吧！”

陪同毛泽东来川的王任重问：“气井有多远？”

“气井离这里有四公里，炭黑生产车间只有一公里多，都在后面山坡上。”

李井泉征求主席意见说：“我们现在去看吗？”毛泽东站起身表示同意。

大家一起出门下坡。刚赶到的矿党委书记安增彬先行一步去安排一下，这边刘选伍陪毛泽东坐一辆车，其他人分乘别的车也朝后山开去。

刘选伍上了毛泽东的车，十分拘谨。毛泽东首先开口问他：“天然气含有什么成分？”

“主要成分是甲烷、乙烷等碳氢化合物。”刘选伍答。

“还有些其他成分吧？”刘选伍说，还有少量的硫化氢。接着刘选伍说到隆昌气矿正在试验用天然气制造合成汽油。毛泽东很感兴趣，问天然气要制造合成汽油，要去掉哪些成分？刘选伍说，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等成分。

路不太好走，汽车时而拐弯，时而爬坡，路过机修厂、配电所、仓库，然后直接开到炭黑车间。

大风夹带着烟雾四处飞散，毛泽东往车间里边走去，听车间副主任梁锡远讲生产操作过程。

当他听到天然气中的硫化氢通过脱硫塔被脱出时，抬头看着飘散的烟雾，问：“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

梁锡远和安增彬回答说，硫化氢随空气跑掉了。本来可以回收硫黄，现在还没有回收设备。毛泽东意识到，这不仅浪费而且污染环境，他说：“要尽快解决回收处理问题。”

走到生成炭黑的一号火房面前，梁锡远打开它的小门让毛泽东察看里边的燃烧情况。风大，又有雨，看不清楚。梁锡远又陪毛泽东转到最后21号火房门前。这里背风，可以清楚地看到输气管上密密地排着上千支火嘴，



1958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去重庆途中到隆昌气矿看炭黑生产。（摄影/侯波）

喷着红黄色的火焰，烧成的炭黑黏附在火焰上方慢慢移动的槽钢上，再被刮板刮下来，经输送带输送到包装车间。

毛泽东看得很高兴。这时在露天，还下着雨，他嫌站着看不清楚，索性撩起身上的大衣，蹲下来看。他问：“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梁锡远答，按照设计安装是1728个。

看着看着，毛泽东发现槽铁似乎没有像梁锡远说的那样来回移动，便问：“怎么看不出槽钢在移动？”

梁锡远解释说：“槽钢移动很慢，十分钟只移动一公尺八，不容易看出来。”

毛泽东问气矿的年产量，梁锡远说，现在气矿的产量已经比初建矿时增加了五倍以上，有一千多吨，约占全国炭黑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站起来，问柯庆施：“你看到了没有？你认为怎么样？”

柯庆施说：“看到了，指自贡市是用天然气的热能烧盐，这里的热能没有利用起来。”

毛泽东说：“自流井的天然气烧盐，跑掉了炭黑。”他很内行地指出了解决天然气综合利用的问题。

时间已是晚上7点多钟，风没有停，雨也没有住，毛泽东的衣帽已被打湿，他还想去离这里很远的产气井。天黑路滑，加上时间也晚了，李井泉和柯庆施都竭力劝他不要再去，毛泽东总算点头同意了。

回矿的路上，毛泽东又问起另一个问题：“这个矿是不是外国专家设计的？”

安增彬回答：“是我们中国专家设计的。”并介绍说，气矿建立在1953年，现在已经从解放前一口小井，发展到了20多口井。

刘选伍还告诉毛泽东，他们现在能生产三种炭黑，今年还准备试制一种新产品——高耐磨油机炉黑。毛泽东听着高兴得不住点头：“很好！”

回程的路上，两边山坡和桥梁街道，早已挤满了人。毛泽东坐的那辆小车就在欢送人群组成的夹道中驶出气矿大门。

胡景祥在隆昌火车站等候着毛泽东一行。专列要离开时，大量的群众忽然拥入站台，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争先恐后跑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为了安全，胡景祥只得挡在车厢门前，许许多多双手从他面前伸向站在他身后的毛泽东……

专列加速，毛泽东进了车厢。人群渐渐看不见了，隆昌车站也愈行愈远。^①

28日凌晨1时50分，专列抵达重庆。当时贺龙正在重庆，他把自己住的小楼让给毛泽东。服务人员知道毛泽东不睡软床，为他换了板床，从楼上拉线，临时安了个电铃，以便毛泽东随时召唤。

在重庆，毛泽东只停留了一天时间。上午，毛泽东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毛泽东参观了二九六工厂。

29日凌晨1点多，毛泽东登上江峡轮，6时15分，轮船驶离重庆开往武汉。

在船上，毛泽东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毛泽东在江峡轮航行中还与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江峡轮大引水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摄影/侯波)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70页。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视察机床厂。
(摄影/侯波)

杨大福和年轻的女三副石若仪谈话。

毛泽东问石若仪：“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现在呢？”毛泽东问。“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样害怕了。”“是啊！”毛泽东

说，“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要石若仪好好向老同志们学习，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①

29日晚，江峡轮在奉节水面过夜。

30日晨，江峡轮驶入三峡。

吃过早饭，快到巫峡时，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首先与船员们见了面，和船长李吉成、莫家瑞、舵工贺理富交谈，问他们哪些地方最难航行？哪些航段需要修整？能不能夜航？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面的情况？

船员们告诉他，近几年来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夜间航行了。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74~76页。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毛泽东问。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连忙答道，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那人接着解释，过去试过，但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驾驶台向莫家瑞船长了解长江哪些地方最难航行，哪些地方需要整修。（摄影/侯波）

正说着，正面江心中突兀着一块大石头，仿佛直冲而来。只见舵

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那石头擦着船边掠去。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毛泽东又望一眼已在身后的大石头。船长说：“要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毛泽东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话，一面欣赏三峡风光。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

毛泽东问起船员们的生活情况：工资多少？比过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休假？能不能经常回家？毛泽东看到年轻的舵工贺理富掌舵十分熟练，走过去问：“多大年纪了？”贺理富说18岁了。毛泽东说：“还年轻啦，要好好学习。”

他又转身对船长说：“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授给青年人。”

毛泽东对驾驶技术也很感兴趣。他问驾驶部和轮机部有多少人？具体担负什么工作？他又向驾驶员们询问如何使用车钟，如何指示方向，如何掌舵。他说：“假如我学习驾驶，一定要学会驶过三峡这一段航程。”^①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74页。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与王任重等一起看长江航道图。（摄影/侯波）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乘“江峡船”过三峡。（摄影/侯波）

过完西陵峡，毛泽东回到船舱客厅里，同田家英、吴冷西长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②

经过规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船长受命让船减慢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细致地对设想要修建坝址的地方看了又看，沉默半天不言语，直到船驶出好远。

对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虽表示了意见，但还是情有独钟。在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一个意见稿上，毛泽东作了修改，还加写了一段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②

划的一个意见稿上，毛泽东作了修改，还加写了一段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80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卷，第 163 页。

30日，船至宜昌，王任重安排宜昌地委书记、荆州地委书记、沙市市委书记上船。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

毛泽东很关心经过三大改造后资本家的状况。他说：“帮助资本家找出路，利用他们的资金发展工业，方向是对的。”“像沙市这样的地方，发展轻工业是必要的，把一部分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上，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对农村的情况特别关心。他关心农民在兴修水利时的合理负担。他说：“你们在农村工作的时候，既要注意依靠贫下中农，又要注意教育农民。中国的农民在打倒地主富农时，有些农民就看着中农，特别是看着富裕中农。在农村，要防止侵犯中农利益，注意团结农民的大多数，注意教育农民，注意贫下中农与中农的团结，我们党如果不团结农民的多数，就会脱离群众。要引导广大农民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领导农民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①

船至郝穴，王任重请毛泽东察看荆江大堤。船慢慢减速，靠近北岸，缓缓而行。

船过公安，毛泽东吟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听不见，汽笛一鸣到公安。^②

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

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召开武汉会议。原来想在武汉听听河南、安徽关于落实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汇报，后来索性把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华东、华中、华南大区各省、市委主要负责人都找来汇报。

毛泽东依次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① ^②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122、123页。

1日下午，吴芝圃汇报。吴芝圃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①

2日下午，曾希圣汇报。曾希圣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提口号要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定一点。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②

当日，毛泽东还在东湖驻地接见了波兰政府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3日下午，舒同汇报。他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说，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③

晚上7时30分，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4日下午，江渭清汇报。他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④

5日下午，周小舟汇报。他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808、809页。

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①



1958年4月6日，在武汉誓师大会上，毛泽东、李达、王任重在一起交谈。（摄影/侯波）

晚上，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率领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6日是星期天，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接见了参加“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的武汉地区科学界5300多名代表。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讲话。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②

7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吴冷西先介绍了起草这个纲要的想法，希望各省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809、810页。

委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九个省、市（上海）委书记都提了意见。

下午，开会时毛泽东问柯庆施：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简单回答说，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吴冷西都记下了。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把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四十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①

8日下午，叶飞汇报。

毛泽东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②

9日，武汉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吴冷西、田家英也停留了几天。那时的湖滨别墅，同后来重建的东湖宾馆不同，是一栋石头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东湖岸边。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

11日上午，毛泽东早饭后散步回来，叫吴冷西、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

毛泽东问：在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吴冷西根据记忆，作了扼要汇报。吴冷西谈道，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1955年至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曾为此作过决定）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09页。

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毛泽东说，对省委提的意见，要作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作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从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泽东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

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1958年4月11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翠柳村参观武汉地方工业品展览会看竹制点头“喷粉器”。（摄影/侯波）

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催吴冷西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并且要吴冷西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①

11日晚上7时40分，毛泽东参观了武汉市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

12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在长沙，毛泽东连日与湖南省委书记们交谈，推荐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的经验，介绍安徽发动群众兴修水利的做法。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9页。

毛泽东从应举农业社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远景，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时间。他反复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争时间，争速度，15年赶超英国。要抓钢、粮，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要搜集整理反映群众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的民歌民谣并汇编成册。^①

下午5时，毛泽东忽然提出要到坡子街火宫殿吃饭。

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当学生时，也到那儿吃过油饼和臭豆腐。湖南方面作了安排，毛泽东一进营业间，就被工人发现了，顿时店堂和车间里沸腾起来。毛泽东和工人们握手交谈，询问火宫殿的历史变迁，原来一些老工人到哪儿去了，传统小吃的现状如何，并观看了工人布置的“鸣放栏”。工人们迅速做了几种特色小吃，端出来请毛泽东品尝。餐后，毛泽东和工人师傅一一握手言谢，并鼓励大家多生产物美价廉的风味食品，保持和发挥火宫殿的传统名牌优势。

告别火宫殿，毛泽东乘车来到驻省某部营房。

这天正值星期六，晚餐后战士们有的看书、散步，有的从事文体活动、副业生产。毛泽东看了战士营房和生活设施，检查了武器保养情况，参观了连队举办的反浪费展览室和荣誉室，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毛泽东还参观了战士们的菜地和养猪场，见到绿油油的菜地，毛泽东问：能否自给？战士们说：基本自给，少数品种要到市场购买。周小舟插话：湖南发现一种甜菜，每亩能产80多斤菜籽。毛泽东关切地说：好，有价值。农产品的提高，要靠科学技术，培育新品种。当看到猪栏里有六头300余斤的大肥猪时，说：“有条件的连队一定要养好猪，搞好战士生活。”毛泽东在一连视察了将近一小时，并应战士们的要求合影留念。^②

晚上，毛泽东观看了湖南木偶戏、皮影戏《鹤与龟》、《两朋友》等民间文艺节目。

13日傍晚（18时），毛泽东乘专机飞抵广州，住小岛一号楼。毛泽东准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53页。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437~438页。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看木偶戏后同演员见面。
(摄影/侯波)

备在这里召开广州会议。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要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同时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毛泽东到小岛宾馆后冒雨在院子里漫步一圈，和接待人员以及先后到达这里的

有关部门负责人见了面，还专门去看了与会同志的宿舍。

陪毛泽东一同回住地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及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卫生部副部长朱琏等人到此想告辞，让毛泽东休息一会儿。

“你们先不忙走嘛！”毛泽东不想送客，“再坐下谈谈！”说完，自己先落座。

大家也都坐了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些合作社和工农业生产的近况。

陶铸说起，广州有个糖厂，产量高，但怕销不掉那么多产品，打算砍掉。他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毛泽东想了想，不表态，把脸转向朱琏，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江苏人，你谈谈，你们江苏人喜欢吃糖吗？”

朱琏想都没想就回答，当然喜欢吃糖。江苏人吃糖，不仅偏爱甜食甜点，尤其无锡、苏州一带，烧的菜里就没有一样不放点糖的。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更讲究吃红糖补身子，亲戚朋友前来探望，糖也是传统的少不了的礼品。

“江苏有多少人？妇女人数能不能占到一半？其中育龄妇女约占多少？”毛泽东和在座的各位一五一十地算起来，结果是需要用糖的数字不小。

毛泽东感到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他吸了口烟，挥挥手：“好了，你们的糖厂不要砍了，产品多，在广东销不掉，就送到江苏去销吧，江苏老

百姓喜欢吃糖。”

停了停，他接着说：“少则就贵，多则就便宜。”他用手指一圈在座的人，“像我们这些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想吃糖而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①

15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90~91页。

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为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给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同志写信：“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①

19日下午4点，卫生部副部长朱珽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和洪敏医生一起去见毛泽东。

1955年4月，毛泽东曾经在杭州和朱珽谈针灸方面的事。对这件事毛泽东很关注。差10分钟5点，朱珽等人到时，毛泽东已经等在那里，正和江青聊着什么，看见她们进来，都站起来迎接。

握住朱珽的手，毛泽东张口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

朱珽回答说：“还没有办，现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

“不是还有一个中医研究院吗？”毛泽东问。

朱珽介绍道，针灸研究所就是中医研究院的一个直属单位。她又顺便介绍了研究院其他几个直属单位的情况。毛泽东用手指记着数，对中医研究的组织编制很关心，特别问起了中医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情况。听说在这个班学习的60名学员都是从高等医校毕业的西医，眼下临床实习还没结束，毛泽东说：“这个班有60名西医专门学习中医，好呀，但他们是不是真的诚心诚意地学呢？”

朱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也并不等她的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发表对中西医的看法：“我看，西医治感冒就很少办法，中医治感冒有时只要一副药就治好了。替我治感冒的中医就是用一副药。”他举出自己身边的例子：“此人姓刘名惠民、山东卫生厅副厅长也。我要他留一个药方，感冒时就用，昨天下午我吃了一次，晚上又吃了一次，熬一副汤药分两次服，出了点汗。今天感冒就好了。”他把脸转向江青，微微地点着头，又回头问朱珽、洪敏：“你们知不知道中医治感冒的药？”

朱珽随口举出一副，并说刘惠民中医治感冒的那副药的方子，自己已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77~179页。

抄录了一份。

“咳，西医治感冒，只会用些阿斯匹林、抗生素之类。”毛泽东说，“抗生素，我知道它是抗生物的作用。人亦是生物，光靠抗生素，把生命也抗死了，应该叫抗菌素。”

他接着解释说：“我说的抗菌素，是针对着抗危害生命的细菌——当然，有些抗菌的药也许并不能直接杀死细菌，你说是不是？”

他用眼光征询周围人的意见，然后说：“抗生素这个名称有些不通，但抗生素这个名称现在已经用惯了，也不必修改它。我是说光靠抗生素，就可以不死人啦？”

毛泽东的情绪激昂起来，思路也跳跃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卫生部不懂卫生，农村部不懂农村，你们知道吗？现在当然改了，尤其农村部改了。

院外，有不少人正忙着打扫卫生除四害，一个个干得很带劲，真可谓人人动手。

毛泽东的眼光从院外收回来，重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卫生部不懂卫生，你说是不是不相信政治能除四害？自己以为内行是不行的，还要外行监督。做医生工作的，对于演戏的艺术总是外行吧。演京戏的艺术家梅兰芳是内行，但这个戏到底演得好不好，还要观众来评。有人以为这个戏好演出，或又以为那个戏不好演出，到底好与不好，拿上台去让观众来评，不就可以解决了嘛！

毛泽东的话题转向“老大哥”：“苏联派过三位医学专家来学习了三个月的针灸。回去开展工作了吧？学习的人太少，会忙不过来吧？”

朱璉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专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展针灸治疗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并说，这些专家学了针灸回去后还开办过几次短期训练班，苏联保健部也准备在莫斯科开办有各加盟共和国医生参加的学习班。

毛泽东点头：“苏联会开展得快的。在苏联大规模开展这个工作，很好。不过，她们学习的时间太短，我们也要给予帮助。”

他又关心地问：她们要办全苏性的针灸训练班，没有邀请我们帮助吗？这个教员还不容易请喽，卫生部有什么办法吗？朱璉告诉主席，卫生部的苏联专家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今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协议上也有苏联邀请中国针灸专家去苏联的一条，卫生部准备帮助，至于怎么个办法，最近我

不在部里，不太清楚。

“那么，苏联专家来北京学三个月针灸就能使用，是怎样学法的？”毛泽东又问，“她们回去治好一些病没有？现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朱琏说，主要是教授她们针灸学的历史、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并通过临床实习有重点地让她们学会了35种病的治疗法。她们回去后，对三叉神经痛之类的病治疗效果不错。至于研究，有中国同志参观了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那里的针灸实验室装备了新式仪器正在进行对针灸的研究。

“研究针灸的新式仪器是什么？又有什么作用？”毛泽东的身子向前探了探，语气很关切。

“如三管示波器，”朱琏回答说，“在为病人针灸治疗之前及治疗当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观察到针灸对病人中枢神经、心脏血管、肌肉运动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如‘维修克’，又叫多管示波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观察到中枢神经、呼吸、体温、出汗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仪器在使用时都能同时自动描记。”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罢，他沉吟片刻，又道：“针灸是可以治疟疾和痢疾的。是可以治吧？你们告诉了苏联医生没有？他们相信不相信？”

朱琏说，针灸可以治疟疾，苏联医生相信，但针灸可治痢疾他们还怀疑。

“他们为什么只相信治疟疾，不相信治痢疾呢？”毛泽东追问。

“治痢疾，我们只有临床经验材料，但不够系统。至于治疟疾，1954年针灸所派过一个疟疾研究组到江西钨矿为工人治疟疾，同时有计划地结合治疗作了研究，数据比较系统，而且苏联专家在北京也曾亲眼看到针灸治好过疟疾。”朱琏回答说。

毛泽东对朱琏讲到的工人患疟疾的情况很注意，一再问到具体的情形和治疗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说：“你们研究治疟疾的根本道理没有？据我看来，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这类问题，根本道理都是一样，你看如何？”

朱琏点头，说根据针灸治疗疟疾症状消失的经过和疟原虫变化的科学分析资料，针灸治愈疟疾的根本原理，正符合主席所说的。

毛泽东笑了：“那么，我也是内行了。”他又要朱璉讲一讲除疟疾和痢疾之外，针灸治疗过哪几种传染病。

朱璉举出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并说针灸和中药配合，可治小儿麻痹症、黑热病，治血吸虫病时针灸还能解除锑剂中毒。说到血吸虫病，毛泽东打断朱璉的话头，问：“锑剂中毒有哪些症状？肝脾肿大、腹水，是大肚子吧？你们怎样参加这个工作的？”

朱璉介绍说，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则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朱璉说，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宣传推广。我们计划再派针灸组去安徽工作。我个人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单用针灸治疗血吸虫病早期症，如果行的话，不仅可以节省锑剂，而且可以解除锑剂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点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也应该那样想、那样做。我想，锑剂能治血吸虫病，也是属于破坏了血吸虫生存的条件的问题。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它威胁着一亿人口的生命，侵占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周围地区都有，因此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

接着，他又提出问题：“现在针灸在各省市开展得怎么样？开办过训练班没有？针灸医生在全国有没有一万人？西医学了中医的大概有多少？”

朱璉回答说，各省市的情况卫生部可能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西医学了针灸的已有2500人以上，针灸所在过去几年中已办过20多期针灸训练班，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西医，他们回去后相继开办训练班，我们也曾派出针灸医疗队到内蒙、西康等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边为农民治病，一边为当地医生传授针灸术，也为工厂和农村开办过针灸训练班。现在全国27个省市大都有针灸工作，但一般来说，针灸在农村还不算普遍。

毛泽东说：“这些工作做得都很好，还需要继续做。”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针灸能治癌瘤吗？过去治过没有？”

朱璉说过去在农村中用针灸治过肿瘤，并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妇女，她当时患的是腋下肿瘤，诊断为淋巴肉芽肿。

于是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这位妇女的年龄、针灸治疗和症状消失的情况

以及现在的情况。又问起癌瘤的区别和种类，朱璉、洪敏一一回答。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兴奋地连声说：“有名堂，有名堂，针灸也许可以治疗癌病！”

这时，边上有人说，可以把用中西药之后无效的癌病人集中一些用针灸试治。

毛泽东赞同道，可以这样试的，治不好，反正没有方法也治不好。他又问道：“子宫癌，恐怕针灸达不到吧？”

大家解释说，针灸治病并不需要病在哪里针在哪里。

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地说：“针灸大有名堂！”他不由感叹：“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天渐黑了，风也更凉。有卫士走过来劝说主席进屋去，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说。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的谈兴还很高，他还有问题要问，那就是卫生部的工作怎么样？

朱璉说：“在中医工作方面，过去是定盘珠，现在基本不同了，是算盘珠了。”

朱璉的话说得有趣，毛泽东好奇了：“什么叫定盘珠、算盘珠？”

朱璉说，定盘珠是一拨也不动，算盘珠是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卫生部的工作很繁重，但有些工作显得被动。

毛泽东笑了，他用右手比划着拨算盘的样子，说：“对啦，卫生部工作有些被动，他们连除四害也信心不足。不知道政治可以除四害。算盘珠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很好，我们大家都来拨。”

话题又转回到外行与内行上来，毛泽东说：“事情要大家来办，外行监督内行，内行就可以更加内行。梅兰芳演京戏是内行，他不会看病，在医生这一行上，他是外行，但他有了病，就是医生的病人了。医生治病是内行，在戏曲艺术这一行上是外行，但医生看戏时是观众。戏演得好不好，由观众来讲，医生看病好坏，得由病人来评。当然，医生也可以懂其他不少事情的喽！”他问朱璉：“你会写小说吗？”问完，他自答：“你也会写的喽。你认识黄树则吗？他是个医生，他也会写小说。”

顿了顿，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同样是重工业，做冶炼金属工作的，对于有色金属也是外行。现在化学原料就有一万种。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他把脸转向朱璉等人，“所以卫生部应该相

信政治能除四害。”

天转阴了，一股风穿过院子，凉凉的。怕是要下雨了吧？南方的雨很多的。大家再次让毛泽东进屋休息，说主席的感冒刚好，可别再着凉了。

毛泽东站起身来，仰头看看天，穿上制服外套，迈开步子，不是朝屋里而是向着院外走去，他对大家说：“哪里有那么要紧？我们去散散步吧！身体是要锻炼的。”

等朱璉她们赶上他，他又打开了话匣子：“除四害，要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大家搞，卫生技术也不是不要，但前提要弄清楚。”^①

22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

23日，毛泽东写《临时通信》：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

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张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有十几项主要指标就够了，更多不必要。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连夜赶工，有七天至十天时间也就够了。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底子，赶一下不甚难吧。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属（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初步接触一下，每项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时间也就够了，秋冬再做较深入的研究，明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94页。

春再做更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以政治带动业务，以虚带实。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以上各点如同意，请酌办。此件用电话通知。

毛泽东

1958年4月23日

刘邓阅，罗光禄用电话通知杨尚昆，请尚昆即刻用电话通知各省市。①

25日，毛泽东对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批示：

此件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率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的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②

当日6时，为召开广州会议，毛泽东给周恩来等写信：

恩来、陈云、德怀、富春、一波同志：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最好本（二十五日）日动身，以便开四天会，卅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

毛泽东

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83~184、187页。

刘邓即阅，用电话即发。^①

27日，毛泽东为当天的会议起草了讲话提纲：

15年能否超过美国？

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仿电力部报告（还有冶金部），十天内写一个长报告是否可能？供党大会用，我也要用。

各部的措施和资金，总投资，怎么样？着重1958年。

各部思想整风怎么样，（以红带专）

大权统一于中央是否可行？

有多少人关于1953年的决定草案？有无可能，什么时候做出一个正式决定？

第三次党大会（1959），是否可行？

可否宣传集体决定了方针？似乎有两派，态度各一。

党、政、军、民、学五方面都如此。^②

27日至29日，毛泽东在广东省警卫处的游船上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研究我国工业建设问题。会议连开三天。毛泽东每天在二沙头附近江面游珠江。又开会，又游泳。

27日，根据资料，毛泽东的实际工作情况如下：

下午2时40分，在住地开会。6时15分上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休息，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

晚上8时在船上继续开会。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30分。^③

当日，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15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5年），表示了态度。

毛泽东认为“15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又说，口号超英不变，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85、18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13~814页。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游珠江。
(摄影/侯波)

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毛泽东说：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

29日，广州会议结束。

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

泳。3点45分，毛泽东到广州棠下村视察。

毛泽东坐车到了棠下村。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长朱光，刚要把社干部介绍给他，上百位农民呼啦一下就围拢了上来。村干部们快把嘴说破了，才使人群闪出一条小道。毛泽东在前，大家四周簇拥着，往村里走去。

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请进社办公室。桌边早已坐满了人。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毛泽东落座，逐一问完农业社干部的名字、年纪，开始转入农业生产情况。“今年比去年好得多了。”钟叙本答道。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社员自养的多少？” “300多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813~814页。

毛泽东点头：“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陶铸不失时机地向大家做起宣传鼓动工作：“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年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上一句：“你们合作社散伙吗？”

“散不了，铁桶江山！”社支部书记梁富利回答。

“散不了，为什么？”毛泽东并不满足，要刨根问底。

钟叙本接过话头：“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一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毛泽东问。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毛泽东慢慢说道，脸上有了满意的表情。

陶铸问钟叙本：“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说：“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大家笑了，毛泽东也很开心。他勉励社干部们有事要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桌子另一边有几位干部一直没吭声，毛泽东注意到，指着他们问朱光：“这几位同志是谁呀？”朱光连忙作了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会书记、乡基层党委书记们。

陶铸打趣道：“现在是四级干部在一起。”

“哪里是四级？”毛泽东转过头，对陶铸说，“连你，我，我们是六级干部在一起了！”

休息过后，毛泽东去看村庄西北面的干部试验田。聚在办公室门口的人群也尾随而去，尽管有人挡着，劝阻着，还是有人不顾一切地把手伸给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陶铸、朱光在广州棠下村视察。（摄影/侯波）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州棠下村观看实验稻。
(摄影/侯波)

毛泽东，希望能握上一握。

“这禾长得不坏！”毛泽东细细地看了路边的田，赞道。

陶铸问社干部：“一造能打多少？”

“大约700斤吧！”社干部答。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毛泽东问。

社干部说：“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田埂而行。此时的广州，已是火一般炎热了。基层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

毛泽东接过来，端详片刻，戴上，很细心地系上系带，眼睛四周望一圈，说：“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走着走着，他在一块菜地边站住脚：“这是什么？”

边上的人连忙下田指着一种菜说这是藿香，又指指周围，说那是黄瓜、豆角、生姜，一块田同时种了四种作物。

毛泽东点头同意：“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说着看着，到了干部试验田边。社副主任钟礼明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问：“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这时，忽听人群一阵骚动。一位妇女满头大汗拨开人群使劲地往前挤。别人问她干什么，她不理，只管往前。挤到毛泽东身后，她站住了，竟将手里的一柄布伞撑开，小心地遮在毛泽东的头上，挡一挡炙人的太阳。毛

泽东发觉了，转头向她道谢，那妇女只是笑，并不开口。就在他回头的时候，他发现小渠那边的田埂上站满了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齐齐地盯住他，却不靠前也不挨近过来。毛泽东乐了，鼓励般地迎上前去。终于有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大胆地跳过渠，把自己的手伸给毛泽东。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毛泽东看得出，这些学生不是本村的孩子。任溥华告诉他，他们是广州市第三十中学的学生，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显然很高兴：“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任溥华尽量用普通话作了回答。毛泽东连连点头：“你们都懂得一点，可以讲一些了。”他又一指这些学生，问社干部：“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社干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州水利馆观看水闸模型。（摄影/侯波）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州参观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摄影/侯波）

部答道：“社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西沉，毛泽东结束近一个小时的视察，准备离开。四面八方的人流也顺着一个方向移动着，而毛泽东，他几乎握尽了由农民那里伸来的每一只手。^①

30日晚上，离开棠下社，毛泽东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的耕耘、水利、水产和土壤肥料四个馆。在水产馆，他指示说，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②

5月1日，毛泽东一行乘机返京。

专机到武汉停留，2日，飞抵北京。

① ②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04~107页。

二十八 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

1958年9月15日，在武汉去安庆的江峡轮上，张治中问毛泽东：“您今年外出，这回是第五次了吧？”毛泽东说：“是呀，但是5、6、7三个月没出来，1、2、3、4月都在外，8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①

1958年8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要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25页。

有戏院。

8月4日至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

6日至8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

9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①

1958年8月1日至3日赫鲁晓夫来访。毛泽东同他举行了会谈。在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后，中共拒绝了苏共提出的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

4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山东视察。4时，专列到徐水县。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车站迎接。毛泽东向张国忠了解了当地的土地、人口、劳力、夏季生产、秋季生产的大致情形。

座谈片刻，毛泽东换乘汽车，经县城往南犁园乡大寺各庄村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他看到庄稼问收成，看到炼钢炉问产量，还扳着手指和张国忠一起算账，一炉能出多少？一天能出多少？

车过小寺各庄的“小农场”与“试验田”，毛泽东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得不错。

车进大寺各庄，停在合作社俱乐部门前。毛泽东走进门，看着几面奖旗，问每次得奖的经过。然后坐在长桌旁，向乡、村干部了解情况。

毛泽东问：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每亩平均多少斤？又问社里和县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828~829页。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农村视察。（摄影/侯波）

大秋作物的预产量。

毛泽东听过回答后问：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说，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自己可以多吃。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毛泽东参观了庄里的粮食加工厂，又穿街走巷，到农业社看望了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看了养猪场、缝纫厂、食堂、幼儿园、“幸福院”。毛泽东走到农田里，看到地里干活的妇女很多，对陪同人员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李悦农对毛泽东说，这里的妇女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毛泽东向张国忠了解徐水县劳动力的安排。

解学恭和张明河又向毛泽东介绍这里搞“军事化”的情况：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农村搞了他们的做法。

在一块棉花地边，毛泽东走下田埂，分开密密的棉枝想到里面看看，走几步，钻不进去。毛泽东问：“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

李江生回答：“1000斤皮棉。”

“那就是3000斤籽棉啰！”毛泽东说着，从棉花地里走出来，朝一块黍

子地走去。

这时，太阳西斜。毛泽东的兴致却丝毫不减，坚持要再去看看玉米、谷子和山药。在山药地里，毛泽东详细问到，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

毛泽东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毛泽东在告别时说：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話，再来看你们。

在返程的路上，毛泽东又谈了劳动大协作与军事化的问题。毛泽东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张国忠答，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这是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

张国忠说县里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为公有。毛泽东很关心，问：“十个人中有没有三个人不赞成？”回答是，连两个也没有。

在徐水县城，毛泽东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整个徐水城关的人，好像都涌到了铁厂到县委的路上，人流如潮。毛泽东微笑着，亲切地和群众打招呼。他被深深地感染了。

在县委，毛泽东的头一句话就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粮食原先很少，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泽东又问河北省其他地区庄稼的情况，了解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抗旱的情况，并和机关干部合影留念。

李悦农、张明河谈到安国的山药、玉米丰产时，毛泽东表示：明天去安国看看。

在回车站的路上，张国忠对毛泽东说：“看群众这股热情，我们党在群众中真是扎根了。”毛泽东点头：“我们打仗几十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让老百姓吃饭，吃好饭！”

毛泽东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施肥，密植。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用来喂牲口，养猪。猪喂

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毛泽东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①

晚上7时半，专列朝安国方向开去，停在定县。

5日早上，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到专列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问：“我到你们县参观一下庄稼行吗？”焦家驹说：“我们正是来迎接毛主席去我们县视察工作的。”

焦家驹陪毛泽东同坐一辆车。从窗外看见有许多人聚在一处，毛泽东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多人？”焦家驹说：“是定县西关，这些人是候车的。”

小车驶进定县城内。

毛泽东开始问安国的情况：“你们县小麦每亩能产多少斤？”

“亩产491斤。”焦家驹答。并介绍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5130斤小麦的“卫星”。

“明年计划多少？”

“计划种45万亩，争取亩产2000斤。”

“怎么实现？”

焦家驹讲到深耕要普遍翻到一尺半以上。毛泽东说：“45万亩地，深翻一尺半以上，能翻完吗？夏种时间有多少天？”

“夏种时间是30天。拖拉机一次能翻一尺半，要是翻两次，就能达到三尺。”

“能翻三尺，那就更好了。没有拖拉机呢？”毛泽东说。

“双铧犁用两头牲口，一次也能翻一尺半。”

“那你们牲口够用吗？”

“牲口不大够用，全县只有两万多头。另从外头买回来2000头。”

“是在张家口买的吗？”焦家驹答是。

毛泽东说：“还要增加点牲口。”

“你们今年每人能收多少粮食？”毛泽东问。

“按亩产3000斤算，35万人每人平均4000斤。”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19页。

“主要是甘薯吧？”

“主要是甘薯。明年我们计划少种些甘薯，增加种植油料作物。”

毛泽东说多种油料作物，可以供应城市人民的食用油。

“你们打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焦家驹答搞储备，社员也可以多吃点。毛泽东说，粮食那么多，每个人每年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多吃小麦。土地也应该有休整的时间。

车出定县县城，沿途可以看见庄稼地了，毛泽东拉开窗帘，不断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势不错。

毛泽东问：“他们这儿的庄稼跟你们那里的比怎么样？”焦家驹表示，粮食作物他们这里还不行。

“为什么？”

“我们那里有粮食的高品种，比如多穗高粱，从唐山专区输入的。”

毛泽东说：“你回头拿一把多穗高粱，一把本地高粱，给我吃，看看哪个好？”

小车驶过定县东亭乡，一面山墙上写着“压倒安国、超安国”。他问：“他们要和你们比哩。现在是他们压倒你们，还是你们压倒他们？”

“我们压倒他们。”

“压倒了吗？”

“没有压倒，他们的干劲也很足。”

进入安国县境，路边的玉米、高粱、谷子和棉花错落有致。毛泽东说，你们的庄稼长得好，我下去看看。

车在新安村边停下。

见到棉花地里有些虫害，毛泽东说，这是钻心虫，两三年应该消灭掉。看到一块芝麻地，他说，这样好的芝麻，怎么不多种一些？走上地头，他又说，公路上要大量植树。

毛泽东上车继续前进。听焦家驹讲安国县食堂化、托儿化的情况。毛泽东要求他们把食堂坚持办下去，好好带孩子，可以把马路搞成水泥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这样国际友人要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

12时左右，淤村乡流村农业社到了。人们聚在村头已经等了很久。毛泽东下了车，一次次和他们握手。

在玉米试验田，毛泽东问，对于防治病虫害，你们有什么机构没有？他叮咛，一定要好好研究治虫，两三年内消灭掉。

走过一块高粱地，毛泽东问：“为什么有些长得这样矮，有的却是那么高？”

乡党委书记郭建回答：“高的是大八杈，能结八个穗，矮的是小八杈，种它是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天很热，密不透风的庄稼地没有一丝凉意。大家请主席休息一下，毛泽东爽快地走进一个护秋窝棚。

窝棚里，只有一张硬铺板，毛泽东坐在铺板上，听郭建汇报农业社的组织情况，听李悦农汇报安国农业社的变化过程。

毛泽东问：你们县里有多少个农业社？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搞大社？

“农民高兴搞大社。我们把大社划小以后，有很多农民又自动联合成大社了。”

毛泽东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过三国没有？《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毛泽东问郭建：“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

郭建说：“办大社好。”

焦家驹说：“我们准备秋后一乡办一个社。”

毛泽东说：还是办大社好。社二三千户、四五千户、五千户、六千户，一乡一社。大社好办事。这是大势所趋。

休息片刻，毛泽东去看甘薯田。郭建讲甘薯亩产计划80万斤，毛泽东说：“这还是个计划，要看结果。”他肯定玉米地里间种豆子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好，豆子含根瘤菌，既肥田又增产。一个记者不小心踩了花生地里的一棵花生秧，毛泽东心疼地说：“看踩坏了一棵。”在谷子地里，毛泽东说：“谷子出小米，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小米加步枪。”

走到一块棉花田，他忽然站住，盯着一块牌子看半天，问：“谁是王洪才？”

“我是。”站在一边的社主任回答。

毛泽东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地：“这块棉花为什么高一行低一行？”

“这是我们试种阴阳垄！”王洪才解释。

“阳垄把阴垄遮起来，阴垄要吃亏。”毛泽东说。

王洪才说：“阴垄不如阳垄见阳光多，不过种植棵树不同，阳垄每亩平均种 3700 棵，阴垄每亩平均种 6300 棵。”

毛泽东说：“那好，你们今年试一试。”

毛泽东走了一处又一处。一拨一拨的人涌来，跟他握手。天气特别炎热，汗从他的额上不住地流下来，湿透了衬衫。一个老农跑回家拿来一把扇子给毛主席，还把自己的一顶半新的麦秸草帽戴到毛主席的头上。毛泽东没有拒绝。就戴着这顶农家草帽离开了流村。

车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焦家驹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车朝着专列停靠的定县车站驶去。

毛泽东和李悦农在车上交谈：要不要并县，并社，乡社合一？是不是搞一乡一社？能不能推广徐水的“组织军事化”？

毛泽东认为：并的是不是少一点。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绪少了好领导。是不是可以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万儿八千人搞成一个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武器。

毛泽东认为：徐水这样干是逼出来的。张国忠讲，全县 11 万多劳动力，弄四万多去打机井、修水库、办工业，还剩七万多劳力，非常不足，就逼出了军事化，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毛泽东还谈道：在山里造林，平原也要造林，过去土地产量低，怕造了林没吃的，现在不会怕这个了。我告诉安国县委，叫他们弄一定数量的土地造林。把坏地造林，造了林可以改变气候。

毛泽东说：平原上也要养鱼。有水就养鱼，山区也可以养。农业上去了，工业上去了，渔业、林业、牧业、副业也要上去。要全面发展。

毛泽东告诉李悦农，要研究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肯定平原上山炼铁的办法好，谁炼了归谁，这样人们就积极了。

毛泽东谈了深翻地的优越性、重要性：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要苦干深翻。有工具就用工具，没工具就用人力也要深翻。

毛泽东认为：河北省委提出的农村园田化的口号很好。这样办对，应该大量这样搞。

毛泽东说：中国人起来了，了不得，一跃就上去了。^①

5日晚上11时，专列抵达新乡，停在新乡760厂铁路专用线。河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新乡第一书记耿其昌等登上专列向毛泽东汇报。得知七里营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决定到七里营去看看。

6日上午，天下起了雨，吴芝圃、耿其昌考虑从新乡到七里营有四五十里路，便另外安排新乡郊区的牧野社和新乡棉织厂请毛泽东视察。工作人员汇报后，毛泽东决定还是去七里营。

下午，毛泽东在吴芝圃、杨蔚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宋玉玺，耿其昌和新乡县委书记等陪同下去七里营。3点多钟，途经新乡县王屯村，毛泽东看到这里棉花长势喜人，急令停车。他看了正在生长的棉花、玉米。同在田间劳动的社员进行了交谈。

下午4时20分，到了七里营。七里营人民公社刚诞生第三天。雨刚停，毛泽东来到公社门前。轻声念出牌匾上的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县委负责人告诉他，这是新乡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点头，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走进院子，看到迎面屋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两个牌子，毛泽东问：“这是什么？”大家告诉他，这是公社的红专大学。毛泽东问：“谁是校长？”“公社的党支部书记。”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摄影/侯波）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26页。

在公社会议室，社委会向毛泽东汇报了七里营公社各方面的情况。他一边听，一边问，特别关心公社的规模、生产情况和社员的生活水平。听到高兴处，毛泽东连声称赞：人民公社好。关切地问社委会的干部们：社那么大，管理不容易，有没有困难？

毛泽东在会议室里待了一会，便出门参观。他首先去了敬老院。毛泽东一边向老人们问好，一边关心地问社长，他们住在这里满意不满意？他看了西屋看南屋，看了南屋看东屋，又进里间看老人们睡的床铺。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幼儿园。（摄影/侯波）

走出敬老院，到了幼儿园。从幼儿园出来又到公社面粉加工厂。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毛泽东走到出面的面粉箱前，不顾飞扬的粉尘飘落肩头，细细地看圆罗筛面，抓起一把麸皮，用手指捻动，看磨得净不净。他到公社滚珠轴承厂，观看滚珠

的生产过程。

越过茂密的豆地，跨过布满瓜蔓的菜田，毛泽东到了棉花试验田。他详细地问，这块地有多少亩？产量多少？施多少肥？像这样的田全社有多少？随行人员有人走进棉田，专门数了数棉桃。

“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毛泽东问。

“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棉花，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

“亩产能有多少？”

“每亩保证皮棉 1000 斤，争取 2000 斤。”

毛泽东说，要收到手里才算数呢！他一边说，一边走进齐肩高的棉丛，用手平着棉花顶比着自己的肩膀，称赞长势不错。又弯下腰，自己数了一遍棉花的果枝、棉桃。

“前边是干部红旗试验田。”有人指着另一块地说。

“我们过去看看。”毛泽东朝那边转过去，他的脸上渗出汗珠，衬衫也已湿了，脚上沾满了泥土。一位负责人走过来说，主席先回去休息休息再看吧！毛泽东摆手，兴奋地说：不，再稍走走！稍走走！

正在打药治虫的女社员看见毛主席过来，都激动得很。毛泽东对她们说：“做给我看看。”于是那几个女社员操作喷雾器干了起来，毛泽东笑着赞扬她们熟练的劳动。

从棉田出来，毛泽东问到社员的收入情况。社干部说，去年收入84元，今年要大搞积累，仍然维持去年的水平。毛泽东说：对社员的分配也要增加一点，今年要100元。

毛泽东笑着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大有希望，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回答：“有这样的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说：“对！有一个这样的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下午6点，毛泽东离开七里营。^①

当晚，专列离开新乡，停在郑州车站的叉道上。

据史向生回忆：毛泽东参观七里营时，我不在郑州，正在嵯峨山公社召开地、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同去参加会议的有农村工作部正副部长赵定远、崔光华、河南日报社长丁希凌、地委书记路宪文、办公室主任赵光同志等。红旗杂志记者李友九等同志已先期到达。嵯峨山地区这些天忽然热闹非凡，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因为这里成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社。在这里人们看到农民以部队班、排、连的组织形式进行劳动。远远望去，农田里一片丰收景象，好不喜人。最为新奇的是，联社自办了公共食堂。为了对农村食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亲自去食堂吃饭，还在食堂门外住了一夜，实地考察。红旗杂志社记者李友九为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草拟了一个简章，我们参加了研究和修改。简章草稿中提出了：“吃粮不要钱”的观点。在现场召开的地、县农工部长会议上，我作了由合作社转化为公社的发言，讲解了简章草稿的内容。

8月6日早晨，接到了省委电话，让我连夜赶回郑州，向主席作汇报。我立即骑上骡子，到遂平县搭火车，当夜赶回郑州。到郑州时已是深夜，

^① 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155页。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34~136页。

车站接我的同志将我领到主席的专列上，吴芝圃等省委几位书记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主席等我到半夜，现已被叶子龙等随行人员劝说去睡觉了。由于不知主席何时能醒，我到后不一会，吴芝圃等同志也被劝说休息去了，仅留我一人在专列上等主席醒来。

凌晨4点左右，主席醒了，他听说我等在那里，立即穿了睡衣出来。主席见到我，仿佛遇到了老朋友，高兴地说：正等着你呢，想听你讲讲嵯峨山的情况。我感到很意外，主席对我的去向似乎很了解。我向主席汇报了嵯峨山的情况，将简章草稿拿给主席看。主席接过简章草稿边看边说：“如获至宝，这东西好，给我吧。”接着我向主席讲述了公社办食堂的情况，我告诉主席，农民去食堂统一吃饭，既节省时间，又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主席听了很高兴，称赞“食堂”是新事物。主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不断提问，问得很细，如“锅灶怎么弄到一起？”“食堂粮食如何统一存放？”“社员吃饭时秩序怎样？”“你在那里有没有吃过饭？”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我向主席介绍了嵯峨山公社的规模和生产组织情况，主席听到农民劳动已经军事化，按班、排、连编制从事生产，又听到一个公社有五万人口时，感慨地说：“大的多了，公的多了。”“这在古代，就是一个诸侯国了。”但主席又谈道，比之古代诸侯国，公社是又大又公，多了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主席又问起群众有纠纷公社如何调解。我告诉主席，由公社民政部门调解处理。主席说：“哦，这带政权性质，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基层政权，这叫政社合一。”主席说，“大集体，小自由，不要统得太死。”我又向主席汇报了嵯峨山公社的组织结构。当主席听到公社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时，饶有兴趣地扳着指头说：“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谈到公社的名称，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我和主席自始至终处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中。这次谈话，除主席和我外，还有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同志在场。他是护送主席出河北，进河南的。毛主席和我的谈话于8月7日黎明结束。^①

^① 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61~63页。

史向生上车后，专列南行到许昌附近长店路段上。

7日早上，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许昌专员公署专员王延太被请到车上，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许昌烟草试验场和许昌县尚集俎庄一带是毛泽东原定的视察地点。由于近日多雨，道路泥泞，难于行车，经研究，临时决定毛泽东沿许昌、南阳公路往襄城县视察。

毛泽东下车，换乘汽车，在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襄城县县委书记等人陪同下，7时30分左右到了襄城县双庙乡郝庄第二生产队的烟田。毛泽东兴致勃勃，从这一片烟田走到那一片烟田，边走边看，边看边问。烟垄深处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沾湿了他的衬衫，他全然不顾。鞋上沾满了泥巴。他对随行摄影记者侯波说，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他指指身后的烟田。

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闻讯匆匆赶来。毛泽东与他握手，询问他的名字，刘熙民说，“康熙的熙，人民的民。”“啊，你是康熙的人民。”

“你干什么工作？”毛泽东又问。

刘熙民说：“县委副书记。”

毛泽东说：“一县之首，担子重啊！”

他转过身，问许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你叫什么名字？”

辛建回答，“辛苦的辛，建设的建。”



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河南襄城县农村视察。
(摄影/侯波)

毛泽东说：“你是辛辛苦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啊。干革命就得有不怕辛苦的精神。”

毛泽东在刘熙民的陪同下，乘车沿许南公路，朝县城方向开去。

通往县城的这条公路，不时掠过一座座彩门。毛泽东问：“这是什么？”

刘熙民介绍：“这是为了组织生产评比，搞竞赛。外边的和许昌、郾县、鲁山赛，本县的乡和乡赛。”

毛泽东问：“作用多大呢？”

刘熙民讲了襄城县刘庄乡搞竞赛由后进变先进的事。毛泽东听了，未作评论，只是告诫刘熙民：“开展竞赛，要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不务虚名。”

车一路驶去。刘熙民又向毛泽东汇报襄城县粮食、烟叶的生产情况。

毛泽东说：“要把农业搞好，光靠两只手不行，还要有农业机械化。农民们愿意不愿意买农业机械？”

“今年烟叶能收入2000多万元，农民手里有钱，都盼望早日犁地不用牛，现在是有钱买不到农业机械。”

毛泽东说：“不要太急，一定会办到的。”

早上8点多，毛泽东一行到了三里沟乡后梁庄的烟叶丰产田。烟田间，乡亲们正在干活，毛泽东一下车，便被认了出来。毛泽东笑容满面地与大家握手。他看到社员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便问身边的干部们：“农民生活情况怎样？休息时间够不够？”

从村北走到村南，毛泽东到了三里沟三队干部种的试验田。这块田烟叶的长势确实比一般的田好。烟叶已有好高，但顶上还没冒花，棵挨棵，叶挤叶，十分茂密。毛泽东下了田，用手轻轻分开烟叶，探身向里瞭望，说：“这不通风，用绳子攀起来就好了。”

他问：“这是什么品种，长得这么好！”

“这个品种叫长脖黄，产量高，质量好，抗灾能力强，农民喜欢种。”

毛泽东问到收烟的时间以及管理技术和收烤技术。比如，什么是“挂刺刀”？什么是“挂腰剑”？什么是“留二茬”？

在一块二茬烟田旁，陪同者介绍说：“头茬烟已经收完，这是二茬烟，只要加水，加肥，管理好，二茬烟也能长好。”

毛泽东走过去，指着一株已超过头茬的二茬烟，打趣道：“孩子比妈妈长得还高。”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你们的烟叶好，还是山东潍县的好，你们比较了没有？”

“现在全国12个省烤烟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他们反映这里的烟叶长得不错。”

“在你们这里开会，说明你们的烟叶好。”

登上一道高坎，极目四望，烟田如织，浩瀚如烟海。毛泽东望着，兴奋地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离开三里沟乡，毛泽东乘车到十里铺乡薛园农业社视察。正在开会的干部群众听说，纷纷涌过来。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看看一块块茂盛的烟田，颇为感慨地说：“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看。”

从烟田到玉米田和田间小井，毛泽东一一看完，已经徒步走了两里路。太阳到中天了，上晒下蒸，炎热异常，毛泽东脸上的汗朝下淌，衣服浸得湿透，大家请他去村里休息一会儿。在村边的一张布棚下，毛泽东坐下。四周围站满闻讯从邻近的李庄、上徐、下徐、赵堂村赶来看毛主席的人们。小学生们排起队，隆重地向毛泽东献了花。

有机灵的人跑去端来一盆清水请毛主席洗脸擦手，又端来一杯开水，请他喝了解渴。毛泽东惬意地一饮而尽，没坐几分钟就要去炕房看看。

正在炕房修理火垄的农民烟叶专家梁运祥，看到毛主席朝这边走来，急急忙忙从炕房里跑出来，忘了自己两手还带着泥巴，就被已到了门口的毛泽东握住手。梁运祥激动万分。

东炉房里正在烘烤着210杆烟叶。火已烧了三天，炕内温度已达摄氏60度。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进去，就在外边看看就行了，毛泽东不同意。

梁运祥把炕门帘子刚一掀开，烟香和热浪就迎面扑来。毛泽东不在意地走进去，从烟杆的空隙里，望见满炕金黄的烟叶，他高兴地笑了。

走出炕房时，因为高温，他的脸显得红扑扑的。他问梁运祥：“烟为什么要炕，用太阳晒行不行？炕烟好？还是晒烟好？”梁运祥都作了回答。毛泽东自己烟瘾很大，对于烤烟的技术细节，问起来也兴趣盎然。

中午11点多钟，毛泽东离开村庄上汽车返回许昌。村民们送来一个大西瓜，让毛主席路上解渴去暑。毛泽东用手拍着西瓜，高兴地说：这个瓜

真大。

将离襄城县境时，刘熙民从车上下来，向毛泽东道别，并问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握住刘熙民的手：“你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①

7日凌晨1时许，急促的电话铃声把长葛县委值班室值班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江烈惊醒。许昌地委办公室下达紧急通知：8月7日，将有中央重要领导人来长葛视察。视察地点一是以勤工俭学著称的长葛第三中学；二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受毛主席表扬的深翻土地夺高产的胜利一社；三是坡胡乡。电话那边问到，从长葛到开封的公路通车不通车？李江烈回答：由于8月2日降了暴雨，双洎河大桥被毁，公路中断已无法通车，三中也去不成。上午10点多，许昌地委监委书记纪忠良等四人，带来两部吉普车到长葛，以备迎接中央领导人之用。

下午1点半，专列驶入和尚桥车站。许昌地委纪忠良等人在车站等候。吴芝圃从专列下来，要纪忠良、县委书记吕炳光、王连安先上车见见毛主席。告诉他们，毛主席上午在襄城县接连视察了几个小时，已经很疲劳了。加上天气炎热，为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健康，下午只安排到近处看看就行了，不再去原定的坡胡等地。

他们来到车上，看到毛泽东精神还好，脸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红发黑。看见他们来了，毛泽东站起来听吴芝圃一一介绍并同他们握手。介绍到吕炳光的时候，吴芝圃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过关于深翻改土夺高产的经验报告，受到主席表扬。毛泽东当然记得。介绍到王连安，毛泽东问他，担任什么职务？哪年来河南的？王连安说1948年到河南工作的，毛泽东扳着手指说：“你来十年了，算是河南人了！”

毛泽东要求下车。吕炳光忙问王连安，安排主席去哪里？王连安想了想，说，就去近处的宗寨“五四”农业社吧。

下了列车，毛泽东及吕炳光、王连安被安排上一辆吉普车，吴芝圃和毛泽东的其他随行人员乘另一辆吉普车。

由于仅有两辆吉普车，河南省委常务书记杨蔚屏、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新华社记者侯波等人，以及公安部的同志，就只好由纪忠良、李江烈等当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36页。

地有关负责人陪同，跟在吉普车后步行。所幸没走几步，从当地驻军借来的卡车就赶到了，大家这才上了卡车。

车队一路向北驶去，行至宗寨田间的交叉路口，却发现前几天的暴雨把路面冲坏了。王连安急忙下车，要叫人赶来修路。毛泽东也下了车，说：“不要找人了，咱们下去走过去。”

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田埂上。那一片田里，长的是玉米，田间管理颇为精细，看不见杂草，叶壮杆粗，毛泽东高兴极了，幽默地说，长（Chang）葛，长（Zhang）葛，你们长葛无“葛”啊！

前面是一面坡，坡下横着一条沟。怕毛泽东有闪失，吕炳光上前要搀扶。毛泽东摆摆手：“不用。”话音未落，他一个大步，从沟下跃上土坡，进了一片谷子地。看见随行记者侯波一个劲地在眼前按动快门，毛泽东说：“别光给我照，多给大家照。”



1958年8月7日，在长葛，毛泽东风趣地说：“好，好，你们长葛无葛啊！”（摄影/侯波）

走过谷地，来到一块玉米地。毛泽东问：玉米地翻多深？分层施了多少肥？浇没浇场地水？犁耙几遍？什么时间播种？计划亩产多少？公社书记作了回答。说到计划亩产两万斤时，毛泽东仔细问了每亩种多少株？每株长几个棒子？每个棒子有多重？

离玉米地不远，就是宗寨村。

毛泽东问：“有多少户？”

“有200多户。是一个高级农业社。”

“有没有办食堂？”

“有”。

“食堂是常年的好，还是农忙时好？”

“农忙时好。”



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长葛玉米地里视察。（摄影/侯波）

毛泽东问：“你说生产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

“大了好。”

时间过得很快，大家沿路往回走。见到池塘里的水浮莲，毛泽东说，水浮莲好啊，可以喂猪。见到路旁的桐树，毛泽东又说，桐树好长，可以出口，日本要我们的桐木材呢。吕炳光汇报说，我们县最好的桐树在墙周，那里的桐树既直顺又粗壮，都支持国家出口了。

回到吉普车前，毛泽东同当地干部握手告别。在返回专列的路上，吕炳光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全县深翻改土和农业生产情况，当他又一次说道，今年全县玉米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时，毛泽东问他：“能达到吗？”吕炳光告诉说：“一定能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向主席报喜。”毛泽东仍保持着他的微笑：“拿到手才算数。”^①

7日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长葛，经郑州开往兰封县东坝头，毛泽东拟在这里横渡黄河。因保卫人员不同意作罢。在东坝头过夜。

8日下午3时20分，专列到达商丘。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40页。

史向生走下专列。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三人便上了车。

史向生介绍，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毛泽东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边的铎？”

毛泽东说：“商丘是原归德府，古宋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些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阏伯台、八关斋、壮悔堂。”

毛泽东把话题转入实际工作：“今年夏季收成怎么样？”

“夏粮丰收。”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哪些？”

“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薯、夏玉米等。”

毛泽东算了一下时间，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说，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毛泽东说：“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轿车驶过包河，毛泽东问：“这是什么河？”

“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

毛泽东问刘学勤的简历，哪里人，今年多大了，上过什么学，读过什么书，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做些什么工作等等。又问，“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你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回答工作紧张，读书不多时，毛泽东说：“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了解了全县秋粮作物生长情况后问刘学勤：“农民很喜欢吃小米吗？”毛泽东说，“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进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没坐稳便又起身观看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指着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几行字，毛泽东问：“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回答：“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新。”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吸了口烟，沉思起来。

向黄楼村走去的时候，刘学勤问：“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先看农业。”毛泽东回答，脚步也没有停。到村子的时间已是下午4时许。屋里院里的老人，地里的青壮年，学校的儿童，纷纷拥来，都希望看看毛主席。

毛泽东往田里走去。一边走一边问：这里小社并成大社了吗？准备搞多大？搞什么性质的？有政策吗？叫什么名字？

前面就是试验田，毛泽东停在写有“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几个字的一道门前。

“这是什么门？”

刘学勤答：“‘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四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默读一遍门上的字，又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越过“跃进门”向前走去。

不远就是打井队的工地。打机井的是清一色的小伙子。毛泽东问他们：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已经打了多少天了？

黄开诗胆子比较大，别人腼腆不敢开口，他上前主动介绍情况。当他说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站在旁边的乡长唐崇举大概认为黄开诗说的时间太长，就插话说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毛泽东却对这位只有18岁、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颇有好感，他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很好！”

离开打井队，走到红薯试验田。毛泽东问，全县种多少亩红薯？过去产量多高？农民喜欢吃吗？怎么吃法？除去吃还可以做些什么？末了，他问，“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回答：“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两亩麦茬红薯，翻地二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说话间，地委副书记王林走上前扒出来一块红薯，个不大。史向生不满意，自己动手扒出一块，也不大。王林见此情况，又找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要再扒一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毛泽东平静地开口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一边说，一边转身朝南边的另一块红薯地走去。

“这是我搞的。”乡党委书记徐家林向毛泽东汇报说，“施肥 30 万斤，计划亩产 13900 斤。”

毛泽东转过身，怀疑地说：“亩产 13000 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接下来看的是稻田，他问：“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

徐家林立即答道：“刚断水一晌，现在拔草呢！”

毛泽东说：“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然后他问起一亩有多少墩？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一亩三万墩，计划亩产 1500 斤。”

毛泽东不说话，走到插在地头的牌子前，看上面写的施肥数字和预计产量，若有所思。

从稻田出来，毛泽东去看社里搞的人造尿池，询问了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和肥料效能。将近下午 5 点钟时，毛泽东向停着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返回车站的路上，毛泽东沉思着，问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 13000 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说不相信。

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又问，“你们种多少亩红薯？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回答后，毛泽东说：“过去亩产 2000 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1959 年 2 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没有忘记专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实验田的结果。^①

5 时多，毛泽东返回专列，离开河南去山东济南。

下午 6 时 35 分，专列途经砀山，毛泽东与原砀山县委负责同志刘钦鉴、薛兆本、张启明、刘思谈话。

毛泽东望着他们，亲切地问：叫什么名字，哪地方人？四人介绍了各自情况。毛泽东说：“你们两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江苏，还没有安徽人呀！要注意培养地方干部。”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 143 页。

毛泽东又问县委当前抓些什么工作，刘钦鉴等人作了汇报。毛泽东接着问：你们这里主要种植什么作物，生产什么东西？县委的同志回答：“夏季主要生产小麦，秋季生产大豆和杂粮。”当听到砀山县水果连年丰收，粮食、皮棉当年可望好收成时，毛泽东高兴地打开车窗，望着窗外成片的良田说：“好，多努力干呀！”

20多分钟过去了，毛泽东最后说：“很好，就这样吧，今天不准备下车了，谈到这里，以后再来，你们看怎样？”说着，起身和大家握手告别。^①

7时许，专列驶离砀山站。

专列途经徐州，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徐州地区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毛泽东向他们了解有关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说：徐州应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成为抚顺。你们要抓煤炭综合利用，抓粮食，抓钢铁，还要抓机械制造。毛泽东向地、市委负责人说：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积农家肥和自然肥。多搞有机肥。徐州地区过去经常多灾，你们要想办法，打他100亿斤粮食！毛泽东在接见中询问，你们那位地委书记，四川人，到哪里去了？梁如仁回答胡宏已调南京在省里工作了，现在正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毛泽东说，这样很好，一边检查，一边帮助你们干。^②

9日凌晨1时，专列经兖州车站，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毛泽东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毛泽东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问王吉德什么职务。

“我是滕县县委书记。”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语逗笑了。

^①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毛泽东在安徽》第177~178页。

^②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73~74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426页。

毛泽东又问：“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

“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宫嘛！上宫还有没有？”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滕国在周朝时期是个小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滕文公，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针大略。现在“文公台”也称“灵台”，相传是滕王的寝宫遗迹。

毛泽东说：“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他问，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四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毛泽东看王吉德烟抽完了，接着又抽出一支烟递给王吉德。他又问：“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我们的小麦亩产 227 斤。”

毛泽东问：“去年亩产多少？”

“去年亩产 126 斤”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

王吉德说：“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今年淹了九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 81 万亩。”

毛泽东又问：“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210 万亩土地。”

毛泽东又问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全区的水灾情况。

毛泽东问王吉德：“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社大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 5000 户的一乡一社。”

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毛泽东说：“搞大一点好，可

以搞五六千户万把户。”^①

9日凌晨3点，列车到达泰安站。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市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登上火车，毛泽东与他们座谈。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笑着说：“怎么你们当中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李元明说。

毛泽东说：“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那一次来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问：“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共九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

毛泽东问：“你们想谈什么？”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说：“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

“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问：“秋季怎样？能收多少？”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李元明回答。

毛泽东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毛泽东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

他问：“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① 魏余秀、邹庆忠编：《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第51页。

“是。”李元明答。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问：“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 21 万民工于 8 月 5 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

毛泽东问：“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

毛泽东说：“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又问：“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停了停，他问：“你们的水利怎样？”

“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问：“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说：“泰安地区有 650 多个社，平均不到 300 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 200 余个。”

李元明说：“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一乡多少户？”

“8000 至一万户。”张海涛答。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

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他说：“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泰山的西、北、东三面都已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李元明说。

毛泽东又问：“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

顶有 60 里路吗?”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 40 华里。”

毛泽东又问：“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

毛泽东说：“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①



1958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在济南西郊专线车站接见省和军区领导人杨德志、谭启龙。（摄影/侯波）

9 日凌晨，专列抵达济南。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省的各项工作情况。在汇报中，毛泽东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

了，干劲自然更足。毛泽东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以便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②

下午 3 时，毛泽东在省交际处一号楼会议室召集省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台前村支部书记刘秀印座谈。

朱永顺回忆：

^① 魏余秀、邹庆忠编：《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第 54 页。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1 日。

主席面带微笑，同我们一一握手。当主席握住我的手时问：“好面熟啊，叫什么名字？”我说：“朱永顺。”毛主席示意我们坐下。夏征农把我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主席把目光先朝向夏征农同志说：“你是省里的。”又朝向我说，“你是地委的。”再朝向刘传友同志说，“你是县委的。”又朝向刘秀印同志说，“你是村里的。”接着又说，“我是中央的。”然后主席扳着手指说，“中央、省、地、县、村，共五级，叫五级会议。”大家听了主席这番话都笑了，主席也笑了。

我接着对主席说：“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向您汇报工作了。”主席说：“噢！第一次呢？”我说第一次是1955年底在德州火车站列车上。主席说，“那次我从北京出发，一路上找河北、山东、江苏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话，大家都讲了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主席问我：“你什么时候去的聊城？”我答：“1956年调整区划，撤销德州，我去聊城。”主席问：“聊城过去叫东昌府，是吗？”我说：“是的”。主席问：“为什么叫东昌府？”我说不知道。于是主席就讲了为什么叫东昌府的典故。然后又说，“东昌府是当年梁山好汉活动的地方。”接着给我们讲述了几段梁山好汉在东昌府一带活动的历史传说。主席问刘传友：“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君义，九世同堂，有没有这回事？”刘传友回答：“有。在寿张城东关，至今还有张公祠遗址。”主席说：“寿张县，原来叫寿阳县，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张公，把寿阳县改称寿张县。”

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向我们说：“大家有什么好消息啊？”我汇报了聊城地区的工作，当我谈到聊城地委在寿张县关门口村召开全地区县、区委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学习参观和推广该村大搞“人造肥”的经验时，他打断我的话问：“什么？什么叫人造肥？你详细地讲一讲。”我告诉主席，“人造肥”是当地农民自己叫起来的，合作社在村头地边挖一定大小和深浅的土坑，将人畜粪便和田间路边的杂草、农作物秸秆掺在一起，加上一定比例的土和水，密封沤制，经过一定时间，达到变黑、发臭的程度后，便可上地。每亩地施上十多车这样的“人造肥”，可增产粮食二三十斤，丰产田里增产更多。毛主席问我，这种肥料含些什么成分？我说没有进行过化验，我说不清楚。毛主席就给我们讲了一大段关于有机质肥料的科学知识。讲了人的粪肥含些什么成分，牲畜粪便含些什么成分，鸡鸭粪便含些什么成分，经过沤制后发生哪些变化，产出些什么新成分等

等，讲完后主席说，“你们可以让农业科学部门化验一下。”刘传友汇报了寿张县的工作。他“口吃”较重，主席听得很吃力，但仍坚持倾听。大约十多分钟后，毛主席把目光转向了我，摆摆手说：“你！你来，你给我当‘翻译’。”大家都笑了，刘传友也笑了，毛主席更是笑出了声。刘秀印简单汇报了他们村大搞丰产田的情况。我们三个人汇报的中心都是围绕如何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指标（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和棉花指标；如何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如何大搞养猪积肥，以及如何加强防洪确保黄河和漳卫运河安全等等。主席认真地听我们的汇报，有时拿起铅笔作记录，并多次插话和提问。当汇报到打井下泉提取深层水时，主席问下泉用什么材料；当汇报到扩大东阿、齐河两县虹吸引黄灌溉面积时，主席问虹吸引黄能不能代替打井；当汇报到深翻土地、翻淤压沙、翻沙压淤改良土壤时，主席说：“淤土掺上沙土，就不板结了。”当我汇报到集中产棉区临清县老赵庄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棉双高产，1957年皮棉亩产73斤，粮食亩产478斤，提前实现《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指标，不但向国家贡献大量皮棉，而且做到粮食自给时，毛主席说：“粮棉双增产，很好。”当我汇报到聊城地区计划扩大引黄灌溉面积，除扩大已建成的位山、艾山、官庄、南坦、王家窑、大王庙等处虹吸引黄灌溉面积外，正在突击修建东阿县位山引黄闸工程，争取当年完成第一期工程，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时，主席听了很高兴。我说这样既利用地下水，又充分利用地上水，实现了“双保险”。主席一边点头、一边说：“‘双保险’这个办法好！”

这次向毛主席汇报，共进行了1小时50分钟。^①

下午，毛泽东由谭启龙、裴孟飞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以及历城县委书记吕少泉陪同，视察了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毛泽东看到，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高兴地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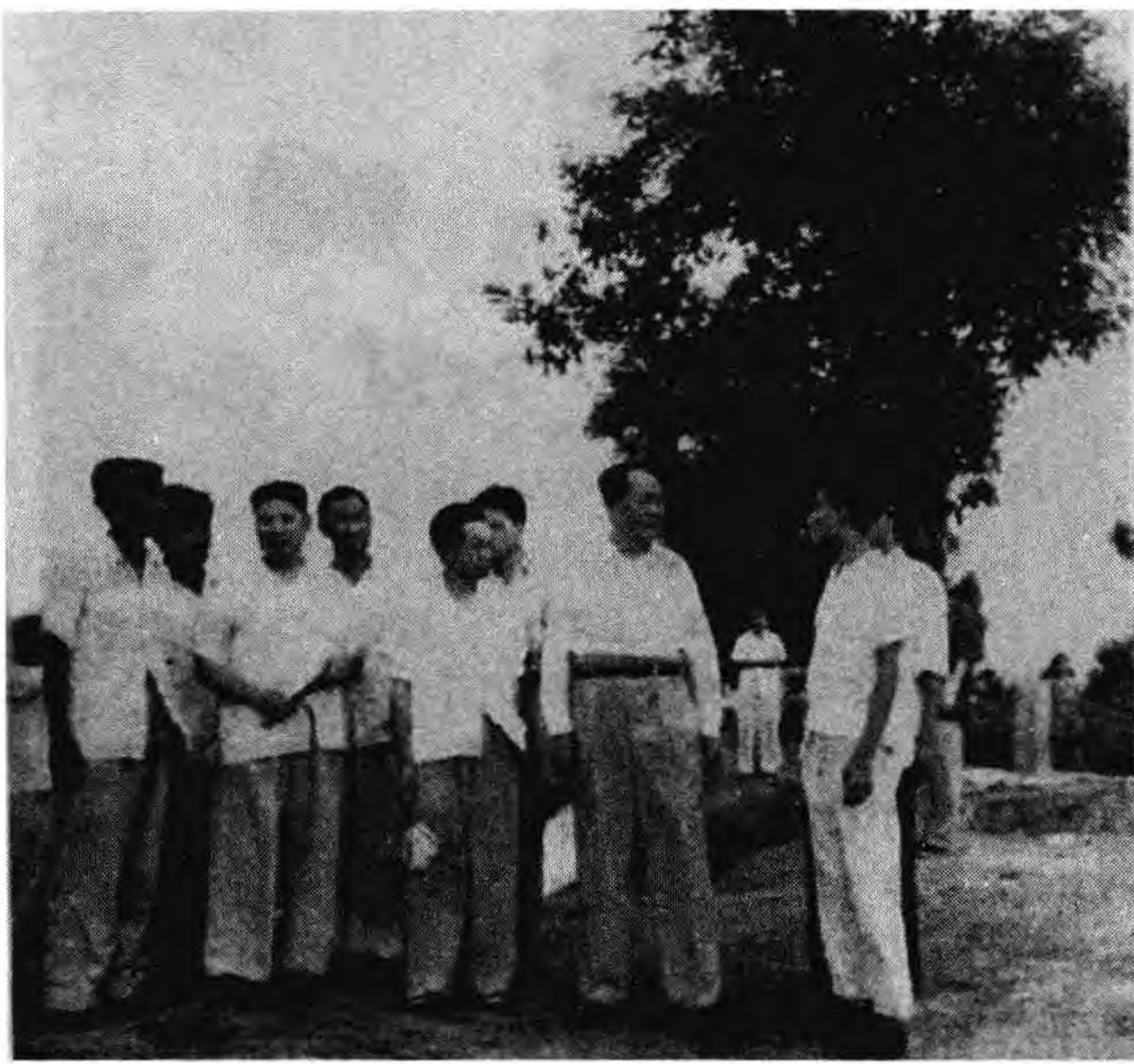
北园乡有2500多亩藕田和2100多亩稻田。毛泽东和北园乡北园社的

^① 魏余秀、邹庆忠编：《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第79页。

干部们一一握手问候后，便开始视察藕田和稻田。

毛泽东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作回答了回答。

问到计划产量，社主任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每亩只产二三百斤。”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北园视察农业合作社。（摄影/侯波）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泽东说。

毛泽东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李树成回答。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争先恐后从窝棚里跑出来。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和社员们一一握手。社员们有些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

毛泽东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你还是个娃娃呢！”

毛泽东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毛泽东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社主任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济南北园乡视察水稻。
(摄影/侯波)

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大约15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李树成回答：“妇女都在菜地里。”毛泽东说：“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准备把北园办成一个大农场。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驱车驶往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下午6时，毛泽东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大门口。在这里等候的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主席。

在去看棉花的路上，毛泽东问秦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笑着幽默地说：“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

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你是什么专家？”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

在一块由山东省委和农科所的同志合种的棉花试验田里，棉花长得有一人高，有关负责人告诉毛泽东，估计每亩能收5000斤籽棉。毛泽东拨开棉棵，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上边这些就不算了。”

随后他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秦杰说。

毛泽东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毛泽东发现棉花容易落桃，便对秦杰说：“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毛泽东问秦杰。

“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

毛泽东很满意：“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①

视察了农业科学研究所，毛泽东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济南部队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长征时期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也在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谈了不少话。

在济南停留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毛泽东勉励他们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②

9日晚，专列离开济南驶向天津。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大院接见军区指战员（谭启龙、裴孟飞）。（摄影/侯波）

① 魏余秀、邹庆忠编：《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第58页。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93页。

②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51页。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济南和长征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亲切交谈。（摄影/侯波）

10日凌晨3点，专列到达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车辆厂后面的叉道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10日中午，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阎达开应毛泽东的要求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下午4点多，毛泽东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视察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公社。

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通往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的田埂上。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毛泽东。几人连忙迎上去同主席握手，向主席问好。

毛泽东要去农田看看。他每到一处，都要眼见为实，不光听汇报。毛泽东走过一块地又一块地，走过溪上的石板桥，看到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毛泽东站住，问东郊区区长张福安：“‘上游’是指什么？”

张福安说：“社里在稻田管理中，十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毛泽东问。

“能赶。”张福安解释，“‘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这是四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毛泽东顺着稻田边走。贴在一个社员家后墙上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拐过几条田埂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第五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内容。他很感兴趣地念了一遍，特别注意其中写的争第一的生产措施。细细地看完了大字报，他才走进五队的稻田。

“这块稻田一亩有多少墩？”他手指一块地，侧身问东郊区区委书记曾国栋。

曾国栋说：“这块稻田共有 300 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多墩，每墩台 27 株左右。”

毛泽东蹲在窄窄的田埂上，用手分着稻株，细细地察看稻的生长情况。不一会儿，他回头问：“这块稻田是不是都这样？”

乡社干部们说都是这样。毛泽东站起身。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插话说：“主席，里边还有一块密植 22000 多墩的好稻田呢！”

“好，咱们去看一看。”

看完五队的稻田，毛泽东往回去看社里试验队的田。太阳已西移，依旧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气已使毛泽东汗流浹背。

一路上，他不断向社队干部们提出问题：第五队有多少户？有多少劳动力？社里去年的稻子产量和今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一亩稻田用多少工？土地耕多深？每亩施多少肥？

社队干部一一回答。其中谈到，今年粮食的产量指标春天的计划是亩产 1000 斤，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多生产粮食，亩产指标已经修改为 2000 斤、3000 斤了。

毛泽东一边仔细地听，一边四面张望。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他指着田旁水沟里飘着的水草，停住脚步问。不远处正在地里忙着拔稗子的十几个社员看见毛泽东，放下手



1958 年 8 月 10 日，毛泽东到天津东郊新立村视察。（摄影/侯波）

里的活计，快步赶来。社员李顺弟腿脚最快，走到跟前，正好听到毛泽东的这句问话。他上前对毛泽东说：“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他还跳下水沟捞上来一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水草，端详着，一边嘴里重复：“啊！原来可以喂猪，喂鸭。”

“这沟里是不是可以养鱼？”毛泽东指着水沟又问。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区长张福安连忙说道。

这时，围拢来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摘下草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试验队的田里，也有许多社员在那里专门等候毛泽东，他人一到自然又激起一片不小的欢腾。

经过苇田，毛泽东说：“这是好东西，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

张福安向毛泽东讲述他们的设想说：“我们准备把稻子和苇子进行杂交，将来可以长成稻子穗，苇子秸，不怕旱，不怕涝，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割就行了。”

毛泽东首先肯定这种敢想敢干的精神，然后问：“现在你们搞了试验没有？”

“还没有搞。”张福安说。

“这两种东西是不是属于一类性质呀？”毛泽东问道。然后说，“你们可以试一试。”

张福安说，一定试一试。如此边走边谈，就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十万斤的试验田。

“搞亩产十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表示疑问。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里，还得再实验再努力！”

毛泽东很婉转地说。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十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

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十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

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这段回忆要比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直接地表明毛泽东当时对亩产十万斤的否定态度。

据毛泽东的秘书高智回忆：

1958年的一天，高智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车上，毛泽东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十万斤稻谷？”

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看完这块试验田，毛泽东顺着田埂看见迎面来了三个青年，他们与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来的工作人员，到这里考察稻田搞试验。

毛泽东问：中国科学院在这里有没有单位？正在搞什么试验？他还指着其中一位青年手中拿着的捕虫用的网兜开玩笑说：“我看像个捕鱼的。”

走到另一块试验田前，毛泽东问道：“这块水稻亩产多少斤？”

区负责人回答是五万斤。

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赞道：“稻子长得很好”。张福安又向毛泽东介绍，这块稻田因为幅度窄，在两边田埂上搭上木板就能进行插秧和田间管理，社员劳动不用下水了。

毛泽东感兴趣地指着远处的大片稻田说：“那里都可以搞成这样吧？人们劳动时，就再也不用下水了。”

参观完试验田，准备回去。又走到苇田边，毛泽东没忘了向张福安说上一句：“水稻与苇子杂交工作，你们要试一试啊！”^①

10日晚上，毛泽东从云南路别墅坐车到马场道尽西头的天津干部俱乐部参加晚会。晚会中途，毛泽东不声不响下楼，乘车返回杨村附近的专列，继续工作。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51页。



1958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天津进出口商品馆参观自行车。（摄影/侯波）

11日下午3点，毛泽东参观了天津进出口商品陈列馆。他仔细观看了全部展品，不时询问展品的质量、性能、产地及出口创汇等情况。毛泽东对进出口贸易工作非常关心，他指示要搞好进出口贸易，多出口多创汇。他期望天津作为北方的进出口基地，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毛泽东鼓励大家继续努

力奋进，力争各种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在展览馆参观了三四个小时。^①

晚上，毛泽东回专列工作。

12日晚上8点到11点，毛泽东参观了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馆。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开幕前夕，毛泽东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长李耕涛陪同，到这里参观。

毛泽东首先参观的是“东风馆”。在天津拖拉机厂的热轧齿轮前，刘树英厂长告诉他，这是一项新技术，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坯加热以后，就能直接用机器轧成齿轮，用这种方法，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倍到50倍，而且加工余量小，可以节省25%的钢材。

在国产硅胶的展览台前，21岁的研究发明人、青年工人孙守纲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看得很仔细，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硅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他得知这种硅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时，毛泽东赞扬说，好。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113~114页。

“东风馆”内的许多展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无梭织布机、电火花机床、七头绕线机等等，他都驻足询问细看。当他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汽筒质量超过美国”时，毛泽东笑着说：“汽筒也在赶？”

讲解员向毛主席介绍，这种国产汽筒能打气 250 磅，美国的只能打 150 磅。

李耕涛接着说：“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接着看重工业馆，天津钢厂总工程师向毛泽东介绍了转炉炼硅钢的情况。一般说来，只有电炉炼硅钢，而转炉炼法则是工人们敢想敢干的成果。毛泽东看到天津用土法轧制的硅钢片，高兴地说：“你们都能制造了。”

在机电工业馆，毛泽东对职工的发明创造很感兴趣，在参观过程中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对有的展品他还请讲解员实际操作一下。毛泽东把有的展牌上的说明都读了，还帮助纠正错字。毛泽东在观看天津市供电局职工制造的带电作业工具时，停留了很长时间，毛泽东仔细地看、摸着，不时地询问产品的制作材料，国外有没有，使用起来安全不安全等。毛泽东边参观，还不断地询问市机电工业的生产情况、产品质量，对职工技术改造、技术革新的成果很满意。随行人员怕毛泽东走累了，请他进化工馆旁边的小屋里坐下休息喝水。毛泽东一手端茶，一面感



1958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天津参观进出口商品陈列馆。（摄影/侯波）



1958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天津参观技术革命革命展览会。（摄影/侯波）

慨道：看来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一个人都要精通几门，精通两门、三门、四门、五门。精通十门就比较困难了。

休息之后，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馆。在化工馆，毛泽东对展出的玻璃布、人造革以及用人造革制成的雨衣、皮

包、短大衣、皮鞋等产品，都有兴趣。一幅红白灯光相映的玻璃画版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海水取宝”四个字，下列从海水中取出的盐、纯碱、烧碱等产品的名字。讲解员说，海水里东西很多，永利久大沽厂今年准备从海水中提取金属镁、金属钠等多种产品。毛泽东笑了，说：海水里有那么多金属，将来缺少金属，你们从海里取就行了。

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要数纺织和毛麻丝工业馆和手工业馆。各种鲜艳的花布、丝织品、毛毯毛呢，收音机、乐器，都布置得很漂亮。毛泽东顺着展台走，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毛泽东问：“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旁边，说：“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毛泽东说。

梁树楷解释说。“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连忙谦虚地说：“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临走，毛泽东再次同梁树楷握手。

在手工业馆，机身用木头做的土造车床引起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还有兴趣地试听了聋哑教话器。

在休息室，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毛泽东讲：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接着，他又问：“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来？几年能够建立起来？三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现在开始向独立方向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毛泽东关心专区、县的地方工业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来。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其他地区上山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问及天津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他认为要抓紧，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他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便说：“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夜里 11 点，毛泽东结束了在展览会的三个小时的参观。^①

参观完展览会已近午夜，毛泽东回到专列继续工作。

13 日早 7 点，毛泽东让工作人员通知河北省委：毛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改变了原定去北戴河的计划，今天不仅不去北戴河开会，而且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参观的历程是，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从上午 10 点开始。

上午 10 点，毛泽东视察天津南开大学。

毛泽东到达南大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主席和省长、市长、校长被一些学生簇拥着进了校门南面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 156~159 页。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南开大学与校领导交谈。（摄影/侯波）

泽东每到一处，都同正在操作的师生们谈话，给予高度的赞扬。许多学生见到毛主席都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震天的口号声招来了南大校园中的近千名师生员工和群众。大家都挤在这个小院内要见毛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

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好在这个小院西面是敞开的，由刘省长、李市长、王亢之书记、校长、党委书记、毛办叶子龙主任、李银桥卫士长以及随从人员和保卫人员围绕着毛主席，形成一个向外挤的集体，保卫着毛泽东向放汽车的地方走。但是热爱毛主席的广大群众为了更近一些亲眼看到毛主席，还是用力往里挤，有时把随从人员快要挤到毛主席身上了。这时，毛泽东仍然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群众往里挤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地翻滚而来。经过几番大的挤撞，终于保护着毛主席上了汽车。大家一同前往天津大学参观去了。尾随这支车队的广大群众又跟到天大广场上来了。^①

上午11点，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毛主席在河北省及天津市领导人刘子厚、李耕涛、阎达开等人陪同下，自南开大学来到了天津大学，毛泽东在三层的会议室接见了校长张国藩教授、党委书记贾震及副校长等人。

张国藩校长向主席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这个学校98%的同学参加了勤工俭学，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个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毛泽东听了以后表示满意，说：“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117~118页。

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他还说：“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毛泽东问王亢之：“天津的中学有没有勤工俭学？”王亢之回答：“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60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这时，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约一万人，人们太兴奋和激动了，在外面高呼、鼓掌，表示对领袖的无限尊敬和热爱。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又坐下和人们继续攀谈。毛泽东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刘子厚省长这时向主席汇报：“前几天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一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刘省长说：“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毛泽东说：“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得更好。”王亢之说：“天津市原有六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四所高等学校，每县并将办起一所综合大学。毛泽东说：“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刘省长说：“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毛泽东说：“好啊！工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摄影/侯波）

厂就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学生也是工人农民，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

毛泽东对学校办起许多工厂很感兴趣，说：“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的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张国藩校长汇报说：“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节献礼，昼夜突击。”毛泽东关切地说：“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据当年的学生张美珍回忆：学校的机工厂坐落在九楼的东北方向，距九楼的直线距离约有500米左右，再加上车间内机声隆隆，听不到九楼前的欢呼声，因此，我们这些正在干活的学生和工人师傅，一点也不知道毛主席来到学校的消息。

上午10点多钟，车间主任王金森师傅来通知大家，说是上午有领导人来厂参观，要求大家一定要坚守岗位，不要擅离职守，更不能停机，围观。这通知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也不乏地位显赫的领导。因此，每人都与往常一样专心干活。

11时许，毛泽东来到机工车间（南车间）的西门口，直到这时人们才明白，原来是毛主席来了。顿时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大家互相注视着，按捺不住惊异和兴奋的心情。机工南车间的厂房很大，东西方向的跨度足有50米。我在车间东头的刨床上干活，距毛主席进入的西门还有段距离。我远远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主席，因不能擅离岗位，又不能关掉机床，我只好急中生智，使刨刀离开工件，让刨床临时空转一会儿。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踏进了车间的大门，向车间里走来。毛主席身材高大、健壮，身穿白色长袖衬衣，灰色西裤，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毛主席一面招手，一面沿着车间的那条主通道，缓缓走来。毛主席几乎在每台机床边都停下来，凑近机床观看，还主动伸出手与正在干活的学生、师傅们握手，谈话。不一会儿，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的刨床走来。我太兴奋了，心怦怦跳得厉害，当毛主席走近我的机床时，我停住手上的活，上前一步，仰望着毛主席说：“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停住脚步答道：“你好，你好。”并向我伸出了手，当我双手紧握着毛主席那有力的巨手时，一切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站在毛主席面前，就像站在我崇敬的长辈面前一样。我看到毛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校办工厂。（摄影/侯波）

主席被晒得红黑的面孔非常慈祥。那天，实在太热了，毛主席的白绸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了大半截，袖子半卷着，一双棕色的皮鞋，前头已经磨出点点白斑。

毛主席站在机床前开始同我谈话，毛主席首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张美珍。”

毛主席又问：“你是工人还是学生？”

我说：“我是学生，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接着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你是哪里人？”毛主席问。

“我是山东人。”

“家住在哪里？”毛主席又问。

“家住在上海。”

“你们劳动多长时间了？”

“我们已经劳动四个月了。”

“还要劳动多长时间？”

“可能还要劳动半年呢。”

“你们现在能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了?”

“可能是二三级工的水平吧,我们反正能够独立干活了。”

毛主席又问:“你们劳动时,还读书吗?还有老师给你们上课吗?”

我说:“我们现在是边劳动,边上课读书,劳动时老师还给我们上三门课。我因为选学的外语课是英语,要和没来劳动的班级合班上课,因此我还去上英语课,一共上四门课呢。”毛主席边听边点头,看到毛主席仔细听我讲话,我的信心更足了,回答问题更加自如了。毛主席又问:“你说光是读书好,还是这样又劳动又读书好啊?”我立即回答:“这样好,又劳动,又读书,既有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还是这样好。”毛主席一边点头,一边又问:“你们的同学都赞成这样参加劳动吗?”我说:“我们都赞成。”

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回答,就像一位师长在专心听取学生的答题一样,认真、真诚。我被毛主席的平易近人、倾听群众心声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以后每当我读到那些回忆毛主席提到毛主席热爱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内容,都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毛主席曾经如此认真地听取过我——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谈话。

毛主席谈话时,声音洪亮且缓慢,尽管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依然句句听得清楚,我也用很大的声音说话,以压过机器的响声,使毛主席能够听清我的回答。当时毛主席身边有一名年轻的警卫人员,另有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学校党委书记贾震。我记得,在我回答问题时,贾震书记紧张地注视着我,就像是家长担心孩子答错了问题,当看到我顺利地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时,他们又都显现出由衷的欢喜。那次随行的记者中,有新华社老资格的摄影记者侯波,她跑前跑后,敏捷、利落地抢拍下一个个镜头。经过这段谈话后,气氛已经十分亲切、轻松了。这时,毛主席又指着机床前挂着的一张蓝图问道:“这张图纸,你会看不会看?”我说:“我会看,看懂了图纸,才能按图纸的要求来加工啊。我们已经学过机械制图课,看图纸就不困难了。”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地点点头。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半小时。当听说铸工车间也有劳动的学生时,毛主席再次同我握手,走出车间的东门,向铸工车间去了。

毛主席一离开车间,我们立即围在一起,笑着,跳着,热烈地交谈着个人的感受,全车间40多位学生和师傅沉浸在无限兴奋和激动之中,大家

不约而同地热烈祝贺我，我被认为是最幸运的，我们互相握手，争着去握那一双双毛主席刚刚握过的手。

车间里的机器声没有了，只有沸腾的人群热烈的谈话声。刚刚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太突然了，不少人似大梦初醒，当这一切都将结束的时候，才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毛主席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敬。这时，有人说：“我们应该送给毛主席件礼物，作为参观咱们车间的纪念啊！”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于是，我们迅速决定，将车间里生产的“细度计”献给毛主席。这是一种小巧、精密的用于检验油漆颗粒度的仪器。据说，因加工精度高，已达到国际水平。大家一致推举我前去献礼，我不再推辞，带上临时包装起来的“细度计”，第二次见到了毛主席。

这时，已经中午12点钟了。毛主席到铸工车间参观后，又参观了机工北车间，正在工厂的会议室休息。我带着“细度计”向会议室走去，我向保卫人员说明后，径直跑到会议室。进门后，看到毛主席正坐在椅子上，与省市领导人谈话。那间会议室，狭小、简陋，一张条形长桌上沾满了机油，那是工厂的“特色”。旁边有几把木椅，桌上摆着玻璃杯和茶水，一切都保持着原有的面貌，不曾经过任何准备。

我的到来，使毛主席和在座的各位领导都转过脸来，等待着我说明来意。我赶紧说：“我是代表车间里全体师傅和同学，来向毛主席献礼的。”毛主席听后很高兴，显然他已认出我就是刚才那个谈话的学生。毛主席再次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并指着身边的一把椅子说，“你也很累了，坐下吧。”我把“细度计”放在桌上，便在主席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毛主席指着“细度计”问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啊？”

“这是用来检查油漆中颗粒细度的。”我一边说，一边取掉包装纸，比试着，向毛主席说明如何使用。

毛主席又说：“这个给了我，你们还有吗？”当听我说明这是我们车间生产的一种产品时，他老人家连声说“谢谢，谢谢”。并顺手递给警卫人员，由他放进了一只手提箱里。我看到任务已完成，便起身告辞，这时，毛主席却指着校党委书记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毛主席又问。

“他叫贾震。”

“是哪个‘震’字啊？”我一面回答说“是地震的震”，一面用笔在纸上写出个“震”字。毛主席笑了，其他人也笑了。毛主席又指着李耕涛市长问我，“他是谁？”我看看李市长，为难了，只好如实回答“我不知道”。毛主席幽默地说：“他是你们的市长，以后有事情要找他哩。”接着党委书记向毛主席简单介绍学校及工厂的情况。^①

参观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已经是中午1点多钟了，几辆汽车载着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饭店。

车上的窗帘拉上了。还算顺利，一路上并没引起多少人特别的注意。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正阳春饭馆与职工谈话。（摄影/侯波）

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站在门前，等候客人。听到汽车喇叭响，他一抬头，见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色红润的长者。

这不是毛主席吗？他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门，却忘了和毛泽东问个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也依次进门。毛泽东一踏进店堂，便打听厨房在哪

^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第64~70页。

里？每到一处，他总是这样，特别愿意意见见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和他们唠唠家常。

厨房又窄又热，毛泽东和厨师们攀谈得挺热闹。他问大家每月能挣多少工资？有没有休息时间？生活过得好不好？听大家说每月能挣六七十元工资，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过去强多了，他满意地点头。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被安排在二楼餐厅吃烤鸭。

两点多钟，饭菜上桌。也许天气闷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不料就这一眼，引来了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妇女偏偏就在这会儿正在窗台晒衣服，又偏偏她的眼睛特别尖，只一眼，她就认出对面楼上窗口前站的是毛泽东，毛主席！

她脱口而出：“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声喊是又惊又喜，立刻牵动街前街后的行人。大家迟疑片刻，便不由分说潮水般涌到饭馆门前。人越聚越多，人群越来越激动，堵住路口，塞满街道，顿时黑压压一片，交通陷于瘫痪。交通警察无法疏导人群，况且他们自己也多么想见一见毛泽东！

卫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上前把窗关好。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开的。

餐厅里毛泽东正与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边吃边谈。但关着的窗户却挡不住楼下滚雷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口号声震天动地。

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纱窗，推开玻璃，伸出头去向人群致意。这一下，立刻掀起街上的一片狂潮。等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接着回到桌前吃饭，不想没吃几口，窗下又有了经久不息的欢呼。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走到邻街的四个窗口，挨个探出头去，向大家招手，向大家鼓掌，来回走了两趟。

毛泽东情绪激动，他一再挥动着手，呼应着人们的欢呼，连声喊着：“人民万岁！”

回到桌前，没吃多长时间，毛泽东再次被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牵动走到窗前，如此竟有六次。

吃完那顿吃了很久的饭，毛泽东和饭店的店员们在一起聊天。毛泽东待人的和蔼态度感动了他们。可不是嘛，每当服务员上一道菜，他都要站起来向他们道辛苦。他不用摆上的象牙筷子，而叫人换上普通的竹筷。烤鸭的张师傅找来一本崭新的笔记本要请他签个字，他也爽快地挥动钢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这会儿，楼下安静些了。毛泽东把饭店的经理找到，叫他坐在自己身边。

毛泽东问他：“你当了几年经理啦？”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毛泽东问。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笑着说：“那很好！”并鼓励他，“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楼下的人群却没有散，人多天热，人人汗流浹背，但他们心中的热情却如日中升。他们要亲眼见见毛泽东。

动身的时候到了，可门外街上到处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要把人晒坏的。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李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没有人听。他又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连声地叫。李市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

没办法了。只好由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结实的战士奋力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尾靠在正阳春饭店的门口。

这辆车窄小，容不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可这会儿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卫士和警卫人员们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硬是把他塞进了华沙车。

接着，前面警卫排开路，后面有人推车，左右护卫，一步一步，终于将车推出了人群。

车里，毛泽东笑着，向人们挥动着手。汽车在人群的夹道中终于徐徐开动，车速也慢慢加快。人们依稀可见毛泽东的手还在向后挥动着，许多

人恋恋不舍地跟着跑。

车上，毛泽东双目微闭，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①

下午，毛泽东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的演出。亲切地接见了演员，并勉励他们“要好好学、好好练、有前途”。

当天下午，毛泽东离开天津踏上返途。

傍晚，专列从天津缓缓驶入丰台车站。

毛泽东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委第一书记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观看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演出。（摄影/侯波）

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们见过面后，毛泽东谢绝大家要他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的提议，说：“天不早了，还是先去地里看一看吧！”

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毛泽东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毛泽东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毛泽东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毛泽东握住他满是泥土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65~169页。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丰台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社看青年生产队刚播种的白菜试验田。（摄影/侯波）

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毛泽东点头：“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啰！”

一块白菜地边，毛泽东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一亩四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二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

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120万斤？这是计划啰！”毛泽东听到这里，插话问道。

田德顺说：“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10月里菜就长起来了。”区委书记王景铭介绍说。

看完白菜地，看玉米地，西红柿地。毛泽东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毛泽东问：“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

乡党委书记答道：“生产大跃进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三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已经近晚上8点了，毛泽东还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

一路之上，毛泽东还在打听菜的问题：“一亩菜产多少斤？”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一万斤，今年两万斤，明年能到三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五亿六千多万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菜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问。

王景铭说：“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他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

到了小屯农业社，毛泽东到四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

接着往前走，毛泽东问到小麦的产量：“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

社主任田岐道：“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

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2000斤，有把握吗？”

田岐说：“有把握。”

毛泽东问：“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他一项一项问道。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

田岐逐项回答，告诉毛泽东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十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两台拖拉机和两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边走边说，到了公路上。随行人员劝毛泽东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毛泽东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要再去看一看。

他站在深翻地旁，问用这种方法翻地，需要多少个工？

田岐说：“一亩地四五十个工。”

“明年种小麦的地都深翻吗？”他又问，担心人力不够。

田岐道：“社里人多，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明年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翻不过来，我们就夜战。”

听到“夜战”两个字，毛泽东转身向周围的社员们大声说：“天黑了，该收工回家了！”

“不算黑。还得干一会儿呢！”有人答话。

毛泽东上车准备离开，大家蜂拥而上，争着再看看毛泽东。

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找人搀着挤到前面来。社主任高声道：我们一定要实现跃进计划向毛主席报喜。^①

13日夜，毛泽东回到北京，回到中南海。毛泽东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卫士长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当晚，毛泽东批阅文件材料，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做准备。

^① 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170页。

二十九 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1958年7月23日，中央通知：8月13日在北戴河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要求8月13日报到。

8月1日，中央又通知：为给各大协作区留出时间再开一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推迟三天举行，改在8月16日开始，8月15日报到。

8月14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总理、陈云、彭真谈话。

15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

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次会见了西哈努克。中午12时20分会见结束，毛泽东赶往机场。

12时50分毛泽东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14时飞抵北戴河。

毛泽东顾不上休息，15时召集会议，讨论钢铁生产问题。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和主管计划及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各大协作区主任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感到1958年完成1100万吨钢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陈云后来说：头一天各省市同志到了之后，到主席那里去，他说少一吨都不行的，少一吨就失败，要你们当夜打电话。这是生产方面的情况，他很担心。主席有所批评，主席批评中央的一些领导机关，经济小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中央各部，现在都忙于搞计划去了，没有机关搞生产，这样不行。主席说如果发生这种现象要有纪律，这样大规模的建设，没有

纪律不行。^①

这天，毛泽东起草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 17 个问题。

- (1) 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
- (2) 今年铁、钢、铜、铝问题
- (3) 明年农业问题
- (4) 明年水利问题
- (5) 合作化问题
- (6) 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
- (7) 教育问题
- (8) 干部参加劳动问题
- (9) 劳动制度问题
- (10) 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
- (11) 技术保密问题
- (12) 国际形势问题
- (13) 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 (14) 协作问题
- (15) 深耕问题
- (16) 肥料问题
- (17) 民兵问题^②

17 日至 30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7 日下午 3 点半至 5 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北戴河会议第一次大会召开。有 80 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会议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毛泽东说，发下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大家来进攻，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负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82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卷，第 343 页。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摄影/侯波）

“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 1100 万吨钢。”毛泽东说，到年底只有四个月 13 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催回电话，保证完成。毛泽东提出：关于农业的第三至五个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关于粮食的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 6500 亿斤，即每人平均 1000 斤，明年人均 1500 斤，后年 2000 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震林回答：“有的地区是人均 2500 斤，口径不一。”

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毛泽东说，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做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毛泽东还说，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要统统搬到乡下去。（邓小平插话：干部参加劳动的决议，我和乔木负责。）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

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①

这一天，毛泽东对《嵎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并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②

18日凌晨1时，毛泽东就停止在深圳方面的演习准备打金门给彭德怀写信：

德怀同志：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上午一时

再：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③

当日，会议开始讨论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主持，李富春先谈了两个计划草案的起草经过。

晚上，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9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毛泽东说，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责令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完成钢铁计划，而且一吨都不能少，如果完不成要实行纪律。但他并不赞成到处都搞钢铁。毛泽东说，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要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毛泽东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30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345~346、348页。

毛泽东说，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到每人1500斤再看。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毛泽东说，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

毛泽东说，钢明年27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合一；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毛泽东还提出，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他说，你们回去以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合作社不搞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

毛泽东说，军官要下放当兵，干部要参加劳动，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政治挂帅。^①

19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邓小平也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

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30~831、832页。

等参加，汇报有关钢铁生产和机械生产问题。汇报后，毛泽东作了八条指示：一、抓生产，经委由薄一波负责，主要抓生产，王鹤寿、赵尔陆也抓生产。二、原材料的调配也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超计划部分地方还是分成。三、抓设备，尽快地把设备安装起来投入生产。四、机械工业收到材料后，第一是制造炼钢炼铁和轧钢设备。五、各省、市委每个礼拜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冶金部的直属厂要加50万吨的任务，作为保险系数。各地也要有这个计划。七、调拨材料生产要有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留党察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八、开一个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戴河开。^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云就当年钢铁生产问题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分析已完成的产量与全年指标相差悬殊的原因，研究用四个月时间实现全年生产任务的措施。

陈云后来说，19日晚上搞了半夜，对钢铁情况的估计，7月份380万吨，主席指出很危险，要敲警钟，因为相差很远，380万跟1100万，差800多万吨。搞1100万吨是6月19日才决定的，这样的指标布置下去都是很迟的。

2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云继续就当年钢铁生产问题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分析已完成的产量与全年指标相差悬殊的原因，研究用四个月时间实现全年生产任务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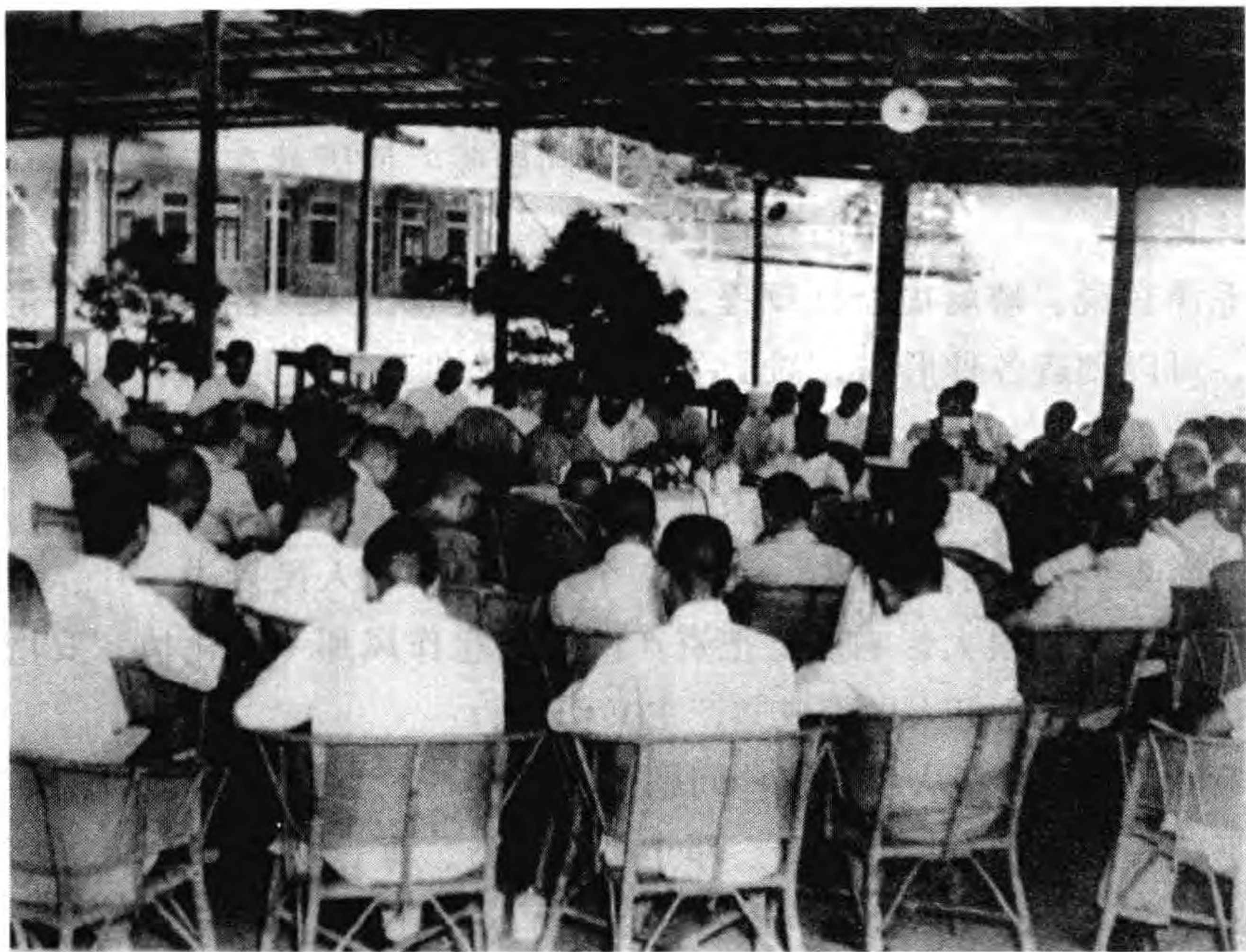
这天下午6时，毛泽东在北戴河接见了西哈努克亲王。

接见结束，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诚、叶飞、肖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陶勇开会，部署炮击金门作战。毛泽东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

21日上午，毛泽东第二次在协作区主任会上讲话。

毛泽东说，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万到3000万吨钢，30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他说，24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我看17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427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03~704页。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摄影/侯波）

毛泽东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們向人民取得少，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毛泽东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

“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

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

毛泽东说，嵯岬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共产主义不行了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毛泽东说，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①

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赵尔陆、王鹤寿开会，研究钢铁生产问题，会议开了一个小时。

下午3时，毛泽东又召集彭德怀、林彪、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开会，研究炮击金门事。毛泽东听取了叶飞的汇报，提出：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毛泽东没有做指示，宣布休息。^②

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谈炮击金门问题。

这天晚上，参加炮击金门的各路部队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22日至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炮击金门问题，没有出席这天的会议。

22日，陈云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到北戴河当天召集陈云开会时关于钢铁问题的意见。陈云说：今年的钢铁生产计划能否完成很担心，7月份只完成了380万吨，离1100万吨很远。钢铁第一本账620万吨，第二本账710万吨，第三本账是八大二次会议850万吨，第四本账是6月19日1100万吨。第四本账下达时间很晚，许多大工厂都没有完成任务，原因之一是从部起相当多的工厂偏重于搞计划，忽视搞生产。主席批评是很对的。二是调度不灵，一种是许多小高炉是农民搞的，掌握生产需要一定时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32~833、857页。

间，生产不稳定。另一种是许多厂子的生产没有完成，原因是成都会议提出分成，工厂按分成比例留下使用了。再有一种是许多厂子是6月15日下放的，上下交接在过渡，同时冶金设备不能正常供应，一些厂子得不到原材料，不能迅速生产。

在22日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最后下了决心，说，照计划打，并要叶飞就在北戴河指挥。下午，毛泽东又召集会议，讨论关于领海、领空范围问题。^①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②

23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 1905~1995》中卷，第42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360页。

想觉悟和道德质量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刘少奇说：公社建立后商业就不要了，只要一个批发部。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

23日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参加大会，他应约到毛泽东处谈领海问题。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万炮齐轰被国民党军占据的金门、马祖及其附近小岛。

晚上，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开炮，时机选择得当。联合国大会三天前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退出黎巴嫩和约旦。美国人霸占我台湾更显得无理。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

毛泽东指示新华社要迅速、广泛收集国际反应，重大反应要用电话传到北戴河来。报道和评论暂时不搞，观察几天再说，这是纪律。毛泽东说：要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如此，新闻宣传单位亦如此。

毛泽东说，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现在我们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美国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主动，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我们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不冤枉他。美国在台湾有几千驻军，还有两个空军基地。美国最大的舰队第七舰队经常在台湾海峡晃来晃去。美国在马尼拉还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不久前（8月6日）就说，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像在黎巴嫩那样。这就是证明。^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834~835 页。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74~75 页。

24日凌晨2时，毛泽东就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农业方面的文件作了批示。

上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开会。

下午，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作了第三次讲话。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决议当作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毛泽东谈到，他就钢铁问题说的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监狱。

毛泽东说，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负担48%，限制农业40年不发展。我们藏富于民。毛泽东说，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就上级服从下级。

毛泽东说，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如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①

25日至3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时，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各省、市、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除了工业书记外，各省、市、区的计委主任和有关厅、局长也参加了会议，专门讨论1958年的钢铁生产问题。

25日下午，陈云、李先念、程子华、陈国栋前去毛泽东处谈话。谈话后，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了粮食和棉花的收购贮藏及商业工作问题。陈云、李先念、程子华、陈国栋参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835页。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在北戴河海滩游泳场的休息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刚下海游泳回来，马上主持开会。除了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外，还有彭德怀、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叶飞（福州军区政委）、胡乔木和吴冷西。

毛泽东说，我们在这里避暑，美国人却紧张得不得了。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 95000 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態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何况金、马以至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毛泽东说，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既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试探美国人。看来美国人左右为难，处于东西难以兼顾的境地。但是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而要把主要锋芒对着美国到处侵略，谴责它入侵中东，也谴责它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个反华备忘录，我们人民日报就可以以此为由头，历数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驳斥备忘录对我们的诬蔑攻击。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从黎巴嫩和约旦撤退一事，也可以组织评论，要求美军从它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基地包括我国台湾撤退。现在宣传上要打外围战，等美国、蒋介石以及世界各国的动向摸清楚之后，再开始就炮打金、马问题发表评论。届时我国政府也要发表声明或文告。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彭德怀提出，金、马前线官兵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可以写些通讯报道。但要注意保密。大家同意前线记者可以先作准备，发表时机另议。^①

26日至27日，会议再次讨论1959年和“二五”计划问题，主要是为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6~77页。

了最后通过关于计划和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文件。

26日，李富春就计划的调整问题向会议作了五点说明。

2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要把管生产与管基本建设和计划的部门分开的意见。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把胡乔木和吴冷西找去，谈人民日报的宣传。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现在报刊上有些评论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今年年初报纸宣传方向比较明确。《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写得不错。最近一个时期，宣传上就显得杂一些，编辑条理差，把一些东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鲜明性和一贯性，评论和消息配合不够。现在中央已决定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大办人民公社，大办民兵。报纸就要跟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要突出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工业消息放在一版和二版，农业放到三版去。毛泽东要胡乔木和吴冷西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回北京布置。^①

30日上午，北戴河会议最后一次大会，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也来旁听，所以人特别多，约有300多人。刘少奇主持大会，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7~78页。

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毛泽东传》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毛泽东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毛泽东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毛泽东说，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8月21日起，还有19个星期，133天，现在又过了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明年1月1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900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搞1100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今年1100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

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 1100 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 2500 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 2700 万吨，200 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

毛泽东说，要把城市乡村都搞得像中山公园、颐和园。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毛泽东说，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叫绿化？没有树，怎么叫绿化？

毛泽东说，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搞地瓜。

毛泽东说，要有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不分高低。现在军队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①

这天下午，主要产钢铁区的工业书记当面向毛泽东作保证，一定完成当年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计划。

31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开过后，工业书记会议又开了一天才结束。会议由薄一波主持，陈云、李富春到会讲话。毛泽东对钢铁产量逼得紧，陈云不得不反复强调抓钢铁生产计划的落实，甚至说出了“土炉子是关键”的话。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云开会。

9 月 1 日，毛泽东就编印《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作了批示。

2 日 9 时，毛泽东写了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836~838 页。

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是陆定一同志论教育的文章，虽较长，理论水平颇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是民兵决议，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要考下等了。有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见书，读得下去，提纲挈领。‘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凑（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语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

毛泽东说：“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词”。“如不同意，可用通信方法鸣放辩论。我写的是一张大字报，你们也写吧。如果同意，请你们会谈一下”。“建议：重写一遍，二遍，三遍，以至多遍，写得同人民公社（决议）那样好”。“建议：你们有意写工业纲要四十条，那很好，就动手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①

3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上作了批示。^②

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戴河返回北京。

晚上，毛泽东在北京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徐冰开会，决定9月5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4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是讨论炮打金门后的形势。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367~369、376页。

三十 巡视大炼钢铁

金门炮击开始以后，国际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一方面是美国，害怕台海紧张将其拖入战争；一方面是苏联，害怕中美战事将其卷入美苏战争。

1958年9月8日至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商谈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会后，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托付给周恩来等人，自己把关注的目光重新转回国内。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安徽、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视察，查看北戴河会议后，钢铁生产的情况。

9月10日清早，毛泽东接见了乌鲁木齐社会福利参观团，随后立即赶往机场。

上午8时，毛泽东携张治中，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出发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我今年月月都有会议，这次北戴河又开了半个月紧张的会议，有点累了，我们这次出去要好好地休息几天，什么公事也不谈，什么文件也不看。”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随毛泽东到武汉。^①

11时，毛泽东的座机飞抵武昌南湖机场，王任重等在机场迎接。张治中等人的座机还未到，毛泽东就坐在机上等张治中等人。

11时40分，张治中等人到武汉。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马上到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1、3页。

轮船上吃饭，饭后游江。”一行人从机场直接到了江边。

一上轮船，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我这次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东西也不看，我们就是游泳休息。”话刚说完，毛泽东又向王任重问起农业丰产和小土高炉发展问题。张治中、曾希圣偶尔插一两句，毛泽东又说，“我们到杭州再休息好吧，到那里好好地休息几天。”

中午，在船上吃饭。一碟青菜，一碟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饭后，毛泽东畅游长江。游完上船，张治中说：“下午没有什么活动，可以睡觉了吧？”毛泽东笑着说：“我游了泳就算是睡了觉。”王任重说：“主席还是休息吧，我们晚上还想请主席看戏哩。”毛泽东不再坚持，到东湖住处休息。^①

晚上8时，省委组织晚会，毛泽东未去。他翻看当天武汉的各种报纸，

《长江日报》上一篇《怎样使小高炉正常出铁》的报道吸引了他。文章是武汉第一纱厂党委书记兼经理胡伯琴写的，他介绍了一纱全体职工如何克服困难，土法上马，苦战45天，建成小高炉并投产。毛泽东认真地看了报道，决定第二天到一纱厂看小高炉。

1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王任重、曾希圣两书记和张治中、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等人陪同下，到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视察武汉第一纱厂小高炉。
(摄影/侯波)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2~3页。

武汉第一纺纱厂参观小高炉。

毛泽东听了党委书记兼厂长的简单介绍，就直趋小高炉旁边。工人们紧张地操作，仅几分钟就出铁了。张治中兴奋地说：“纺织厂也搞起钢铁来了！”毛泽东说：“不但可以搞钢铁，如果条件许可，将来还可以斟酌搞点农业，种点菜，养些猪，来个农、林、牧、副、渔结合，工、农、商、学、兵合一。”张治中说：“现在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乡村都大搞钢铁，今年产钢不止1070万吨吧。”毛泽东说：“也许还可以多一些，不过今年也只有三个半月了。”曾希圣说：“现在有些专家怀疑反对，说是走了弯路了。要搞就要搞大的现代化的，不要搞小的土的，小的土的将来还要淘汰。”毛泽东说：“我们活到今天，谁不经过青年少年时代？像我们这样年岁的人不早就把青年少年时代抛掉了么？”^①

参观完第一纱厂小高炉，毛泽东又来到长江边，登上轮船，再次畅游长江。长江两岸，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毛泽东走到船舷边向群众招手，群众热烈欢呼鼓掌。毛泽东从长江大桥附近下水，顺流而下，游了40分钟约十华里。陪同的有王任重、陈再道等。

晚上，王任重请毛泽东到东湖湖边的听涛轩酒家吃东湖鱼。作陪的有曾希圣、张治中、省委曹书记、张体学省长、李明灏副省长等。

晚饭后，毛泽东到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

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东湖住所接见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两人就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事后表示，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耳不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能洗刷唯心精神。^②

下午3时，陈再道、谭甫仁等军区领导来东湖宾馆，见毛主席。

陈再道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毛泽东肯定了武汉军区的工作。谈到军队干部要下连队当兵一个月。毛泽东说：一定要当满一个月，要真正当一个兵，一个兵每天要做的事，都要去做，不得暴露身份，就是普通一兵，兵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要求，都要有自己的体验。毛泽东听说一位老将军因工作关系，提前六天回到机关，说：“六天还等不得？”后来，这位将军立即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4~5页。

^②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168页。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陪同下接见武汉军区党代表大会代表。（摄影/侯波）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前往武大校办工厂视察。（摄影/侯波）

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集中群众的智慧。”^②

晚上7点57分，毛泽东在武汉大学运动场接见了武汉大学、武汉水

返回连队，补满了一个月。

在陈再道等人邀请下，毛泽东等驱车前往武昌何家垄武汉军区大礼堂，接见了党代会400余名代表。然后到大操场同大家合影留念。^①

12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畅游长江。毛泽东此次游40分钟，约20华里。

晚上7时，毛泽东来到武汉大学，参观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办的电池厂、硝酸厂、制钢厂、硅钢片厂等。毛泽东说：“学生自觉地要求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

① ②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171~172、181页。

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四所高等院校一万三千多名师生员工。

当晚，毛泽东约曾希圣、王任重两书记，陈司令员，张治中，还有三位青年女游泳运动员吃饭。

当日夜，毛泽东彻夜工作，批阅文件。对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动态》作了批示；就炮击金门和中美华沙谈判给周恩来、黄克诚写信；凌晨，给张治中写信，附去五份文件要张治中看。

13日中午，毛泽东第四次游长江。工人和附近轮船上的群众挤满了沿岸和甲板，比前几天人更多了。开船后，毛泽东同三位妇联负责人谈话。谈话结束，毛泽东下水游了半小时，上船后顺江而下，向武钢进发。^①

下午2点，毛泽东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摄影/侯波）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长江轮上与武汉妇联负责人交谈。（摄影/侯波）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13~14页。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视察武汉钢铁厂。（摄影/侯波）

乘船到青山蒋家墩码头。武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等在码头迎接。毛泽东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观看一号高炉出铁并到焦化厂了解焦炉生产和建设情况。

17时，毛泽东回到驻地，又到东湖游泳。观看了武汉赛艇集训队运动员的表演。

14日是星期天，早上，曾希圣返回合肥安排毛泽东视察，临行前与张治中商量主席到合肥的迎接事。晚饭时，张治中向毛泽东提出：“主席十年来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您，您到合肥时让人们站在道路两旁瞻仰瞻仰可以吧？您不反对吧？”毛泽东说：“我已经受到你们很多批评了，说我从没有到过安徽。曾书记也多次这样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①

下午有雨，没有安排活动。毛泽东约武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还有王任重谈话。

下午5点多，毛泽东吃饭，一小碟青菜，一碟香肠，一些面包。张治中说：“主席吃得太简单了吧？”他说：“就这样，吃得很舒服嘛。”毛泽东边吃饭边和大家谈话。^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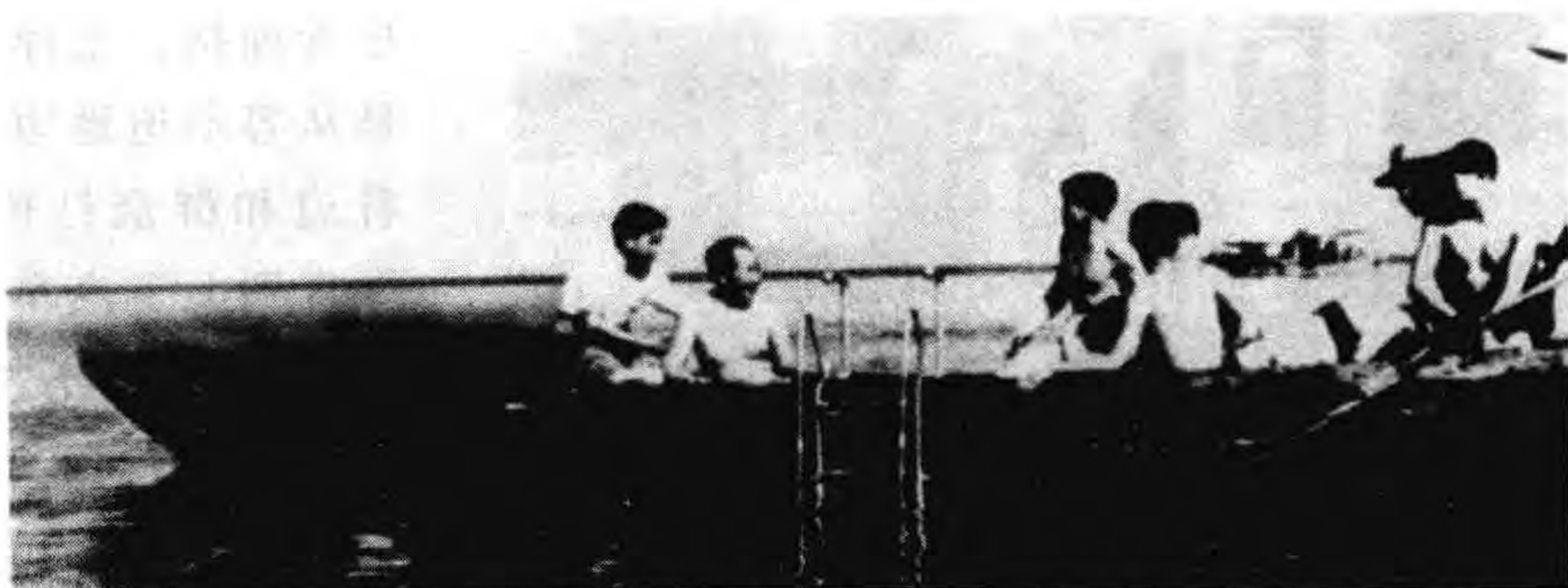
吃完饭，毛泽东对林一山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情，我们到长江船上去谈吧。”上船后林一山扼要汇报了三峡水库工程设计情况。

傍晚，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32分钟，十余华里。

畅游长江后，毛泽东到“老通成”吃武汉特产“豆皮”。市民群众知道了，出来时一大群人站在车旁和四周等着，爆发出一片欢呼和掌声。毛泽东边走边向群众举手示意。

晚上8点半，毛泽东到省委礼堂看演出，有京戏、湖南花鼓戏等。中

① ②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17~18、18~19页。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后在船上与随行人员谈笑风生。（摄影/侯波）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武昌洪山礼堂小会议室接见武汉妇女代表。（摄影/侯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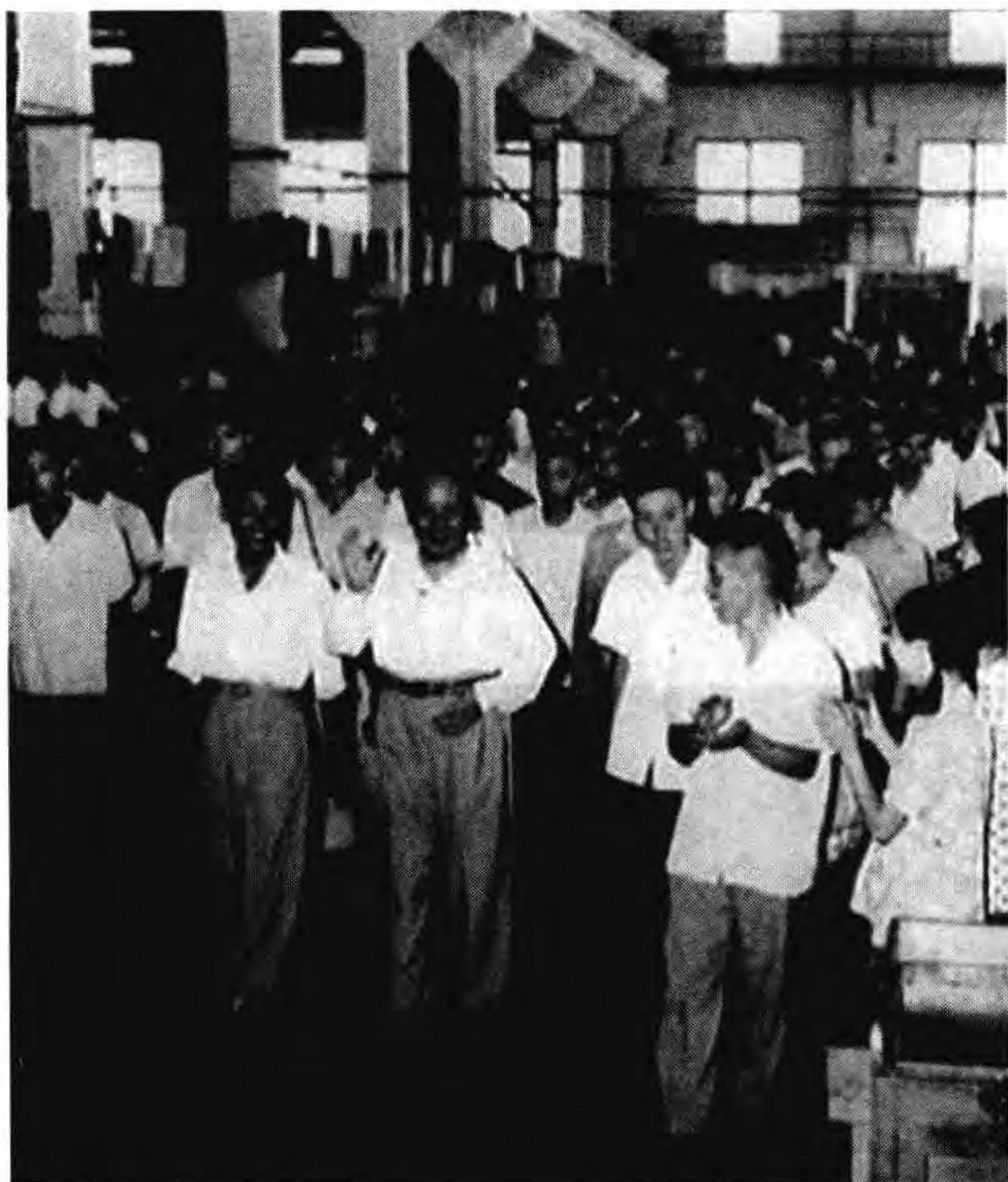
间休息时，武汉市委妇女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请求接见，毛泽东在休息室和她们谈了话。

15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7时吃早饭，张治中到来，与毛泽东在饭桌旁谈话。张治中谈到主席交给他看的文件中波兰大使馆的电报所说的中美大使会谈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毛泽东注意倾听并扼要作了回答。

早饭后，毛泽东在客厅接见了徐海东大将。徐海东长期养病，14日才到东湖来。毛泽东知道后，特别请他来见面。

上午，毛泽东在王任重、张平化陪同下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

毛泽东一进工厂大门，工人们就从四方八面聚拢来，越往前走群众越多。每到一个车间，工人们情不自禁地跟着走，欢呼、鼓掌之声震耳欲聋。人群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
(摄影/侯波)

尽管拥挤，毛泽东还是从容不迫地边走边看边和群众打招呼，一直到上了汽车，工人们还是尾随不舍。

10时左右，毛泽东驱车由武昌至黄石，途中小停，视察鄂城县临江公社棉花试验田。

11点多，到大冶铁山，车子一直开到山顶现场。毛泽东听取了矿山领导的介绍还和工人们握手问好。

下午1时，参观矿山后，毛泽东坐车到黄石市，在中共黄石市委休息吃中饭。吃饭

时谈到钢铁问题。王任重谈到湖北、湖南、河南三省是协作区，中央给的明年的任务，我们估计可以超额完成。在全国来说，明年生产的预定数字也可能超过。饭后毛泽东与当地领导合影。

下午，毛泽东视察大冶钢厂。

一进厂，工人们就蜂拥而来，欢呼声、掌声、呼喊万岁声，淹没了机器的轰隆声，解说的人也无法介绍。王任重、张平化等都被冲散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冲出重围，大家满头大汗，浑身湿透。毛泽东还是那样从容地看着、听着，脸带笑容，不停地向工人群众举手示意。

下午3点多，毛泽东登上江峡轮。当时大雨滂沱，毛泽东冒雨畅游长江，游了十多分钟。

下午5点，要开船了，王任重、张平化、黄石市委书记杨锐来告辞。江边站满了群众，请主席出去见一面。毛泽东刚从江里游泳上船，身上穿了一件打了不少补丁的毛巾浴衣。毛泽东说，“我要换衣服。”有人说：

“不必换了吧？”毛泽东说：“不好。”他还是换了衣服才站到甲板上接受群众的欢呼。上千的人站在江边，热情地高呼，一大群孩子高唱《东方红》，船到江心，才慢慢散去。

毛泽东和张治中坐在甲板上聊天。张治中说：“主席昨夜整夜没睡，今晚最好不要再看文件，好好睡一觉，明天到安徽才好活动？”毛泽东说：“好，今晚好好地睡。”这时，船上一位女同志跑过来和主席握手。毛泽东为张治中介绍：“这是船上的三副。”又告诉他，她是广东人，她有一段艰苦的经历。毛泽东是上次坐江峡轮认识她的。

毛泽东带点感叹说：“还是到外头来多看，多得到一点东西，老住在北京实在不好。”张治中说：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乘汽车去黄石大冶途中与农民交谈。（摄影/侯波）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在黄石大冶铁矿山上。（摄影/侯波）

“您今年外出这次是第五次了吧？”毛泽东说：“是呀。但是五、六、七三个月没出来。二、三、四月都在外，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八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张治中说：“最好全国各省都去一次。您还有哪几省没有去过的？”毛泽东掐指算了一算：“西北三省（陕、甘、青），四个自治区（新疆、内蒙、宁夏、西藏），华北的山西，西南的云南、贵州，都还没有去过。”张治中说：“还是要准备去吧？您如不去，人家又会说您‘偏心’了。不过西藏太远，慢一点。”毛泽东笑了。张治中又说：“到西北最好春秋两季。”毛泽东说：“夏天也好。”^①

下午5点10分，江峡轮离开黄石市。

16日，毛泽东在江峡轮上给王任重写信：

敬挥数字，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此次在鄂，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颂你们一帆风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②

凌晨5时到安庆，船在江上停着没靠岸。曾希圣、黄岩省长坐船来迎。

张治中和曾希圣、黄岩先商量主席到安徽后的行程。经商量，本想在主席到合肥时通知群众站在大道两旁，让主席和群众见面，满足群众的愿望，但考虑到这样容易使群众知道主席的住处，群众一定会早晚站在门口等待见面，甚至欢呼喧嚷，影响主席工作休息。同时估计到合肥时天色不早，所以作罢，决定在主席离开合肥时夹道欢送，较为妥当。商量好，他们一同去见主席。

刚坐下来，毛泽东就问钢铁生产情况，他们作了简单汇报。曾希圣说：“安徽的任务很重，我们正努力完成，不过有些机械供应不上。本来和别的工厂谈好了的，他们没按计划供应。”毛泽东笑着问：“你们和他们订了什么合同吗？”曾希圣说：“有协议的。”毛泽东又问：“签字了吗？”曾希圣说：“没有。”毛泽东笑着说：“口说无凭呢。”又问：“现在你们谁抓钢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2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419页。

铁？你是第一书记啰。”曾希圣答：“是的。八大二次会后我才开始抓，过去没有抓。”毛泽东回过头来对张治中说：“我们过去都是搞什么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农业合作化等，抓工业抓钢铁实际是从今年八月才开始的。我也是党的第一书记，现在才开始抓。”张治中说：“那不一样吧。党中央还有主管的同志，国务院还有主管部门，这几年工业发展也很大，不过钢铁产量是从今年才开始跃进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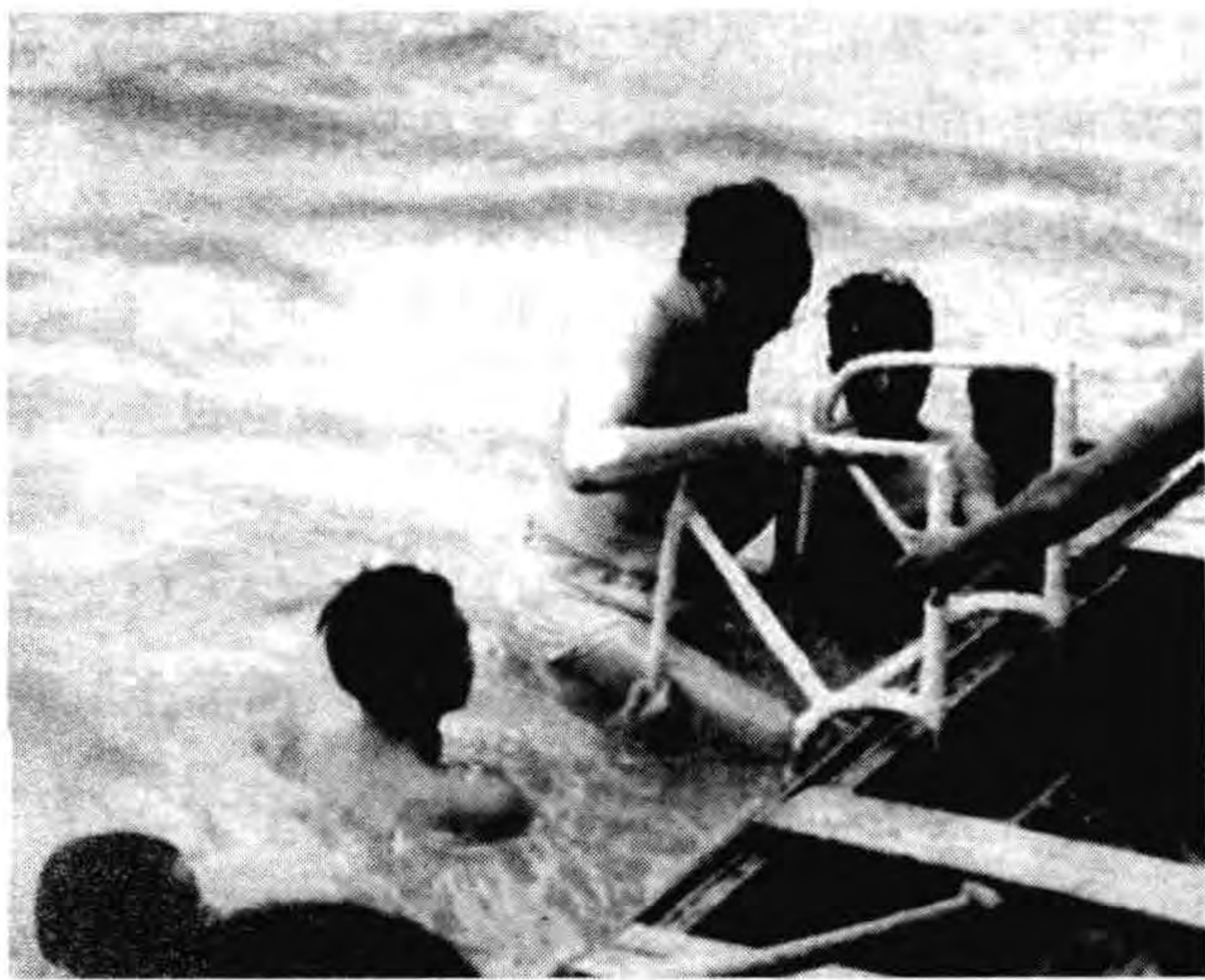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又转头问曾希圣：“你们都在搞小高炉，县里谁在抓？”曾希圣答：“县委书记。”毛泽东又问：“大家抓工业，农业怎么办？”曾希圣、黄岩同时答：“上午抓钢铁，下午抓农业；这叫做一只手抓钢铁，一只手抓农业；工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点头说好。

中间谈到安徽的煤铁贮藏量，曾希圣说多得很。据现在已经查明的，全省68县当中有48县都有铁矿，煤更多。在全国来说，安徽也是煤铁藏量丰富的省份了。

毛泽东突然问起安徽建省年代；安庆对岸是何处。建省年代大家都答不上来。曾希圣说安庆对岸是东流、贵池。谈到贵池，毛泽东就说起和韩信、彭越同时的大将黥布在贵池一带打仗的故事，又说到黥布在洛阳见汉高祖的故事。因而又谈到汉高祖刘邦，谈到朱洪武，谈到曹操，谈到诸葛亮，谈到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长江轮上和湖北、安徽两省第一书记座谈三峡大坝问题。（摄影/侯波）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安庆杨家套江面畅游长江。
(摄影/侯波)

包拯。又由人物谈到地理，如说诸葛亮是湖北襄阳人，原籍是山东，因而又谈到历代地理上沿革的掌故。这次谈话时间很长。

毛泽东在轮船上还与湖北、安徽两省的第一书记谈了三峡大坝问题。^①

这天，长江风大浪高，船上人说是六级大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

“今天风浪太大，不游了吧？”毛泽东说：“试试看。”下水时，大家心里有点紧张，不像在武汉那几次游泳心情轻松。毛泽东终于游完，上船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今天风浪太大，水流太急，游泳不太合适吧？”毛泽东说：“风大流速都没有什么，就是一浪紧接一浪，人在水中得不到一点休息。”^②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张治中在安庆江面与座轮职工合影。(摄影/侯波)

① ②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26~28页。

中饭后，毛泽东和江峡、航川两船职工及陪他游泳的同志在甲板上合影。

11时，毛泽东弃船登车，到安庆中学参观他们的小高炉、电机厂、木工厂等，看他们出铁，看他们劳动和劳动的成品。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曾希圣陪同下视察安庆第一中学。（摄影/侯波）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安庆机关干部建的小高炉。（摄影/侯波）

离开安庆中学，毛泽东到安庆机关干部搞的钢铁厂，看了小高炉出铁。然后离开安庆，往合肥的公路进发。

安庆离合肥，约 180 公里，沿途隔不远的一段路就是一个牌楼，写明庆祝某某公社成立典礼。有人敲锣打鼓或拿着喇叭筒在宣传。许多标语用石灰写在田埂上、墙上乃至屋顶上。农作物生长良好。今年大旱，但从安庆到合肥，沿途不管是平原或山区，都是一片葱绿。许多装了包的粮食一大堆一大堆地放在路旁。黄省长说：“这是准备运上海的。上海粮食归安徽包干，现在运输力量还不够。”

途经舒城县，毛泽东参观了舒茶人民公社。

下午 7 时到合肥。天已经黑了，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张恺帆、桂林栖，省委统战部长姚克等十多位负责同志在大门口迎接，曾希圣一一介绍给主席，毛泽东又回过头来把张治中介绍给大家。毛泽东精神奕奕，并无倦容。^①



1958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在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视察，观看公社远景规划模型。（摄影/侯波）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 34 页。

晚上，毛泽东出席安徽省组织的晚会。这次从北京出来，张治中劝毛泽东，希望也在视察中能抽空去一次黄山。毛泽东问到黄山情况。张治中说，山高路陡，恐怕要坐滑竿。毛泽东说他不愿坐滑竿。在武昌东湖时，张治中又旧事重提，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满脑子装的就是工作，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对于游览风景不感兴趣。6月间，张治中在毛泽东那里吃饭谈话，他谈到从1949年就开始由过去的苦闷逐渐转变为越来越愉快。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我从来就没有那么满意高兴过。要说真的感到有些满意高兴的话，还是从今年开始，看到今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都在大跃进才开始。”^①

晚上，毛泽东给曾希圣写信：

曾希圣同志：

校名遵嘱写了四张，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

合肥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②

17日下午，毛泽东参观安徽展览馆工农业生产展览。

毛泽东对各个展馆都很感兴趣，几乎每一部分都看了，对有些项目还特别过细地看和问，有些还要求当场表演，有时还带点幽默说几句话。比如他看到木制的车床就问：“是做样子的吧？能不能持久？”讲解员表演给他看，证明不是做样子。看到学生们制造的工业品很高兴，一件件问。看到积肥十字诀：烧、熏、挖、换、扫、铲、沤、堆、捡、捞，“积肥没有巧，十字要记牢”，就连连点头说好。看到一个“熏”的积肥模型叫“五龙”抢珠就笑着说：“为什么不可以六龙？”一位解说员解释得很详细，毛泽东就说：“你们很有研究，知道得那么多。”看到淮北（阜阳、濉溪）淮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34、3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420页。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水利馆观看淮北水利工程规划总图。（摄影/侯波）

南淮河四化和江南山区水利化的挂图，他说在武汉会议时已看过，认为很重要，就回头叮嘱曾希圣：“这些图明年开七中全会时你要带去给大家看。”看到许多精美的轻工业品如钢笔之类，毛泽东就含笑对曾希圣说：“你们要抢上海的生意吧？”

曾希圣说，合肥还修了一个体育馆，内有游泳池，希望毛泽东去看看。毛泽东说时间不早，不去了。张治中问主席：“为什么这两天不游泳？”毛泽东说：“我有点伤风。”

汽车沿环城马路走了一圈就回到了驻地。^①

晚上，毛泽东通宵工作，在《钢铁生产紧急会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上作了批示。这天，美国提出一个“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39页。

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也提出要尽快“停火”。美国还动员北欧国家和印度等国，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停火”方案。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对谈判的指导提出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农业展览馆看改良农具。
(摄影/侯波)

建议。到第二天早上8时才睡。睡前托身边工作人员看望张治中。

18日中午，曾希圣请毛泽东吃饭，在座有罗瑞卿、张云逸、副省长余亚农、张治中，还有张恺帆、桂林栖、潘效安等。

午饭后，略为休息，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到毛泽东那里去。

毛泽东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文件，在另一块长条桌上放着许多线装书。张治中说：“您要看那么多的东西？”毛泽东指着长条桌上的书说：“这是你们安徽省通志，他们送来，我只捡了几本看。”张治中又问：“这一大堆文件您都要看吗？”毛泽东说：“我已选了几件重要的先看了。”毛泽东忽然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么？我介绍你看看，这书我找来好久了。”张治中说：“楚辞没读过。我现在脑子坏得很，不但记性坏，悟性也坏，许多古典著作看不懂。我六岁启蒙以后，曾念过四书五经、《左传》和老庄的书，读《论语》时连朱注都读了，但死记硬背，根本不懂。”毛泽东由此谈到《论语》，谈到朱注，谈到朱熹。毛泽东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治中笑着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划归江西了。”毛泽东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他曾经七八百年来都被认作是安徽人嘛。”毛泽东又由此谈到二程（程颐、程颢），说他们兄弟是客观唯心主义，和周敦颐（莲溪）是对立的。又谈到陕、洛、闽、皖四学派，谈到中国的一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如

数家珍。

下午，毛泽东参观中共安徽省委机关干部搞的小高炉群。

据负责同志介绍，这里现在除极少数技术工人外，大部分都是机关干部。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说：“好，这样就可以从干部中训练出许多技术人员。”毛泽东视察了厂的各个部分，看了选矿机，还看到许多男女同志蹲在地下打矿石。这时候，厂的四周围竹篱笆外已经聚集了许多工人和群众。毛泽东隔着竹篱笆向群众挥手致意。^①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视察安徽钢铁厂。（摄影/侯波）

毛泽东又转到安徽钢厂。

最后，毛泽东又参观了农具改良展览会。毛泽东逐件看逐件问，还要求表演操作。这些改良农具包括深耕的、运土的、车水的、播种的、插秧的、收割的，各式各样，种类很多。

毛泽东看了感到很满意。他看到人力推动的剪式收割机就笑着说：“这是推头机。”

18日晚上，毛泽东又通宵工作。次日凌晨2时，毛泽东给曾希圣写信：“请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委员、省政府主要人员（主席、副主席、各厅局长、计委等委员会主任、法院及检察院院长），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开一张名单给我，为盼。”

毛泽东收到用电话传来的周恩来的来信。凌晨4时，复信周恩来：“18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43~45页。

斗争的必须形态。”^①

19日早上，毛泽东托秘书高智将周总理18日深夜来电，和主席19日晨复电，交给张治中阅。

中午，张治中见毛泽东时谈起总理来电和主席复电，毛泽东说：总理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很正确很恰当。

毛泽东这天要离开合肥，张治中和罗瑞卿到毛泽东住处，张治中问主席吃了饭没有。毛泽东说未吃，预备到火车上吃。张治中看到那大堆书籍还摆在那里，问：“要带走吗？”毛泽东说：“不，我只拣了几本准备在路上看。”因张治中问到这些线装书，毛泽东就谈到《四库全书》和纪晓岚，说纪有错删处，但也有一定的贡献。于是又谈到安徽的戴震（东原），说当时戴震帮助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出力不少。

离开合肥前，毛泽东先与住处的服务员照相留念，和他们一一握手说：“谢谢你们。”跟着又和省委、省人委的干部几百人合影。^②

安徽省委安排30万群众，沿街夹道欢送毛泽东离开合肥，从住处一直排到火车站，长达十里，人群密密麻麻。在微雨中毛泽东由曾希圣陪同乘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离开合肥时乘敞篷汽车会见合肥市30万群众。
(摄影/侯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73页。

②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46~47页。

敞篷车缓缓前进。刚进火车站，站在附近的群众看到了毛主席，跟着蜂拥进入站台，拥到车厢旁边，欢呼跳跃，毛泽东已经进了车厢又站出来，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破例让群众夹道相送。毛泽东不管到哪里去，都是轻车简从，不但不要群众接送，就是连地方党政负责同志也不让接送。上火车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今天群众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使人感动。”毛泽东说：“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作主了，是国家的主人了。”又说，“他们都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的美好远景了。”

毛泽东说：“你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我看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①

专列到裕溪口，上船过江到芜湖。本来为主席在船上准备了一个小房间，他不进去休息，却找到芜湖地委书记杨明和大家一起坐在船边谈话，问这问那。

毛泽东在芜湖住了下来。晚饭时，毛泽东从山上住处走到山腰的饭厅

和工作人员一道进餐。饭厅中间小桌上放着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摆了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毛泽东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去盛。毛泽东和同桌的工作人员边吃边谈，添饭时还是自己盛。服务员送来一小碟盐腌的生辣椒，毛泽东尝了尝说：“很好，你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芜湖乘坐我国自己建造的鱼雷快艇。（摄影/侯波）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47~50页。

们都来尝尝。”

20日，毛泽东视察了芜湖造船厂。他看了三个车间，边走边看边问。大概有了过去的经验，他们先把全体工人集合在厂内广场上，主席一进厂，就先和群众见面。群众鼓掌、跳跃，欢呼，而秩序井然。

毛泽东坐鱼雷快艇在江上快速行驶，并观看表演施放烟幕。毛泽东坐在船首，精神抖擞，不断向陪同参观的同志发问。

视察了芜湖造船厂，毛泽东坐车绕芜湖市一周看了市容，然后改乘火车去马鞍山钢铁厂。

毛泽东先参观了五号高炉出铁，再参观转炉。工人群众的秩序非常好。大部分集中到马路上去，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看到毛泽东来了，也只在原地欢呼鼓掌，一个都没离开岗位。毛泽东看完车间后，路过二号高炉的墙报牌，驻足观看，原来是二号高炉“八一”突击队全体同志拟订的生产公约，叫《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公约》，共十条。毛泽东边看边点头，全部看完。

毛泽东离开马鞍山市前，马鞍山市的工人、干部、商店职工、市民，都排列在马路两侧，热烈鼓掌欢呼。毛泽东站在敞篷车上缓缓前进，一路不停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赶到马鞍山，登上专列。黄岩省长告辞。专列启动，离开马鞍山，曾希圣、江渭清、罗瑞卿、张治中与毛泽东长谈，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公司。
(摄影/侯波)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视察炮兵部队。
(摄影/侯波)

一直谈到车到南京。

谈话中，毛泽东风趣诙谐，常常引起大家欢笑。先由江渭清汇报江苏省农业生产情况。这时外面正在下雨。大家都说现在下雨不好，会影响秋作物。有人还说，我们现在抗旱抗水都有办法，但抗雨还不

行。不过科学昌明，相信将来还是有办法的。大家由农业谈到积肥。现在积肥的土办法很多，肥料不愁不够。毛泽东就接着谈肥料的成分，说有人认为土墙没有什么肥料价值，这是不对的。经过风化作用的泥土就有肥效，就能为植物所吸收。又说：“肥料中主要是氮，它和氧不同。氧容易和别的东西‘合作’，如氧化铁、氧化铅，氮就不然，不容易和土壤中的矿物质起化学作用，要‘合作化’是很困难的，你们没听过氮化什么吧？”

话题转移到人民公社和供给制。曾希圣、江渭清都发表了意见，说到现在个别公社已经开始试点吃饭不要钱。江渭清说：“这还需要摸索实践，至于布料、衣服、鞋袜、日用品，就更复杂了。”江渭清又谈到江苏省供给制度的改革，表示将由个别公社开始试点，行之有效，总结经验，反复研究，然后才能逐渐推到县、地、省，最后到我们这些人。毛泽东很留心地听着，听到这里突然笑着插一句：“像我们这些人是最难改革的。”

毛泽东随后又把话题转到军队。谈到在北京开了两个多月的会，大家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来整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把部队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使部队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军队中的军衔问题，军官们把领章、肩章挂起来后，官兵之间就像有了一条界限似的，是不是可以不要？毛泽东又谈道，以后各级军官每年要有一段时间到连上当兵。当官不当兵，不到连上来，怎能知道兵的情形、基层的情形？怎能指挥他们？

江渭清谈到去年台风给江苏带来不少损失。毛泽东笑着说：“你们知道，台风有时也有好处呢。”他举出一个例子，楚汉相争时，刘邦从关中出

兵，一路上很顺利，一直打到徐州，正和文武官员置酒高歌的时候，项羽率领三万精兵突来袭击，刘邦措手不及，大败而逃。项羽衔尾直追，正是万分危急的时候，阵前忽然刮起一阵台风，飞沙走石，天日无光，刘邦才得保全性命，逃回洛阳。大家听了都笑了。

大家又谈到对科学技术上发明创造的奖励问题。江渭清、曾希圣两书记都表示以后奖励不一定要用金钱物质，给予精神上、荣誉上的鼓舞也可以，例如开会表扬、报上发表、宣传推广等等，其作用往往比金钱物质要大，也是发明创造的人所愿接受的。由此又谈到学位问题，对有发明创造的人应不应该给予博士、硕士、院士等头衔。毛泽东笑着说：“古往今来这样多历史人物谁是拿过博士学位的？孔夫子是不是博士？屈原是不是博士？”

毛泽东指着张治中笑问大家：“你们知道他的号为什么叫‘文白’？我也是今年夏天在北戴河才知道的。他本来当过预备警察，取名叫警魄，后来不当警察了，此名也不用了，就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魄字中取一个白字，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造人呢！”引得大家哄然大笑。^①

下午8时，毛泽东到南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还有省上几位负责同志在毛泽东住处门口迎接。

晚上，江渭清要求毛泽东在南京停留一天，并准备了一些活动。

第二天凌晨4时，毛泽东给江渭清写信：“如天气好，我也许今天去杭州”。^②

21日，毛泽东临时决定要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往杭州。曾希圣书记飞回安徽，张治中和罗瑞卿送他出门后就一同到了毛泽东住处。江渭清等都在座，谈钢铁生产问题。

毛泽东拿着北京送来的河南省小高炉炼铁的材料和冶金工业部钢铁生产情况报告的摘要念给大家听。毛泽东指出，今年只剩了三个半月了，他对1070万吨钢的计划能否完成表示担心，然后说：“像河南的许多的创造性的方法应该在全国推广，互相交流。”还问大家，“这是北京18日发的通知，你们接到没有？”大家都说没收到。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2时。^③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5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423页。

③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59~60页。



1958年9月21日，毛泽东和许世友等在南京。（摄影/侯波）

下午2时，叶子龙来告，时间已到，请主席上车。毛泽东还没吃饭，准备到火车上吃去。但南京军区正召开代表大会，有一千多人，连同省市机关干部共约三千多人，他们要求主席接见，已集合在大礼堂。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军事学院院长廖

汉生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后就站着问起话来。

毛泽东问：“你们对于各级军官每年下连当兵，受班长节制，同士兵同吃、同住、同训练的办法怎样？”许世友答：“我们一定照这样做。”毛泽东又问：“你们正在开会，好不好对此作出决议？”许世友答：“当然可以，我们也准备这样做。”张治中在旁边插嘴说：“我今早看报，杨得志上将已经下连队当兵，《人民日报》还登载一篇师长、政委下连当兵记的文章呢。”毛泽东说：“是呀，我看了标题还没看内容。”叶子龙说：“杨得志还有信报告主席呢。”^①

随后，毛泽东到军区大礼堂接见了参加南京军区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说：“我不讲话了，我要到上海去。”

从大礼堂出来，江渭清等要到火车站相送，毛泽东一再说：“不要去，不要去，那有什么意思？用不着。”南京方面听说合肥群众夹道欢送，也想这样做，毛泽东没有答应。

登上专列，毛泽东吃饭，其他同志休息。一个多小时后，张治中和罗瑞卿来到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没有休息，手上拿着一本《三国志》在看。毛泽东告诉他们：“《三国志》不错，看起来很有意思。”张治中想起在武汉某次晚会听到的相声《歪批三国》，就从这里打开话匣子。毛泽东想起来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60页。

也大笑：“编相声的人对《三国演义》是相当的熟。他们说《三国演义》中三件奇怪的事，指出诸葛亮一年四季不管冷热手上都拿把羽毛扇，真好笑。”由此而谈到《三国志》的陈寿，谈到周瑜、鲁肃、曹操、刘备、孙权和曹操、刘备的评价。接着又谈到赤壁之战。谈到刘备入川，干部少而弱，南方干部多，北方干部太少。谈到曹操并不姓曹，关羽并不姓关。

最后谈到《三国志》中的周瑜、鲁肃、吕蒙合传。毛泽东说：“这个合传特别是吕蒙部分不可不看。吕蒙是行伍出身，以后孙权劝他念书，做了东吴的统帅。”然后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罗瑞卿列举许多高级军官过去都是行伍出身的。张治中提到陆逊，毛泽东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关羽攻曹军手上的樊城，吕蒙用计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现在的宜昌），南郡太守糜芳投降。关羽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进城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损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派来的人很优待，使他和将士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

毛泽东谈到陆逊的儿子陆抗，孙子陆机、陆云，这两兄弟在晋代是有名的文学家。又说：“陆机的《文赋》是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只是写得冗长些，能压缩一半就好。陆机写文赋时很年轻，才二十岁吧。”张治中说没有读过《文赋》。毛泽东说：“范文澜也没看过，我曾告诉他看了。”^①

专列途经上海，柯庆施来接，请毛泽东坐车到中苏友谊馆吃晚饭。

刚坐下，毛泽东就问上海钢铁生产情况，同座的一位同志做了扼要的汇报。据说上海的任务较重，铁矿石和煤分别取之于鞍山、本溪和安徽，最近运输紧张些，但相信一定能完成并且争取超额完成任务。毛泽东注意听了。张治中想起南京的情形，便问柯庆施：“南京大搞小高炉，连小学、街道居民都在搞，小学生和老太婆都参加，上海怎样？”柯庆施笑笑说：“也是一样。”毛泽东问张治中：“你怎知道小学和街道都在搞？”张治中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61~62页。

说：“我的弟媳是小学教员，是她告诉我的。连星期天都不休息。”随后又谈到上海的粮食供应情况，毛泽东回头对张治中说：“上海粮食归安徽包干，你是安徽人，有资格到上海来受接待。”

在饭桌上，毛泽东不断提出问题，还问到根治血吸虫病进行得怎样。同桌另一位同志答：“原定一年准备，四年根治，两年扫尾，今年是进入根治的第二年了。”又说，“现在治疗的方法简单多了，既不要住医院，治疗过程也短得多，每三天两天打一针，并不妨碍生产。现在对消灭钉螺处理粪便的方法也多，但是也有一些困难。”毛泽东当即指示：“我们一定要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现在，我们如果有一千万人患血吸虫病，就会有九千万人受到威胁。就如同我们同桌吃饭十人中有一人患这个病，其余九人都受到威胁一样。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性非常大！”

毛泽东还问到人民公社的情况。同桌另一位同志答：“各区正在纷纷建立中，今天一个拥有七个乡一万多户的大社才开过成立大会。”柯庆施说：“人民对公社非常欢迎，热情很高。”

晚饭后，毛泽东参加了晚会。柯庆施希望毛泽东能在上海歇下来，毛泽东没同意，就在门口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说：“下次再来看你们。”上了火车，张治中问毛泽东：“您要开始工作了吧？”毛泽东说：“今晚看看书吧。”^①

当晚，毛泽东离开上海去杭州。

车行两小时45分，到达杭州。张治中又到主席车厢，毛泽东还在看书。张治中说：“您沿途太累了，这次到杭州要好好地休息几天。”8月间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对张治中说准备到杭州休息一个星期。张治中说：“您经年累月都没休息，一个星期太少，两个星期吧？”毛泽东说：“看情形吧，或者十天。”但是今晚毛泽东说：“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了，最多五天。”又说，“你这几天怎样活动自己安排去，我们‘分道扬镳’吧。”^②

在杭州，谈到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说：“八月失败”怪不得陈老总，他事先有报告，事后有检查，主要责任在湖南省委，军队内部主要是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导致了“八月失败”。^③

① ②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63~64、65页。

③ 毛岸青、邵华主编，李林达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情满西湖》第280页。

22日，毛泽东就周总理来信提出“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当天回复：同意对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处理。你“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①

23日，叶子龙找张治中，说毛泽东要请他和罗瑞卿去见面。毛泽东谈了这两天的活动。他们怕影响主席休息，坐了一会就告辞了。毛泽东一直送他们出园门口。张治中说：“主席不要送了。”毛泽东说：“我也要走几步。”快到园门口时，毛泽东问身边的罗光禄秘书：“江华回来没有？”罗光禄回答：“今晚或明早回来。”毛泽东用关怀的口气说：“现在他们任务重，很紧张的。”^②

晚上8点半，江华从外县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一直谈到深夜。

26日晚上，江华请毛泽东吃饭，张治中、罗瑞卿应邀陪同。

到主席住处，毛泽东见张治中就问：“你这几天游了什么地方？”张治中列举了游过的“三潭印月”、“灵隐寺”、“花港观鱼”、“平湖秋月”、“孤山”等等。毛泽东又问：“南北高峰你没有去吧？”张治中说我跑不动，又没有滑竿，所以没去。毛泽东说：“还是能走上去的好。北高峰我上去过四次了，南高峰和其他许多山都上去过了。”他还列举了许多山名，张治中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张治中问：“有路上去吗？”毛泽东说：“有山就中。”张治中说：“有没有滑竿？”毛泽东指着自己的两腿笑笑说：“我有这两条滑竿。”

罗瑞卿还告诉张治中：“昨天江华书记来看过我们，刚好我们都外出。”毛泽东一看见就给张治中介绍：“这是江华同志。”又说，“他不姓江，姓黄。”原来他叫黄春圃，湖南江华县人，江华是他做地下工作时取的名。毛泽东又为张治中介绍省委书记霍士廉说：“是霍去病的霍。”又转头向霍说，“你大概是霍去病的后代吧？霍去病在汉代战功很大，可惜二十七岁上就死了。”话题又转向浙江省副省长吴宪，毛泽东笑着说：“他这人很厉害，口衔天宪。”大家都笑了。在座还有一位副省长叫陈士达。席间边吃边谈，谈笑风生，大家很高兴。谭震林看了钱塘、绍兴、宁波等县的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424页。

②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65~66页。

业生产情况，席间向毛泽东作了简略的汇报。他下半年视察了很多省份，据他估计，今年全国粮食产量将有飞跃。

毛泽东刚到杭州时原说过要大睡三五天，据说还是一天只睡四五个钟头，只有两天睡得还好，能睡到六个钟头，但26日一直到上午9时还没睡。毛泽东出来后每夜所看的和批阅的材料文件并不比在北京的时候少，所少的仅仅是会客、接见。毛泽东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学英文，一有时间就看书，他说看书对他是一种休息。这次他带了两箱书出来，古典的、现代的都有。有一次张治中看他在看古本《三国志》，又有一次他在看关于冶金工业的书。毛泽东对张治中说：“这是炼钢铁的书，你是人民代表，也应该看。”^①

27日下午，毛泽东给张治中来电话，说要张治中7点半去吃晚饭，饭后上车回北京。

毛泽东在住处特别准备了几样菜，同座有江华和夫人、霍书记、吴副省长、陈副省长、张治中和罗瑞卿等。席间闲谈，张治中先说：“今天是中秋节，月色很好，恐怕湖上游客很多吧？”意思是想动员毛泽东在离杭之前赏玩一下西湖月景，但毛泽东只说：“是的，是中秋节呀。”话题马上又转到工作上来了。江华谈到浙江煤、铁贮藏量都不算大，已探明的铁矿少，他要求把安徽的广德和江西的玉山划归浙江，来增加煤、铁藏量。毛泽东听了笑对张治中说：“你是安徽人，你和他们签个字吧。”大家又谈到浙江虽然煤、铁蕴藏量不大，但还是个富裕的省份。毛泽东说：“是嘛，我们现在一个省面积这样大，又有这样多省份，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中国历史从秦始皇大一统后，地方上连一点权力都没有，就影响到地方的发展。那么大的国家，一个中央那能管得这样多？同时买酱油的钱就不能打醋，那怎么行？”然后又谈到钢铁问题，省上同志还是表示很紧张，但是全民动员，相信三个月后能争取完成任务。谈话结束时已经快晚上9点了，毛泽东和在别处一样，不让他们到火车站相送，就在门口握手道别。^②

晚上9点多，毛泽东登上专列离开杭州去上海。

当晚12点多，专列途经上海，柯庆施和两位副市长登车迎接。叶子龙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182~183页。

②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68页。

通知张治中：“到上海了，主席等着大家一道下车参观钢厂。”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夜梦初醒吧？”略谈一会儿就坐汽车直趋上钢一厂。

28日凌晨1点多，毛泽东视察上钢一厂。转炉正在出钢，毛泽东和钢厂负责同志一一握手谈话，机器声人声太嘈杂。工人们听说毛主席来了，都纷纷集拢来，情绪热烈。

参观完上钢一厂，毛泽东登上专列，柯庆施和两位副市长都希望他留在上海过国庆，和群众见面，毛泽东说他已和北京说好，回去还有许多外宾要会见。

火车开动，张治中和罗瑞卿在主席那里又谈了一会儿，凌晨4时，各回房休息。毛泽东整天没有睡，靠在床上看书，晚上9点张治中约罗瑞卿去看主席。一坐下张治中就问：“听说您一天没睡？”毛泽东说：“已睡了一个半钟头了。”

原来预订火车到天津时参观天津钢厂，罗瑞卿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算了吧，还是直开北京吧。我现在有点伤风了，如果在天津还活动一天，伤风加重，就不能上天安门了。”^①



1958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钢铁厂视察。（摄影/侯波）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70~71页。

晚上，专列途经天津，林铁和刘子厚省长等到车上来看毛泽东。林铁汇报了钢铁生产情形。毛泽东很注意地听。林铁又谈到除四害情形，说河北已出现很多四无乡，如张北县的一些乡，大家去看过，中央检查团也去检查过，确实是做到四无。又说，有一个乡全年只有一个人害病。毛泽东说：“当初我们倡导除四害，并没有什么把握，现在看起来，作用很大。”罗瑞卿看时间不早了，便提议结束谈话，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①

29日凌晨3时8分，专列到达北京车站。

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对记者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毛主席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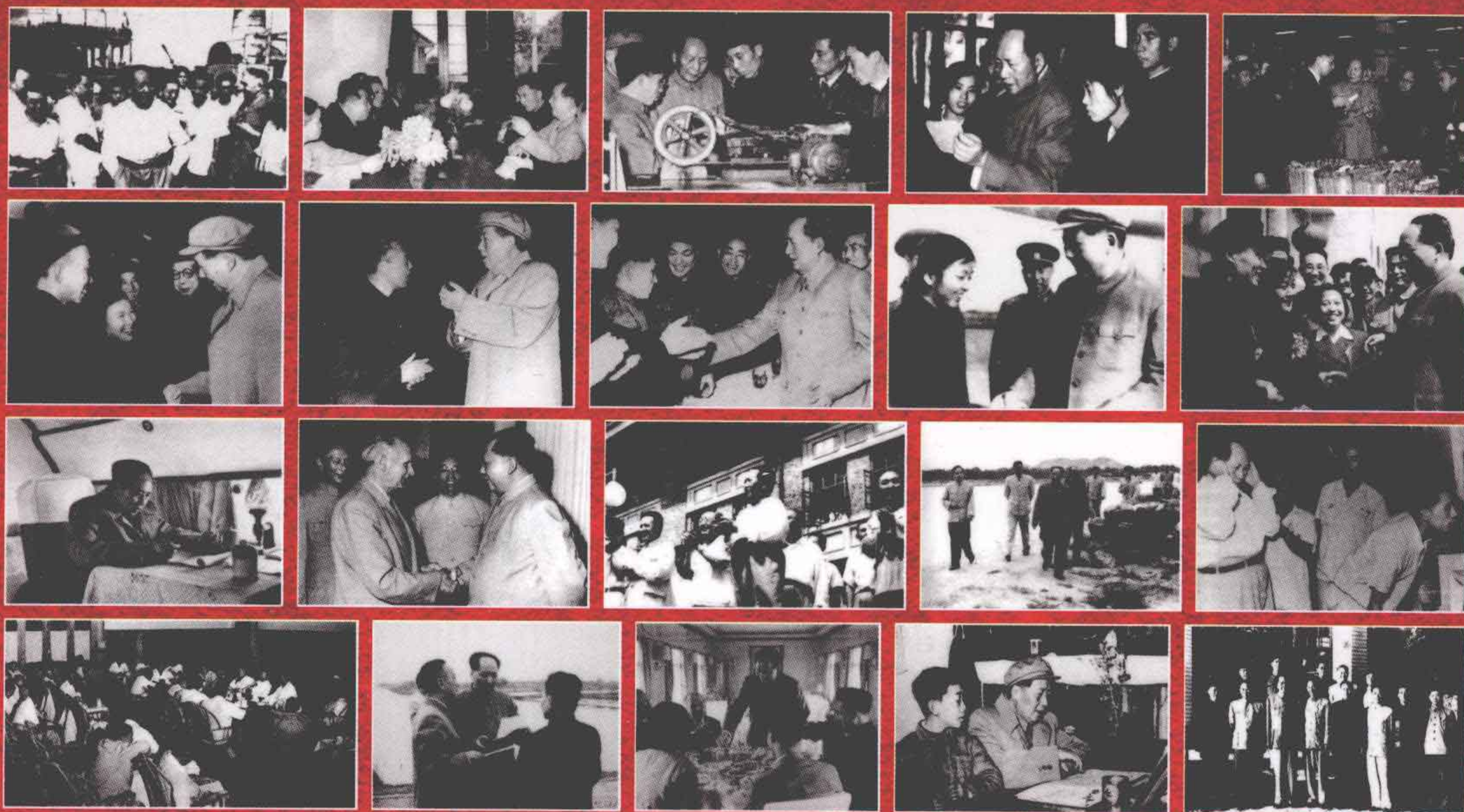
① 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71~7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429~431页。

毛泽东

离京巡视纪实

1949—1976



上架建议：领袖人物

ISBN 978-7-5115-2129-3



9 787511 521293 >

定价：168.00元(全三卷)